目次

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後

第五章　歐洲往來

第六章 政治生活第一章

第九章　兩次粵變的內情

第十章　反獨裁政治與擴大會議

第十一章　汪蔣合作

第十二章　國難政治的經營

第十三章　乙亥蒙難

第十四章　西安事變以後

第十七章　脫離重慶

歷史與人物（代序）

歷史的構成不能脫離其人格化的條件，我們讀世界史固可以文物的進化來劃分時代，例如新舊石器時代，銅器時代——等等。然而即在這種歷史階段的劃分方法中，總不能脫離人的要素，只是彼時人和歷史的存在關係，是羣的性格強於個的性格而已。所謂原人時代都是如此。除了以文物的進化來劃分時代的階段之外，更有以政治的潮流，經濟的制度，文明的傾向等等來劃分歷史的。然而無論以任何分法來區別歷史階段，在每一歷史部門的決定點，總得有以一種人格的代表，以作歷史階段的里程碑。政治史也好，經濟史也好，文化史也好，世界通史也好，一個史家每當寫到一階段歷史的轉振點和決定點時，他不能不以時代人物來作爲某一歷史階段的代表者。在政治史上是如此，在經濟史上是如此，在一切部門的歷史均莫不如此。偉大的時代思潮，偉大的歷史運動，必然有其結晶化的偉大的人物同時並存。不管是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歷史與人物，始終保持着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

人物傳記所以得在龐大的學術領域中得以獨樹一幟者，正就說明着歷史對其本身的要求。傳記文學在文學的領域中始終保有其不移的地位：歷史像滾滾的長江流水，前浪逐後浪，時代的人物去了又來，時代的潮流新陳代謝不息。然而那怕世事滄海桑田，幻變無極，惟人格化之歷史的里程碑，却始終成爲悠悠歷史洪流中的中流砥柱。而且更有意義的是，歷史的事件雖必然隨時代的變遷而在後人的

記憶中給沖淡了或消逝了，我們縱可從若干歷史的文物或文件中去溫故知新，然而總不能從如斯的文物或文件中獲得一種現實性的親切感。我們現在去讀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史，讀民主主義的政治運動史，還不如去讀一本亞當．斯密斯的傳或盧騷的傳；我們現在與其去讀普法戰爭的史實記載，或若關於大革命的歷史，倒不如讀俾士麥的自傳，或拿破侖的傳記野史來得有味，親切而實感。蓋因歷史的記載，縱記載的歷史的典型事件，然一個歷史人物的紀錄，卻更具歷史的典型性。這裏便成立了傳記文學的需要。

歷史的事件與歷史的人物，就是構成一部人類歷史的經緯。我們欲瞭解歷史的事件，欲研究一時代的思想或潮流，我們就不得不求之一時代的代表人物的生活種種。盲目的英雄崇拜論在這個時代固無必要，但瞭解一個劃時代的歷史的巨人，無論從個人的修養以至世事經緯的把握，都有其必要。講到歷史教訓這一點，歷史人物的紀傳比之歷史事件本身尤來得感格深刻，凡是讀過偉人傳記的人，對此都不會否認。筆者甚至認為偉人傳記的存在價值，較之歷史事件的存在價值尤強烈。良以歷史事件的本身，在其擔卻一時代歷史的發展使命之後，其存在已不足重要；歷史愈古遠，其存在的意義愈是文化的意義重於歷史事件本身的意義。荷馬的二大史詩既囊括了古希臘的歷史輪廓，亦包蘊了他自身的記傳：「舊約」的影響所以不及「新約」來得深刻，因為前者是一部民族史的成份居多，後者卻是一個人物記傳的成份居多。歷史愈成過去，而歷史人物的價值亦愈見永垂不朽，人物傳記的重要性，就是在於其是歷史之里程碑的一點。離開了歷史的人物而談歷史是不能想像的。

然而歷史的人物是否一定要等到他所代表的時代成為歷史的過去時，始能予以肯定呢？時下所謂

蓋棺論定，似乎就按着這樣意思。但我們認爲一個偉人的歷史的不朽性，雖有待於歷史的證明，惟一時代的經綸人物，其歷史代表者的性格，是在其生存的時期中即給肯定了的。許多偉人自傳的產生，可說就是這種性格的自覺。自我的吹噓或別人的捧場均不能成立人物傳記的價值。經綸人物所以成爲經綸人物，端在他能綜合時代的性格於一身。這…如偉大的文學作品是偉大時代的反映一樣，偉大的人物也是偉大歷史的典型結晶。拿破侖戰爭的史實記錄，遠不如托爾斯太一部「戰爭與和平」來得給人深切的感情，但假定拿破侖在放逐聖厄那島的悠悠長夜時期，能完成一部自傳的話，則其給於後世的教訓恐較「戰爭與和平」更要來得深刻了。姑置文學的意義不談。反之，我們讀托爾斯太的傳記，比之單單讀他的作品，尤能深感人生殺護的啟發。傳記在文學的部門固如此，在政治及其他部門的情形也還是一樣。例如思想史或哲學史，單單從人間思維史的發展加以探討是乏味而也無甚意義的，讀思想家的傳記就遠爲有所得。我們如果對此電氣時代的發源深感興趣，此種興趣將因讀愛迪生的傳記而倍增。

我們這裏所欲紀述的，不是純粹的思想家，文學家或科學家，而是一位當今中國的代表偉人——汪精衛先生。汪先生的偉大不在他自成那一家，而在於先生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中一位典型的經綸人物，由先生既往並現在繼續爲中國奮鬥的事實言，其在現代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是已經確定了的。就一個衛存的時代人物言，方今先生正是各方面毀譽的集中點，但時代的毀譽不足爲一代偉人的歷史評價，一代偉人的歷史評價是其畢生的事業。人格與歷史的綜合，就是偉人所以成爲偉人的基本條件。先生自當年鋃鐺縲絏成傳誦一聯至艷電登高一呼，其爲中國奮鬥，其爲民族犧牲的事業與精神，無論

毀之者試學之者，總不能加以抹殺。不能抹殺的歷史事蹟，配合不能抹殺的人格精神，就是構成一代偉人之所以為偉人的基礎。先生雖不是純粹的思想家或文學家，但卻是現代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位偉大的鬥士。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等等，其所以偉大，無非因其對於人類文明史的貢獻，但一位偉大的革命鬥士，為國家獨立與民族生存奮鬥的鬥士，他的偉大除了間接保衛文明外，更含有保衛國族生命的現實的意義。說先生是中國現代的革命思想家，則先生除了是三民主義思想的繼承者外更是其執行者；說先生是當代的一位文學家或詩人，則先生除了道德文章媲美之外，還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實踐者。我們現在為先生試作一部傳記，其動機決不在就人論人，就人論人不免夾雜主觀的成份，我們的動機是在想就先生畢生的事業奮鬥過程中，客觀地闡明先生在現代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及其業蹟，為一代的經綸領袖完成一座造像。這造像也許是粗疏的，因為我們所根據的材料僅是一些不甚完全的文獻。但我們深感當此新的中國方在誕生前夜的陣痛時期，對於新中國的唯一個領導者是怎樣的一個人，實不能不有一個較深切的認識。那怕我們所有的材料尚不完全，但根據既有的文獻和事實，加以組織與造像，仍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講到傳記，自傳當然較一切傳記為正確。不過許多畢生為事業奮鬥的偉人，要求他們有餘暇寫自傳是很少可能的，許多偉人的自傳都是晚年退休生活後所作，惟彼時也許因記憶力衰退，故所記或未能詳盡；或因晚年的人生觀與生活興趣有所偏向，故其記載或是片斷的，主觀的。不過講到正確，自傳當然更具可靠性。先生自二十二歲加入同盟會迄今，三十餘年來為國族奮鬥未嘗稍歇，雖然著作等身，卻還沒有自傳問世，這一部分固由於終身革命，無暇為此，但先生的自謙，恐怕也是一個

原因。一個革命家對於其個人的一切，往往不加重視，世間獨有革命家缺少自傳，就是由於這種緣故。惟先生在民國十三年一月號的「東方雜誌」上，曾應該誌所請作過一篇簡短的「自述」，在「自述」中，先生曾約略記載其家世的經緯與幼年生活，並參加革命的機緣。先生在同文中曾說：「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講和論說，當做自傳，是再誠實的，不必另外再作自傳了。」先生早年因家境清貧，出世甚早，二十歲時至日本留學，不久即參加革命。故先生紀傳的適當根據，是先生的文章與其事業。現在我們這篇傳記，除以先生的那篇自述為一基本的參考文獻之外，在敘述先生生的奮鬥過程中，將多多引述先生的文章詩詞以及其革命事業，因為我們與其採用一般的傳記風格，以個人的素描為重點，無寧注重其文章與事業為得當。

最後，著者願意鄭重聲明一句，如前所述，本傳在寫作的過程中，不免有許多錯誤與遺漏，這是因為寫作的材料僅賴文獻，寫作的動機不是私人的感情而只是對一代經綸人格與事業的景仰，所觸既狹，所見既少，錯誤遺漏自知難免。然而卻正因為有這些條件，寫作的客觀性將能充分保證的。但仍希望在寫作的過程中能獲得更周詳珍貴的材料。如果我們的工作能為今日追隨先生左右以建設新中國負任的鬥士們益增對於先生的信心，那便是我們工作的莫大收獲了。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日。

雷鳴

第一章 一個革命鬥士的誕生

幼年時代的經緯

像所有的偉人一樣，幼年家庭環境的感格，對於先生一生事業的經營，具有最根本的決定影響。先生世籍是浙江山陰縣，祖父以上，墳墓都在山陰。其先系出唐越國公華，元末自婺源遷山陰，明正德中有諱應軫者，著青湖文集，是爲十二世祖。曾祖蚧，敕封文林郎，祖雲，舉人，遂昌縣訓導。至先生尊翁省齋公（諱琡），始遷至廣東番禺。先生的尊翁何以忽從世代所居的原籍山陰而遷移到廣東去，這原因現在我們無從明白，大概是不出迫於經濟生活的要求。蓋據先生自述，其尊翁直至七十歲的高齡仍不得不自己掙錢養家，則先生家庭景況的清寒，於此可見。據若干文獻所述，在先生尊翁一代，有前駐日公使汪大燮的父親某氏，在廣東省某處任知縣，此一汪姓亦爲浙江人，當時先生尊翁的來到廣東，據說就是投奔於此知縣的幕下。後來汪知縣在任中過世了，先生的尊翁便就在廣東番禺住下。先生的尊翁來到廣東時，業已與同鄉盧夫人結縭，生有一子三女。先生的生母姓吳，才是廣東人，生有三子三女。先生在弟兄行中列四，連姐妹在內則排行宋次第十。先生本人生於清光緒九年，西曆一八八三年。當先生出世時，他的父親業已六十二歲。他的父親年事雖高，但不僅在七十歲時猶自行經營家計，且還親自担任教育子女的責任。先生自己會回憶他的父親是一個勤學的人，七十一歲以後，雖擬坐蒙館，耳犯重聽，但每當先生傍晚由書塾放學回家後，他的尊翁必親自課督，令先生

讀書習詩，例如誦讀王陽明的「傳習錄」或令習吟陶淵明與陸放翁的詩等，直至背誦得出，他的父親方才表示滿意。有時先生的尊翁自己苟有所作，亦必命先生筆記下來。同時亦十分注重習字，每令先生每天在一塊白漆木板上寫上三四十個大字。今天先生的文章詩詞及其挺秀的書法，雖是後來繼續進修的結晶，但幼年時代的嚴格家庭教育，實早爲先生奠下了基礎。

但給與先生影響最深刻的，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他的母親。汪老太太雖在先生十三歲時即棄世仙逝，但她給與先生的人格影響，比之遲一年病歿的他的父親來，尤較深刻。先生在後年回憶起他的身世時曾這樣感嘆過：「我十三歲母親病歿，十四歲父親病歿；依戀父母的光陰，統共只得這些，其間還除去在襁褓中無知無識的時候，算來不過十年。」而提及他的母親來，先生尤表示無限傷心，他說：「我的母親，提起來，眞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只是沈浸在憂勞兩個字裏：家計的艱難，家事的瑣碎，以及在家庭內所受的閒氣，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湧現於眼前。我有一卷「秋庭晨課圖」，並有一段跋語，將我母親的生平以及我幼時的光景約略寫出。」

是的，先生的母親是一個中國型的典型良母。她雖不得不掌理艱難的家計，然而對於子女的教育，仍不時親加督勵。然天不假年，汪老太太經過四十四年的辛勞歲月，在先生方十三歲時即撒手歸天了。後年先生每有感觸，對於他母親的死得太早，總不勝淒然。先生在十四歲時曾有「重九游西石巖」（巖在廣東樂昌縣城西北）一作，初次表現了他的這種感情：

笑將蓮響答清吟，落在萸囊酒在襟。天淡雲霞自明媚，林空巖壑更深沈。衆黄搖落騷人感，碑版勾留尋古心。咫尺名山時入夢，倘逢佳節得登臨。

秋庭晨課圖的故事

先生對他母親思懷心切，每恨不能報答。前述的那幅「秋庭晨課圖」，是先生畢生最珍視的一份財產。先生於母喪後六年即離國赴日，十年後還到故鄉，想搜尋一些他父母的遺物，但除了他父親的一些書跡外，竟不獲絲毫紀念他母親的遺物。後來先生即委託畫家溫幼菊氏畫了一幅「秋庭晨課圖」。該圖據先生自述，是寫的他九歲時候依依膝下的情態。時間是在秋天的一個清晨，庭中芙蓉亂開，先生正在由她的母親課教中。據後來先生自述，在他每當思念及自己的子女時，眼前就不免要浮起他母親憂悒的音容。他還記得他在童年嬉戲時代，雖尚不知憂慮爲何物，但每次看見他的母親以私飾典質，以維家用時，他的幼稚的心靈中就不免發生一種異樣的淒痛感。在此次中日戰爭南京失陷前，先生往漢口時，怱忙之際於任何東西都不及攜帶，但唯有這幅「秋庭晨課圖」則始終攜之俱行，未嘗忘記過。

不過現在先生所有的這幅「秋庭晨課圖」，並不是溫幼菊氏畫的。溫氏的原畫似爲民國十一年時所作，因先生附圖原詞，爲民國十一年三月所書。玆將先生當時原詞照錄如下：

右圖，兆銘兒時依母之狀也。其時兆銘年九歲，平旦必習字於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爲常，秋晨蕭爽，木芙蓉娟娟作花，蘿蔓於壁上，距今三十年矣。每一涉想，此狀如在目前。當時父年七十，母則四十；父以家貧，雖老猶爲客於陸豐，海道不易，惟母同行，諸兒姊皆不獲從；以兆銘幼，挈以自隨。兆銘無知，惟以依膝下爲樂。有時見母寂坐有淚痕，心雖戚然不寧，初不解慈母念遠，心苦若也。嗟夫！豈特此一端而已，兆銘年十三而失恃；於母生平德行能知者幾何，於母生平所遇之艱難能知者又幾何。母雞鳴而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覈，往往宵分不寐。兆銘惟知饑則索餅餌，飽則跳踉以嬉，懵然不知母

之勞瘁也。歲時令節，兆銘遂驟兒嬉戲而忘倦時，見母蹙額仰屋，徵歎有聲；搜篋得衣物，付傭婦令質錢市果餌；及親友至，則做語笑款洽，若無所憂者。兆銘亦忽忽不省意，不知母何爲而委曲瑣屑若是也。母所生子女各三人，劬勞太甚，諸子女以此長成，而母亦以此斲其生，不獲終其天年，悲哉！兆銘喪母後六年而去國，凡十年，乃得歸，歸而求父之手澤，蕩然無得尺寸，求母之遺物則猶有存焉者。因以兒時所得之印象告之溫幼菊史，乞繪爲圖之，庶幾後子雖一生一死乎，於圖中猶窺聲音也。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　汪兆銘謹識

原圖不幸於民國二十年秋間遺失，現在的一圖，是方君璧女士所作，先生對此曾有說明如下：

溫圖於二十年秋間失去。題詞書於十二年一月，當時什襲珍藏，未付裝潢，故幸未與溫圖同失。方君璧妹精繪事，且曾見溫圖，乃於二十二年十二月爲更作此幅，與題詞合爲一卷，並重錄跋語及題句附於其末。

兆銘再識

這裏所說的題詞，係廖仲愷先生作，原詞如下：

紅花綠樹繞堂西，故園風景依稀，學書曾記作鴉飛，解得慈頤。　母兮已謝塵寰，人間何處春暉，萱闈只當窗臨軒，夢也懷其。　調寄畫堂春。

前詞意尚未盡再賦一解

一枝紡線翠，正衣綫停指閑課經字，髫齡問難，傾談高妙語，食牛吳蠻，淋漓滿紙早博得慈顏嘗喜，字當時猶是花存，萬物都隨逝水。往事！文章一代，勳業千秋，恭種難繫，幾回寂對，抵多少，嗟此與恩，只粉墨痕猶殘花漬，卜得君家人事，撫蘭孫玉立成行，恍猶慈顏。　調寄瑞鶴仙爲

精衛四兄題秋庭晨課圖　仲愷

在中國舊有忠孝不能兩全的說法，目的在鼓勵忠君報國的思想；擴而適用於一般當於教養的習俗，其目我國傳統的精神，督勉她們的子孫。但就爲人子者言，凡能盡孝者，也必然能盡忠。蓋因忠孝

的新舊雖有成敗之別，然其感悟的大實則一。

「子曰先生」與童年時代的教育環境

先生家庭的經濟情況，在他父親在世之日本已十分艱難。自他父母相繼過世之後，其窘苦當然更深一層。他父親死時先生十一歲，方離散學。這一事實已够說明了一切。關於此點，先生在其後年所作一自傳簡約中「自述」中曾這樣說過：「父親死後，並無遺產，我衣食住之資，都仰給於長兄。至十七歲，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得十元脩金，兼去各書院應試，往往取得優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銀二十元左右。十八歲三兄病歿，十九歲二兄病歿，和兩孤嫂一孤姪，持此度日。」

先生早年時代的家庭景況，正如那時所有中國舊時代的大家庭一樣，在舊中國開始迅速崩潰的過程中，不得不同受時代的浪潮所打擊。先生出生於遜清光緒十年（西曆一八八四年）。是年四月清廷派李鴻章在天津與法議和，五月和俄國簽訂喀什噶爾西北界約，七月而清法戰爭又作，法艦攻閩封臺。自從一八四〇年代鴉片戰爭後列強對華侵略的激流，此時正達空前的高潮，在先生自出生至十七歲這[illegible]歲止，先後有清法之戰，中日之戰，英國侵略緬甸兼及西藏，以及俄國窺伺北疆。至於國內一面，則亦常有對內的動亂，興中會初期革命的醞釀，以及康梁變法運動與義和團之亂。先生家庭所遇的時代，先生童年生活的時代背景，就是這樣一幅混亂不寧的景象。先生雖自述其幼年時代所受的教育，只共一「子曰先生」的教育，因此對於一般新知識每有不勝悵望之慨，實則先生童年時代[illegible]舊教育，[illegible]後年先生的事業，確是最實際的時代知識的啟發。而且對於先生其幸運的

是，他不僅有這樣一個足供他知性反省的巨大時代背景，同時也由於他有滿良好的家庭教養，以及廣覽圖書的一位叔父，他在早年時期即具有一種後年運用之於政治見解上極其有力的史學知識。先生雖自謙說「但還算得甚麼呢？」不過就既往數十年間先生的革命事業言，他的特殊的教育環境，實在是值得重視的。

不過話應得保留一步：我們雖說先生早年時代背景及其史學知識足為先生知性啟發的源泉及其把惜，但要是先生的家庭情況不如事實般的優渥，或竟將「子曰先生」的事業當作畢生的事業，那麼縱有前述的那種教育條件，先生的生活經歷也許會又是一副局面了。為甚麼？因為客觀的時代背景雖足供其知性啟發，本國史的知識雖足供其為把握時代的工具，但這裏卻還缺少一種足以構成與舊時代奮鬥而創造新時代的動力。蓋欲獲彼時代的知性啟發，僅僅是本國史的知識是不夠的；要從啟發而進一步導之為行動，必需要有一種更新鮮，更廣博的時代知識。先生曾自述謂：「我在國內研究史學的時候，對於遼金元之侵略中國，免不了感觸憤慨，對於清，自然是一樣的。只是被什麼「君臣之義」束縛住了。」這說明了什麼呢？這是說明要是先生長此停頓在自幼年時代至少年時代的家庭環境中，他縱飽讀史書，恐也難於解脫那時社會條件的束縛。中國那時曾有不少的飽學之士，他們內心間對於國家的危殆未嘗不感觸傷，可是因為他們沒有擴大心靈視界的機會，沒有直接接觸時代潮流的機遇，結果他們的政治出路只得歸趨於扶清滅洋或義和團式作亂的一途。

溫和的姿態與熱情的性格

對於先生特別幸運的是，他的出生地是中國最得海外風氣之先的廣東省份；還要是太平天國革命的發祥地，也是帝國主義侵略先鋒的最初發接場。而且濱海而居的南國人民，在天性中就富有一種海外的好動性格。整個中國這時雖仍處在閉步自封的狀態中，但南國的人民卻早已開始他們的海外經營活動了。先生處此環境中，加上他自己對於世事的早熟感，其躍躍欲動的心理當然是不難理解的。到今天爲止，雖仍有許多人認爲先生是一個書生氣質的人物，但此種觀察是近乎外形的。先生的溫和性格，可說是早年受的他母親的薰陶影響，但在他的血液中，卻完全充滿了革命的熱情。宣統二年的義舉，所以使世人驚異不止者，主要就是由於只看取了先生性格的溫和面而忽略了其熱情面。此是後話，按下不提。我們所以觸及先生的性格問題，無非因爲能夠瞭解此種性格，就是瞭解先生一生事業的基礎。

廣東省固得風氣之先，同時先生也具有南人的特殊性格；然而要是環境只容許先生儘發揮其溫和性格的一面，那麼他也許因顧念寡嫂孤姪的生活，竟不能擺脫現實生活的逼迫。在此時，接受當前的現實，就先生的情形言，不是做一輩子的「子曰先生」，便是改行經商。然而先生卻不止僅有近乎保守的溫和，他更具有進取的熱情。他對自己的青年教育雖表憂慮，卻並不灰心，他爲生活的壓迫雖不得不在十七歲的年齡即出爲人師，但他並不卽以此滿足，並不自此爲畢生的出路。他的經濟環境雖不容他受彼時所有的最好的教育，但像一切偉人一樣，環境並不能阻止先生進取心的發展。「屢去各書院應試，往往取得優等」，這二句簡單的敍述，實說明了先生彼時奮鬥的經過。對於一個普通人，父母相繼喪亡，手足繼之夭折，精神上的打擊已經夠受了；加以家徒四壁，又得照顧幼弱，這樣就是縱

屬的，就是對於先生，此種情景也不是絕無影響，他那過敏感的心靈，如何受此深刻打擊，在他後年許多詩詞的作品中，我們都看得出來。先生詩詞有多感傷的情調，這是與他童年時代的家庭環境有關的，但此種感傷的情緒並沒有掩沒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即熱情的奮鬥。

在一九〇四年，清光緒卅年，即先生二十歲的時候，廣東省政府有派遣留日學生之舉，先生認為這一個機會萬萬不可錯過。蓋欲留學日本，在當時的先生，也決非私人的經濟力量所能辦到，同時一九〇〇年代初葉的日本，正是中國青年所神往不止的一個國家。彼時國內對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內容瞭解者誠不多，但一八九四——九五年的清日之戰，維新的日本與老大的中國，恰好形成了一個尖刻的比較，清日之役中國雖然戰敗，但中國並不因此增恨日本，相反，他們由此更明白了清廷的腐敗，感思從日本習取得一些道理。清廷世紀末的這次變法運動，差不多均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為範本。中國青年對於日本的向往，就形成了當時朝野的留日熱，日本之為中國革命的溫床，也就起源在這一時期先後。

先生這一願望是如願以償了，這一面固賴先生自己的奮鬥，但同時恐怕也得力於他長兄之助。因為先生的長兄，那時就在兩廣總督岑春煊幕下任事。總之，先生於一九〇四年的九月，應試及格，一路上一艘三百噸的小型輪船，開始其歷史事業的第一頁，向日本出發了。

正月在日本

先生在日本進的是法政大學的速成科，這原因是容易明白的。當時清廷自鑒於對外戰爭失敗之

後，對於她自身的腐敗，再也掩飾不得，而國內要求改革的聲浪，正在一天天的高漲，此種內外形勢，使清廷不得不作政治革新的考慮，爲免革命的爆發。然而要改革政治，人才問題是一個先決問題。因此清廷即在各省派遣官費留學生至日本，目的即在訓練一輩政治的人材，先生進法政大學也就是由於這種要求。不過清廷再也料想不到這些原來目的在爲給她打強心針、延長她生命而赴日本的留學生，竟多半倒是清室最後的送終者。而先生便是其中最有力量的一人。

先生到日本的那年，適逢日俄之戰：先生於一九〇四年九月出發至日本，而同年日本即行對俄宣戰。日俄戰爭是亞洲民族解放史上最可紀念的一頁，先生適逢此重大事件，其所體會者重大自不待言。日俄戰爭離清日之戰雖不過十年，但中國人民不僅對日本無絲毫幸災樂禍的意思，且上至革命領袖，下迄一般人民，莫不視爲日本的勝利，以一雪黃種人屢受白種人凌辱之仇。孫總理後來在神戶的那篇有名的演講——「大亞細亞主義」——中，對於此種心理分析得最爲詳細，而先生本人，適於此時到達日本，當時先生的觀念與心理如何，最好還是引證他自的己話：

一九〇五年的正月（光緒卅一年，日本明治卅八年），是我離開故國，第一次迎接的正月。當時的我，還是二十一歲的青年。上一年的秋，考取廣東省政府的官費留學生，到了日本進了法政大學。一九〇五年的正月，在我，印象特別深刻，這是有兩個理由的。第一是，我離了故國第一次在異國碰到的正月。第二是，那個時候，正是日俄戰爭激烈的時候，日本的國內，完全包在戰爭的氛圍氣中。

[illegible]從舊曆到正月，日本國內聽到旅順的陷落，全國國民都[illegible]是今天的勝利，[illegible]個[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攻擊旅順，[illegible]頑強的抵抗，全國國民[illegible]期待着，於是用了全力攻陷旅順。該年[illegible]

本國民的熱烈的愛國心，深深的燃燒了年青的我的心胸。在學校裏，倘令正在上課，一聽到窗外賣號外的鈴聲，教授便中止了講解，叫買號外。

在當時的法政大學，有爲我們中國留學生特設的由翻譯轉授的班級，所以，我雖則不會講日本話，但講義是完全懂的。再有譯錯，也大多是文語體的，所以，只要練習一兩個月，已能懂得大概的意思，對於研究並沒有障礙。我住的地方，是神田叫作清水館的寄宿舍，街的名稱，已記不清楚了，想來大概是在神田保町那邊。

當時的我，頗爲用功。所以，除了在教室中授課的梅謙次郎博士及其他幾位教授之外，沒有接受其他薰陶的機會。這個時候，對於我影響最大的，是日本偉人西鄉南洲與勝海舟兩人。我以爲，沒有這兩個人，江戶事件的解決是不消說，明治維新也不會有那樣好的成就。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帶的書店裏去的時候，總不忘記搜集與這兩個偉人有關係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園去，總儘瞻望着西鄉的銅像。當我們從事革命運動的時候，康有爲與梁啓超拚命反對，說國民運動，只弄成國內分裂，結果，是促進列強的分裂中國。但是，我研究明治維新時代的情形，研究西鄉，勝兩偉人的事蹟，決沒有那樣的憂慮。

現在回想當時的正月，我的腦海中，浮起了另一個感想。日俄戰爭，離開甲午中日戰爭，只有十年；但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中國青年所期望的，是日本的勝利。在十年之間，中日間感情的對立，已經清算了。我留學日本時，在東京的中國人，在一萬以上，個個人都衷心支持日本。看到現在的情形，也有人說，中日兩國，是不能衷心和睦的；我便想起了從前在東京過的日俄戰爭的事。只要處理的方法如何，國與國之間的怨恨，不是不能消解的。（「正月的回憶」一節，見：民國卅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新中國報」「學藝」）

法政大學時代的生活及其影響

在今年（民國三十年）六月，先生以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的身份前往東京作隆重的訪問時，歸途道經大坂府，在大坂工商會議所聯合招宴會上，亦曾作過同樣詞意的演講。

先生在法政速成科是官費生，當時月給祇有三十元；速成科的修業期限為一年半，因此至一九〇六年六月，先生在同級六十二名中以第二名，在全體同學三百餘人也以第二名的優秀成績卒業了。要是個普通人，那麼照當時先生的經濟情況，卒業之後理應急急回國以謀獵取一官半職的機會。可是先生却決不是那種人。他在一九〇四年踏上日本土地，至一九〇六年卒業，在這前後銜接的三年過程中，他的眼界和思想業已起了極大的變化。當時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之後，正在猛烈的飛躍中，先生耳濡目見的一切，比之他在國內究研史學知識所得的一切，已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先生所得愈多，他的知慾也愈是無限。一年半的速成科雖匆匆修畢，但先生感到他自己似乎越發空虛了，他的强烈的知慾抓住了他。憑了一紙速成的證書回到滿廷去做官的念頭，不僅對於當時的先生絕對不發生興趣，而且厭產生一種異常的憎惡感。革命的烈火這時已在他的心頭燃起，他決計暫時不還本國，一年半來在速成科中所得的政治主義及政治思想，再也抑止不了他的進取要求。最後，他決定留在東京繼續進法政大學的專科。

可是進專科是需要自費的，十七歲即不得不出任「子曰先生」的他，現在竟想自費進國外大學的專科，這對於常人豈非於癡人說夢嗎！然而這時先生性格的積極而果然發揮作用了，他決定自力籌措。在該國的大學中，確不乏有以洗滌碗碟、揩擦門窗或其他工作的收入，而以之抵充讀書費用的學生。惟當時的日本，似乎還沒有這種機會，因此在先生的會場，他就利用他才習來的文字工具，翻

始從事翻譯工作。可是在經濟條件上，這翻譯工作竟使先生獲得意外的成功：關於此事，後年先生回憶中曾以感慨而得意的情調這樣說過：「自費的錢，是從譯書來的，只是那時的譯書，只為得錢，如法規大全、純是傭僱式的工作。官費的時候，每月祇得三十元，自費的時候，每月所入，竟有五六十元，除了自己使用之外，還可以幫幫朋友的忙。」先生十七歲做「子曰先生」時候，月修只得十元，加上一些應考而得的膏火津貼，也不過一二十元，然而那個時候先生已還此微款照料兩寡婦和一孤姪了。現在先生再設自食其力，竟又有餘力幫助朋友，先生待人接物的仁友可親，即從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出。而然先生的繼進法政大學專科，其所得決不止以僅僅是學業的上進。不用說得，從三百名學生中名列第二這一點看，不僅說明先生天資的優秀，同時也說明先生是一個用功的學生。當時在梅謙次郎，富井政章，山田三良諸先生的領導之下，先生專心學業，不問其他。彼時二萬餘名的留日學生中，對於日俄之戰雖不乏主張激烈行動者，可是先生却穩忍自重，並不主張鼓噪行事，他當時雖是一個火辣了的青年，然而他是早年教養，使他比一般舒揚張的青年人更能沉着穩重。先生在他「革命之決心」中曾說過兩句是以表示他此種性格的話，他說：「至激烈的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為之；至剛毅之節操，惟至寬容之度量者能有之」。復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在金陵大學畢業典禮席上所作的「青年對國家之責任」一講中，對於青年一憑血氣的行動，作過剴切的告誡。那時他曾回憶他在日本留學時代所得的經驗，他說：

日俄戰爭之時，我是二十一歲。在開戰前，俄國軍隊已佔領了東三省，當時我國留學生決議組織義勇隊，組織回到東三省去與俄兵作戰。有的甚至為上[illegible]，將全部學費存管學校大隅[illegible]

在日本，並沒有參加那次的戰爭。

實踐革命的踏出

然而那時先生抱着怎樣的態度呢？他是否對日俄戰爭的意義無動於衷，而只顧一事正經讀他的書嗎？決不。我們馬上要證明先生是一個最激進的革命者，不過在彼時，先生與他的同鄉朋友胡漢民先生與朱執信先生等，卻在幹着另外一件工作。他們要求瞭解日俄戰爭，然而他們更要求瞭解日本——明治維新的日本。因爲日本一向在中國的心目中是一個不足道的小國，可是甲午戰爭中日本竟打敗了中國，而日俄戰爭中日本又打敗了當時數一數二的世界强國俄羅斯。弱小的日本何以能一躍而成强國，這是爲先生所不得不求理解的。爲打倒白種人對亞洲的壓迫，中國應幫助日本打敗俄國，固屬毫無疑問，然而彼時中國自己尚在清室的統治之下，中國內部的積弱不除，徒高喊和日本協作是無用的。彼時先生思想的歷程變化，差不多已屆成熟。他過去在國內研究史學時，雖對遼金元之侵略中國，不免憤慨憤慨，對於清室的統治，雖亦懷有隱積的情緒，可是在未出國前，卻仍不免受「君臣之義」所束縛；現在經過在日本逗留三年，他的思想有了非常的變化，請看他自己說：「及至留學法政，從憲法學得到了國家觀念及主權在民觀念，從前所謂「君臣之義」撤至九霄雲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到那時候，與新得的民權思想，會合起來，便決定了革命的趨向。」這證明先生不是一個只有血氣，而乏深慮的青年。當日本去打敗俄國，得到大勝利，這是對的；但對於一個中國人，他這時最重要的念頭，應該留在自己的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上，這便是當時先生的基本信念。他認識爲去幫助日

去，不是組織政黨的問題，而是在那個先行復興中國。中山先生—無中國，無日本；無日本，無中國」的言論。此時雖尚沒有建立起來，但在汪先生的直覺中，他早就有此見解了。他看到日本已經相當強大，日本那時即使沒有中國的幫助，也可以生長下去；可是中國卻不然，中國彼時和今日一樣，當前的大問題是如何生存，如何復興。在先生的眼中，那時中國所需要的，不是熱心有餘而智謀不足的青年，而是需要如日本明治維新中最著功績的西鄉隆盛（南洲），勝海舟，吉田松陰，高杉晉等那樣的一類志士。

我們在前面說過，先生幼年時代曾頗受王陽明學說的影響，現在他所景仰的幾位日本志士，卻正也是受的王陽明思想的影響。例如先生最爲感動的西鄉南洲，就是其中之一。西鄉南洲曾有這樣一節遺訓：

道者，天地自然之物也。故講學之道，以敬天愛人爲目的；修身克己爲始終。克己之極功，即所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總之，人皆以克己而成，以自愛而敗。其觀古今之人物，創起事業之人，大抵皆能成其事於十之七八，而得終成其餘二三之人，其爲稀少；自始即能慎己以事者爲可敬，則其功可立，名即可顯。隨功立名顯，遂亦起自滿之心，而恐懼慎戒之意，漸趨驕矜之氣，負其所成之事業，苟且以從事於已事，陷所業於窘境，於終敗者，皆自招也。故克己者，應戒慎於不能目睹耳聞之所也。

又曰：

以道爲天地自然之物，人須行之，則以敬天爲目的。天者，人我同愛者也，故須以愛我之心而愛人也。

不以人爲對手，當以天爲對手者，責己而不咎人。應時尋我誠之所不足。（見段單光譯「大西鄉遺訓——敬天愛人之敎」，政治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尤以後兩則的幾何話，最配合先生的道德觀感。後年先生揭櫫「知行合一」的理論，一部分即由當時的這種影響。

先生加入革命黨，是在他二十二歲那年。其時留學生間的革命熱，已經十分高漲。先生與其同鄉同學的胡漢民朱執信兩先生，亦日夜埋首於國事的探討。當時存在於留學生間的政治勢力有兩種，一即是由康有為領導的君主立憲派（保皇黨），一即是中山先生與黃興先生的同盟會，主張激進革命，推翻滿清。在此前後，各種政治集團的活動，極呈五色繽紛。黃興先生和劉揆一，宋教仁，張繼，陳天華諸先生組織華興會，與洪門哥老會領袖馬福益等結合，圖謀湖南革命失敗後，即經上海亡命到日本，息影在東京市牛込區若宮町，發行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以圖再舉。而中山先生雖早在光緒廿五年（一八九九年）即曾到過日本，但自一九〇〇年惠州舉義失敗之後，中山先生便一直游歷於歐美。至一九〇五年初夏，始重行到日本。先生對於中山先生，此時早慕名已久，而此次中山先生東返，由於日本志士的介紹，初次開始與湖南派的革命鬥士黃興相合作，一時東京中國留學生間的革命空氣，可謂達到了空前的白熱化。因此當地的留學生，會同日本志士宮崎滔天，末永狼嘯等人，於八月十三日在田河岸的富士見樓舉行中山先生歡迎大會，同時慶祝孫黃的合作。當時開會的二千餘人中，先生偕同胡漢民朱執信亦在其內，經先生對中山先生的信心，是決定在神田錦輝館的演說席上，同時同盟會的正式成立，亦即在這時。即採先生原有的興中會，黃興與宋教仁的華興會，章炳麟的光復會等，均於此時擴大而結成為同盟會。首次大會舉行於赤坂檜町內田良平先生的室內，參加的代表共有十七省之多。六條黨綱與四大口號，亦即擬於此時。

六條綱領是：

（一）推翻滿清政府。

（二）建設共和民國。

（三）維持世界眞正和平。

（四）主張土地國有。

（五）主張中日兩國國民聯合。

（六）要求世界列邦贊成中國革命事業。

四大口號是：

（一）驅除韃虜：民族主義。

（二）恢復中華：民族主義。

（三）建立民國：民權主義。

（四）平均地權：民生主義。

當先生在錦輝館聽到中山先生的一番三民主義的革命主張後，他自法政大學攻習所得的革命的趨向，就向行動的一步踏出了。在前引「正月在日本」一文，先生曾自述一九〇五年是他平生最可紀念的一年。「在一九〇五年這一年，在我，有一件不能忘却的事。便是，在這一年，我第一次會見了孫中山先生。地點在神田的錦輝館，在演說會的席上，日期已記不淸楚，中山先生是穿的白色的衣服。所以應該是夏天。」是年先生加入同盟會後，卽被委任爲評議部議長，後兼執行部書記長。當時同盟

有如下表：

總　理　孫　文

執行部　庶務長　黃　興　張　繼　劉揆一

　　　　內務長　章炳麟

　　　　經理長　谷思愼

　　　　外交長

　　　　會計長　何天炯　廖仲愷

　　　　書記長　田　桐　胡漢民　汪兆銘

評議部　評議長　汪兆銘

　　　　評議員　熊克武　吳鼎昌　陳家鼐　秋　瑾　孫毓筠　程　克　馮自由　黃復生

司法部　部　長　鄧家彥

　　　　檢事長　宋教仁

先生加入同盟會之初，即爲總理所賞識，被委爲黨中要職。自此以後，先生即追隨總理及其事業，以迄於今。先生終身的政治事業雖屢有波折——如我們在後文中將詳細敘述的——但其對革命的基本的信念則始終未嘗稍變。這個原因，固由於先生對革命事業的堅毅與節操，然其對於總理的終身知遇感，實不失爲培植其不動搖信念的一大力量。

第二章　民報時代與南洋時代

民報前夜的革命形勢

孫中山先生與黃興先生攜手結合，於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後，革命的政綱是有了。但欲使革命的勢力深入民間，最重要的工作，當然是擴大的宣傳。因此發行機關報之議，也隨同盟會的成立而同時決定。

在此前後，中國留日學生間的政治宣傳與政治組織的活動，本已達到空前的白熱化。以藍天蔚，鈕永建，吳敬恒，吳祿貞等為中心的「軍國民教育會」，也於此時前後宣告成立。且派遣湯爾和與鈕永建為代表，回國遊說袁世凱，從事鼓吹各省的革命運動。此外有黎力山（鼎亭），主倡的「支那亡國紀念會」；學生運動活動最烈的有劉成禺與秋瑾女士等人。

談到文字宣傳工作方面，當時有張繼，沈虬齋，胡元倓等所辦的「國民報」，及黃興，宋教仁亡命赴日之後所創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不過當同盟會宣告成立之後，所有原先分散的革命勢力，這時就大部分歸併到同盟會來。在同盟會之外別樹一幟的，只有康有為，梁啟超所領導的君主立憲派。他們不但不贊成革命，而反斥革命將使中國陷於分裂。這一派的宣傳大本營，就是梁啟超所主辦的「新民叢報」，當時不僅在留學生間擁有不可輕侮的勢力，即在國內，亦擁有相當的讀者。因此隨同盟會的成立，雖吸收了一部分革命的力量，然而同盟會的革命性格愈顯露，與主張君主立憲的康，

皇派也便意識對立了。同盟會不僅在基本的革命宣傳上要求一個自己的宣傳機關，而且在反駁康、梁派的謬說上，尤有建立自己喉舌的必要。於是就決定發刊「民報」。

先生第一步參加實際革命工作，就是參加「民報」的發刊。「民報」的誕生是經過相當困難的，第一是資金問題，第二是印刷所問題，第三是人事問題。遲至同年十一月，第一期的創刊號始見發刊。當時發行所設在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番地，主筆爲章炳麟（太炎）。章氏爲鄒容序「革命軍」一書，被繫刑圄，此時適由上海出獄，黨方面遂派先生與胡漢民先生親至上海迎接至東京。至於編輯陣容，則以胡漢民，宋教仁、朱執信，陳天華及先生本人等構成主要台柱。第一號「民報」發刊時，曾在神田錦輝館舉行慶祝大會，當時不僅大部分留學生都來參加，就是日本方面同情中國革命的志士，也到了不少。

關於同盟會的成立，得力於日本志士的幫助是非常大的。例如宮崎滔天與末永狼嘯，內田良平，坂本金彌等，都是孫黃合作的有力份子。後來中山先生爲感謝日本志士所發表的「中國革命之經過」一文中，曾列舉過各位志士的台銜，如政治家方面有大隈重信，犬養木堂（毅），大石正已，尾崎行雄；民間人有副島護一，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福本日南，末永節，佐佐木四志，秋山定輔，宮崎兄弟，（彌藏，寅藏，民藏）；參加革命而戰死者有山田良政，三多親，負傷者有岩田愛之助，金子克己，甲斐靖，山田純三郎，平山周，萱野長知；實業家有中野德次郎，鈴木右衛門，大北郎兄弟，久原房之助，犬塚信太郎，藤瀨政治郎，及學者寺尾京及副島兩博士。民國三十年九月國民政府爲追念日本志士的功績，曾在日本鶴見總持寺的境內，舉行樹植「日本同志援助中國革命追念碑」典禮。不

逼此是後事，且按下不提。而「民報」成立，得此輩志士的助力亦極多。

先生原名兆銘，字季新。及至「民報」發刊，始以精衛別署發表文章。先生在「民報」上發表的第一篇大文章，就是有名的「民族的國民」一文。是時先生還不過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先生在國內的教育環境，縱有時使他對於世事現實感到憤慨，然如其本人所述，當時絕不免爲「君臣之義」的傳統思想所束縛；所以民族思想的萌發，就當時先生的教育境遇言，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發見。當時清廷不想以立憲爲解，以消滅革命的暗流，康梁之輩，尤以爲中國只須做到立憲，不爲君主可以不必反對，就是外族統治，也可以承受。康梁的觀點，只跟政治的改良主義，根本沒有考慮到民族獨立問題。他們對於民族獨立的革命，且表示積極反對，他們以漢滿不分，君民同體之說，認爲民族革命，只是招致中國的分裂，是完全要不得的。他們根本沒有看到在清廷統治下的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之後，其自身早就入於歐美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以君主立憲來起死回生，來挽救清室的統治，就無異間接加強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中山先生所以獨主張以民族主義徹底推翻滿室統治者，就是認爲唯有先光復民族的政權，始能爲中國解去兩重統治的桎梏。

向康梁開放第一炮

先生固有民族思想的勃興，是在法政大學的求學時代；即是從憲法學的研究，而獲得國家觀念與主權在民的觀念。但先生在「民報」第一期上發表的那篇長文「民族的國民」，雖然是受了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而作。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其最大的特點，不僅在從學理上闡述民族的定義，而

且確認民族主義是革命運動的最大動力。因此，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行動性格的，是政治意義的，先生的那篇「民族的國民」，就是一貫以政治鬥爭的目的，一面從學理上闡發民族與國民的限界，一面卽以之向康、梁的漢滿不分，君民同體，直接作政治的進攻。當時清廷正圖用立憲以懷柔革命，而康、梁的君主立憲論，正是典型的御用言論。因此揭發康、梁理論的虛偽性格，就構成了當時對清廷鬥爭的一環。先生在該論文詳細指陳君主立憲說係謊唬籠絡民心的陰謀之後，卽進向康梁攻擊謂：

深觀乎國內之所以歡迎立憲說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則國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皆幼稚而交相錯也。夫國民主義，從政治上之觀念而發生；民族主義，從種族上之觀念而發生；二者固相密接，而決非同物。設如今之政府爲同族之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顛覆專制，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能達。乃國民夢不之覺，日言排滿，一聞滿政府欲立憲，則驟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剗滅種族思想也。豈知其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償，而徒以種族供人魚肉耶。嗚呼，種此禍者誰乎？吾不得不痛恨於有爲，梁啓超之妖言惑衆也！

其見解透徹，熱情四溢，流露於全文之中。尤其對於康、梁的滿漢不分，君民同體說，揭發不遺餘力。康、梁否定民族是建國的要素，且以爲滿族早已漢族化，僅須開放政權卽足，然先生則始終認爲唯有先恢復民族的獨立，始能說到建國。此種一貫主張，就是在今天也依舊是先生的不變政治信條。

先生當時的革命主張是：首先應光復漢族的獨立，以民族主義爲國民主義的基礎：這並不是主張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爲漢族是構成中國國家的民族主體，中國的歷史就是漢族的歷史。以少數民族實

行統治的清廷政府，只是實施政治和君權專制政治，並不能代表整個的中國。反之，國民革命雖主張光復漢族的獨立，但並不主張以漢族的貴族主義或專制主義來統治其他民族，而是以五族共和的民主國來替代一族專制的君主國。此種立論，在今天雖不足爲奇，然在當時即如康、梁等高級知識份子，竟也認爲是過激之論。先生思想的前進，見識的透澈，在那樣年青的時代，就已經睥睨世界了。就是與先生站在敵對地位的康、梁，對於先生立論的正確，也曾表示過佩服。

理論革命家的姿態

接着「民族的國民」一文之後，先生又繼續發表了「論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及「革命決不致召瓜分說」，「申論革命決不致召瓜分之禍」等重要文章。其中「論革命之趨勢」一文，乃分析國內外政治大勢，而申論革命爲必不可避免的傑作。當時的客觀革命形勢怎樣呢？這篇文章是給了我們一個很明白的解答的：先生首先確認革命的動機，自庚子之後，（即一九〇〇年，鄭士良在惠州起義，青天白日旗飄揚空際，卽始自此時，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亦殉於是役），早已一發不可阻遏，及至丙午萍醴（一九〇六年）之役，更至只有進而無退的境界。黨人雖屢遭失敗，但再接再厲，愈挫愈烈。馴至清廷不得不在鎮壓之外，復施懷柔政策以資籠絡民心。這種懷柔政策，卽先生攻擊所最烈的君主立憲主義。關於此點，先生當時曾以質問的口吻這樣說過：

今之論者，於此往往持疑問曰：彼滿洲者，其果能以君權立憲法，保其專制，而永使漢人爲所征服歟？抑以作僞之故，挑國民之怒，轉以促革命之進行歟？爲漢人者，其果受其籠絡，而隳革命之志歟？抑識其陰謀、轉灌

此以壽革命之活動力歟？

先生本人，當然是毫無疑問肯定後者的觀點的。蓋革命黨的性質，革命的主義，係以民衆爲基礎。只要平民在異族專制政治下所受的痛苦一天無法去除，則革命的基本趨勢，就始終存在。「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則革命之主義，日熾一日，而革命黨之實力，亦日盛一日。彼滿洲之立憲，無論爲強悍，爲陰柔，要之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也，即無異普及革命之主義也，即無異拓展革命黨之實力也。」接着，先生便列舉諸種壓迫民生的事實，以爲革命基本趨勢的寫照。

然而康、梁諸的保皇黨，除以君主立憲論爲對抗民主共和的武器外，又復倡言推翻清室的革命，必將首先招致國內的分裂與禍亂。康、梁這一反攻的武器，當時相當有力的。因爲不僅保皇黨的人士同具心理，即一般雖對革命主張表示同情，但又不免有身家之顧慮的「縉紳之士」，也懷有同樣的心理。蓋當時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早爲一般憂世之士所洞察。他們看到庚子拳匪之亂，尚且招來八國聯軍的干涉，則中國一旦因革命而掀起內亂，必定造成列強瓜分中國的藉口。

然先生則力言「凡稍知民族與政治關係者，皆知主權苟尚在彼族之手，則政治決無由進步，而政治無進步，就是國家無由強，從而也就無從避免瓜分的潛在危機。反之，欲杜瓜分之禍，不能圖之苟安而唯有訴之革命。」因此先生即進而闡明瓜分說之沿革，以證明革命與瓜分的無關。關於本問題，先生除前後寫了兩篇洋洋大文外，最後復發表了上下兩篇「革命可以杜絕瓜分之實據」的歷史性論文，以爲全部論點的結論。

在先生早期幾篇寫作中，即充分發揮了他的史學知識和國際知識的富豐。以上所引例的幾篇新斯

作品，無一非十餘萬言乃至數十餘萬言的洋洋大作，不僅對於中國現代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即在今日讀之，仍不失為具有歷史教訓的革命古典。我們應該注意一點重大的事實，即先生在現代中國始終保有其經綸領袖地位者，非因先生是一個以武裝為背景的軍人政治家，或權術政治家，而是因為先生始終能站在時代的前頭；他的淵博的史學知識和其分析時代的銳利目光，就是他全部政治歷程的動力所在。先生早年以革命理論家姿態出現的作品，就已經表現他這種力量的不竭泉源。

歷史的教言

例如先生在駁斥康梁派圖以滿漢不分，君民同體說的國民主義來抵消民族主義時，就以他的史學知識的武器，將對方的面目暴露無遺。關於此點，我們不妨引用先生在其「民族的國民」中對康有為「辯革命書」所下的痛烈批判。

康有為之「辯革命書」，一生抱負，在滿漢不分，君民同體。以為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種族之別，則尤無須平滑……然康之所說，其根據全在雍正關於曾靜，呂留良之獄所著之「大義覺迷錄」，不為摘而出之，恐天下猶有不知其心，而誤信其言者。茲採取「大義覺迷錄」中，康氏原書抄襲之語，比較互列於下。「大義覺迷錄」有云：「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康氏原書亦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入主中國，古今稱之。」又云：「所謂滿漢，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此其抄襲之一。「大義覺迷錄」有云：「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康氏原書有云：「孔子春秋之義，中國而為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則中

固之。」此抄錄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傳爲僞書，今爲辯護滿洲計，則幷引其義矣。）「大義覺迷錄」有云：「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並蒙古極邊諸部，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乎？」康氏原書亦云：「中國昔經晉時，氐羌鮮卑入主中夏，及魏文遷洛，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孫偏佈中土，多以千億，又大江以南，五溪蠻及駱越閩廣，皆中夏之人與諸蠻相雜，今無可辨。」又云：「國朝之開滿洲，蒙古，回疆，青海，藏衛萬里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漢唐，而軼宋明。」其抄襲者三。嗚呼！雍其命豈不以爲此爲我世宗憲皇之聖諭，爲小臣者所宜稱述勿衰者耶？況其甚者，彼猶祇僅云：「我朝既爲中外臣民之主，不當有華夷而有殊視」而已。未嘗自認與晉同種族也。康氏原書，乃引史記稱匈奴爲禹後，遂謂滿洲曰：「滿洲種族出於夏禹。」嗚呼，非有腦病，誰爲斯語？夫匈奴即與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專血系而已，祇社會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於滿洲……彼之蒙古源流已詳言之。……今康有爲竟以無端之牽合，而造出滿洲之種族出於夏禹一語……至於稱頌滿政府聖德，謂爲「唐虞宋明之所無，天地萬國所未有。」此雖在滿洲人猶將慚駭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筆之於書以告天下。嗚呼，彼寧人妖，願我民族共放除之，毋爲晃氣所染……。

我們在這裏特地引用了這一節，目的當非在向康梁作鞭屍之舉，只是從這短短的一節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先生怎樣善於運用理論的戰術，而貫徹其自己的主張。康梁主張的錯誤，目前早已成歷史的過去，愈更愈成過去，先生的言論愈見正確。雖時至今日，時代的環境早面目一變，不過中國人民民族還未充分解放，而民族獨立未獲充分保障之前，這種歷史的教訓還是值得再三體味的。

民報傳刊的經過

先生不僅具有卓越的本國知識（這一點是每一個偉大政治家所必備的，）且更擁有廣博深入的國際知識。例如其「論革命之趨勢」與「革命決不致瓜分說」等建設性的文章，即充分引述國外革命的史實，以充實其立論的內容，成為進攻敵人的有力武器。即中山先生本人，對於先生的透徹論旨，亦表示其十分激賞。例如於刊載「民報」六期的「革命決不致招瓜分說」一文，中山先生曾在南洋「中興日報」上為文加以贊佩過。其言有謂：

精衛於民報第六號對於革命將召瓜分之說，曾為文加以駁斥，其論析中外情勢，使中國人士莫不大悟，外國恐怖症亦為之一掃；最近氏又發表一革命決不致召瓜分說之長文，為證實其理論起見，引入種種根據。其卓見洞識，頗博讀者快慰，其引用土耳其，摩洛哥近事為證，論旨堅實，究非為畏懼外國，諂媚滿洲者所能企及（中略）。余讀精衛之革命防止分割論，實不禁欽佩萬分——余今願以之贈担憂革命將遭分割論者，藉精衛許之也。

觀乎中山先生對先生見識的批評，我們就可以推知先生的文章，曾對革命盡了如何的貢獻。當時「民報」總主筆章太炎氏，雖然後來和國民黨一度宣告分道揚鑣，並和先生有過不快意的論爭，然其對先生之文章卓識，卻也一致表示讚嘆。

隨「民報」的發刊，同盟會的勢力亦日見擴張了。在「民報」發行一週年之際，賴其宣傳的努力，國內會員已發展至一萬餘人，同時宣傳方面亦深受其影響。可是正當此時，忽然襲來了一個甚大

的打擊。當清廷對於孫黃在日本結合同盟會一舉，心中早感不快，又因中山先生在「民報」一週紀念時發表了一篇民族紀元的演講，其中發揮革命經綸，不遺餘力，更遭清廷之忌；尤其重大的是，是年劉道一在湘省萍鄉醴陵發動革命，爲清廷所破獲，知悉革命的指導背景係在日本東京，於是即向日本政府提出放逐同盟會一派的要求。劉道一、蔡紹南等是年從日本潛歸湖南之後，即與當地哥老會領袖姜守旦，李經其等相聯絡，預備舉發革命。這是同盟會成立後的初次革命行動。但湖南省的軍隊雖經運動成熟，惟因步鎗只三千，子彈不足，加以受江西，湖南，湖北，江蘇四省兵力所包圍，結果是失敗了。

清廷要求日本政府取締革命黨人，非自萍瀏事件始，早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章太炎，馮自由等東京組織「支那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時，清廷駐日公使蔡鈞，即向外務省要求取締留日學生的革命行動。而這次萍瀏事件，事涉武裝革命，清廷遂堅決向日本要求放逐同盟會黨人。此時日本政府方結束日俄戰爭，不欲結嫌於清廷，因此西園寺內閣即令中山先生等出境，一般留學生也受日本文部省所頒佈的「清國留學生規則所束縛」了。日本志士，雖間有向政府抗議者，但亦無可如何。先生與胡漢民隨同中山先生一起至越南河內，而「民報」亦因之宣告停版。

隨「民報」停刊，章炳麟是消極了，陳天華則更憤慨作遺書萬餘言，投海自殺。先生當時精神上所受的刺激，當亦不小，其悼陳天華詞中：曾譽之爲革命之神，謂天華雖死，英魂不死；悲切之深，見乎字裏行間。

人格美德與感情

其間，關於先生本人也有一段插曲。原來先生的長兄，彼時在兩廣總督岑春煊幕下。同事中有一位叫劉子蕃先生的，與先生長兄十分友好。劉氏有一位令妹，當時的社會風氣，長兄的身份即相當於父親的身份。先生自早年父母死之後，他的長兄就負起了做父親的責任，因此不與先生事先通知，即代先生與劉氏的令妹訂下了婚約。可是先生後來加入了革命黨，在「民報」上大做其反清的文章，這事使他長兄非常着急了。「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長兄將我交出來，不然就要對不住。」（「自述」）一人犯罪，九族同誅，這原是專制時代鎮壓民衆叛變的特有苛刑，莫怪先生的長兄是要着急的了。但先生本人，對於家庭的感情是十分濃厚的，雖然爲了革命的大我，不得不犧牲家庭的小我，然而先生迄未有一日忘記過家庭的愛。欲證明家庭感情的熱切，我們可以引述先生在獄中時代所作的一首述懷詩。詩曰：

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樂，此生何所爲，此情何所託。嗟余幼孤露，學殖苦磽确，蓼莪懷辛酸，棠棣甘飄泊。心欲依墳墓，身欲棲巖壑，憂患來薄人，其勢疾如攫。一朝出門去，萬里騖寥落，懸崖橫荒塊，頓欲忘遠略。鋒鋩未淬厲，持以試盤錯，蒼茫越關山，暮色照行橐。瘴雨黯蠻荒，炎雲蔽銅柵，山川氣蕭條，華采亦銷鑠。悵然不敢顧，俯仰有餘怍，遂令新亭淚，一灑已千斛。回頭望故鄉，中情自惕若，常憶搴衣時，擬把舊盟約。簪除庭前樹，上有慈烏啄，孤雛羅網中，覩我眸灼灼，兒乎其已矣，使我心如斫。沈沈此一別，惘有夢魂縈。良朋衆所病，氣類相援藥。號哭亦徒爾，號呼者不省，對此不見恥，夜夜何由作，撫衷易成戚，吟嘯徒[illegible]

昨，瀰離不可見，燕市成荒寞，悲風天際來，驚舉擣雉郭，萬象刺心目，痛苦甚炮烙。憤如九鼎壓，命似一毛握，大雅積博浪，比戶十九冥。初心雖不遂，死所亦已獲，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鑊。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悠悠檻穽中，師友嗟已邈。我書如我師，對越凜短燭，昨夜我讀書，孺子顛不惡，但有一事勞，蛛蛛先由覺，如何習靜久，輒爾心躍躍，有如寒潭深，鬱斗自樓蘖，又如秋樂動，驚鳥聲以愕，有感將相乘，吾道終隔膜。悚息讀師言，愧汗發如濯，平生慕慷慨，養氣殊未學，臨難過劇烈，臨氣潛搖撼，餘生何足論，魂魄亦已剝，鑄薇欲在抱，謝汝圖油漠，琅琅讀四錄，清響動寥廓。（述懷）

這首長詩，不僅訴說了先生柔情的一面，且亦表示了先生剛毅性格的又一面。其中「倚檐牽衣時，謬把歸期約」，據先生後來自述，係為姊氏兆鏞女士所作。關於這，曾有一首「重九謁五姨墓」的詩，原詩附誌之下：

生小類吾姐，多才愧不如。形骸常分析，魂夢每驚碎。舊鏡臺仍大，關河淚易枯。斜陽過歸去，回首斷孤魂。

姊諱兆鏞，字綺湄，溫淑多才，與余友愛至篤。余獄中述懷詩所云「倚檐牽衣時，謬把歸期約」，即為姊所作也。今姊歿十年餘矣。（「汪精衛全集」卷四）

在「小休集」中，有同題另一作，一併附誌如下：

倉猝別吾妹，從茲生死殊。風塵久憔悴，魂夢屢驚呼。舊鏡臺仍在，關河淚易枯。斜陽過隴去，回首斷孤魂。

「家庭的罪人」

以上所引證，不過藉以說明先生對骨肉感情之一斑而已。因此當先生得到惟長兄兆鏞的噩耗後，

便以「家庭的罪人」名字，寫了一封最後的家信給他長兄。謂：「事已發覺，請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家中子弟多矣，何靳此一人，幾蹈之，倖爲國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不然，死不瞑目。抑此非罪人所宜言也，與劉氏女曾有婚約，但罪人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以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

先生的人格，美德，在這寥寥數千字中，是表白得最也明白不過的。爲不願累及長兄，他忍痛宣布脫離家庭關係，惟對寡嫂孤姪，則又殷殷關切：爲獻身革命，爲獻身大我，不得不自承爲是「家庭的罪人」，而寧願以身許國，此種表現在私生活上的精神人格，正是先生一生大小事業的度量衡。一個僅具備粗而單的性格的人，他也許可以幹出一番驚天動人的事業，而博得一時的英雄稱號；可是一個缺乏人道精神的英雄，算不上是一個眞正的偉人。人生是多方面的，若許多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政治家，若用人間的道義予以評價，他的罪業泰半破壞多於建樹。若像先生那樣，雖認定拯救祖國是他畢生的最大目標，可是他絕不忽視最細微處的人生意義。

先生的長兄發得這封信以後，便具了一份驅逐逆弟，永離家門的狀子，遞到番禺縣存案，復與劉家商議解除婚約。先生不僅關懷家庭，且亦關懷及那位劉姓女士。那時的社會環境，對於一個被遭解除婚約的女子，是每每視爲不祥的人物的，一個女子的終身往往會因此而墮入黑暗的深淵。因此先生雖不得已解除婚約，惟于心則常不安。先生在他自述中說：「後來聞得劉氏女反對他們這種做法，直至民國元年，我已娶了，回到廣州，重聚家門，聞得她尙未嫁。我覺得眞如古人所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未免耿耿於心，及至聞得她和一位陳先生結了婚，方纔寧帖。」

投奔「革命之母」

「民報」既經解散，在日本一時又無法立足，但同盟會的幹部，並不因此打擊而鬱背消極，當時雖無回到中國的可能，可是除東京之外，同盟會尚有一個海外的革命據點在——南洋。因此幹部派的人物即在「民報」解散之後，相繼前往南洋。南洋是中國海外移在的最大集合地，而華僑又恰如中山先生後年屢屢稱道過的，是中國「革命之母」。早在同盟會結會之前，華僑已是遇次革命起義的中心，同盟會的成立，尤其受到華僑的極大支持。現在中山先生就先後率領他的幹部，投奔向這個中國「革命之母」的懷中來了。時在光緒卅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

先生偕同黃興先動身出發，繼之中山先生率同胡漢民由香港而至遙遠的河內。關於先生本人或得到達南洋新加坡，似有兩說：一說先生先行率中山先生之道，偕黃興同至新加坡；一說先生先至河內等待中山先生，後中山先生至，翌年（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因欽廉舉事失敗，遂相偕至新加坡。照前說先生應在一九〇六年已至南洋，照後說則爲一九〇七年。據先生對本問題的自述，則謂「丁未之後，奉孫先生命，奔走南洋，組織同盟會分會百餘處——」丁未爲光緒卅三年，即爲一九〇七年。但實際上，先生奉中山之命，先於一九〇六年抵南洋方是毫無疑問的，蓋當時中山先生曾有一封親筆介紹書交給先生，囑其到新加坡之後，即持信往晤其老友張永福和陳楚楠兩先生。原信如下：（並見製版如圖）：

永福楚楠仁兄均鑒：西貢之事，據已兩占，近來可有進步。茲特派汪精衛[illegible]輩，偕來南洋參與機密

黃龍生（河內殷商，熱心任事）乘機到坡與
足下有所商議，所有弟所欲言者，統託精衛等面達。
足下有所見，亦望與酌議爲禱。專此敬候
近安

弟孫文謹啓

這封信雖然沒有日期，但一定是一九〇六年中山先生到達河內後所寫，因信中除介紹先生本人之外，並有河內殷商黃龍生其人。如此看來，足證先生比中山先生先到新加坡了。先生之於張永福先生相識，亦就在這個時候。彼時張陳兩氏，是新加坡華僑的革命領袖，也是中山先生的知己好友。先生於彼時追隨中山先生雖爲時尚不久，然已經得獲中山先生的極大信託，得參與革命的最高機密了。當時中山先生的別莊晚晴園，就是革命會議所在。事隔卅餘年後（民國卅年八月），先生回憶往事，曾賦詩一首贈張永福氏，詩曰：

遙從南斗望中原，壯志天池欲化鯤。百戰故人今健在，白頭重話晚晴園。（見左角）

與璧君女史相識前後

不久，中山先生因欽廉事件爲清政府向安南法當局要求放逐出境，亦來到新加坡，隨即邀約諸人會晤。其中邀請林義順先生的一封書信，即由先生所出面，原文如下：

……先生鑒：今日温慶武君來，係先生約於明夕五點鐘在家招之小飲，新
見屆時到叙，所約無多人，惟武烈君等。
又璧君之太夫人明日來，特飭挽留叙，雖堅約

尊夫人到叙，學傳詳約期，亦於五點鐘齊集。同席者璧君母子及武烈應培楚楠諸兄之令寵，不與男客同席，想

尊夫人必允命駕也　此上閨轉

大安

弟精衛頓首　六月十七日

關於這封信，林義順先生於民國二十年九月九日，曾發表過一則說明：「此信冒頭所以不書明受信人的姓名，是防止當地政府的干涉。」林氏的說明大意如下：

丙午年（光緒卅二年，一九〇六年）精衛同志旅居新加坡時，適逢陸武同志及璧君同志之夫人來新加坡，孫總理招讌於晚晴園，獨精衛同志以青年納履及為人列席。

如此看來，先生於一九〇六年至新加坡是毫無疑問的了。原信中所提及的武烈與應培，即陳武烈先生與吳應培先生，後者方於最近逝世。至於「璧君同志」云云，當係指先生夫人陳璧君女史。

先生與陳璧君女史的結縭經過，不是僅僅一椿個人的婚姻事件，而其間還有着一段革命的史實在。璧君女史號冰如，與先生同爲廣東番禺縣人。璧君女史與先生結婚之前，即參加革命工作。璧君女史的家庭，是檳榔華僑的富室，其尊翁陳耕基先生，向經營商業於南洋檳榔。先生於一九〇六年至新加坡後，因奔走南洋各地，在檳榔認識女史。後來先生隨中山先生及黃興，胡漢民，李竹癡諸人同往檳榔工作，寄寓當地華僑俱樂部的小蘭亭時，獲得進一步的相識，蓋此時先生屢在平章會館召開演說大會，而先生本人的演講，極受當地華僑的歡迎：在短時期內，即募得數千元的運動基金。璧君女史，恐怕也就是當初深受先生影響的一人。

南洋活動的經緯

起先，中山先生在河內時，即謀再舉，然仍屢遭失敗。是年（一九〇七年，光緒卅三年）潮州黃崗之師失利於前，四月鄧子瑜發難於惠州又告失敗于後。七月欽廉兩府發生抗捐事，清廷遣郭人彰，趙伯先各率兵三四千往平之，中山先生於是再在安南召集同志，擬乘機佔領防城，派黃克強，胡毅生暗結郭趙為內應，同時派日本志士萱野長志帶款回日本購械。七月革命軍攻破防城，未可進取兩粵，但不料東京本部黨員忽起變故，遂至計劃失敗。先生即在此前後抵新加坡。

自新加坡到檳榔，目的是在為革命運動募取基金，因此得獲相當成就後，中山先生即率同黃興胡漢民再回至中國，此即同年的鎮南關事件。關於南洋的黨務，當時就是交託與先生的。在此時期，先生即與璧君女史由同志而建立了友誼關係。

鎮南關事件失敗後，中山先生與胡漢民，黃龍生等再至檳榔，一面募集基金，一面從事擴大宣傳，其中心機關就是由先生所組織而成的「檳城閱書報社」。其間先生並不單單駐在一地，而奔走於星加坡，西貢，仰光，檳榔，馬來半島之霹靂等地，調達資金，從事宣傳與組織等工作。例如光緒卅三年（一九〇七年）十月，與鎮南關事件同時，先生又從西貢赴新加坡，當時在河內的黃興，曾發先以中山先生的名義，向星加坡的同盟會支部發出電報一通，謂：「精衛君昨夜由西貢搭法公司來星，望派船招待，孫。」

其時中山先生偕同胡漢民赴吉隆坡建立同盟會支部，以王清江為支部長，其幹部有阮德三，蘇雲

鄭等人。後復至大霹靂，怡保等地，推進會務。在怡保時，一行人最初投宿於新改良旅館，然當地勢力向為康有為的保皇黨所占，以該地華僑富豪胡子春為首，對於中山先生一行的活動，大加阻遏。甚至中山先生不得已，當夜即偕同林義順，陳楚楠，李竹癡等另覓宿處。後來中山先生即派遣先生與吳應培往馬來亞從事活動，先生憑其宣傳的天才，曾獲很大結果。關於先生演說的天才，張永福先生曾經這樣說過：

「在彼演說之夕，被請者尚未登壇，全場即無虛席，當彼踏上講台，滿堂即鴉雀無聲，每講至精采熱烈處，掌聲如雷而起。其能吸引聽衆之注意與喚起熱情，概可想見。」

鎮南關起義的失敗，是在一九〇七年十月，至翌年三月，中山先生又指揮河口起事；當時先生即在檳榔嶼籌得基金數千元以充革命費用。但不幸此次起義又告失敗，中山先生在清廷各方追迫之下，只得再返美洲從事籌款。當時將國內外的黨務交給先生與胡漢民，黃克强諸公，而先生與胡氏，即成了華僑革命活動的中心。

創辦「中興日報」

先生於一九〇六年赴南洋，於一九〇九年再返日本轉道北上謀刺攝政王，其間四年的過程中，除「奔走南洋，組織同盟會分會百餘處」外，其次要工作，就是在新加坡創立「中興日報」。先生於這一時期的黨義宣傳，不僅見之於各地的演講，且亦見之於「中興日報」，其所謂：「在那時候，所有演講和論說，都載在「中興日報」」，（「自述」）即是指此。

「中興日報」第一號，係發刊於一九〇七年八月二十日（陰曆丁未七月十二日）。它的英文名詞是『Chong Sing press』或『Chong Sin Vit pao』。當時發行所係在新加坡吉甯街十三號（13. Cron Street）發行人由麥加士建洋行（Mcalister & Co, Ltd.）出面，主席張永福，監督陳楚楠，經理林義順，主筆汪兆銘，胡漢民，居正，田桐，林時塽，張西林，王行，何德如，林希俠，方瑞麟。發刊詞係由胡漢民先生執筆。當時康有爲一派的保皇黨，在新加坡亦有一張叫「總匯報」的機關報，其編輯陣容的人物有區渠甲，宸壽民，陳介敬諸人。因此東京時代的「民報」與「新民叢報」的理論鬥爭，這時就在新加坡再度出現了。當時同盟會的態度是這樣的，欲打擊滿廷，非先在精神上打擊其代言人的保皇黨一派不可。因此胡漢民先生專任批駁康梁的著作，先生與何德如，王行等，担任理論的正面攻擊，就連中山先生本人，也一度以「南洋小學生」的筆名，發表過堂堂的議論。

「中興日報」在南洋華僑間所引起的影響，是非常宏大的，發行數量飛躍增加，因此而有擴大經營的必要。爲籌措資金，由林義順先生建議將「中興日報」組織股份公司，此議得到中山先生的同意之後，即由先生，胡漢民，林義順，許子麟等奔走各方募股，結果在陸秋露，陳光進，陳貞祥，鄧澤如，潘兆鵬，丘得松諸人的贊助下，報紙得獲繼續發展。當時會長張永福先生在回憶及當年奮鬥的情景時，不禁這樣感慨說：

「今往矣，民爲黨國之柱石，然當時之拮据狀態，如今猶在腦際。」

就在這個時候，陳璧君女史亦和「中興日報」發生了關係。在報社招股時，璧君女史適遇張永福先生的局間，於同年（一九〇八年六月五日）購入百圓股十股，當時的收據現在尚可考得。

久字第三十四號代

南洋中興報社有限公司收到
陳壁君先生附入壹十股交到全期股本通用銀紙共壹百大圓整
理合給回收單爲據候公司開辦通知請攜此單換
本公司換正股票可也　付此收執存據
所有本公司事宜均照英國有限公司辦理
戊申年六月初五日經理人

一頁光榮史的前奏

「中興日報」與康有爲一派的鬥爭，還不限於新加坡一地。蓋在其前康有爲在仰光已設保皇會於五十尺路，發動援助德宗運動，而當地閩僑李竹癡，陳春源，莊銀安，徐贊周等同盟會員暨同情同盟會的份子，頗思成立一宣傳機關以抵抗保皇派。於是他們就集議收買當地爾啟恩所辦的「仰江新報」，改組爲「光華日報」，以莊銀安爲經理，陳仲赫爲副經理，後來胡漢民，呂天民，黃大寰等先後前來協助，同盟會在仰光的勢力因此大增。當時爲避人耳目，同盟會的支部並不公開，而以「演說社」，「覺民書報社」等等名目從事活動。該地的支持人即莊銀安與盧喜福，而演講會的台柱，則爲先生，與胡漢民及吳應培。據說莊銀安先生在有一次熱烈的演說中，竟因此吐血而死。這些另星的史實插話，說明了當時革命情況的何等熾烈。

先生在南洋的四年間，奔走革命，極得中山先生的信託與同志的愛戴，而先生的宣傳工作——文字上或口頭上的——尤博得工作上的極大效果。在檳榔時期日夕在新街新舞台與小蘭亭演講，其得羅人心，更爲同志所稱道。例如陳新政先生對於先生的雄辯口才，曾稱道謂：

汪君之演說，題目既新穎，而事事原得肯綮，因此極得聽衆信仰。謂南洋華僑之覺醒，實出於汪君之力，亦不爲溢譽也。（「陳新政遺集」卷下頁三）

此時陳璧君女史，亦爲先生的熱忱聽衆之一。由革命而結爲終身伴侶，實由於此時始。當時檳榔同志黃金慶，設有維新書局，爲出售革命書籍機關之一。璧君女史就常來此地購置「革命先鋒」等書籍。後來璧君女史常至同盟會會員吳也榮家中，而先生亦常而吳家，因此相識。當先生於光緒三四年（一九〇八年）自檳榔赴光處理黨務時，璧君女史亦於此時離開檳榔前赴日本留學。翌年，先生離開南洋謀北上發舉之際，亦曾轉道至日，而造成中國革命史上夫婦共同參加發事的光榮一頁。惟關於此事，筆者特留待下章詳述，這裏爲略窺先生與璧君女史至深關係起見，謹引先生於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所賦的詩一首以爲本章承上啟下的結論。

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

依然涼月照三更，回首當年百感并。志決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復期來生。頭顱似許原非望，
恩意如新不可名。好語相酬惟努力，人間憂患正縱橫。

——詩集集——

第三章　庚戌艱難

革命與英雄主義

中山先生於一九〇九年五月三度赴歐美募集革命資金前後，曾將黨務交托給胡漢民，黃克強及先生諸人。當時先生即與胡漢民等商妥，在中山先生出國時期，黨務工作暫限於革命籌劃及組織工作。但革命的行動仍自發地不斷在國內展開。宣統二年，廣州新軍事件成熟。原來清廷自屢經外患，對於軍事上頗思有所改革。當時廣東省也改採新軍制度，除一面在陸軍速成學校及虎門講武學堂養成將兵之外，復於一九〇七年設立模範學兵營，以之組成新軍。可是革命黨的同志在此前後却有大批加入此項新軍，結果獲三大隊的新軍，反形成了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

至宣統二年元月，黃克強與胡漢民認爲新軍起事時機業已成熟。但不幸其中因有過份熱烈份子，竟於事先一日即謀發動起事，結果遂告失敗。當時中山先生聞訊之後，即由美取道檀香山返國，過日本時曾私行登陸，爲當局所悉，不准逗留，遂至檳榔嶼約晤趙伯先及胡漢民諸氏，商議再度起事。旋即再赴美洲。原來在此前後，革命行動，曾遭受重大打擊，如潮安，黃岡，惠陽，欽廉，鎮南關，上思，河口諸役，幾無一不失敗。因此黨外敵對勢力的攻擊，黨內情緒的消沉，亦於此爲極。黨外如「新民叢報」梁啟超一派，冷言熱語，譏諷先生等爲「遠距離的革命家」，而謂革命黨的首領，徒驅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而原屬同盟會的光復會派章炳麟及陶成章等，亦惑於外言，起而責難。於

是先生感覺到此時欲挽救革命，實有先行振起黨內行動情緒的必要，遂決志以身作則，北上從事謀刺當朝要員。

革命與英雄主義，雖然是二件事，然英雄主義雖不一定即是革命的，但革命的過程卻總離不了英雄主義的插曲。這點區別，我們是應該理解的。仝盟會推翻滿清，固有其本身的歷史因素，當然仝盟會於辛亥革命前夜陷於精神上的退潮時，要無一椿驚天動地的偉大英雄行動，就難免在其一連串的進展過程中要受到極種的頓挫。一連串的革命進程，就宛如一架鎖鏈的機器，機器的配備雖已構成了其本體轉動的條件，但要沒有一種不斷的推動力，機器只不過是機器而已。而且人事的構成是有機的，其複雜當非鐵鑄的機器可以比擬。就冷酷的歷史因素言，某一個人的行動，似乎不足道，可是歷史要是離開了人的條件，那就不成其為歷史。我們對於人與歷史的關係是應該這樣看取的：即我們雖不能說每一個人的隨便行為即足構成歷史，然而無數人的日常行為，卻正是一時代的歷史背景，而就中若干人的代表行為——歷史意義的行為，就是歷史以人格化表現的里程碑。先生北上義舉一事，應該如此看法。

北上前夜的準備

先生北上謀刺攝政王載灃，其非出於個人的英雄主義，事實異常顯明。蓋當時黨內因屢次起事失敗，情緒大為低落，同時康梁派的乘機攻擊，光復會派章炳麟，李佳中，李天鄰，時功玖，許雪秋，陶成章等人又紛紛附和，於是清廷即思利用此有利機會，剿撫並進，企圖分散黨人力量。此種形勢，

當非像先生這樣有血氣的人所能容忍，故遂毅然決定以犧牲一人的偉舉，藉以挽回黨人的精神。先生事先並不將此志告人，故當其於宣統元年自星加坡潛赴香港之時，就連中山先生亦未曾曉得先生抱此決心。獨有先生知己胡漢民先生一人，略知先生的意志。故先生到香港之後，黃克强適自越南抵星加坡，自胡氏知悉此事之後，乃立即與中山先生聯電勸阻，並電當時在港的馮自由，囑令於先生抵港之時，設法加以勸阻。馮氏得電後，曉得先生趁法國郵船來港，即偕黃隆生和，趨至九龍碼頭守候。及先生抵港，知行蹤已為同志所知，遂暫中止進行。

先生旋赴日本，與同盟之士黃復生，喻紀雲，曾醒，方君瑛，黎仲實，陳璧君等組織一小暗殺團體。彼時在東京密議的場所，為本鄉區眞砂町十五番地。當時陳璧君女士已先在日本，跟滔天的義弟九二四郎先生學習擊劍。就中喻紀雲本是日本千葉醫專出身，對於化學知識十分豐富，他和黃復生兩人就擔任了小團體中製造炸彈的任務。旋因在日本試驗困難，先生乃先偕仲實，璧君，復生，君瑛四人先至香港，設機關於黃泥涌道，時約同志李紀堂赴屯門鄧三伯之農場從事種種試驗。

他們所用的武器，包括日本日野大尉發明的三十六響鐵鎗及自動炸彈，這是他們在東京時在倉地鈴吉與小室友次郎的工廠中習得的。他們試驗的方法頗足發噱，即先以小猪一頭繫於二壁中間，然後以小猪為犧牲目標，發動電火。這小猪當時在先生等一羣人心目中就等於西太后的外甥端方，不過端方還是當時滿室的一位比較開明政治家，因此後來先生等一團人所選定的犧牲目標，不是端方而是攝政王載灃。

致中山先生書

先生於宣統元年一年中，為經營暗殺事件，曾先後往返日本二次。中山先生與黃克強氏，曾屢加勸阻，但先生意志已決，莫能挽回。雖是年秋同盟會成立南方支部於香港，邀聘先生為支部書記，先生仍堅不肯受。迨至同年十一月上旬，先生偕紀雲，仲實，璧君悄然北上。臨行致書中山先生及南洋諸同志告別。其致中山先生書謂：

來致敬悉一切，前團體以專心此事，既聞命矣。後團則以維持團體為急，此事可置後圖。弟意欲維持團體，莫善於力疑斷團所言。蓋此時團體，渙散已甚。維持之法，非口實所可彌縫，非手段所可挽回，要在吾黨勢力爲事實之進行，則灰心者復熱，懷疑者復歸於信。此非臆測之言，前事可徵也。丁未春夏之間，太炎諸君在東京所以排擊破壞，無所不至矣。嗣潮惠軍起，東京同志奮起響應，未嘗以太炎等之言而有所介介於中。即太炎等亦自息其喙。惟太炎等最後之手段，無過於發佈誣毀之函。前因有人彌縫其間，此等最後之手段忍而未發。今則不然，彼等最後之手段已出矣。其排擊破壞之能力，當無有更甚於此者矣。然則今後吾黨復有事實之進行，對於天下，則彼等愧怍之不暇，更有何法以惑人。弟等之為此事，目的在於破敵，而非在於對內變也。所以對內變之道，亦不外於此。故弟在東京，於彼等之所為，付之不見不聞，惟專心於所事而已。先生謂弟死後，太炎等不知又如何興文。此言弟亦慮及；小人之為不善，無所不至，不能保其不為此卑劣之行，故弟甚望南洋同志，存廣見識。弟事發後，團為營之而興報，以杜彼輩之興文也。餘情詳以前諸信不再贅，專此敬請大安。弟精衛頓首。

此信書於同年十一月朔日，觀此信，我們可知先生不僅賦有勇氣且更智慮周到，決非一介之勇夫

可比。一般人普通只知道先生是一位書生氣的人物，實則先生不僅秀逸其貌，且亦具有百折不撓的勇氣。普通人對於書生氣的人物往往別具慢眼，殊實中國歷史上能留芳百世而成爲後世讚美的人物，多半是帶有俠義氣氛的文士。這一點我個人認爲中國古典教育的方式是很有關係的，蓋武道一門，爲中國古代傳統教育項目之一，如六藝中的射御是，直到科舉制度興，八股取代了一切，書生就無形中變成了弱者的代名詞。言念及此，良足興嘆。

與胡漢民的論辯

當先生決心北上之時，中山先生及黃克强胡漢民諸公，均力加勸阻，良以先生平素對於同志間友誼極篤，大家恐怕先生此去，萬一事機不密，不僅先生命難保，即對黨內工作亦將蒙受重大打擊。就中胡漢民與先生素稱莫逆，故阻諫尤力。惟先生大志既決，絕不稍動。且更表示其決心謂：「若謂今非可死之時，弟非可遽死之人，則未知何時始爲可死之時，而吾黨孰爲可死之人。凡爲黨死，死得其正。兄無以愛我之故，矯爲不衷之言。」這種大義精神，就連胡漢民先生亦不禁爲之感動萬分。後來胡漢民嘗語人謂先生決非以血氣見逞於一時者流，誠爲知心之談，其實先生一生唯主義是從，終身未嘗稍變。凡眞能瞭解先生精神者，必能知道先生個人的生命，不屬於他一身而屬於主義。我們從先生的紀傳探討先生的政治生命，更可證明此種論斷，決非出之臆測虛構。關於這一點，我們總是引用先生自己的意見，先生於同年三月十九日致胡漢民先生書謂：

讀三月十一日來書，謂暗殺之事，足阻革命之前途，弟細籌不覺太息久之。平日相與論事，弟之所見，似不

如兄之精密，惟今度弟自信所見較眞。蓋兄囑辟我事而下評論，而弟則自丁未（光緒三十三年）以來，蓄此念於胸中，以至今日，千迴萬轉，而終不移其決心。昔人有言，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譬諸螺旋之釘，弟之所思，已經千螺旋鏇遶。凡兄此書所言，與某某書所言，曾弟所經過者，今舉而辟之如下。一謂此事徒促虜軍隊警察之進步；此言頗嫌其過於簡單。數年以前，虜極昏迷，我亦幼稚，兩無進步之可言。就今日及以後虜與我相對之狀態而思之，可舉六端：一曰因我進步，虜亦進步；二曰因虜進步，我亦進步；三曰因我不進步，虜亦不進步；四曰因虜不進步，我亦不進步；五曰虜進步，而我不進步；六曰我進步，而虜不進步。就此六者觀之，因革命黨之行暗殺，而加意於陸軍警察之進步，此固意中事。所謂因我進步，虜亦進步也。然則我不進步，虜亦進步矣乎？徵之事實，則殊不然。數年以來，虜軍隊警察之進步，有目共睹。近者陸軍部日催各省，使限於一年以內，練成陸軍兩鎮。然則虜不因我不進步，而亦不進步明矣。是故希望我進步，而虜不進步者，祇可從附之冀孚。而虜及因我進步，虜亦進步者，亦當知此為不可逃之事實。尤當知因我進步，而虜亦進步，猶愈於虜進步而我不進步也。是故為今日計，虜既因我之進步，而亦進步，我亦因虜之進步而進步。高材捷足者，先以得之而已。夫為吾黨謀進步，其事有為虜所不及知者（例如秘密運動），有為人所共見者（例如既起兵及暗殺事。）為虜所不及知，則我進步，而虜不進步，此最宜注力謀之者也。無如革命黨之行事，不能以運動為已足；縱有千百之革命黨（此指眞革命黨）運動於海外，而於內地全無聲響，不見有直接激烈之行動，則人幾忘中國之有革命黨矣。故運動與直接激烈之行動，相將而行，缺一不可。而直接激烈之行動，既予人以共見，即無術以禁虜之不從此加意於提防。然不能因避虜之加意提防，而遂停止其直接激烈之行動。是所謂因我進步，虜亦進步，猶愈於虜進步，而我不進步也。二謂此事徒使虜加意粉飾立憲之舉動。兄論此事，極為透闢，弟向亦曾念及此。惟兄書結論云，為中國計，為多數人計，此後非特暗殺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虜死命之運動，亦斷不可起，蓋

此皆使吾敵之陰力反撥，國民愈生迷夢者也，然則吾黨將持消極主義以裂世乎？吾有以知兄必不謂然。兄之意以爲勉求起一有充分之武力，能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也。此即弟前書所謂成軍也。兄之目的，全與弟同。惟如何而得達此目的乎？！其不離運動與直接激烈之行動兩者明也。既不能直接激烈之行動，則兄之反對此舉，又何爲者？且兄亦嘗於別一方面思之乎！全露馬腳之立憲大綱，尙未足醒國人之迷夢，而粉飾之舉動，日日未已，（此兄所已言者）即以吾粵論，官界紳界商界學界，皆孜孜然以六月初一及九月初一，選舉諮議局紳爲唯一之大典，彼爲立憲之劇，固日演於舞臺，以炫人之觀聽，而革命行動，寂然無聞，不獨爲賊所竊笑，且令國人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之風潮，以爲前者猛進不已之革命黨，今亦擲甲收兵，聲響都寂。是非心折於虜廷之假立憲，何以如此？是益足以堅其信仰立憲之志耳。今後吾黨若無直接激烈之行動，其結果必出於此。如俄羅斯如土耳其，立憲詔書宣佈之初，一時人心爲之稍靖；迨眞相旣露，羣始大譁；此時衆怒必較前爲烈，然而政府已於緩者人心轉移之時，肆力修備種種壓制之魔力；魔力旣盛，悍然斬去假面目而不顧，而人民莫如之何，惟有水益深火益熱，無可自脫，輾轉就死而已。今者彼虜民賊，即用此手段。吾黨於其初嘗豫備立憲，已洞燭及之。故民報、中興報上之論文，出於兄與弟二人之手者，對於此事，不啻垂涕泣爲國人道也。則奈何可於滿賊演立憲劇之時，使吾黨緘默其直接激烈之行動，以殖滿人之信用，而導國民以入於迷夢也耶！是故因滿賊之盡露馬腳，而不爲直接激烈之行動者，其言雖亦有見，然害及吾黨，毀其直接激烈之行動，則人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之風潮，而倍增其信仰，其爲害於人心者爲尤大也。固知革命黨之勢若漸斂，則滿賊無所忌憚，愈於粉飾，其假面目爲漸揭露。然尤當思彼必蓄足眞魔力，然後斷去假面具也。假面具終有揭露之時，能於其未揭露之前，而先灼見之，且揭破之，以告人者，惟有革命黨。今於假面具之時，欲一揭破之，使國民知不肯受欺者，固大有人在；則直接激烈之行動，必不可已也。兄謂此事傷吾黨之元氣；此論據爲薄弱。零星散發之革命誠足傷吾黨之元氣，弟詳論之矣。至於暗殺，不

過犧牲三數熱血同志之生命而已。何傷元氣之有，若並此數人之性命而亦吝之，則何必組織革命乎？譬如煮飯，當爇之以薪，薪盡而飯熟，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乎？若謂人才難得，當積以求之，不當輕易散去，須知所以求人才，欲其得用也，得而不用，何求之爲？若謂今非可死之時，弟非可避死之人，則未知何時始爲可死之時，而吾黨數數爲可死之人也！以吾之意，吾黨除自殺外，凡爲黨事而致死者，皆可云死得其正。兄無以愛我之故，獨爲不衷之言也。以上所言，於兄所疑者，剖析殆盡，未識兄以爲何如？

主義與實踐

在任何一個革命過程中，總不免發生對於主義的信念縱盡相同，而對於主義的實踐，則有異議者。一般政黨的內部分裂，往往起因於實踐之爭，而非原理之爭。然而眞正能發生統一力量的，倒不是徒全主義的外形而在其實踐。同樣也可以說一種主義的眞正信徒，他同時必然是一個主義的實踐者。任何革命的主義，必然是行動的主義者，也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讀了上面引述的一封信，便可知道先生與一般徒唱主義的高踏派革命家，畢竟大有區別。胡漢民先生於先生蒙難之後，始將信刊諸南方報章，並附識數語謂：「吾友此事，蓄念已久。然吾與孫中山君及一二同志，屢泥其行，其意皆欲吾友爲木鐸，不遽爲血鐘也。吾友所言，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譬諸炊飯，以已爲薪，曾不念其當爲釜者，故終不能屈吾友之意。」先生大志格天，羅襄蹈不過是一例罷了。

先生先嘗喻紀覽於宣統元年至北京後即在琉璃廠火神廟夾道——今之太平橋——設立秘密機關。爲避人耳目起見，即在此地開設一守眞照相館，復賃東北關數屋，以爲會所。其間黃復生與陳璧君女

士等亦相繼前來北京。當一切計劃次第布置就緒之後，先生自知事件一旦爆發，生命不保，故在事先三月，即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復致書胡漢民及南洋諸同志。詞意之間，備述革命胸襟，如今讀之，更覺饒有意義。茲覓錄原詞如下：

前函草就，復念世人性質，好崇拜死人，而推許生人，此風大不可長。欲爲文以正之，使知生質要由黨負之任者，其艱固有甚於死者也。惜匆匆之際，爲文不能詳，然亦已簡括言之，頃登諸中興報上，即作爲弟之絕筆可也。革命之要義，由仁心而生者也。仁心一日不滅，則勇氣一日不息，故能毅然以身爲犧牲而不辭。欲犧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端：一曰恆，二曰烈。恆乎烈乎？斯二者欲較其難易，須其輕重，未可以一言盡也。設譬以明之，譬之炊飯；盛米以釜，束薪燒之，釜之爲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蝕，火不能鎔，能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恆之德也。若革命黨人之擔負重任，集勞怨於一身，百折不撓，以行其志者也。薪之爲用，炬火熊熊，頃刻而燼；顧體質雖毀，而熱力發發，飯以是熟，此烈之德也。若革命黨人之猛向前進，一往不返，流血濺同種者也。夫捨釜與薪，飯無由成，即取其一，而舍其一，飯亦無由成。欲致力於革命者，亦當深念及之。則當度德量力，擇其一而爲之，不必較其難易，權其輕重，惟視己力之所能爲而已。今欲舉革命黨人之有恆德者之一人以爲代表，則以最先進之一人當之，孫逸仙先生是也。今欲舉革命黨人有烈德者之一人以爲代表，則亦以最先進之一人當之，史堅如先生是也。吾黨人欲於恆與烈擇其一者，其觀此矣。而歸其本，則曰由仁心而生之勇氣。

這封信也是先生蒙難之後，由胡漢民在南洋報章上加以刊載。胡漢民復註數語於後謂：「北京炸彈事件發見，吾友汪精衛與黃復生，遂落彼虜之手。二人爲革命之良友，即滿虜之深仇。既得之而不敢遽加戕害之者，以彼當僞預備立憲之時期，將以緣飾內外人之耳目。且知黨人絕無懼死之志，前仆後繼，勢所必然。彼虜已爲中懾，乃勉強以寬大之狀，欲冷黨人之怒，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者，據中外各報皆云，精衛供詞，洋洋數千言，而廚不敢發表一字，誠恨其所言之足以動天下人也，保皇黨人，無恥無賴，乃竄入歸罪攝政，及國會不開等語，鬼蜮之徒，良不足較。而其他各報亦多之事推測，甚於無一能知吾友決心之所在。嗚呼！吾不能脫友於虎狼之吻，吾豈可更使吾友受誣不白，實志以歿耶！吾負有爲吾友辯正之義務，而猶處所言不盡吾友之本懷。幸吾友手書所遺，猶保存於余手，讀之可具見吾友之志。不肯如吾，不煩更贅一詞，斯世有欲知吾友此次行動之本意者，請讀其書。抑吾友之志，即同事黃君之志也。悠悠之口，當漸歸而自息矣。」

告別南洋同志

先生所謂世人性質，好崇拜死人而批評生人，不僅道着了一般俗世羣衆的心理，且亦是先生本人當時極可能的處境。所謂蓋棺論定，原是普世衆生對人物衡量的準則。蓋不脫功利觀念的人生，往往好以死人作準本。這種現象，世間恬不爲怪。實則對於一個一心一意爲事業奮鬥的人，他本人本無所謂成功與失敗，只是衆口悠悠，偏好論長道短，以爲自己貶揚的櫬托。俄國作家戈果里所寫的「死魂靈」一書，雖另有其內容，然而世上靠喫着另一種「死魂靈」爲生者，確亦不乏其人。世上有不少人會爲「人言可畏」而遽萌短世之念，但眞正的「人言可畏」，恐怕倒不在一個人的生時而在其死後，因爲事到其時，聽人擺弄，連辯護的機會也早沒有了。先生洞燭卓識，爲杜絕後人假借其事業，離間黨人起見，特在致漢民書中，附致南洋同志一書，其詞有謂：

南洋同志公鑒：弟自昨歲小除夕離星嘉坡以來，遂與諸同志不復相見，至於今將一年矣。此一年中，得此事

之故，來往奔走，僕僕不定其居。屢接諸同志來書，殷殷存問；所尤不忘者，庇能及仰光同志，曾電召弟往，弟皆未嘗一報，每念及之，輒愧然不安。顧弟所以不敢報者，以既承諸同志存問，不能不述近狀以告；將以實相告耶，則事尙未發，不能預言；將飾詞以相告耶，則是欺也。以是之故，竟闕闕而不報。今者將赴北京，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故預爲此書，託友人漢民代存，俟弟事發後，即爲代寄，以補前此疏略之過，望勿以遲延爲罪，幸甚幸甚。抑爲朋友者，於臨別之際，必有贈言，況將死之時耶，惟弟所欲言者，平日已言於民報及中興報，而民報第二十六期所載革命之決心一文，則將生平所爲文字，約而言之，蓋即以此爲弟將死之言可也。惟弟於將死之時，猶有所歉然於中者，即以今春弟將爲此事，平生師友，知而責之，以爲死之易，不如生之難，以當艱屯。其所諄諄責備者，弟心識之矣。顧以革命之事，條理萬端，人當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擇其一而致力焉。既致力於是，則當專心致志，死後而已，然後無負於初心。弟既致力於是矣。而年來與諸同志往來於目的地，相約前仆後繼，期於必制狂虜之死命，故離國師友之督責，亦一往而不留，亦以耿耿此心，可對於師友也。然死者長已矣，至於生者，因將來革命之風潮日高，而其所負之責任亦日重，其勞瘁苦況，必有十倍於今日者。恕，敢先諸同志而死，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此誠所深自愧恧者。望諸同志於死者，勿寬其責備，而於生者，則務爲團結，以厚集其力。惟相信而後能相愛，惟相愛而後能相助。毋惑於讒言，毋被離間於宵小，毋以形迹偶疏，而疑其感情，毋以行事遊移，而疑其心術，蓋有此四者，往往使團結力爲之破解，凡諸黨派所不能免，而秘密性質之革命黨，則尤不免也。至如近日某某等倡散流言，離間同志，是其一例。願諸同志慎之也。嗟乎！革命之責任，必純潔而有勇者，乃能負之以趨。非諸同志之望而誰望，願同志同心協力，固現在之基礎，努將來之進行，則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朝旭日之必東升矣。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書盡於此，伏維自愛。

胡漢民先生於此書之後，亦附綴數語謂：「此書寄於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同時介以一書云：「弟爲此事，與兄爭執者屢。兄之所言，固有至理。兄望我至切，我非木石，寧能無動。惟竊思果弟一人以一死爲快者，則誠無以對兄。而今所爲，決不如是。自信前仆後繼事，方興未艾也。如是則弟亦可無罪於吾黨矣。此時距出發之期不遠，遺書之事，弟恥爲之，故前此不復注意於此。今者小人離間，蝟集至於中山，弟不能爲中山分謗，已可愧矣。反被人傳言弟與中山有隙，分道而馳（南報公然宣佈），則遺書之事，雖爲可恥，亦不得不冒昧爲之。今草告南洋同志公函一封，乞兄代存。俟事發後，爲之郵寄中興日報登載，以塞小人之口。」

關於先生北上義舉的動機，其決心與精神，有了上引的幾封信，已經足够明白。先生在諸此信中，無一語述及私人顧慮，且以遺書爲了恥至不得已而爲之一點，足見其人格之崇高。

銀錠橋計劃失敗

先生最初本擬謀炸慶親王，但以慶王侍從如雲，加以所經道路多爲寬闊處所，不易下手，遂作罷論。是時適載洵載濤自歐洲考察海軍歸國，先生乃攜鐵壺盛炸藥至東站相俟。是日盛會，雖候之竟日，但下車時官員隨行衆多，目標分別不清，只得廢然而返。後來先生與同志計議，擒賊莫如擒王，遂決議謀炸攝政王載灃。

攝政王載灃所居的醇親王府，離什刹海岸不遠。先生與諸同志探悉載灃每日上朝，必打從鼓樓大街經過。橋前有短牆一道，先生計議若炸彈由此擲下，則在載灃經過時，一行人均可炸斃。但事有不

巧，此項計劃方定，載灃因鼓樓大街修築馬路，忽變更行程。第一次計劃遂宣告流產。後來又訪得其取道烟袋斜街，亦因租不到房子，不能下手。最後始決定以什刹海旁的銀錠橋爲行事地點。

銀錠橋雖三面環水，一面聯聯數家居民，環境比較幽僻，可是離開攝政王府却太近。照例王府附近，一定警衛森嚴，難以下手。而且在光緒三十三四年左右，北京城內火事頻發，外間早傳有革命黨混入放火的流言。當時民部尙書肅親王，曾爲此事親自領導組織所成的消防隊，以防火災。並在以丁士源爲總辦的高等巡警學堂中，選拔優秀學生施以四個月的消防工作訓練，以肅親王的第三子鎭國將軍憲平爲消防隊隊長。這消防隊也就是當時載灃參內時的警衛隊。

此消防隊兼警衛隊所受嚴格訓練中有一條，規定在上朝路上，隨時刻注意有無新掘泥土痕跡。苟有發見，應即立刻勘查，並報告勘查結果。載灃本人所以因鼓樓大街修築馬路而變更行程，或亦卽由此原因。

然在先生方面，以爲銀錠橋既接近攝政王府，爲載灃上朝每日必經之地，適橋北堍復有現成陰溝，遂決定在該處埋藏炸彈，通以電線，以電流發火，伺載灃過橋之時，卽引線爆炸。當時計劃既定，復向什刹海附近淸虛觀道士處租賃一屋，以爲行動地點。當時由喩紀雲擔任埋炸彈，先生則自任引放電機，時爲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夜。

蒙難前後經過

不過事情卻是全部失敗的。失敗的經過，據後來各方面的傳說，頗多出入。有說是夜喩紀雲偕黃

復生同往橋下掘孔時，因犬聲四起，未及竣事。及至次夜復往，將炸彈鐵罐埋置孔中，並敷設電線。復因電線過短，不够應用，等三夜再往續接電線時，忽見橋上有人窺伺，復生大驚，即遣雲紀往僻處觀中囑先生勿來，已則潛大樹後，觀察動靜。起初見一男子持一小燈籠下橋，且照且尋，若有所索。一俟此人走後，復生乃急至橋下將電線拆卸，惟鐵罐頗重，當場未及移動。僅將電線連同鐵罐，一起用土覆蔽原處。復生本人再伏樹後窺伺，旋見一警察一憲兵偕一平民同來，持燈籠二，下橋視察良久乃去。後來據傳說，當夜有一陳某男子，因其妻三日不歸，出外偵訪，不意深夜發見橋下有人作埋藏物件模樣，遂奔告警察，另一說則爲一劉某者至橋邊溲溺而於無意中發見。

更有一說，則謂事在三月七日上午三時半，載澧上朝道經銀錠橋時，在其前面打道的消防隊員兼警衛隊員，忽在附近發見新翻掘的泥土，遂即根據他們平素訓練的經驗，立即動手搜查，結果果在橋堍發現埋彈處所。此時傳到憲平處後，即親自出來調查。當時北京市內只有二所經售彈藥件的機關，一所在東城，一所在西城。經消防隊調查結果，此炸彈殼係西城臨記鐵工廠所造。據此線索，遂告破案。

但諸說中當以二十三夜被發現埋彈一說較爲可靠，因發案之日至破案之日，中間尚有十餘日的距離，不過像這樣一件大事，當不免有種種臆測和傳說。案既發，先生知道暫時已不能進行，其間即遣陳璧君女士與黎仲實至南京廣州籌建資金，同時派喩紀雲往東京，先生與復生兩人則仍留京內以觀動靜。這時先生如果要走，原也還走得掉。不過先生既抱決心而來，並不因計劃屢次挫敗而告消極。

他方面軍警當局發見炸彈之後，即會同各方當局，並聘日本技師前往驗看。原來當時消防隊的訓

機，即聘有日本教官，如町野武馬，川島浪速，小平總治等人。據日本技師檢驗結果，證明彈殼係外國製造，一時盛傳載洵載濤兩貝勒方自外國返來，朝內或有較深陰謀。但彈殼外面的螺旋釘，如證明係土造，當局遂着手開始偵查。後來知道係騾馬市大街鴻泰永所製。於是捕獲鴻泰永主人，知爲守眞照相館定錄。搜查守眞照相館結果，又復發見諸多可疑文件。此時黃復生即告被捕，而同日先生適往館中探聽變故，爲鴻泰永主人所見，亦一起逮捕，事在同年三月七日。

先生罹難之後，對於當時北京各報，當然是一大好材料。於翌日「正宗愛國報」上，即有新聞一則如下：

「初七日上午十一句鐘，弁兵五六，持鎗由琉璃廠火神廟西夾道守眞照相館內，綑綁一人，年二十許，東洋裝束，無髮辮。尙綁有中裝者三人。先後裝入轎車而行，警派極嚴，不知係何重案云。」

第三日同報又續載消息謂：

昨所載琉璃廠守眞照相館四人被拏一節，中有一人東洋裝束，係將半結其辮（前半全留，後半僅留寸許）。皆係少年，南方口音。當被獲時，且搜出鎗械云云。

當時東洋裝束，即指西裝，西裝而無髮辮，其爲革命黨無疑。

到同月十日，「愛國正宗報」上又刊載拏獲要案續聞一則，記載更詳：

據查原辦此案，係內左一區警員某，帶同巡警由該相館拏獲汪某一名，廣東人，東洋裝束，帶有假辮，當被巡警撤掉。並拏該館主人黃弗甲一名，四川人及廚子館役二名。又在東北園路西小胡同黃弗甲家內，搜出皮包七個，內裝火藥藥水鐵罐剪子小刀，並起出手鎗等物，一併押解內左一區，即日下午兩點半鐘，將全案解交內城總廳。兩點後，民政部正堂肅王烏林兩侍郎內城巡警總廳，公同審訊。據汪某供稱，二月初五日，曾託騾馬市路南鴻

裴永鑫盒舖擊鑼鏈廷文，在順治門大街路東三盛合鐵廠，訂造鐵罐一個，付過價洋七元，初十日取回等情。當據內城總廳警士會同外城警區，赴騾馬市傳喚商裴永鑫長鏈某到案。據供汪某託伊在三盛合鐵廠訂造鐵罐，當時汪某言是盛香油用。及添傳該廠掌櫃某甲到廳質訊，供亦相同。隨將某甲取保塞傳，汪某等在廳拘留。不知以後如何。

歷史的文獻

先生被捕之後，本早視生死爲身外之事，遂即寫了一篇長達數千言的歷史供詞，表白他的堅毅志向。原詞如下：

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留學時，曾爲民報主筆，生平宗旨，皆發之於民報，可不多言。丁未年孫逸仙起事時，兵敗後攜炸藥軍器等出，我潛以此等物件，納入書篋，寄存友人處。後復在南洋各埠演說，聯絡同志。繼思於京師根本之地，爲震動天下人心之舉故來，又自以平日在東京交遊素廣，京師各處熟人頗多，不易避面，故陪黃君映附相館之設，即以三百元入股，在京居其家。黃君等皆不知精衛目的所在。相處月餘，後見精衛行止可疑，頗有疑心，故映相館中有人辭去。至於今日，忽聞你等映相館中有事，故即往閱，知事發不忍連累無辜，故復回寓，擬留書黃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自被逮以來，訊者或曰今中國已立憲矣，何猶思革命而不已。嗚呼，爲此言者，以爲中國已有長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黨人觀之，則數年以來，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少減於疇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持立憲之說者，以爲立憲則必平滿漢之界，而民族主義之目的可以達；立憲則必予民以權，而民主主義之目的可以達；如是則雖君主立憲，亦不可以即於治。以吾黨人論之，姑勿論所謂平滿漢之界，與所謂予民以權者爲果有其實否，即以君主立憲之制而言，其不能達吾國之

目的，可決言也。蓋法理者，每謂君主僅國家之最高機關，有憲法以範圍之，則君主無責任而不能侵犯，故君主立憲，未嘗不可以治國。此於法理則然矣，以事實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國之立憲，無論其為君主立憲與為民主立憲，皆必經一度革命而後得之。所以然者，以專制之權力行之既久，為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非驟去強權，無由收除舊布新之效故也。法國當路易十六即位之初，蓋已嘗樹立憲君主政體矣。而後卒不免於大革命，其故實由於此。非惟民主國之法國為然，以君主國言，若英所謂憲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謂君主立憲政體之強國者也，今之言立憲者多祖述之。其亦嘗一按此三國之歷史乎？英國無成文憲法，其所謂權利請願，與所謂大憲章者，實由幾度革命所造成。其憲法發達之歷史，蓋遞嬗遞變以至於今日者。法學者謂英國之國體雖曰君主制，而以其政治而論，實為民主政治，非虛語也。德國之憲政，由日耳曼諸邦自治制度，夙已發達，足以為其根本，故君主立憲之制，可行之而無礙。至於日本，則所謂最重君權之國也。其憲法上君主之大權，遠非德國可比，微論英國。今中國之言憲政者，或謂其以日本為法，或謂其君主大權過重，是於法理為不足學。吾以為前說固無足論，即後說亦徒為法理之空談，非事實之論也。夫謂日本憲法君主大權最重者，於法理上則然耳，至於事實，則大權固不在君主也。維新以前幕府專制，天皇僅擁虛位，是故倒幕之役，實為日本政法上之大革命。西鄉隆盛之兵東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權，已移於維新黨之手，於是德川歸政，天皇總攬大權。要其實則天皇高拱，國事皆決於倒幕黨之手，是故日本之憲法，以法文而言，則大權總攬於君主，而以歷史而言，則其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國立憲之成績衡之，中國乃無一相類。既非如英國憲法之以漸發展，又非如德國有自治制度以為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經廢藩倒幕之大革命，其專制政體，行之已數千年，自二百六十餘年以來，且日益加厲。所謂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在於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為奴隸供奔走而已，一旦藉立憲之名，而制定憲法大綱，其標榜名義，以為憲法所以尊重君權。夫各國之立憲，其目

神在於限制君權；而此所謂立憲，其宗旨在於鞏固君權。然則吾儕謂如此立憲，適爲君主權力之保障，爲政府之護符，其言有少過乎。嗚乎，如此之立憲，即單以解決政治問題，猶且不可，况欲兼以解決民族問題乎。夫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有衝突之關係。民族主義，謂不欲以一民族受制於他民族之强權；民權主義之不欲以大多數之人民受制於政府之强權。然所謂强權者，即政治上之權力。今號稱立憲，而其目的在於鞏固君主之大權。是其强權較昔加厲，其終爲民族民權兩主義之敵，不亦宜乎。論者又曰，此爲國會未開時爲然耳。國會已開，則民權日以發達，故爲政治革命計，當以速開國會爲惟一之手段。爲此言者，可謂惑之甚也。夫立憲所以鞏固君主之大權，上文已言之矣。而國會者，即爲此大權所孕育而生。如嬰兒之仰乳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如是之國會，而欲其能與政府爭權限，以爲人民之代表，庸有冀乎。吾敢斷言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未有所變易，而貿然開國會以生息於君主大權之下者，其結果不出三種：一曰國會爲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曾立憲矣，其憲法悉模仿歐洲君主立憲國。條文纔布之後，以親倖之臣組織內閣，以各省總督爲上議院議員，以附屬擁護之小人爲下議院議員，粉飾苟且，殆如一場戲劇。未幾新內閣頹然而倒，而國會亦閉歇不復開。至昨歲而有少年土耳其黨之大革命。二曰國會爲君主之魚肉，今之俄羅斯是也。俄自與日本戰敗後，迫於民變不得不立憲，其憲法條文之完善，較之歐洲大國相倍蓰也。其政黨之發達，較之今日請開國會者之完備相霄壤也。其憲法由民黨數十年紅血所購得，較之今日所謂立憲，又不可同日而語也。然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無所變易，國會終不能與政府之威權相抗。故自有國會後，以持正議之故，屢被解散，議員之被捕者纍纍不絕，濃血充塞之歷史如故，革命之風潮亦急激如故。三曰國會爲君主之贅疣，今之安南議會是也。安南隸屬於法，法欲苛斂其民，而慮以激民，乃開議會，以安南人之有資望者，爲殖民會議員，每欲加稅，輒開議會使議決，號於衆曰，此議會所議決也。故安南之有議會，實爲法國官吏之鷹犬，協力以壓制其民者也。由是觀之，即如請願國會者之所期，其結果不出此三

者。請願諸人，其果有業於是乎。醉虛名而忘實禍，其罪實通於天也。立憲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諸人，以爲欲達民生之目的，舍與政府死戰之外，實無他法，此實革命黨所久已決議者也。若夫避戰爭之禍，而求相安之法，則前此革命黨人（下缺一二行）憲政體，則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之目的皆可以達，而戰爭之禍亦可以免，誠政者也。或有慮此爲不利於滿人者。不知果不言立憲則已，如其立憲，則無論爲君主國體，爲民主國體，皆不能不以國民平等爲原則。謂民主國體爲不利於滿者，非篤論也。或有慮此爲不利於君主者。然以較諸與革命之際，其利害相去幾何，歷史所明示，不待詳言也。所謂願汝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及所謂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慘也。設不亡於漢人而亡於鄰國，則法之待安南，觀去其國王如一敝屣，而其國王乃日仰鼻息以苟活也。以較之日本德川幕府，還大政身名俱泰者，其相去如何乎。上之所言，於國內現象略陳之矣。至於國外之現象，其足使中國一亡而不可復存，一弱而不可復強者，尤令人驚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國人於庚子以來，頗知敵國外患之足懼，至於今日，反熟視若無所覩，此眞可爲痛哭者也。夫中國自甲午戰敗以來，所以未至於瓜分者，非中國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國平均勢力之結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國乘勢進兵於東三省，久駐弗撤，實啓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勢之故，遂與之戰。戰役既終，而各國之形勢爲之一變，前此日英同盟，與俄德法同盟相對抗。迨俄戰後而有日俄協約，有日法協約，有英俄協約。所謂協約，質而言之，實協以謀中國而已。前此欲謀中國，而各國自顧其利害，勢有不均，遂相衝突而出於戰。今則鑒於戰禍，而以協約爲均勢不二法門。一旦各國勢力平均，則保全瓜分爲其所願。顧所以得延至今者，以英法處德爲之梗，而日本又處美國之議其後也。比年日美之衝突，日以猖獗，數月前忽有日美開戰之說。而日英同盟之議，囂然大起。日本新聞從而論之曰，日美英同盟成立，則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國之死命。其謀我之極，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強，兩國雖各懷敵愾，終不致遽如日俄之釁端，則其彼此利害衝突之點，終必以協商定之。誠使英美法俄美日對於中國之均勢政策略定，則自甲午以來，中

國所賴以苟安偷活者，乃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有為波蘭之續而已。分割之慘，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謂保全者，其實為無異於分割。國不能自立，而賴保全於人，已失其所以為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此所謂一亡而不可復存。一蹶而不復振者也。識者有鑒於此，乃倡言清美同盟。夫同盟之目的，在於互相扶助也。故有兩強國同盟者，而決無以強國與弱國同盟者。以強國而與弱國同盟，是必強者以同盟為餌而餌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國不自強，萬無可以與他國同盟之理。而非於國家權力發動根本上有大變革，又無可以自強之理。愛國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談國事者，不以此為憂，而顧以邇來中國與外國交際，其體面較優於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國所以不見禮於外國者，以其有賤外排外之思想。然雖如是，而俄人固嘗以深情厚貌相親，而因以獲大利矣。今中國人之思想，已由賤外排外，一轉而為媚外，而各國之尊我不如俄，知中國之所重者不在主權，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體面，遂亦飾以深情厚貌相結，以期外交上之圓滑，而中國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間有一二小小權利得倖倖爭回，則尤大喜欲狂。而於外國之協以謀我，瞭乎若無所見。此眞燕雀處於危巢，而不知大廈之將傾也。此無他，由人人心目中以為今已預備立憲，凡內治外交諸問題，皆可藉以解決，騖其名而不務其實，如渴飲以狂藥。獨日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後，中國之情狀，其有不忍言者矣。由此言之，中國之積勢，非於根本上為解決，必無振起之望。及今圖之，其猶未晚，斯則後死者之責也。

黨內外的反響

這篇供詞，實是一篇歷史性的大文章。當此生死關頭，先生仍侃侃而談，這種革命精神，浩然正氣，實非一個平常人所能想像。而其所言所論，不獨對於當時的國內外情形發揮至為透闢，即在我們今日讀來，恐怕也有無限的感慨。一個人為生存奮鬥，縱為至有意義也是至難的事；然而欲拋卻一切

私念，從出生入死的種種歷程中去懸念國家與民族生存的奮鬥，並不是人人能爲的事。能之者，唯有堅決不拔之革命精神的鬥士而已。這決非是轉彎的說法，捨死求生，乃是人人所有的天然願望，貪生謗不可恥。然可貴的却是能從死的意義中看透生的意義。

先生旣作此供詞，當然不思卸却責任，而慨然承認一切行動皆由己爲。「正宗愛國報」亦謂：「據供所有一切，皆汪某一人所作，並無別人指使等情」，其慷慨激昂之情，不獨爲後來黨人佳話，且使當時滿廷當局，亦爲之敬提不止。當時大家以爲先生萬無生理，却不料此案件竟有意料之外的發展。

當時國內外黨人，聞悉先生蒙難之後，均預料難逃一死，故早一致目爲先生是革命的殉道者了。當時張靜江方在巴黎，聞此訊後，逢謂人曰：「使我費十萬金，購一活精衛來，亦所甘心。」其對先生推崇有如此者。而其他革命黨人，對於先生的義舉，又復贊佩有加。爲知當時黨人對於先生的評價起見，我們最好引用當時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週刊」：在該刊第一百二十一期中，有署名「反」的一位作者，發表了一篇題名「殲我良士哀哉不能言」的長文，除前半段敍述先生蒙難前後的經過外，即以幾句發抒謂：

此吾黨所最哀慘之字條，支那愛國者精衛汪先生殉道之凶聞也。嗚乎！萬爵氏被逮，西班牙之暴君未定，各國黨人能而騷亂者數十處。西班牙政府雖敢冒世界之大不韙，而暴君亦爲之不寧。精衛先生不僅以義氣相尚，激宕於權貴之間，彼固完全一保衛民權之大俠豪傑也。中國十年以來，稍有影響於微微之人道，與短時之驚魂者，一爲吳先生，其一則鄒容君，其學則淺陋。然彼若任作駁原道等篇，不慮法意時而即死，亦如河南程氏所云：

退之其遲矣。彼所影響者，本止及於中年之斗方名士。然其晚節，率名士而歸中國新黨於無恥者，亦收其全功。張謇，鄭孝胥之徒，從天下而動，先天下而利，國會完全歸不知公德之支那儒者。草鞋跟線，揚而羼之，將復其有力焉。故殷復之功，決不能掩其罪也。梁啟超其初本無邪氣之好學生。當新民叢報之出也，慨然有獻身爲猪之概。忽爲艺臉所規持，不幸而中功業之毒，斯爲可惜。滿洲立憲之聲一起，梁啟超之晚節末路，遂倒行逆施，幾乎與市井無賴，同其流品。其影響所及，首先墮劫者，如楊度之屬；其餘甲乙丙丁，蕃蹇而倒敗，幾風靡於全學界。最從前個人之羽毛，學步效客，固之不欲者，莫若吳稚暉之徒。其狀貌威嚴，誠嶷然敢爲也，此皆梁啟超之附屬品。必非蘇蘇餘子，簿爾晨目所可及。若精衛先生者，彼不知有功業，惟冀人民之福利而已。先生知中國之殘虐民者，決非滿洲政府之勢；凡智能稍優於中民者，即欲虐民以自肥，才如嚴復，梁啟超，楊度，張謇，鄭孝胥，吳稚暉之徒。以迄袁世凱鹿傳霖，陸潤庠，劉光漢之屬，無論其表面之爲善爲惡，無非皆操其虐民自肥之方術而已。以爲先生，曉乎後矣。

此寥寥數百語，將先生的身份襯托得何等鮮明。其謂先生不知有功業，惟冀人民之福利，這眞是先生一生事業的最切評價。同期「新世紀」又另闢「滴滴淚」一欄，專載旅法同志對先生同情的小品文字。就中有具名「合者」一文曰：

得來信，謂不肖所聞，初不料竟爲誑言。回首光黨慈戮觀之獻俱報，既獨老請，秀良之士，屠殺殆盡，吾欲何言！不隨劍死，儘所討論益慚愧，懷伊人顛沛蒼然，蹈北緬一，遽飲屠伯之刃。掩面而號，何能已聲耶！

這是認爲先生業已罹難的哀悼文字。當時消息既遭封鎖，而案情本身又重大，因此一般同志，均一致認爲先生萬無僥倖之理。在此同樣感情下，又有署名「苦者」，「革餘者」，「痴者」，「南者」，「駁者」等發抒慷慨激昂的論調，論先生投身革命暗殺，民族英雄；總之，先生視刺載灃一舉，[illegible]者失

敗，但其精神影響，無論對國內對外，均已收到了極大的效果。

終身監禁與肅親王

先生一行人既被捕，清廷當局的狼狽慌張，自不待言。當時鄭親王第三子鎮國將軍憲平，首將此事通知京師城內警察長章宗祥，同時至東四牌樓胡同王府稟呈民部尚書肅親王本人。因事體重大，即夕於王府召開幹部會議，由肅親王主席，到有章宗祥，憲平，民政部參議汪榮寶，警衛軍統領良弼，疆理司長劉道仁，陸軍軍法司長兼高等巡警學堂總辦丁士源等諸人。此時適值清廷正擬以立憲緩和革命氣勢的時代，所以對於先生一案，一時竟感難於處理。在平時，當然不免以死刑相處，當時一部份頑固官僚，原也作此主張。即載灃本人，最初亦極震怒。但就中民部尚書肅親王，卻是當朝的一位比較開明主義者。肅王認為當此立憲時期，殺一革命黨人，除迫黨人挺而走險之外，與朝廷並無好處。故主張爲標榜立憲，緩和人心並離間黨人起見，不如從輕發落爲佳。實則肅王本人既爲開明份子，對於先生的洋洋供詞，早不免受其影響。而載灃認爲肅王意見亦十分有理，因此於先生案發之後第十四日，一行人由民政部解送法部。其解送原文謂：

民政部爲欽奉事，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宣統二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諭，民政部會奏拿獲要犯，請旨懲辦一摺。汪兆銘黃復生，着交法部永遠牢固監禁。羅世勛着牢固監禁十年。餘依議。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相應派員將要犯汪兆銘等三名，解送貴部，欽遵辦理可也。須至咨者。計送要犯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三名，宣統二年三月二十日，民政部咨送，奉前交部永遠監禁及監禁十年人犯汪兆銘等，為部收禁。茲將汪兆銘，黃復生，羅世

勛等，已受檢查，應用衣服書籍各件，開列清單如左。單袷衣褲六十四件，毯氈十四塊，布片一捲計十九塊，藤箱大小兩擔，藤箱包內，袷衣斗篷共三十六件，頭枕棉衣褲十一件，棉花在內，白布包內棉被棉褥褥子枕頭共二十一件，皮統靴共八雙，計十六支，皮絨鞋共十五支，帽子十頂，皮帶等零件共四十三件，子書二十八種，計二十四本，通鑑集覽計二十四本，陽明學計三本，殘缺小說計七十一本。又兩套，地圖一張，曾世勛棉被一床，布衫一件，銅墨盒兩個，筆十支。

先生得免一死而獲終身監禁的判決，其得力於革命決心者半，得力於肅親王亦半。蓋有革命的決心，始能感格及人。當先生被捕時，警士曾從先生衣袋中搜出「革命的決心」、「革命的趨勢」及「告別同志書」等三篇文章，肅親王當然有機會讀過，而後來那篇洋洋萬言的供詞，尤使肅王感動不止。在這裏就習伏蒼所謂己助人助的一種神力。要非如此，我們就不能解釋何以肅王肯為先生出一臂之力了。反之，當時清廷中要無肅王那樣一位比較開明的人物存在，則先生的革命決心，也只能遂到成仁的最高表現。因此就革命的立場言，先生與肅王雖為二個對立陣容的人物，惟在私誼上，先生後年未嘗不表示對肅王助力的感謝。這也是先生人格美德的一節插話。關於此點，我們在下章「獄中內外」尚有敘述。茲引先生本人被捕時口占一絕於后：

被逮口占

啣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姹嫣紫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後

正月在北京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三月廿二日，先生與黃復生羅世勛三人被正式移入舊刑部監獄。當時清廷政治腐敗，監獄生活，自然不堪設想。不過一因先生等是國事犯，他方面清廷方圖在各方面以政治刷新示人，故對先生等待遇稍優，而肅親王本人，亦因愛慕革命黨人的卓識與精神，時時入獄探訪先生與復生。當時肅王所以如此看待先生，除個人的感情外，自然含有一種政治目的，即圖感化先生。就各方面看來，肅王似乎不失爲當時清廷中的一位開明人物。據傳當攝政王預備判處先生等以極刑之時，肅王曾以俾士麥的高壓手腕不足以滅德國社會黨及維多利亞女皇特赦謀刺政治犯的事蹟，感動了攝政王的心。在先生入獄之後，肅王更不時前來相與談論。有一次肅王且親語先生他本人曾閱讀「民報」，他說他閱讀了「天討增刊」上的「獸王夜嘯圖」及「射狐圖」諸篇之後，深覺革命黨人確有資格可以談革命了。不過就在這種場合，肅王也並沒有忘記他的政治任務，因此他會向先生質難過，他說三民主義雖好，但就他看來，未免太狹隘了一些，他認爲世界大同主義，比之三民主義更合乎革命的理想。如果先生是一個空洞的理想主義者，在當時的環境下也許有爲肅王之言所動的可能。事實上確有許多高唱理想的政治家，一旦遭遇危難的試驗，往往會轉變成爲一個高蹈主義者。然而對於實踐性格異常強烈的先生，肅王的友誼固可感，肅王的理論卻是斷斷不能接受的。

在前引的「正月的回憶」一文中，關於當時的獄中生活，先生曾有一節憶述如下：

……一九一〇年，我在北京，企圖暗殺當時的攝政王，未成，被拘禁獄中。一九一一年的正月，在北京的鐵窗下過的。當時北京的監獄，正在改善囚犯待遇後不久，比諸以前，要人道的多了。但是，我的腳上還是繫上了鐐銬。每天的三餐，叫是叫作老米，已很陳，脂肪質亦早已失去了的帶黃色的糙米飯一碗，鹹蘿蔔一碟，湯一杯，每五天吃一次豆腐。但若比諸過去，已好得多了。但是當時的我，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始終覺肚饑荒。吃肉，是一年三次，端午，中秋及元旦。尤其是元旦，每個人一斤肉。在獄中過着的這一年的正月，忘却一切，貪婪的吃肉。（中略）

救我命的是肅親王。肅親王爲使我拋棄革命的決心，用盡了種種方法。曾經有一次，把我帶到法場上，逼迫我變更革命的決心。他常常到監獄中來，與我議論天下大事，談論詩歌，我的能免一死，也許是有一種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憶到這個時候的事，總懷念着這位清朝末期的偉大政治家。（譯文見「新中國報」「學藝」。）

政治家與詩人

引文中所謂談論詩歌，詩歌確是先生獄中生活的唯一慰藉。真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同時必然是一個文學藝術的愛好者。良以一種偉大的政治理想，必產生自崇高的感情情懷。人們的內心應該得到其適當的表現，詩歌是抽象的，政治是實踐的，但就其所代表的理想言，它們同爲一定感情的產物。任何一種政治運動，一定有許多文士詩人參加其間，無論他們是在朝幫閒，在野幫忙。一種含有偉大理想的政治運動，一定含有政治表面現象以外的文學或詩的因素在內。而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亦

他政治生活的另一面，必然包含着文化色彩豐富的生活樣相。而在中國這個文治之邦，這種特性尤其來得明顯。第一，一個政治家一定是知識份子，第二，中國歷來政治舞台的背景，就是用詩詞文章鋪砌成了的。幹政治，弄文學，雖然是兩個不同的生活部門，然而在需要豐厚的感情，內省的精神一點上，是完全相同的。詩所抒說的是感情，政治所表現的是理想，但兩者都來自精神的要素。

在先生從參加革命到殺難爲止的幾年中，他的內心的表現是在革命事業的實踐，所以這個時期只有宣傳革命的大塊文章，而很少有訴說感情的詩詞之作，可是在獄中生活的一個時期，與外界的交往既被切斷，內心的感情發洩，就貫注到精神文學方面來了。先生在他詩集之一的「小休集」序中，曾有這樣幾句話：

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講斯言，人生不能無勞，勞不能無息；長勞而暫息，人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樂也。而吾詩適成於此時，故吾詩非能曲盡萬物之情，如禹鼎之無所不象，溫犀之無所不照也。特如農夫樵子，偶然釋耒弛擔，相與坐道旁樹蔭下，微吟短嘯，以忘勞苦於須臾耳……

這短短的幾句話，細味之下，我們不僅看到了先生人生觀的如何淡樸，實在也暗示了一個崇高政治家的眞摯感情。世人每相信政治家的鬥爭裏面，一定包含着無窮的物質慾望；然而一般所謂政治家是否如此，姑且不論，惟一個革命的政治家，他的奮鬥確是偏重於精神方面的。任何政治家當不能飲風餐露度日，惟不以一己的功利觀念以臨政治事業的政治家，他決不爲物慾所蔽。世間固不乏以滿足一己養尊處優生活的政客，然唯政治理想是問的政治家；他就只知道而爲人類服役，甚而作一己修養。如果說像這種人也不能要求感情之滿足，則我所取者，一如蘇軾所謂惟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

而已。當今德國元首希特勒，我爲傑儒之餘，他所追求的，是一種造製藝術，而在先生的情形，則唯詩詞而已。

感情的抒發

在一年有餘的獄中歲月時期，先生僅有二十八首的詩作。我們讀過獄中記一類東西的人，都歸爲獄中的生活的感情抒發，終不免帶幾分意氣消沉的氣氛。牢獄生活的情調，確也充滿了幽暗的色彩。然而文天祥的正氣歌就是監繫生活的產物，其浩然之氣，究非監獄的圍牆擋攔得住。雖說監獄生活阻絕了先生與外間世界的接觸，然其對革命事業的耿耿之心，卻同樣不受這種人爲阻隔的影響。例如前章引述的「被逮口占」一詩，就是當時先生胸襟的絕好表白。入獄之後，先生的精神氣魄和他腳上的鐐鍊更是相得益彰。現在試看他的「獄中什感」「有感」及「詠楊淑山先生手所植榆樹」等諸作，以示一班：

獄中雜感

西風庭院夜深沉，徹耳秋聲感不禁。伏櫪難磨千里志，經霜猶有百年心。南冠未改支離態，對角中宵發楚音。多謝青燐慰岑寂，殘宵猶自伴孤吟。

煤山雲樹總淒然，荊棘銅駝幾變遷？行去已無乾淨土，憂來徒喚奈何天。瞻烏不盡林宗恨，賦鵩知傷賈傅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

有感

憂來如病亦綿綿。一讀黃書一泫然。瓜蔓已都無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笳中落月淒無色，劍裏江城黯自

聲。莫向燕台回首望，荊榛零落帶寒煙。

詠楊椒山先生所手植榆樹

樹猶如此況生平，動我蒼茫懷古情。千里不堪聞路哭，一鳴豈爲令人驚。碩陰落落無餘節，枯葉蕭蕭有餘聲。寥寂階前坐相對，兩枝留得夕陽明。

附記：椒山先生以劾嚴嵩下獄，就義之處所植榆樹猶活，數百年來無敢毀之者，相傳有神怪，殆有心人藉此以存甘棠之愛也。余所居獄室門前，正對此樹，朝夕相接，民國六年重游北京，獄舍已剷爲平地，惟此樹巍然獨存。

感懷

士爲天下生，亦爲天下死。方其未死時，怦怦終不已。背來魂魄羅，一籌三萬里。山川知我憶，相見各含睇。願君發清霜，一爲洗塵耳。歸來夢如何，斜月淡如水。

以上所引各作，無一不是先生當時抒懷之作。寄託哀情，追懷古人，憑弔事物，不過是抒發感情的工具而已。但除此以外，先生對於外間世事，雖無法與聞，却仍處處表示關懷。尤其對於革命黨人的一舉一動，更是關切異常。不過在當時，這種關心，也僅能表之於詩詞的方式。

獄內外的高歌

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趙聲，黃克強等在廣州起事，死者七十二人，事後葬於黃花崗。當時先生在獄卒處聞悉此事後，不禁悲感交集而有寄懷之作：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余在北京獄中偶聞獄卒道一二，未能詳也。賦此寄感。

夜將詩思亂閒愁，却看流螢落不收。九死形骸慚放浪，十年師友負綢繆。殘燈難續寒更夢，歸雁空攜故國辭。最是月明鄰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難覓一雙魚，永夜愁人慘不舒。南浦離懷羅綺薄，舊樓殘夢錦衾虛。鵑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暫憶昨宵燈影裏，故人顏色漸模糊。

再如溫生才自南洋返國謀刺孚琦失敗一事，消息傳至獄中時，先生亦有「獄中聞溫生才刺孚琦」之作云：

血濺英雄滿天涯，不數當年博浪沙。石虎果然能沒羽，城狐倒可怕磨牙。新亭觸目情何限，昂首長歌哽咽聲。長記越台春欲暮，女牆紅遍木棉花。

這與其說是憑弔溫生才，無寧說是先生當時自己的心理宣述。獄中生活不僅未曾銷磨掉了先生的意志，如果我們用鐵的堅强來比衡先生的意志，則獄中生活實在使這種鐵的意志更鍛鍊成了鋼的性格。

另有二件插曲，也是有關於先生獄中生活的。當先生北上義舉之初，阻遏先生最力的是先生的兩位好友，一位是胡漢民先生，一位是朱執信先生。關於胡漢民先生勸阻先生的經過，前章已經敍述過。朱執信先生則在先生尚未出發之前，鑒於先生行志已決，無可挽回，遂有代古決詞及代答兩作。詞中有「來年當三月，坐看萬木繁」之句，竟成詩讖。茲一併引載如下：

代古決詞

我意固已決。蕭艾藉藉生。不如蘭蕙折，自謂冷冷再生，孤燈照影徒悲泣。中夜出門去，三步兩徬徨，

言念同心人，中情自紆縈。我心固匪石，萬言千言空留聲。月光皎皎缺復圓，星光腴腴聚復稀，日光星光兩嶔嶔。欲明未明鷄唱時，芙蓉江上好，幽蘭谷下潔，所貴在素心，不向西風弄顏色。水流雖朝宗，燕落還回顧，來乎當三月，坐看截木槃。人生代謝亦如此，此身何惜殉荊轟。

代答詞

消搏露秋零，陳蜜守乾干。所貴持達人，貞心留歲寒。齊歸不羨飛冲天，所爭豈在須臾間。我有微軀素，欲葵先祇澀。丈夫各有千秋意，無爲區區兒女顏。相期留金石，寧將塵垢污人寰，何意中道判，欲往逝不還。此情誰不言，心雖力已殫。不惜此身苦，恐令心期負，含辛進此歌，願君一週顧。

但兩闋詞在當初雖不過是詩人心靈的一種假設，然其友情意味的豐富厚重，實在是反襯了先生在朋儕間保有着如何深邃的感情。朱執信先生在事先即作此決詞，而胡漢民先生初聞先生蒙難，其心創痛，自無待言，試看他的一首詩作：

挾策當興漢，持椎復入秦。問誰堪作釜？使子竟爲薪！智勇豈無用，犧牲共幾人。此時眞決絕，淚早落江濱。

庚戌春日在廣州聞北訊，知季兄事失敗。季兄人豪，以血書書之：我今所薪，兄當爲釜，蓋用其論革命文中語也。

後來先生在獄中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胡漢民先生亦殉難，有詩哭之曰：

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卻憐三人血，不作一時流。忽忽餘生恨，茫茫後死憂。難將小年淚，灑上寸心頭。落落初相見，無言意已移。談笑常互聞，寤寐不曾離。壯懷劉攜處，艱難發對時。歲寒期相共，肝膽照迴池。彼自同日事，傷心不忍聞。迴懷徒淼淼，過眼盡紛紛。塊蝶悲銜土，舒嫁歎告藍，故國新劍盼，…

望。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余在北京獄中，聞展堂死事，爲詩哭之，繼聞展堂未死，遂輟作。

胡漢民知先生有詩弔之，遂亦作詩和之曰：

滄浪推蕩惡，須知未易測。可憐成獨往，只欲障狂流。日日中原事，沉沉大地變。廣州三月春，吾亦讀吾頭。火盡薪仍在，行危道不移。心魂留共守，風雨慎相攜。國士生還日，羣黎望治時。當春榮萬木，獨遠歲寒枝。既定共和局，因之撤漢關，我家良未已，此日且無紛。回雁知秋氣，飛鳥有斷羣。徘徊不能去，應爲故山雲。

黨的營救

先生與黨內同志的感情既如此深厚，故其被捕消息傳出，黨內馬上發動營救。前面曾經說過，自銀錠橋事發之後，先生與黃復生留京，而派陳璧君女士偕黎仲實赴香港廣州籌議資金，喻紀雲則赴東京續行購辦火藥。後來陳璧君女士亦轉道前赴日本。當他們正在東京準備一切之際，忽在日本報紙上看到了先生被捕的消息。當時陳璧君女士本欲入京以身相殉，後來知道先生得免死刑，僅處終身監禁，遂稍心安。因此即會同紀雲，仲實到香港計議營救之策。同時中山先生與胡漢民亦得因報，於是即共同進行營救事宜。中山先生偕同胡漢民及陳璧君女士先赴檳榔嶼籌集資金。璧君女士家庭富有，凡其太夫人亦早同情革命，故在以先生一行入北上之際，曾傾家協助。這一次又由陳父第三如夫人捐助[illegible]千。[illegible]鄉同志亦捐助一千元。同時檳榔同志又推舉戴金[illegible]先生偕同胡漢民及璧君女士四人往各地捐

款。當時所以需要如許款項，不僅是爲的援救先生，且更欲繼續執行先生未竟之志。現在將當時胡漢民致鄧澤如的一信，轉載如下：

黎生見行後六日，璧君始抵檳城相見。精衛先被捕，係在璧君由北京到日本將及再返北京之日，當攝政邸側，發見炸彈埋藏處時，精衛等知所謀之未遂，但以爲無由蹤跡，且猛往直前之心，不以少挫折而輒止，因令璧君往日本，更合藥爲再圖。（以爲藥多，前所攜備者不敷，而北京又無購買處）璧君行時，亦覺同事者無大危險，此所以曾電慰其家庭云事雖敗而無傷也。距後北京偵探，因鐵罐製造之店，而輾轉推求，至半月之久，竟物色得四川黃君，獲之於照相館，更由館中人覺得汪黃所用之小廚帶路至所居屋，而精衛亦落賊手。港報所登，係據日本報所錄而登者，大致不差，然云汪等有相片及相館亦早知二人之有本姓者則譌。今精衛與黃君，俱已定爲永遠監禁，初璧君與同事者數人聞精衛盈耗，即欲急足再潛往京城，拚與俱盡，及知精衛改定監禁，乃折回香港，謀營救之法，弟初亦不甚信監禁之說，故對於此耗，以爲無望，及見璧君，乃諳九死一生之機。吾儕不名爲精衛之友則已，不名爲革命之同志則已，循有朋友之念與團體一氣之觀念，當無不力圖營救之策者。璧君過港，港中有三五熱心同志，皆協救而起。因之已有擔任運動北京官界之人，其人爲門第最高者。除精衛原本同事數人外，尚有挺身願冒險脫精衛於難者數人，藉此義舉也，而以奪滿虜之魄。亦示吾黨患難相急之眞於天下。惟此等節一着，便需措款項，其一切運動經已布置，（今雖未能預定出何方法，而必備有種種可用之材料）其需費之多，（當在萬金之上）則可預言。璧君之左右，已於去年盡鬻其首飾，以與精衛等爲行事之費，今雖並罄其第三賬推之私蓄矣。然此只僅可得三四千金，且須一月餘，始能交價。（弟擬璧君一家之行事，不禁敬佩。）所能同志，資助有五六百金，故弟急須措推藥，金慶，璧君再出星加坡。（玄議二三有資財之同志之討，此時紛紛，以勵等救精衛之爲人，非昔久鬱於獄中，盡其不覺敎而蹴肖之志也。

金鏤曲共綰同心結

胡漢民與璧君女士在新加坡籌得款項後，即回到香港，香港諸人早在尖沙咀設有專事營救先生及繼續謀刺攝政王的秘密機關。惟如何派人進京佈置一切，頗成問題。因仲實，璧君等雖欲挺身而出，無奈他們對案情直接有關，去京凶多吉少。因此遂改推鄒魯，鄭子敦，張煊前往。就中張煊有同鄉人在法部當差，輾轉通達，得獲先生消息，而璧君女士遂亦隨後進京。先璧君女士經由獄卒之手，以十餘雞蛋送至獄中。先生得到雞蛋之後，不免疑慮萬端，後來一一細察，忽在雞蛋上發見了璧君女士的筆跡。方知獄中已有人偕璧君女士同來營救，不禁憂喜交集。喜的當然是外面已來營救，而憂的是恐怕璧君女士發生危險。在此極難以形容的心情下，先生以血書「信平到安」四字，再轉輾托人送到外面。這樣一來，獄內外的交通是打通了。

當先生第一次接得璧君女士的手書時，曾賦金縷曲一。詞云：

余居北京獄中，嚴冬風雪，夜未成寐，忽獄卒推余，示以片紙，摺皺不辨行墨，就燈審視，赫然冰如手書也。獄卒附耳告余，此紙乃傳遞輾轉而來，促作報字。余欲作書，懼洩漏，倉猝未知所可。忽憶平日喜誦顧梁汾寄吳季子詞，爲冰如所習聞，欲書以付之。然「馬角烏白」句，易爲人所駭，且非余意所欲出，乃匆匆傚效其體成此詞，以冰如書中有「忍死須臾」云云，感其留京賈禍，故詞中峻促其離去。冰如手書留之不可，棄之不忍，乃嚼而下之。冰如出京後以此詞示同志，遂漸有傳寫者。在未知始末者見之，必以余爲剽竊顧詞矣。此詞無可存之理，所以存之者，亦當日酒書之紀念云爾。

金縷曲　民國紀元前二年北京獄中所作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爲君剖。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又難。

以共同事業而結成終身伴侶，在世界各國革命史上原非鮮見，不過像先生伉儷那樣情愛彌篤，在私生活上樹立一種楷範者，却也並不多見。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從事革命事業的人。不過積實於一代偉人生活底流的，必然是其公私一貫的美德與人格。先生一生致力國事，就是璧君女士，在中國革命事業上亦有其不可埋沒的貢獻，然而兩人對於彼此在私生活上的瞭解與關切，一如他倆爲革命事業共同奮鬥一樣，始終未嘗稍弛，數十年來先生爲革命事業奔走海內外，其間夫婦當不免有小別，然先生對其夫人的愛心，則竟可說與日益增。先生以惻隱仁愛的心理參加革命，同樣，他的這種美德爲他博得了黨內外人士的深厚友情，而在夫婦關係上，亦建下了中國當代領袖家庭的模範。

獄外的革命形勢

先生當時在獄中以吟詩賦詞自娛歲月，但外間的革命形勢，却一天緊似一天。是年（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一九月的廣州起義雖復遭失敗，不過黃花崗的烈士鮮血，已在整個的中國散遍了火花。九月間以清廷命盛宣懷爲國有鐵道問題擬集外債事件爲導火綫，首先在四川爆發了革命的火燄。而以武漢爲中心的新軍部隊與武判公會，亦有「振武社」的軍事革命組織成立。所謂新軍，包括步兵

六大隊，騎兵，炮兵，工兵各一中隊，這時候隊中幾乎都有人參加了「振武社」的秘密團體。而黨方面的領導人，當時是譚人鳳。

是時俄國租界忽發生炸彈案件。當局派人搜查的結果，發見了革命的旗幟和名冊，於是按圖索驥，先在武昌小朝街捕得黨人卅五名，後復在各機關捕得七十三人。一時武漢三鎮，充滿了恐怖的空氣。然而，這卻正是革命暴動所需要的情緒。

新軍內部因為名冊給發見，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結果工兵隊中人認為與其束手就縛，無寧先下手為強。因此工兵隊就首先發動了行動。事實上工兵隊確無甚麼把握，唯一的把握，只是人心的不穩而已。然而這一群衆心理的把握，卻收得了意外的成功。在工兵中隊發出第一鎗後，齊濟民等的第二十九大隊，立馬上響應了。不久，城外南湖的炮兵騎兵與騎兵，也隨之一起發動，革命的戰爭，就這樣開始了。

軍事行動的開始是在陰曆八月十九日，正像開始是突發，其結束也意外的迅速。炮兵自蛇山高地向城內總督署轟擊的結果，使總督瑞徵忽忽逃往漢口租界，第八師團長張彪，也隨後上兵艦逃之夭夭。在翌日二十日，武昌全城已入新軍之手，公推協統第二十一混成旅團黎元洪為首袖。武昌革命傳的成功，當然鼓勵了各省的黨人同志，亦起而各自為戰，在數月之內，竟光復了十五省之多。

清朝政府在這個時候，還圖掙扎而不肯放棄政權，遂於同年十一月召袁世凱入京，同時在內政方面制定內閣官制，頒佈憲法命令，而資政院復於此時請開放黨禁，特赦[illegible]年九月前事，據是月十日內閣官報第六十九號所載緣[illegible]謂：

九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資政院奏請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一摺。黨禁之禍，自古垂爲炯戒，不獨戕賊人才，抑且消沮士氣。況時事日有變遷，政治因之遞嬗，往往有所持政見，在昔日爲罪言，而在今日則爲讜論者。雖或迹涉嫌疑，逃亡海外，放言肆論，不無微瑕，究因熱心政治，以致逾越範圍，其情不無可原。茲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綸，與民更始。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嗣後大淸帝國臣民，苟不逾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當深自濯磨，抒發忠愛，同觀憲政之成，以示朝廷咸與維新之至意。欽此。（監國攝政王鈐章，奕劻，那桐，徐世昌署名）

開放黨禁釋放出獄

這篇官樣文章，雖已不足挽救淸室覆亡的命運，但却促成了先生早日出獄的機會。當時法部尚書紹昌，根據開放黨禁法令，即與左右侍郎會商開釋先生及其他黨人。紹昌原奏如下：

開去國務院司法大臣，臣覺羅紹昌等謹奏，爲黨禁既開，擬將臣部監禁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請旨予釋放，恭摺仰祈聖鑒事。宣統三年九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資政院奏定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一摺，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等因，欽此。跪聆之下，仰見朝廷寬大爲懷。與民更始之至意，感悚莫名。伏查宣統二年三月二十日，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民政部會奏，審擬要犯訊明定擬一摺，汪兆銘，黃復生，著交法部永遠牢固監禁，羅世勛牢固監禁十年，餘依議，欽此。嗣准寄信前來，並由民政部將羅原摺到部，當經遵照分別辦理在案。竊維比年以來，時事艱難，憤時嫉俗之士，倡言改革政治，原出於熱誠發憤，其心亦別無他。茲聖上廓然大公，豁除黨禁，咸與維新，在逃

諸人。倘予赦其既往，則凡因犯此項嫌疑，監禁在先者，自無不在矜恤寬宥之中。臣部仰體朝廷德意，請就監禁人犯，逐起調查，竊見汪兆銘等一案，情罪似由有因，旋即片行民政部，咨取全案卷宗，詳細翻閱，所有原供罪狀，實係因犯政治革命嫌疑，致罹法網。在汪兆銘等，以改良急進之心，致蹈逾越範圍之咎，其跡雖近悖逆而當日朝廷不忍加誅，亦實以其情尚可原，冀有激濯自新之日。乃者幸際聖明，俯從輿論。一眚之玷，不咎厥初，與海內相見以誠，凡既往獲咎者，同邀寬赦，合亟仰懇天恩俯准，將此案監禁人犯汪兆銘及黃復生，羅世勛等，悉予釋放，如蒙諭允，即由臣部遵奉施行。此外如有應行查辦之犯，臣等自當隨時查明。遵旨辦理，並通飭各省，凡係類於此項人犯，無論在監在配，一體分別查辦，以示寬大而廣皇仁，所有因犯政治革命嫌疑監禁人犯，請旨悉予恩釋，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九月十六日，開去國務大臣，司法大臣，臣紹昌，左侍郎臣沈家本，(假)右侍郎臣王垿，又奏，查閱汪兆銘親供，並無狂悖之詞，應如何棄瑕錄用，請旨片。再臣等查閱汪兆銘親供所開各節，指陳政治之得失，發揮立憲精神，洋洋數千言，並無狂悖之詞，抑且頗抱苦志，時流露於公庭對簿之間，似此邃學新知，實屬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憫，倘蒙天恩釋放，加之驅策，當更感激與奮勵圖自効。謹抄錄汪兆銘親供一分，恭呈御覽。應如何棄瑕錄用之處，出自聖裁，謹附片陳明請旨。宣統三年九月十六日。（監國攝政王鈐章）

這篇洋洋灑灑的奏詞，使人頗覺有趣。清廷政府，當時不能不說已有幾分覺悟，像先生這樣一個舊學新知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們相信清廷確有加以擢用之意，但民族因素的宿命，終未能如清室的希望。

因此，在同年九月十六日內閣官報第七十六號上，就發見了釋放先生一行人的命令：

欽奉諭旨，法部奏監禁既湖，擬將監禁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請旨悉予釋放，並鈔錄親供呈覽各摺片，

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均著開釋，發往廣東交張鳴岐差委。欽此。（監國攝政王鈐章，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署名）

「重見天日」之後

先生於庚戌年（一九一〇年）三月七日被捕，四月二十六日正式被判入獄，迄翌年九月十六日釋放，在獄時期前後一年又半。九月十七日的「正宗愛國報」，在本京新聞欄內以「重見天日」一題將先生出獄事件記述：

法部於十六日上午，將在部羈禁之罪人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三人，遵旨釋放，提牢官歡迎三人至典獄司門外，彼此互揖，感情極洽，旁觀人甚多。無不讚嘆。聞汪君等出部後，寓於騾馬市大街泰安棧。

東莞張江裁先生（次溪），關於先生庚戌蒙難一事，曾編有「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一書，其中對於當時經過，記述備詳，本傳三四兩章，亦多取材此書。當先生出獄時，黨禁雖弛，然黨人此時方各有所事，行蹤祕密，是日赴獄中相迎的，就只有先生留日法政同學張伯楨（篁溪先生——江裁先生尊翁）一人，因此關於先生出獄前後的情形，亦以張氏知之最稔。現摘引其所述如下：

余適供職法部，向與精衛同鄉同年。先一日詣獄所報精衛，精衛一見詢余曰君別來無恙耶？因君在獄中，若爲在籠，彼前飲啄，一切世事，均所不知，邇今日出獄之樣，亦猶如也，明日君當將近月報紙視我。余諾之，翌午十一時，典獄司掌印傳旨，乃導精衛出獄，先至典獄司，掌印文公告余曰，精衛入獄時，釋部搜檢銀幣有九十餘角存司中。今並還之精衛，精衛形神憔悴，佇立凝想，不發一語，同出獄者，有四川黃復生，精衛偕往，語曰余某君，復生頷謝。時部中司員及獄人往送精衛者，約百若干餘人，途爲之塞。司內諸君，余告文

後日，精衛憶及，君可假寐東三種，一爲精衛執行李，一供精衛衞生些，一爲余些，同赴泰安棧，抵棧時午後一時半也。余勞精衛曰獄中良苦。精衛曰招待頗不惡，飲食雖劣，久則安之矣，貽殺案中某君，獄中比鄰居，彌接談以破岑寂，初尚閱新聞紙，稍知外事，後亦禁之，祗淡覽自攜來之書籍而已。被捕時自決必死，而心中一毫不亂，故供詞稱許時局，今日惝惘如夢中也。余告精衛曰君今之出，是由武昌風潮烈焉，大事已去，政府欲借君收覆水也。君被捕時，余與君姪適甫，在廣利舟中，閱報知之，抵鄂後，人人謂君必死，肅親王爲民政部尚書，章宗祥爲內城總廳廳丞，兩君咸稱愛才，章氏言之肅王，肅王謝於攝政王，故定君永遠監禁，君之不死有今日者，半由肅王及章氏之力也。越數日精衛告余曰，已草一書致章氏矣。余又詢精衛曰君從前何以自認？政府欲君速離京，故啟發張鳴岐差遣，然張鳴岐何人也，事實理論，兩不適合，君自審究何如者。精衛曰歸尊該如君言，吾亦暫留鄂下，擬大局情形何若耳。又數日，精衛遷他所，終日奔走國事，席不暇暖，余因等察所謂閉門斜街花市，與精衛晤時少，精衛和會南北之動機，正此時矣。

南返與袁氏出山

清廷在請出袁世凱之前，曾令陸軍尚書廕昌率領近畿新軍二師南下，同時命令薩鎮冰率艦隊到武漢，但鑒於用軍事鎮壓革命已無可能，遂不得已而起用項城。當時袁氏是北洋軍的唯一領袖，清廷認爲只須袁氏肯予支持，定還可對付革命。當先生出獄時，同盟會在南方的行動雖已公開，惟在北方則尚在半秘密狀態中。先生出獄後所以不即離開北京，大概亦奉有黨的命令擔任北方活動，據傳先生與袁氏心腹楊度聯絡，曾有國事共濟會的組織。不過先生在北京並沒有逗留多久，因爲在同年十一月間，在天津出版了一張叫做「民意報」的新刊物，地址在天津法租界西開不安里四十一號，該報的總

編輯就是先生本人，發行人為趙鐵。出獄之後的先生，竟在短時期內又辦起「民報」「中興日報」一時代的工作來了。不過這時先生的文章，已從攻擊性的宣傳，進而為建設性的建設了。「民意報」的發刊詞（十一月一日），即出諸先生手筆，其言有謂：

嗚呼，當吾同胞焦頭爛額流血之時，而將欲呼籲抱臆寄意於口舌筆墨之間，此操觚之際，所由慇然傷痛而四顧者也。已死之同胞，其有欲言而未得言耶？未死之同胞，其有欲言而未暇言者耶？將未得言與未暇言之情，磅礴鬱積，鬱沈膨脹，凝而為肝胆肺腸，蓄而為淒風愁霖，發而為哀吟怪歎，宣而為語言，形而為文字，死者生者，死而復生者，生而又死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纏綿而反復，憂危而鄭重，嚙眉而書之，嗚咽而讀之，前見古人，見後來者，其諸與吾前後者其同情於是乎？

「民意報」出了幾期，先生此在支持了多少時候，目前均不能稽考。不過時事的迅速發展，使先生的行蹤旋即見於上海。原來袁世凱是一個對政治野心極大的人物，西太后死後，他雖在足疾的掩飾下蟄居在他的故鄉河南省項城，惟對於身受攝政王的排斥，對滿廷早已有了貳心。現在滿廷想借用他北洋軍閥的地位出而鎮壓革命，他就覺得他政治野心實現的機會是到來了。因此他就提出下面幾個要求，為出山的條件：

一、縮短議會開設期為一年；

二、設立責任內閣；

三、對參加革命軍者寬大處理；

四、取消結社禁止令；

五、為征討革命軍，募集新兵三萬二千五百名，軍費四百萬兩。

前四項條件，顯然是袁氏玩弄的一套政治手段。誠就後來史實所證明，袁氏本人對於革命毫無忠心擁護，當時他所以出此開明的政治措置，不外是順應時世的要求而已。彼時清廷地位的狼狽，不言可知。除袁氏的條件之外，其他軍人如奉天第二十師的張紹曾，長春第三師的盧永祥及東三省將軍人，竟亦向北京資政院連絡，提出了十二條國政改革的要求，以致宣統不得不下「罪己詔」。對於袁氏的條件，當然一口應允。

國父歸國宣統退位

袁氏出馬後，即以馮國璋代蔭昌為第一軍統帥。然而在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漢口大智門驛已為革命軍所奪，十一月二日漢口全告光復。此時馮國璋軍雖亦攻克漢陽，但袁氏看到清室大勢已去，即下令馮氏中止攻擊行動。其實袁氏在入京之初，對於清廷早懷貳心，暗中已與革命軍有所勾結。前述先生出獄之後，在北京稍住時期中，曾與袁氏親信楊度有所接洽。蓋在革命軍方面，亦深知袁氏與清廷的關係不過是在彼此利用，他方面革命軍此時聲勢雖已浩大，然欲以軍事統一中國，究竟尚非其時，所以對於拉弄袁氏一齊，當然認為是政治上完成統一中國的一大捷徑。因此通過先生與楊度的暗中接洽，由先生代表中山先生與袁世凱成立了袁氏支持共和政體的三大默契：

一、保全領土。

二、由國民會議運動決定休戰與國體問題。

三、為達到第二項目的，一方運動北方資政院、他方運動武昌政府。

因爲有此默契，所以當張勳在南京被圍之時，袁氏仍復按兵不動。其次，在馮國璋軍攻下漢陽之後，袁氏反下令停戰。

當時中山先生正在從國外兼程返國途中，事先上海方面先有各省代表會議的召集，至十一月三十日，漢口會議復決議宣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廿一條，在此會議中已表示如果袁世凱真心支持共和，則當以第一屆大總統位置畀之。他方面南京亦於十二月間克復，十四日的南京會議，因等待中山先生而宣告延期，但同時選舉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副之。

十二月十七日，北方代表唐紹儀到達上海，自十八日至廿一日開，前後五次與南方代表伍廷芳進行協議。惟當時所涉者，僅爲國體變更問題，由每省三人所組織的代表會議決定之；對遜位後的清帝，予以優遇待遇等等。至二十五日，中山先生回到上海了，而先生亦在此時由北方歸返。先生本人雖未直接參加南北會議，但後來孫中山先生和袁世凱間交涉的結果，就是根據了上面的三點協定的。

在袁世凱變更態度的前後，清室曾屢次召開御前會議，並在和議進行之際，授袁氏以侯爵的銜頭企圖籠絡袁心，惟此時袁氏既與南方發生聯絡，表示不受。他方面清室貴族良弼，鐵良，載灃，載澤，善耆等人，組織宗社黨以圖遏阻和議的進行，結果就中最有力的份子良弼，於一月廿六日被殺。翌日以段祺瑞爲首的北洋軍人四十六人，聯名頒發了「讓位勸告」書，於二月四日，復以進兵京城爲威脅，迫令清帝退位，結果宣統遂於二月十二日宣告退位，袁氏當即向南京臨時政府發出支持共和政體的通告，大意略謂：

共和爲世界公認之最良政體，今茲由帝政趨於共和，實爲諸公累年心血，爲民國無窮之幸福。大清帝現已

明詔辭位，經由代觀署名，其宣布之日，即帝政之終局，民國之始基。願茲努力前進，以建國的地位，使君主政體永不再見於中國。

第一篇　建國文獻

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有補述的必要。原來中山先生回到上海之後（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即受各省代表所推舉，於同月廿九日被推舉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於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宣佈就職，當時的就職宣言書，卽是出諸先生手筆，原文如下：

中華締造之始，而以不才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國民以爲內無統一之機關，於外無對待之主體，建設之事，刻不容緩，於是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自推功讓能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職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辭也；是用黽勉從國民之後，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端在今日。敢披肝瀝膽，爲國民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血鐘一鳴，義旗四起，擁甲帶戈之士，遍於十餘行省，雖編制或不一，號令或未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爲共同行動，整齊劃一，夫豈其難，是曰軍政之統一。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次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僞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

宜、大綱既挈，條目畢舉，是曰內治之統一。滿清時代，藉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以上數者，為行政之方針，持此進行，庶無大過。若夫革命主義，為吾儕所倡言，萬國所同喻，前次雖屢起事，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飆發，諸友邦對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為倖獲；對外方針，實在於是。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生，文顧何人，而克勝者？然而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以至今日，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其所遇之困難，視遭遇於前日，而吾人唯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無阻，必使中華民國基礎，確立於大地，此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今以與我國民初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萬萬同胞鑒之。

這篇中華民國建國史上的第一偉大文獻，卽出於年尚未滿三十的先生手筆，則先生受中山先生的寄畀之重，實在不難想見的了。同時，先生的政治思想，亦初次結晶於這歷史的文件中。

革命佳話的完成

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一時南北和議幾於停頓，北方代表唐紹儀於一月二日辭職，南方代表伍廷芳亦於十三日辭職，而由中山先生以先生在北京時與袁氏方面已商就的三項協定為根據，與袁氏進行直接交涉。及至袁氏發表擁護共和政體的正式宣言，中山先生遂於二月十四日提出

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表章，而推薦袁氏爲第一任後繼人。這是中山先生實踐諾言的表現。翌日參議會即根據此項意旨，正式推選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又於二十日以黎元洪副之。

先生本人在此時期，既完畢參加中華民國創立的任務，亟思急流勇退，重歸其志士本色，因此即於此時在上海和陳璧君女士舉行婚禮，而完成革命生活中的一段佳話。然而不料袁氏中途失信，忽有背共和而自立帝政的陰謀發動，而這一政變，又復決定了先生重復捲入政治生活的命運，以迄今日。

先生在南洋時代得識璧君女士，此種相識，到了共謀北上發舉時代，便發展爲同志以上的情愛，而獄中內外的一個時期，更使兩人間在國事與私誼上，發生了共緒一心的深深結合。及至民國發朁，國族光復，他倆也便以一對同志夫婦的新婚姿態，和中華民國一起誕生了。這種巧合，如今想來實在是異常有意識的。據說在南洋時代，璧君女士的尊翁陳耕基先生，對於革命運動，最初曾經表示過懷疑，惟因璧君女士本身對於革命的信仰，進而參加實際行動，最先博得了女士令堂衛太夫人的同情。後來璧君女士由檳榔赴日留學，先生亦即追蹤赴日，從這時起通過北上義舉一事，兩人間即發生了深厚的感情。先生獄中詩「秋夜」一作，也許是這種感情的一種洩露。詩曰：

落葉空庭夜籟微。故人夢裏倆依依。風蕭易水今猶昨。魂度楓林是也非。入地相逢雖不愧。擘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灑新亭淚，忍使啼痕又滿衣。

此詩由獄卒輾轉傳遞至冰如手中，冰如得詩與展堂等讀之，伯先每讀一過，輒激昂不已，然伯先今已死矣，附記於此，以誌隱痛。

在先生青年的生活中，以詩詞的形式表彰私生活上的愛誼，佳作尚多，在將來行文的次序中，當

縟續引載。人生出入於悲喜劇的場面，本無足奇，然如本章經緯所述，像先生那樣的富於傳奇色彩，殊不多得。這也許眞就是一個偉人的不平凡處吧。

第五章　歐洲往來

袁世凱第一步陰謀的實現

中山先生於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清帝溥儀於同年二月十二日正式宣布退位詔書，辛亥革命的任務於以告成。根據漢口會議的決議，中山先生即實行退職諾言，推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後繼人。得到參議院正式通過之後，黨方面即派先生與蔡元培先生兩人前往北京迎袁。原來黨方面早知袁氏懷有異心，所以雖以總統一席畀之，但相約以奠都南京為條件。袁氏對此，雖然慨然承諾，實則早有成竹在胸。

先生一行於二月末抵達北京，備受袁氏歡迎，自無待言。可是在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日間，北京城內突然發生了兵變，至三日而更擴大至天津。這形勢顯然要求袁氏坐鎮北京了，先生一行遂將兵變內情電告中山先生。說明袁氏無意南下就職，黨方面不得已遂取消奠都南京之議，而仍以北京為首都。其間經緯，不待說是袁氏陰謀的第一步。

至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迎賓館舉行臨時總統就任典禮，南京的參議院，亦即移往北京，四月廿九日開始在北京集議。而民國成立後的第一屆內閣，亦於三月二十日在北京組織成功。當時內閣總理為唐紹儀，同盟會方面參加組閣者為蔡元培（教育部長），宋教仁（農林部長），陳其美（工商部長），王寵惠（司法部長。）

袁氏陰謀的第一步雖經實現，惟像這樣一個內閣，當非袁氏所能滿意。誠如中山先生所說，他的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方面固爲實踐諾言，同時也是出於不得已。例如其謂：「余在臨時大總統任內，見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辭職，非得已也。」（中山全集，卷四，十三頁。）與袁氏妥協，原是出於戰略上的考慮而非辛亥革命的本志，是不待言的。惟當時情勢，亦如中山先生所說：「在此情況中，使當政府之局者，爲忠於民國之人，亦無由政治，僅可得小康而已。余於袁世凱之繼任爲臨時大總統也，固嘗以小康期之。乃偕率同志，退爲在野黨——」（引文同上）

爲期袁氏執政，能臻國族於小康，同盟會遂許可其黨員參加唐氏內閣。蓋當時黨方面尚認爲雖以臨時總統一席畀之袁氏，但若得制定憲法，確立國會權力，以之牽制袁氏的武力，民權主義的理想，仍可逐步實現。所以當時的臨時約法，亦以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爲範本，努力限制大總統的權力，而賦國務總理以處理國事的全權。用心不能不謂良苦。

同盟會改組國民黨

可是同盟會的理想，總還阻不住袁世凱的野心。袁氏在實現打消建都南京的計劃之後，即任命其心腹馮國璋爲北京所在地的直隸省總督，其次一步，即壓迫唐紹儀內閣並分化國會。

同盟會中以宋教仁爲中心的一部份黨員，爲圖通過國會擴大同盟會的勢力起見，倡議改同盟會爲國民黨。這一個建議無疑是受當時的政治情勢所歡迎的。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既獲得了成功，現在它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組織了，一般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都巴不得趁同盟會擴大改組的機會，擠身進

來。而袁世凱本人，就是懷有這種野心的第一人。所不同者，袁氏不想假借國民黨的勢力，只是企圖分化之而建立他的獨裁政權而已。

同盟會一經改組為國民黨，政治環境亦即隨之起了變化。一切不同的主張和主義，都想假此機會混進黨內。過去在東京担任過「民報」主筆的章炳麟氏，這時首先在北京的「亞細亞報」上抨擊同盟會的地權平均論與民生主義。四月間宋教仁在參議院議長選舉失敗之後，企圖實行五黨合併，他竟亦表示了對民生主義的反對態度，企圖改之為社會政策。中山先生所謂「革命方略，格而不行」，在這時眞可說是遭逢了絕大的危機。不用說，一生唯中山先生與三民主義是從的汪精衛先生，這時當然也嚴格站在中山先生一面。先生批評當時的情勢時曾說：「三民主義在同盟會的八年間已實行了過來，但在元年，忽變了二民主義。」後年在論及同一的問題時，先生更這樣透澈說過：

> 辛亥之後，總理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當時便有些同志對總理說：「如今民族民權主義都達到了，民生主義，外招列強之嫉視，內惹社會之疑忌，還是慢些說的好。」總理聽了，憮然說道：「我如果不講民生主義，我便不必革命了。」然而這些同志，終於不聽總理的話。民國元年，公然在北京牽扯了無數野雞政客，硬將中國同盟會改組國民黨……
>
> 他們在北京做這勾當，總理也沒奈他們，然而總理實行民生主義的意思，不但不因此挫折，反而愈加堅定……（汪精衛集，卷三，一二四頁。）

袁氏陰謀的第二步實現

民元的國民黨，與今天的國民黨，完全是二個不同的存在。當時的國民黨雖以同盟會脫胎，卻是不要三民主義的，所以中山先生雖被推舉爲當時黨的總理，實際上可說是違背他的意旨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國民黨，也依舊是袁世凱所不能容納的眼中釘。在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不久，與袁氏之間即發生了裂痕。袁世凱就職不久，即以整理財政的名義，向五國銀行團借款二億五千萬圓，不惜承諾賣國條件。此事當與對外打倒帝國主義自任的同盟會所不能容，因此同盟會參加組閣的閣員，相繼宣告辭職，第一屆的唐紹儀內閣，亦於同年六月間倒塌了。

不過這時袁氏的帝政陰謀尚未成熟，對於中山先生與黃興等人，仍曲意拉攏。當八月間中山先生北上參加國民黨成立大會並就任總理之職時，袁氏且偕與擬訂八大政綱，並委中山先生以全國鐵路督辦之職。在中山先生本人，雖因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頗感失望，惟爲國運着想，尙冀袁氏執政，能使政治漸上軌道，故亦慨然以經營鐵路事業自任。蓋如其所謂：「但使國無大故，則社會進步，亦足以間接使政治基礎，臻於完固。如此，則民國之建設，雖稍遲滯，猶無礙也。」（中山全集，卷四，十三頁。）

民國二年三月，宋教仁被殺於上海車站，這是袁世凱第二步陰謀的實施。原來宋教仁雖以放棄民生主義爲條件，倡議改組同盟會爲革命黨，唯仍主張政黨政治，對於袁世凱的獨裁意向，攻擊不遺餘力，故遭袁氏之忌。後來在兇手家中搜出密碼電報，證實確爲袁氏及其內閣總理趙秉鈞所指使，一時

黨內外均震怒異常，而袁世凱本人，亦一擲其過去假殷勤之面目，正式向國民黨挑戰了。

國會雖於民國二年四月在北京召開，然其存在在袁氏目中已不足重視。不經國會通過，袁氏即向五國銀行團成立二千五百萬鎊的大借款，以之購置武器，賄賂議員，組織軍隊，分化國民黨。並爲消滅國民黨的武力根據地起見，將江西的李烈鈞先行免職，繼之將安徽的柏文蔚調任四川，廣東的胡漢民轉任西藏。帝政獨裁的野心，至此遂暴露無遺了。

二次革命的失敗

同年中山先生鑒於袁氏陰謀日見抬頭，辛亥革命的所完成的任務，亦瀕於危殆，遂命李烈鈞，黃克強組織討袁軍，從上海趕到江西。七月十二日，湖口宣布獨立，第二次革命的火炬又復在國內燃起了。同時黃興亦在南京組織討袁軍，以岑春煊爲大元帥。安徽柏文蔚，廣東陳炯明，福建許崇智，上海陳其美等，亦先後起相呼應。

不過二次革命結果是失敗的。七月廿五日湖口被攻陷，翌二日黃興遁離南京，袁氏軍於八月十五日佔領南昌，九月三日而入南京。第二次革命的軍事形勢，至此遂告解體，中山先生本人亦不得不再度亡命日本。然就政治意義說來，討袁之役並未就此結束。所謂「自民國二年至於五年，國內之革命戰事，可統名之曰討袁之役。」（中山全集，卷四，十五頁）即是指此。國民黨既遭袁氏解散，革命的行動又從地上給逼入爲地下活動了，這時指導革命活動的組織，就是中華革命黨。

民國二年以後，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了，總理即於此時，成立中華革命黨，須知道中華革命黨，不是國

民族的復興，却是中國同盟會之復活。他的最大表現，一是回復革命的性質，二是確確實實將實行三民主義著於誓約。（汪精衛集，卷三，一二五頁）

在這裏，我們應該從新歸着到先生本人在這時期的行動。先生出獄之後的一年內，隨革命形勢的明朗化，其奔走於南北統一活動，已見於前文。然自元年春奉命偕同蔡元培先生同往北京迎袁不果之後，先生的見解亦一如中山先生一樣，認爲辛亥革命的成果已經被出賣了。在這時期，先生就從未接受過袁氏政府的正式任命，他早已料到國民革命的完成，有待於重新從地下工作做去。因此即在同年偕其新婚愛妻重返故鄉廣東，旋自南洋轉道單身前往法國。直至民國四年，歐戰方酣，而革命有利形勢復臨中國之際，先生始復歸來。

第一次赴法國

在我們敘述先生旅歐生活之前，爲瞭解他這一時期的心境，最好還是引用他這一時期的幾首佳作：

登鼓山　以下民國元年

登山朝望雲，盤紆千仞上；寥寥萬松陰，惟聞疏鐘響。

太平洋聽瀑作　山在南洋馬來半島

山徑無人鳥自鳴，柳陰裊裊舞新晴；隔林遙聽潺湲起，猶作宵來風雨聲。

泠然清籟在幽深，如見晴人萬古心；流水高山同一曲，天風爲我伯牙琴。

雙峽如花帶雨開，臨流顧影自徘徊；幾疑天上銀河水，來作人間玉鏡台。

一片淪漪不可收，和烟和雨轉無愁；何當化作巖中石，一任清泉自在流。

印度洋舟中

艙有空濛裏，心隨流水喧；此生原不樂，未死敢云煩。遠斷關河影，蕭條羈旅魂；孤篷秋雨濕，詩思倩誰溫？燈影殘宵靜，濤聲秋雨來；風聲隨處暴，懷抱幾時開！肱已悵三折，腸徒斷九迴；勞薪如何爇，未敢情寒灰。

舟泊錫蘭島至古寺觀臥佛殿寺前大樹下導者云此樹已二千年佛曾坐其下說法

寺前有奇樹，婆娑二千年。枝條方青翠，聲音因風傳。我來坐其下，久久已忘言。梵唄來空境，其聲柔以緩。感此傷我心，哀吟對山川。回顧向臥佛，爾乃能安眠？問佛佛不應，自問亦茫然。荒山寂無人，孤雲撥無邊。寥然俯潭影，輕陰籠清圓。

先生對於自己幼年時代的教育，每感新知識的不足，雖然後來在日本留學數年中，所得啟發頗多，不過對於當時西方的學術世界，仍懷着熱切的憧憬心理。因此此番前往歐洲，便直接以法國為目的地。法國不僅在學術意味上是西歐文化的沙龍，且亦是歐洲政治革命的溫床。所以法蘭西的吸引先生，是當然的了。先生在法國研究的對象，一即是社會學，一即是文學。

文學生活的經營

當時李石曾與蔡元培等人，亦在法國，先生即會合諸人，為溝通中法文化起見，在李昂設立了一所中法大學。而先生本人在這一時期，文學活動的感情亦達到了最高潮。如以下各詩，均為彼一時期

的作品。

曉烟　以下民國三三年

樹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幹欲擎空；朝來別有空濛意，只在蒼烟萬頃中。

初陽如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記得江南烟雨裏，小姑鬟影落春瀾。

晚霞

緜緜遠樹低，渺渺長河直。漸變餘霞，流光如琥珀。

又

蕭瑟郊原薄暮風，千慟渺渺淡烟中。斜陽入地無消息，惟見餘霞一抹紅。

戰鼓既起，避兵法國東北之閒鄉，時已秋深，益以亂離，景物蕭瑟，出門偶得短句。

修竹三竿小閣前，半臺一角屋西偏。園荒知爲蟲鼠擾，地僻應無鋒火傳。宿霧初陽涼似月，迴風斜雨灑如烟。秋來未便悲搖落，却爲黃花一悵然。下帷長日未窺園，偶趁秋晴出郭門。風景不殊空太息，江山如此更何言！殘陽在地林鴉亂，隴畝無人野兔喧。欲上危樓還卻步，怕將病眼望中原。

紅葉

不成絢爛只斕斑，攜酒相看醉欲扶。得似武陵三月暮，桃花紅到野人廬。

再賦紅葉

蕪道河邊日已昏，西風刀割更銷魂。丹楓不是尋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三賦紅葉

澹淡顏色勝瓊春，却爲飄零暗愴神。風妒霜侵兩無謂，不辭汎菊慰羈封。

劉地西風萬木殘，滿山樹葉悔無端。楓林不是湘妃竹，誰染啼痕點點斑。

四賦紅葉

疏林亦有斜陽戀，都爲將殘分外妍。留得娟娟好顏色，不辭岑寂晚風前。

坐附

荒原遼樹沒浮天，黃葉聲中叢鵲驚。爲問蘭蕊何處去，西風吹雨已如煙。

從文學中看取的人生哲學

這時期，先生對於法語已很純熟，可證之其譯佛老里昂寓言詩一事。佛老里昂（Jean Piere Claris de Florian 1755—94年）爲法國著名寓言作家，其作品較之拉．芳登尤爲諷刺且具教訓。譯詩如下：

譯佛光里昂寓言詩一首

東風和且平，衆木繁其枝；夜來有微雨，初日殊遲遲。在此春光中，不樂將何爲？東風有牧場，碧草生離離。一羊蹶而趨，一犬還相隨；宛然兄若妹，情好相欽依。阿妹今不歡，疏淚如綆縻；嗚咽語阿兄，吾生其何之？我謝造物者，用意無偏私；跋行與躑息，所適惟其宜。如何兄與我，長日爲人羈？阿兄唉餘權，辛勤守房牌。戒防豺狼至，夕長穿窬窺；小變起不虞，生死還相待。何以報忠貞，惟有鞭與笞！主人有孺子，戲踏供娛嬉。潛伏故枝梧，中懷隔鬥離！至今癱瘓病，毛血猶參差。阿兄既不幸，阿妹尤堪嗟；嗟我膚中毛，織彼寨中衣。奪我懷中乳，哺彼襁中兒。可憐更行田，芻豢來無時；雨淋與日炙，張藉成枯骸。晚行庖廚下，碧血積淋漓；裝饞口流涎，談笑酬酸嘶。回叔與諸姑，赫然在盤飾！死嗟不敢祈，饑跌不能移。投地

有餘骨，封狼梟其頭；孤墳在何許，溝水流殘骼。生也爲人奴，死也爲人犧；盍此一思，命矣其何辭。阿兄聞妹言，慄然止其哭。弱者未云禍，強者未云福。與其作刀俎，毋寧爲魚肉！

佛氏此詩：天下之自命爲強者，皆當愧死。願吾以爲弱肉強食，強者固有罪矣；而弱者亦不爲無罪。罪惡之所以存於天地，以有施者亦有受者也。苟無受者，將於何施？是又願天下之自承爲弱者一思之也。

都德有一山羊記，述一小山羊遇一狼，自分必死，然與之搏鬥至力盡始已。文甚奇妙，而用意頗與此詩相發明，暇日當更譯之。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先生人生哲學的又一橫斷面。我們欲瞭解先生一生的事業與爲人，若單看取了其政治生活的一面，是不完全的；我們應該更進一步細察他的感情生活的一面。因爲惟有感情生活中，我們始能發見一個偉人事業的內心面；換言之，就是他的人生哲學。同盟會與初期國民黨的一個組織特點，即其幹部的人物或悉爲一代文人。有人認爲中國爲一文治之邦，這認識並沒有錯，而且我們也不必否認。其實理想的文明國家，確應該是文化與政治保有一致的關係，蓋因對於文化活動懷有至高感情的人，其對政治事業，亦必寄與清潔的靈魂。

先生於早年時代，除努力于革命事業外，對於文學的活動，也同樣懷有熱情。這是無足異的，革命需要熱情，文學也需要熱情。先生兼事兩者，無非說明了他是一個熱情異常豐富的人。在最初期革命時代，革命文士的文化活動組織，就是「南社」，而先生亦爲其中一份子。他如陳去病，柳棄疾，高天梅，諸宗壯，黃節，沈宗畸，潘飛聲，邵瑞彭，徐珂，梅曜安，蔡哲夫諸子，故爲當時南社的中堅份子。每逢春秋佳節，便是這羣文士的聚首日子。先生且爲此中人的領導，下面一首詩，便是這樣

集會中的一作：

除夕遙南社諸子作歲寒小集，何香凝夫人繪歲寒圖，諸人皆有吟詠，余亦成一首。

冰雪滿天地，老梅能著花，孤松青不已，相與導春華。

落落心魂在，悠悠歲月除，聚離謀一聚，何惜最稀微？

詩的話

先生詩詞作品質量並茂，幾人盡知曉，惟其本人對詩作本意的發揮，除見諸若干詩集的序言外，似尚不多見。直至最近，日本學者草野心平氏訪問先生於首都官邸，談的問題，恰好是論詩，可謂珍遇難得。現在就將這篇談詩的記述節錄如下，雖說時序有先後，然為瞭解先生對於詩的意見，引用在這裏恐怕倒是最適當的。現在讓我們直接自談話開始：

「最近寫詩嗎？」

「不，並不多寫。」

「在甚麼時候寫的，夜裏還是日裏？」

「大概是夜裏寫的，普通的文章，寫得很快。寫詩卻不能這樣。寫一首便要耗費一個晚上，差不多要妨礙明天事情樣子。我喜歡風景，愛好自然，但是現在可……」

「寫成了不離一步的樣子……」

對啊！請看我最近的詩集吧，說着便走到樓上，拿了兩本題着我和過去的A君名字的「雙照樓詩詞藁」

，分給我們。

先生問起最近日本所稱的近代詩和漢詩，我便照着我自己的意見回答了。關於漢詩，我說日本現在的漢詩，只存形體，內容極貧弱，是否可以稱詩，尚屬可疑。於是先生便提出「乃木大將」，我的心裏便突突的跳着。

先生在某君的名片背後，寫了一首詩。——「皇師百萬攻強虜，野戰攻城屍作山。愧我何顏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給我看，並且竭力說乃木大將雖然也許不能稱詩人，但是這首詩還好極了，可稱謂成功之作，非常可愛。他又在另一張紙上寫着。

我也提出了和這首詩一樣，某雜誌曾譽爲明治以來漢詩最大傑作的「金州城外」詩。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腥新戰場。」正寫到這裏，一面看看旁邊先生正在寫的紙片上，赫然是「征馬不進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我於是把所寫的給先生看，輕輕的吟過二三次，並且說再要勝過這一首，可寫不出了。

講起蘇曼殊。先生問在日本據說也相當有名，我便回答是在一部份人之間，有名也未可知，並不全般的知道。實際並不是意外的，但是當時的確是認爲出於意外的，我聽着先生告訴我，他如何列席蘇曼殊的葬禮，蘇曼殊怎樣患了慢性赤痢，死在上海法人經營的廣慈醫院，柳亞子編輯了曼殊全集，並葬在杭州西湖旁邊。先生對我多年相信着他是中日混血兒，加以指正說：「雙親都是日本人。」我表示懷疑，先生又武斷似的說：「雙親都是日本人。」

「柳亞子現在大約在香港。」

我繼續着談起[illegible]的同學[illegible]。

主席也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對他用法文翻譯陶淵明詩集，好像還沒有知道。（中略）

我說：「先生和希特勒，倘若不能稱爲另一型的詩人，那麼便是持有「詩」的政治家。」

先生好像回想着很遠的過去，在紙片上揮動他的筆寫着：

「高劍父騎驢灞橋風雪中，」說：

「希特勒很愛好中國的藝術，我贈了他一幅高劍父的畫圖。畫裏是乘着一匹驢子，踏着雪的橋上走着。這國民黨黨員，也不在重慶，也沒有參加和平運動，大概是在印度。」

「雙照樓詩詞藁」裡載着一首「題高劍父畫鎮海樓圖」的詩：「夢裡樓台識綠蘿，驚聞猶是十年前。洸洸赭蔽撐滄海，蟲沙江橋界遠天。懷抱久知含夏右，風塵原不礙山川。白雲隱約憑詩處，指摘黃花更惘然。」

從高劍父再說到西鄉隆盛。先生說：

「西鄉隆盛是由平民風格中產生的。」（譯文節錄新中國報「學藝」第一九七期）

先生的政治家生活的一面，往往彈調過了他詩人性格的一面。然而先生政治生活的裏面，卻始終保持一種詩人的崇高風格。我們甚至可以說先生的政治生活與其詩的生活，是一種渾然一致的存在。先生嘗自謙他的詩作，與革命的宣傳無涉，而只是人生小休之作，然而我們細吟先生的每一首詩詞作品，深覺言志載道的意味深溢其間，雖無主觀宣傳革命的動機，然在客觀上實達到了革命宣傳的目的。其獄中時代的作品固然如此，就是在表面上與政治無關之作，亦莫不如此。這原因無非因爲先生是一個澈底獻身於中國革命事業者，所以以文字表現的詩詞，以行動表現的政治，都含有同樣的革命性格。

袁世凱稱帝

現在我再回到當時國內的政治情勢。自討袁之役失敗後，袁世凱的野心，亦隨其聲勢的日增而益進。袁氏繼任臨時大總統後，把憲法問題置之不議，而反強令國會通過大總統選舉法，復令其黨羽所組織的所謂「公民團」，要求國會立即選舉袁氏為正式大總統。而國民黨的遭解散，以及中山先生創立中華革命黨，亦即為此時前後事。

反動時期的到來，形勢蓋已不可避免，辛亥革命既未能實行革命方略，一般人對革命失望之餘，就連帶及非難共和政體，非難及革命本身。例如「民報」時代任過主筆的章炳麟，竟亦作誹謗論調謂：「今與邦人諸友同處革命之世，借為革命之人，而自顧道德，猶無以愈於陳勝吳廣！」又謂：「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其上置貴族院，非承封建者勿為也。民主之國，雖代以元老，蛻化而形猶在，其在下院，則體有外朝詢庶民，處非家至而人見之也，亦當選其得民者以叩帝閽——欲效立憲而使民有貴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權於上，規模廓落，則苛察不遍行，民猶得以紓其死——必欲閉置國會，規設議院，未足佐民，而先喪其平夷之美——」

此種言論，雖未足代表當時全部形勢，然對共和革命的反動氣氛，確已聲勢甚壯。袁世凱即利用這種反動的形勢，推波助瀾，於民國四年竟公然命楊度組織「籌安會」，準備恢復帝政。九月復以全國請願聯合會的名義，要求擁戴帝政。至十二月，又假借其御用「國民代表大會」的名義，悍然不顧

一切，確認帝制政體。同月十二日，最後一幕怪劇終於演出，袁氏宣布登位，並潛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令各省文武官員一律稱「臣」。

在另方面，轉入地下工作的革命黨，雖在形式上對袁運動宣告失敗，但如前引中山先生所說，迄民國五年爲止，革命黨的討袁之役迄未停止過，而隨袁氏的反動愈烈，革命黨的相應活動亦愈轉激烈，當民國四年袁氏圖立帝制，並不惜接受二十一條條件之際，中山先生即命其同志返國乘機起事。單在廣東湖南等地，革命黨人被龍濟光與湯薌銘所殘殺者逾萬人。在「籌安會」成立之後，中山先生復分別遣派李烈鈞至雲南，居覺生赴山東，朱執信、陳炯明赴廣東，黃興，程潛赴湖南，于右任赴陝西，策劃二次討袁運動。這時在法國方將三載的先生，亦即兼程返國，有詩一首紀此行謂：

自都魯司赴馬賽歸國留別諸弟妹

十年相約共燈光，一夜西風雁斷行。片辭臨岐君記取，願將剛膽易柔腸。

先生返國後先至上海伴迎其夫人自香港歸廣州，已則南下至南洋策劃討袁。亦有詩一首記其事：

六月與冰如自上海至香港，冰如上陸自九龍遵廣九鐵道赴廣州歸省，余仍以原舟南下，舟中爲詩寄之（民國四年）

悵望孤燈暮驛樓，零丁我亦汎扁舟。天涯不用遙相問，一樣輪聲一樣愁。

一去怱怱太可憐，只餘巾影淡於煙。風帆終是無情物，人自回頭舟自前。

沈沈清夜欲生寒，倚遍迴闌意未安。遙想檳花燈影裏，正攜小妹話團圓。

贏得抛擲一晌眠，夢囘燈蕊向人妍。此時情況誰知得，依舊濤聲夜拍船。

護法之役前後

但其時袁世凱的「皇帝夢」已臨最後一刻了。中山先生本人此時在日本正式宣佈討袁，蔡鍔將軍亦於此時出京潛赴日本轉道返國，於十二月十九日至雲南，二十三日與總督唐繼堯等發表聯名通電，要求取消帝制處分禍首。於二十五日宣告獨立，同時即向川湘兩省遣兵「護國軍」。不旋踵間，即得十三省的響應，翌年五年貴州宣佈獨立，三月廣西陸榮廷獨立，四月廣東與浙江省亦相繼宣言獨立，反對帝政的烽火，幾已燎遍整個神州。就連袁氏認為可靠的段祺瑞與馮國璋，竟亦反對帝政。袁氏見大勢已去，遂於三月二十二日宣佈取消帝政，廢止「洪憲」稱號，副總統黎元洪繼為大總統。袁氏本人，羞憤之下，亦於同年之月六日病死於故都新華宮中。這一場怪劇的開幕至收場，全後為時雖只八十日，但其遺害之烈，至今日猶未全消其影響。繼之以起的，就是所謂軍閥割據時代，同年倪嗣仲組織督軍團高舉叛旗，以及張勳擁宣統復辟，不過是這一隨來黑暗時期的序曲吧了。

先生本人，看到帝政雖給推翻，然因內政的烏煙瘴氣，仍未消除，發重至法國，經營其一小休的生活，他這時心裏的煩悶與感慨，可見諸下行的一首詩作：

鷄爾加松海濱作（民國五年）

朝行松林中，初陽含芬芳；晚行松林中，新月生清涼。林外何所有？白沙淨如霜；沙外何所見？海水青茫茫，海濤千萬疊，淡如綠[illegible]；對帆[illegible]片，輕若沙鷗翔。海風以時來，松籟因之揚，和我讀書聲，空谷

坐琅環。藉此得酒肉，如在白雲鄉，清遊不可負，戰詩懷孟光。

不過這一次的智法時期，爲期並不甚長。譬如前所述，袁氏死後，軍閥專政的局面來不僅未除，且變本加厲一變而爲軍閥割據的時代。尤其北方的政局，一如走馬燈一般，迄北伐完成前十二年間，國內混亂，民生塗炭，眞莫此爲極了。

黎元洪繼任總統後，宣佈恢復舊約法與舊國會，然而當時的實際權力，全操諸國務總理段祺瑞之手，對於革命黨的鎭壓，其手腕亦不輸於袁世凱。所以在名義才經恢復的國會，終於仍被武力解散了。誠如中山先生所說：「袁世凱雖死，而袁世凱所遺留之制度，不隨以俱死，則民國之變亂，正無已時，已爲常人意料所及。果也，曾不期年，而毀棄約法解散國會之禍再發，馴至廢帝復辟，民國不絕如縷。復辟之變，雖旬餘而定，而毀法之變則愈演愈烈。余乃不得不以護法號召天下。」（中山全集卷四，十五頁。）

中山先生當時與袁氏政府妥協，本早預料前途不甚可靠，所以特以遵守臨時約法爲基本妥協條件。初不料袁氏竟懷帝制野心，繼袁氏之後，舊國會仍遭武力解散，臨時約法，成爲一紙具文。因此在民國六年國會再告解散之後，中山先生即本護法之旨，決定向北方政府提出抗議。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南下議員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決定軍政府大綱。中山先生本人，亦先期自日本返國，就任大元帥之職。而開始爲時達六年之久的護法運動。

二次歸國從事社會工作

汪精衛先生第二次自法歸國，亦即於此時應中山先生之召。這一次先生取道英國，芬蘭，經西伯利亞而返，這是因爲此時俄國方在醞釀革命，故其返途帶有觀察的意味。旅程中有兩首詩作如下：

六年一月自法國度海至英國，復度北海經挪威、芬蘭至俄國京城彼得格勒，始由西伯利亞鐵道歸國，時歐戰方亟，耳目所接，皆征人愁苦之聲色，書一絕句寄冰如。（民國六年）

野頓冰風冷鬢鬚，鄜州明月又如何。天下我亦仳離者，莫話深愁且讀書。

西伯利亞道中寄冰如

我如飛雪飄無定，君似梅花冷不禁。回首昨宵深院裏，滿裙疏影伴清吟。

先生這次回國之後，雖追隨中山先生從事黨務與政治上的工作，不過還沒有在政治運動中積極露面。自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一個時期，先生與中山先生對於中國的政治前途，早懷有同樣的見解，所以其對當時的政治態度，不免見之消極，雖然革命的心理始終熾烈異常。後來國民黨解散，中山先生重組中華革命黨，先生這時就在法國以在野之身聲援中山先生，一面作身心的修養。及至二次討袁發動，中山先生出來指揮一切，先生亦即回到國內。這是表示先生唯中山先生的行動爲行動。袁氏死後，革命黨又遭退潮時期，中山先生出國他去，先生也就再度回到法國。及至護法之役起，中山先生南下就大元帥之職，先生也幡然返止國內。然而當時國內政治情形的絕望，要爲不能諱言的事實。且

看先生本人對當時情形的見解：

……在這時期，革命運動，所受的壓迫，所遇的障礙，比民國成立以前，困難何止倍蓰。在這頓挫時期中，革命黨人，宛如孤軍入了重圍，除了力戰而死的，能保持他的革命人格之外，其餘或是潰圍而去，落荒而走，或是屈了雙膝，向敵人投降。在這頓挫時期中能堅持着革命的旗幟，始終不變的祗有一個孫先生，和他極少數的信徒而已。（汪精衛集，卷二，一一七頁）

在這極少數的信徒中，先生就是一人。因為先生嚴格尊重中山先生的領導，是以雖不露面於當時烏煙瘴氣的政治舞台，却始終保持着革命的人格。而亦一如中山先生退為在野黨時經營鐵路事業，以冀「社會進步，亦足以間接使政治基礎臻於完固」一樣，先生在這個時期，亦暫時從政治生活轉而經營社會事業。蓋在留法數年內，先生對於社會學頗有心得，他認識在當時的社會現狀下，欲使中國政治馬上走上軌道，在社會條件上即鮮少可能性。讓當時一般社會對於革命的認識是怎樣的呢？我們仍舊引用先生自己的話：

……辛亥革命的時候，有許多人喜喜歡歡的說道：「唉！如今好了，從此大家可以食便宜的米了。」似乎緊急的缺少和需要，是「便宜的米」，這誠然是不錯的；可惜的是剛纔下種，便想吃飯，把中間一大段耕耘收穫等等辛苦的工作，全忘却了。不到一年，大家便覺得革命太費力了；有一位老先生，撚着鬍子的說道：「吾儕小民，有幾許的命來禁得你二革三革四革五革六革七革哉！」這幾年來，大家不但是革命二字不用提，索性連政治二字也不用提了。提起革命，就是「搗亂」，而且接着歎氣的說：「今日的人心，已經厭亂到了極端了；」提起政治，就是「亂源」，似乎這只是那些軍閥和政客專制的名詞，和一般人民沒有關係的，

那麼，我要問問他，今日羣衆所最缺乏最需要的，是甚麼？到底是甚麼？（汪集卷二七〇——七一頁。）

這答覆是需要「好政治」，然而好政治的前提，是需要一個並行的健全社會和健全的羣衆，這就有待於與革命工作相呼應的社會工作。原來到了民國六年，中國的國體形式雖好容易自帝制度爲民主，然而這也不過是徒成其形體而已，至於帝制時代的社會黑暗風氣，不但照樣保存，而且是變本加厲。當時先生回到國內，感到與其去混進政治舞台，不如本其所學，幹一些切實改良社會風氣的工作，來得有益。因此在上海方面就發起了以端正風氣爲務的「進德會」。

三度赴歐

至民國七年，中山先生辭去大元帥職務，被選爲軍政府七總裁之一；同年北京召集非法國會，選舉徐世昌爲非法總統，這時潔身自好的先生，對於政治當更不欲問聞，而唯社會改良事業是從。翌年歐戰議和，因先生熟悉法國政情，遂被廣州軍政府推爲南方巴黎和會代表，先生不就，旋即自太平洋經美國以私人資格再度赴法。其對廣州當時情形，有「廣州感事」一詩如下：

獵獵旌旗控上游，島上古樹只荒邱。一枝還向鷦鷯借，三窟誰爲狡兔謀。幾度蒸鳧良有擧，翻公雖子密難籌。過江名士多於鯽，祇恐新亭淚不收。

是時先生好友胡漢民先生養痾於日本神奈川縣江之島地方，先生特往探視，盤桓十日，有詩記之謂：

展堂養痾江之島，余往訪之，留十日歸，舟中寄以此詩。

平原秋氣正瀰漫，步上河梁欲別離。彈指光陰猶可戀，積胸磊塊未能歡。巢成苦被飛鳩妒，誰道新知落雁寒。久立橋頭帆影遠，不辭吹淚濕衣襟。

這可見先生此番去國，實含有不得已的衷情。然而一個革命家雖遭祖國的放逐，其對祖國的熱愛，必然愈熾。我們翻讀世界革命史，幾乎所有復國的志士，都在國外生活中生長了對祖國的「怒火之花」。先生在太平洋舟行中雖發着「故國未須回首望，小舟深入浪千層」的無限感觸，然而祖國對他正期待着重大的使命，在不久的將來就要招呼歡迎他回國了。

第六章　政治生活第一章

一般政治背景

自民國元年到民國十年間，在先生是一個修養時期。這不是說先生在這個時期中不問革命政治，在討袁及其後的護法諸役，先生每次都自國外趕返，協助中山先生策劃一切，在前章已有敍述。只是在這一時期中，先生未曾正式登政治舞台而已。先生在黨中一向以清高自重著名，對於袁氏執政及其隨來時期的政治腐敗情況，當然看不入眼。試看先生對於這一時期的國內政治認識：

……各國於國際道德，雖未能修明，而國內的道德，則已如天經地義，不可動搖，故民主主義蕩蕩而日上，而中國則八年以還，有共和之名，而無其實。四千年專制之毒，仍彌漫於政海，而莫知所屆也。（汪集卷二二十四頁）

在「中國國民黨史概論」的長篇演講中，先生對於當時中國的腐敗狀況，更自外交、軍事、政治各方面加以詳細剖析，尤可看出其對當時政治現狀的失望。不過對於政治情勢愈失望，堅強黨的工作無疑更爲重要。而先生在這時期裏，雖不身登政治舞台，然却致力於黨的工作。

袁世凱逝世以後，黎元洪繼爲北京政府總統，但沒有幾個月，便因轉勳事變，讓給馮國璋，馮國璋不久就死了，結果總統一席，由徐世昌所得。南北戰事與奉直軍閥的鬥爭，把這一時期的中國，攪得四分五裂。此時安福系把持北京政權，而廣州軍政府亦爲桂系軍閥所把持，中山先生乃不得已向非

常國會辭職赴滬、至民國九年，在南北和議同時，桂系軍閥陸榮廷，岑春煊及廣東督軍莫榮新，竟取消軍政府自治，向北京政府的徐世昌投降了，當時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即命許崇智，陳炯明率兵加以驅逐，岑走滬，莫遁桂，與廣東闊別兩年又半的中山先生，重復歸粵主持一切，而汪精衛先生亦於是年奉召返國。

民國十年，是先生第一次正式出任政府官吏的年份。孫中山先生是年爲廣東國會推舉爲南方政府大總統，先生歸國後，即主持廣東教育事業，本其在法國研究社會學的所得，思從改革社會事業與教育事業着手，奠定國家政治的健全基礎。因此即增加教育經費，禁止賭博，舉行醫師政府考試制度，注重公衆衛生等事宜。然而當時的廣東情形，在先生是仍舊很不滿意的。

民國十年直至十一年六月以前，廣東有些市政的進行，有些教育計劃的設施，也有些類知事民選的試辦，表面看去，似乎是有革新的傾向了；然而按之實際，平民政治的基礎，全未奠定，和平民政治最不相容的如募兵制等等問題，全未解決……

十年冬間，有一個外國朋友來看廣東。他對我說：「這不是國民黨得了廣東，卻是廣東得了國民黨呢！你看國民黨進了廣東之後，只看見廣東，不看見國民黨了！」我聽了他這番話，只有置身無地。他又對我說：「我惟有希望你們擱了廣東，從新做去。」我答說：「我們擱了廣東不難，只是交給誰呢？難道交給吳佩孚嗎？」他聽了也只有嘿然，不知所答。（汪集卷三二——三三頁。）

從陳炯明到加拉罕

然而，時事的突變，竟眞迫使國民黨又不得不暫時離開廣東了。原來中山先生回到廣東之後，因

陸榮廷仍盤踞在廣西，其餘軍閥勢力，亦極囂張，中山先生即決定出兵討伐，遂親率大軍赴前方，而以後方接濟的任務委諸陳炯明，却不料陳炯明早懷貳心，暗與軍閥相勾結，進據惠州，佔領石龍虎門，遂致中山先生自廣西北伐的計劃不得不暫告中斷。翌年四月，中山先生率師返粵，命李烈鈞許崇智出兵攻江西，自己坐鎮廣州，並免陳炯明本兼各職，然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竟嗾使其部下葉舉等圍攻總統府。中山先生避居於永豐艦中，率永翔，擴玉，豫章，楚豫等艦相與在白鵝潭周旋達一月餘，並電召許崇智軍回粵肅清內亂，但結果未遂目的，不得已於八月九日，搭乘英國軍艦至香港，再乘俄羅斯皇后號，轉道到上海。 汪精衛先生亦於此時隨侍至滬。

同年奉直戰爭中張作霖失敗，退至關外。吳曹迎黎元洪爲總統，恢復舊國會，先後派黎澍等迎中山先生北上，然中山先生不願與軍閥政府相合作，拒絕所請，復於八月十五日發表宣言，提出五項要求如下：（一）合法國會當自由集會行使職權。（二）懲治禍首。（三）實施兵工計劃。（四）發展實業，改善人民生計。（五）實行全民政治，不容軍閥假託割據。

中山先生爲圖打倒直系軍閥政府，認爲以敵攻敵的方法，頗有可取之處。於是即着手聯絡一切反直系的軍政勢力，而奉直戰爭中遭敗北的張作霖，亦爲中山先生所注目。當時即派遣先生赴奉天聯絡張氏，同時遣郭泰祺至北京游說黎元洪，派胡漢民聯絡段祺瑞，派張繼接洽齊燮元。

關於此事，在當時上海出版的「中國日報」上，先生曾發表一節談話，大意如下：

孫總統主張民治，全國民意翕然相附。惟民意雖同意民治，然在今日排斥勢力的時代，若無有力後援，結局終難成功。孫總統此次派余前往奉天，即爲民意求外援，並知張作霖之意向。

同時，有一件與後來中國政治發展極有關係的重大事件，亦正在醞釀之中。在民國十年，蘇聯派遣代表馬林至廣東與中山先生會晤。原來蘇聯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革命之後，長時期受帝國主義各國所包圍，急欲找求國外盟友。而列寗時代的蘇聯，對於各國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確具相當政治熱情。所以早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七月，即由其外交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要點如下：（一）放棄帝俄時代在華之特權；（二）改訂商約；（三）建立兩大民族之和平。至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加拉罕復發二次宣言，具體表明蘇聯對華六項政策：（一）蘇聯宣布昔日帝俄與中國所訂之條約無效，放棄對華領土侵略及租界；（二）以前商約作廢，另訂互惠商約；（三）中國應不扶植反蘇聯之黨派，解除白俄武裝；（四）放棄領事裁判權；（五）中國停止與舊俄人員關係；（六）退還庚子賠款。這樣就成立了正式中蘇邦交，於民國十三年五月簽訂中蘇條約。

國共合作的醞釀

但這時在中國是北洋政府時代，蘇聯顯然未以訂結中蘇邦交關係爲滿足，她看到南方的國民黨，是一富有革命色彩的政黨，因此在民國十年，復派代表馬林至桂與孫先生會晤。他方面中國自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後，各種新興團體的組織，亦如雨後春筍，到處萌發。翌年，陳獨秀因北大教育長地位被逐，自北方來上海，當時上海方面有國民黨人胡漢民，戴季陶，廖仲凱，沈玄廬在滬發刊「建設雜誌」，「星期評論」，無政府主義派金家鳳，袁振英等，亦在滬宣傳無政府主義。於是陳獨秀遂將其主辦的「新青年」遷滬出版。同時蘇聯共黨派遣代表維丁斯克，來滬進行組織共黨活動。至民國九，

年，中國共產黨正式在滬宣告成立，即以陳獨秀，譚平山，沈玄廬，李大釗等為中心人物。不過這時中共的力量，當不能與擁有歷史的中國國民黨相提並論，所以蘇聯即移其目光於國民黨。為了這一目的，蘇聯一方面與北洋政府談國交，另方面在優林之後，另遣越飛來華與南方政府接洽。

中山先生雖自陳炯明叛變後被迫至滬，但同時命令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等舉兵討陳。翌年（民國十二年）復返廣州，被各軍公推為大元帥。六月，中山先生命譚延闓率兵返湘，聲討趙恒惕，吳佩孚，不果。但國民黨與中共的關係，卻已日漸發展成熟。十一年冬，蘇聯代表越飛在赴日途中，至上海會晤中山先生。當時中山先生鑒於國內革命形勢，亟須外來革命力量的幫助，惟對共產主義，認為不適中國國情，結果在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發表孫越聯合宣言，內容要點如下：（一）孫中山認共產組織，如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越飛亦經同意。（二）孫中山認為中國最緊要之問題，為完成統一，取得完全自由獨立，越飛承認蘇聯對此點能熱烈作切實聲援。（三）越飛重行向孫中山聲明一九二〇年十月之對華宣言，並放棄中東鐵路合同，以實踐宣言原則，重行開始談判；但孫中山承認在條約改訂未完成前，蘇聯仍得保持中東鐵路原狀。（四）越飛向孫中山擔保，蘇聯決不使外蒙古與中國分立；但孫中山承認在中國政府未有力量管束外蒙之前，蘇聯軍隊暫不撤退。不久，中山先生得張繼氏的介紹，得識中共北方領袖李大釗等，伏下了國共第一次結合的線索。

中山先生於十二年回廣州後，遂即召集許部份子汪精衛，廖仲凱，胡漢民諸氏，說明他自己對於聯共的意志。當時中山先生認為蘇聯革命雖以實行馬克斯主義相標榜，惟頗抱疑念。中山先生曾經識孫辯過，他說目前是資本主義時代的世界，蘇聯工商業落後，共產主義欲求成功是不可能的，列寧不

得已改取新經濟政策，就是一個證明。然而這種新經濟政策與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的主張，不無共通之處。所以認爲在中共接受國民黨領導的條件下，聯共一舉是可以採納的。尤其因北伐發動在即，亟須統合國內的政治勢力。

主義與政策

關於國共的根本政治立場問題，因不在本書範圍之內，故無庸贅述。惟度衡當時的政治情勢，一切前進勢力的聯合，自有其必要。當時國民黨幹部中贊成聯共主張最烈的，爲廖仲凱先生。廖氏此時方自日本熱海地方歸國。關於這一段事實的經過，在先生所撰的「廖仲凱先生傳略」中，曾有頗詳的記載：

……先是孫先生深念民國以來，禍亂無寧日，雖軍閥肆虐，而帝國主義實操縱之，顧帝國主義方宰割世界，無能抗者，及俄國革命起，斯大獻，以爲得良友。十一年冬俄國專使越飛至上海，謁孫先生，讜論相契合，孫先生遂命先生（指廖氏——編者）偕越飛赴日本，與越飛養痾熱海，先生昕夕與相聚，縱論上下古今。自是先生始決意力贊孫先生結識世界革命者以與帝國主義抗衡……十二年冬，布教令，改組中國國民黨，先生實盡最力。……（汪集卷四一至九頁）

我們所以引用這一節文字，絕非想借此指示汪先生本人對於當時國共結合問題所示的態度。就在彼時，國民黨中人對於容共一事，也已有反對表示，如先前的馮自由，後來的張溥泉，謝慧生等。不過先生本人，和當時中山先生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即認爲彼時的聯俄容共，只是爲適應時代環境的一種政策，並不像三民主義那樣保有永遠的持久性的，時代與環境如果變化了，政策亦從之

變化。現在且看先生本人對此問題的透闢見解。

凡黨必有其主義，根據於主義而有種種政策。國民黨的主義，是三民主義，而所謂聯俄容共農工等政策，即是根據三民主義而發生的。

聯俄的主義，在三民主義裏說得最爲明白，三民主義之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是非資本主義的，而蘇俄是反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堅決最有力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應該聯合蘇俄，這是聯俄的眞意義。

如果說，中國革命要就第三國際的指導，那麼，是加入第三國際，不是聯俄。

如果說，中俄在外交關係上，應該聯合，那麼，只是以外交關係的意義而聯俄，不是以革命的意義而聯俄，將總理聯俄政策的精神，完全消失。須知道中國革命，因爲要反抗帝國主義，所以纔有如此困難和曲折，蘇俄也因爲要反抗帝國主義，所以纔和資本主義的國家，結了不解之仇。如果雙方拋棄了反抗帝國主義的目的，則中國對於任何國家，都可以拉攏，何必聯俄？而蘇俄也正好與資本主義暫時穩定之歐美列強締結甚麼協商同盟，何必注意到這樣分崩離折的中國？（中略）

如果要將共產黨的理論與方法，適用與國民黨裏，甚至將國民黨共產化，那麼，只能說是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不能說是容共，必爲總理所不許。（汪集卷三一六一——一六三頁）

聯俄容共的解釋

其時陳炯明退據惠州，廣東局勢轉危爲安，孫中山先生遂即重返廣州（民國十二年）。而國民黨的容共主張，也漸次成熟。於是蘇俄遂遣鮑羅廷前來中國，再度與中山先生接洽。當時國民黨所以需要容共，一如先生所謂，是出於因時制宜政策上的必要，而以不動搖三民主義的根本主義爲前提的。

所以在鮑羅廷來華之後，中山先生為預防他日國共糾紛起見，即與鮑羅廷協議之下，發表一文，內容如下：

俄國革命之成功，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則在各黨員對於三民主義尚不明白。質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為別物。

俄國革命當初，僅有民權民生二主義，後因與列強對抗六年，始知對民族主義應用其力。然而中國學生中，雖知其愚，反崇拜俄國革命之過激態度，而竭力排擠毀謗吾黨。彼等始則與俄國提手，阻止俄國與吾黨往來，繼則獨自賴俄國援助，企圖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幸俄國革命黨人，均富有學問經驗，不欲做彼等背平之愚，且亦覺知彼等之力量，當加糾正起見，欲令彼等參加國民黨，與我等採取同一行動。且曉諭吾民族主義，乃適時良藥，非過去遺物，故彼等亦經覺悟，參加我等。

從這宣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主張聯俄容共，只是當作一種政策的措置看的，他首先指出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截然為二物，他要求服從國民黨為容共的先決條件。這種基本的立場，和前引先生對主義與政策關係的解釋，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鮑羅廷本人，當時亦經聲明他來華的任務，是為協助中國的國民革命。鮑氏謂：

余為中國國民革命而來。君等目前在與帝國主義鬥爭。關於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共產主義今日尚非議論時機。中國目前的工作，是在國民革命的發展，余已命中國共產黨致力於此。

吾認為最重大者，為結集一切革命勢力於國民黨下。然今日之國民黨，尚缺乏組織，份子複雜，官僚與投機者充斥。此非大眾的組織。我們首先應該解決這一問題。

其實國民黨方面自十一年六月中共發表第一次時局宣言，對國民黨的政治方針的缺乏定見加以批

師以來，已深受刺戟，急起加強組織，並於同年十一月間，由中山先生，及廖仲凱，胡漢民等協議之後，發表了國民黨的政治方針。現在復經鮑羅廷的敦促，黨方面遂決定了改組政策。

國民黨改組

民國十三年一月，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全部改組，並先期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如下：

吾黨組織，自革命同盟以至中國國民黨，由祕密的團體而爲公開的政黨，其歷史上之經過，垂二十年。其奮鬥之生涯，舉其大者，見於辛亥三月廣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漢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諸役，丙辰以往護法諸役。黨之精華，以個人或團體爲主義而損生命者，不可勝算。當之者摧，攖之者折。其志之堅，犧牲之大，國中無二。然綜十數年已往之成績，而計效成功，不得不自認爲失敗。滿清雖革，繼有袁氏；洪憲雖覆，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鬻身，有如深山蔓草，燒而益生，黃河濁波，徹而益濁。使國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爲。此則目前情形無可爲諱者也。竊以中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本其歷史的使命，依民衆之熱望，爲之指導奮鬥，而達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則民衆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爲軍閥之牛馬外國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犧牲而已。國中政黨，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爲。凡此派流，不足齒數。而吾黨本其三民主義而奮鬥者歷有年所。中間雖迭更稱號，然宗旨主義，未嘗或離。顧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則以組織未備，訓練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運用不靈，雖有大羣，無以取勝。吾黨有鑒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發爲改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總理委任九人，組織臨時

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始其事。行將召集海內外全黨代表會議，以資討論，關於黨綱章程之審定，務求主義詳明，政策切實，而符民衆所渴望。而於組織訓練之點，則務使上下速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黨奮鬥之成功，將繫乎此。願與同志共勉之。（中山全集補編卷一，第三輯八——九頁）

改組之後，先生即爲指定中委之一。改組結果，國民黨遂採取聯俄，容共，農工等諸項政策。就歷史的觀點來看，國民黨此項改組措置，曾引起了後來一連串的悲慘結果。惟造成後來諸種不幸事態的責任，卻罪不在國民黨方面，我們在行文的過程中，將予漸次證明。就改組時代的國民黨言，其需要新的革命力量，原是一件事實，而當時方在中國誕生的共產黨，說是一個政黨，還不如說是一種研究的團體來得適切，唯其所號召的理論與主義，在當時新進的青年份子間，也確具相當力量。中山先生看到這力量用之於共產黨雖不足以成大事，但用之以刺激國民黨的猛進，不無小助。當時採取容共政策，即本此動機。中山先生更特地以調强民族主義來範圍共產黨，例如他說蘇俄共產黨的所以成功，「在其能合和俄國大多數人心……鮑君（鮑羅廷——筆者）初來時卽對我說，俄國革命經過六年間之奮鬥，誠不一其道。而今日回頭一看，最合俄國人民心理，莫如民族主義……俄國革命，原本祗有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而無民族主義。但其在六年間奮鬥，皆是爲民族主義而奮鬥，若是與我黨之三民主義，實在暗相符合。」（中山全集補編卷一七三——一七五頁）。

改組後的政情

這是改組宗旨的說明。我們再看改組以後的情形。

民國十三年春間，中國國民黨改組，對於本黨，實在是起衰振廢的良劑。自從改組以後，本黨的主義，深入人心，因而形成力量。以這種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作戰，戰勝攻取，四年之間，從珠江流域，以至長江流域，進而至黃河流域。國民革命，看看就要告成了。改組以後所以能有此成績，原因雖多，不外以下幾點：

其一，自從改組以後，綜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次第出版，建國大綱，亦已制定頒行。本黨主義和實行方法，都已在青天白日之下，顯現出來（中略）

其二，自從改組以後，本黨行動，日趨於紀律化。（中略）

其三，自從改組以後，對於帝國主義與軍閥，採取不妥協態度……其結果使一般國民，都知道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惟有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遂相率而集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

其四，自從改組之後……「贊助農工」和「農工商學聯合起來」的口號，遍於全國。（汪集卷三，一七二——一七四。）

這是說明國民黨改組後的功績；這功績是在實行三民主義，實行國民革命，而非其他。當時贊助改組最力的，是先生，廖仲凱，戴季陶，吳稚暉等人，不過就在當時，也已經有了反對派的出現，如採科、張繼、謝持、鄒魯、許崇智、林森、葉楚傖等，即後來所謂的西山會議派。然而，就當時的政治實情，中山先生的主張終於獲得貫徹。

在這個時期中，先生曾一度在中國國民黨中央教育會上海執行部任常務委員。上海執行部的設立，是在國民黨第一中全會之後。當於上海的三個常務委員，除先生之外，即為葉楚傖與邵元冲二

人，地點即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惟不久即奉中山先生之命，與原任廣州中央宣傳部長的戴季陶對調。

北行紀游

中山先生一面從事改組國民黨，一面對於北方政局的變演，監視不稍弛。北伐軍事行動，亦於同年開始，不過活動範圍尚限於東江，西江。他方面則派焦易堂等暗結胡笠僧、馮煥章、孫禹行等在北方舉事。是年春，先生亦曾一度被遣往北方公幹，這時有當時的幾首詩可供證明。

西山紀游詩 民國十三年

數年以來，李石曾先生在北京西山從事農林，並開辦學校暨天然療養院。余數聞音訊而未一臨其境爲憾。十三年春日，余以事晉入北京，因得暇暢遊西山，爲詩記之，得若干首。

始出西直門歷西山至溫泉村宿

郊行值春暮，羣峯隱如簇，玄豎黯天際，蒼翠忽在目。西山多爽氣，風物至蕃沃，溫泉更幽絕，一水淺明玉。依山結村落，高下見茅屋，初日射平林，春氣溫以淑。兒童讀書聲，若與田歌續，桃李已微穠，麥香吹盈谷。樹木與樹人，爲日常不足，禽聲繁且和，萬籟靜潮肅。迢遙登小丘，曠衍眺平陸，居庸屹相向，蕭爽動心曲。

登金山憩金仙庵

列嶂隱蒼煙，傾巖蓄丘泉。澄心寄丘壑，遠目窮幽燕。危石下無地，孤松直在天，名山新亭築，佇看集靈

賢。

宿碧雲寺

鵑影紛琴山，錫杖出巡寺。行行勿漸近，已見碧雲起。石關何嶙峋，寶塔五層聚。孤標不可即，如出碧霄際。奇松生石隙，老柏影交翠。泉源暗復現，又在碧雲裏。憶昨遊溫泉，水聲猶在耳。復攬金山勝，遊目豁千里。得此供三絕，可以歎觀止。名山宜講學，合并眞與美。東風動絃歌，山水盡嫵媚。結鄰有故人，相見各歡喜。茅屋三兩椽，魂夢得所寄。夜來臨水坐，煉星耿林蔚。靜默成自然，夜氣清且富。作詩以自奉，亦以勞吾子。

這裏給先生一再讚賞的西山碧雲寺，在相隔一年之後，却意料不到會成爲歷史上的一個紀念殿堂。

是年秋，江浙戰爭爆發，第二次奉直之戰又隨之而起。大總統黎元洪被迫離位，竟以曹錕爲總統。於是中山先生復命先生入京，向段祺瑞、張作霖，繼續接洽倒直運動。是時奉直兩軍方大戰於山海關九門口、吳佩孚以總司令之尊駐節四照。而其部下馮玉祥，方爲北路司令，入熱河攻承德朝陽。此時馮已接受國民黨之運動，故當黨政國，彭壽莘等攻九門口不下，吳佩孚親往督師之際，馮即乘機疾馳三百里至北京，實行倒戈，囚曹錕於延慶樓，及吳得報來救，陣勢已亂，爲馮大敗於楊村。這是十三年十月間事。

隨中山先生北上

倒直運動成功後，先生即奉命進行孫段張三角聯盟，以期將國民黨的勢力引進北方政治。先由黃

郛出而組府，繼之段祺瑞起爲執政。段氏看到此時國民黨勢力的浩大，遂決定邀請中山先生北上協商國事。當時北方的情勢仍在混亂中，而廣州內部的異動勢力，亦未澄清，故北上一舉，原含有萬分危險性。不過中山先生認爲北伐所欲完成的目的，如能由北上協商而以政治的途徑加以完成，當能事半而功倍。

北上之前，因事體重大，中山先生即召開幹部會議，參加者有先生、胡漢民、廖仲凱、張靜江、戴季陶、孫科等重要黨員。決定以胡漢民留守廣州，先生，孫夫人、戴季陶，孫科等隨行。當一行人至上海後，中山先生又命先生先行入京，佈置一切，約期天津會晤，自己則繞道日本北上。先生此時始終是中山先生所最親信，最倚托的人物，自第一次中央會議指定爲中執委，至以遺囑重託爲止，中山先生與先生的關係，眞可說得上寸步不離。因此，知道中山先生北上經過最詳的，亦唯有先生。

兄弟於去年（十三年——筆者）十一月十三日，隨大元帥自廣州出發，十七日到上海，大元帥決定自己率領幾位同志，繞道日本以赴天津，命兄弟先行入京，並在津會面。及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兄弟接着，這時候大元帥已發病了。但是大元帥還不肯休息，雖然病臥在牀，而裁答函電，接見重要同志及賓客，仍是每日不斷。至三十一日入京以後，病勢日見沉重，便不能躬親應務了。一月二十六日入協和醫院受手術後，以至於三月十二日易簀……

這一次大元帥北行之目的，曾經郵電宣言，一是開國民會議，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

開國民會議，是爭取軍閥所把持着的政權，還之國民。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毀棄帝國主義在中國施行侵略的武器。故此大元帥的主張，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不願聞的。當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的時候，天津的法

領導，竟不許中國各界人士在法租界的國民歡迎會，還揚言不許大元帥通過法租界。這可說與大元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針鋒相對。而中國的官僚，反以爲這是大元帥不善外交所致，這是何等荒謬？過了幾日之後，京津一帶，紛紛傳說駐在北京的外交團，要以尊重不平等條約，爲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大元帥聽得，極爲注意。適值交通總長葉恭綽和善後會議籌備主任許世英來見，大元帥詢知實有其事，當時極爲震怒。……我們不敢說這一番震怒，是大元帥致死的根由，然總是大元帥病篤及傷其生命的一個原因……當時兄弟因爲大元帥震怒，極力勸止，並自任要葉許兩位切實商量……一是在善後會議開幕禮頭，聲明政府關於國民條正條約的要件。二是外交次長於答覆照會遞交時，口頭聲明執政府對於孫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完全同意。然其結果……尊重不平等條約，果然做了承認臨時政府的交換條件了……大元帥北行，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受了一大挫折了……

至於開國民會議……依大元帥在廣州臨行時宣言，是以預備會議產生國民會議的。如今儘已連預備會議的名稱也不爭執……這樣的讓步，已可謂到極點了。然而臨時執政府對於這樣的讓步還不能滿意……大元帥北行，以開國民會議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又受了一大挫折了。（汪集卷三，五五——六〇頁。）

「和平奮鬥救中國」

北上一事，就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召開國民會議兩點言，一因執政府的缺乏誠意，一因中山先生的逝世，可說是失敗的，可是，我們却不能說絕無收獲，中山先生在北上之初曾說過：「我抱了這樣目的而北上，我知道是會危險的，我只要國民明白，我便什麼都不管，我便甚麼都不怕」。中山先生要國民明白他爲甚麼要北上，這一點是成功的。因爲中山先生有此北上一舉，使國民黨的主義，獲得了

將過深入的效果，而爲後來的大舉北伐，開了一條精神上的捷徑。

中山先生精神不死，不過他的肉體畢竟挨不下病魔的磨折，終於在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了。逝世前一日，即三月十一日一時，忽神智清醒，急召親族孫夫人，孫科，及先生，邵元冲，于右任等至病榻前，將先生稟承己意的預先草就的遺囑，由夫人扶腕簽字，既而呼「和平，奮鬥，救中國」一語再。這一位中國歷史最大偉人的死，及其臨終呼號，在我們今天看來，實含有異常重大的意義。現在我們且看當時侍疾在側的先生目擊的追憶。

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下午，還能和侍候的人談話，入夜以後，精氣衰弱了，聲息微微了。一間靜悄了的病室裡，一個要死的病人，躺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滯了，一種微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和平！」「奮鬥」！「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幾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裏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卷三，五二頁）

我們在這裏實在不能不提到運命二字。先生是總理遺囑的起草者，而總理最後呼聲的「和平」「奮鬥」「救中國」，又是今天先生所負政治任務的最大目標。這種關係決不能說是偶然的，而是先天的命運。

受託的一幕

我們要明白中山先生及國民黨諸同志對於先生的信任與重託，最好還是從中山先生的傳記中，引

歉一些事實。當中山先生的病勢已至極危急時，一般隨侍同志即主張預備遺囑，以備萬一時簽字，作國民黨永遠遵守的信條。而接受此項重託者，就是先生。

……汪先生問看護者，邀約家屬三人，至先生（中山先生）榻前，面請先生指示敎語，俾便遵守。先生沉默久之，遂振目諭曰：「我看你們是危險的呵。我如果死了，敵人是一定要來軟化你們的。你們如果不被敵人軟化，敵人一定要加害於你們。如果你們要避去敵人的危險，就是一定要被人軟化，那麼我又有什麼話可講呢？」話畢，目復闔。　汪先生用極誠懇態度請求云：「我們跟　總理奮鬥了幾十年，向來都沒有怕過危險，以後還怕甚麼危險。向來沒有被敵人軟化過，以後還有甚麼敵人能夠軟化我們呢，不過總是要總理先告訴我們幾句話，令我們有所遵守，方知道怎麼樣向前去奮鬥。」大元帥見　汪先生請求如是懇切，乃霍擬眼諭曰：「你們要我說甚麼話呢？」汪先生答曰：「我們現在預備好了幾句話，讀到總理聽。總理如果是贊成的，便請總理簽個字，當作總理說的話。總理如果不贊成的，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為筆記下來，也是一樣。」先生聆至此，即諭曰：「好呀。你們預備了甚麼話呢？念給我聆聽。」汪先生即取出一紙，低聲悅讀曰：」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先生聆畢後，即表示滿意之態度，點頭諭曰：「好呀，我很贊成呀。」立時有一位家屬繼續請求曰：「先生對於黨務，旣經贊成說幾句話，對於家屬可不可以照這個樣子，也說幾句話呢。」先生諭曰：「可以呀，你

們要我說甚麼話呢？」 汪先生又照初次形式，取出第二張字體曰：「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爲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之志。此囑。」（中山全集卷四，二七——二九頁）

眞動人的一幕，明顯地說明了總理對於先生的信託，而先生所起草的總理遺囑，又是何等重大的一件歷史文獻。單從這一樁事實看，先生後來政治生活的經營，獨能固守總理遺敎者，可說是不無原因的了。自東京留學時代遇見總理，加入同盟會，迄民國十四年總理逝世爲止，爲時二十年，先生受總理的信任與愛護，始終如一日。先生受總理的領導歷史既深，其對總理遺敎的執行，自亦備加眞摯懇切。

政治生活飛躍的前夜

中山先生臨終前所說的幾句憂慮黨的話，實在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說他死後「敵人是一定要軟化你們的」。這敵人在當時，自然是指的一切反革命份子，尤其是北洋政府。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方經傳出，段祺瑞政府即於三月十四日下令封閉國民黨北方機關報「民國日報」，並逮捕負責人，同時彈壓國民黨會議的促進運動。他方面四出收買國民黨員，如馮自由，馬君武，鄧家彥等，並在安福系份子主持下，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以分化國民黨的勢力。

然而此時先生所最憂慮，倒不是黨外的敵人而是黨內的異動份子，我們曾說過，在國民黨改組之後，黨內即有分裂的傾向，所謂左派與右派之爭，其時共產黨雖方參加國民黨，但其利用容共政策以

實現其政治野心的陰謀，在中山先生在世時，即已露其端倪。例如 中山先生北上一事，雖純係出於貫徹革命目的的要求，而當時的中共，即已有過反對的表示。當時「嚮導」報上曾討論北上問題，張太雷羅亦農輩，竟然說出北上就是放棄廣東革命事業，就是與北洋軍閥妥協，不啻背叛革命，違反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只是中共元老陳獨秀瞿秋白等出加反對，且第三國際也表示中共不應對國民黨操之過激，結果遂在表面上贊同北上之舉。

然在中山先生逝世後，先生尚未返抵南方時，廣東內部的分裂現象，已十分展開。當時代中山先生坐鎮廣州的胡漢民，鑒於鮑羅廷統制下中共勢力的日益囂張，已深具戒心。中山先生在日，國民黨中最高的幹部人才，原只有先生，廖仲凱及胡漢民三人，後者都是先生的好友兼同志，都是有繼承總理地位資格的國民黨同志。其中廖仲凱先生，因係國民黨改組的竭力主張者，故在總理逝世之後，仍主張不變聯俄容共政策。廖氏是時在總理手創的黃埔軍官學校為政治部主任，而胡氏亦以民黨四都督的元老資格，居於政治崇高地位。

廖氏在當時是被認為一左派的人物，而胡氏則被認為右派的領袖。然而就改組前的國民黨立場言，這種分別是根本不存在的，只因在容共政策之後，由於一種外來政治勢力的滲入，遂造成這種現象。唯在中山先生死後，國民黨最重要的問題，暫時還不在排斥共黨而在怎樣建立黨的新領導，而將黨的勢力從新團結鞏固起來。在對外政治上，用政治的途徑和北洋政權妥協一事，已絕無可能。故第一個問題，是在確立南方正式政權的問題。需唯有先求黨內團結，先求政治機構的確立，始可談到一切政治問題的解決。

民國十四年在國民黨是一個龐大的歷史轉捩點，總理死了，容共政策的裂痕是暴露了，黨內的團結力是鬆弛了，這時需要一個領袖，一個政府，來解决諸此問題。先生覺得他這時應該負起重大的責任，趕快回到廣州。因爲在當時的國民黨中，先生既無派別的背景，且是身受總理重託的一人。他不負起這樣的重大責任，是無人能夠負得起的。有人認爲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先生所負的實際政治任務，較之他在民國十年前政治歷程言，頗有些不可思議。可是眞像歷史的飛躍有其一連串的因子一樣，先生政治生活的飛躍，也同樣有其種種原因，關於這，我們需要另章說明。

第七章　國府主席與中山艦事件

總理逝世後的領導人問題

總理逝世後，國民黨的內部馬上呈現了分裂的現象。這雖是政黨組織的常例，不僅國民黨爲然。在總理在世之日，國民黨也早已起過屢次的分化作用，譬如辛亥革命後一部份國民黨人主張廢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而修改之爲社會政策，以致後來有改組中華革命黨而再發展爲國民黨的積極經過。自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之後，因容共政策問題，國民黨的分裂因子，早隨改組而俱存。不過以總理傳統的權威地位，以及三民主義的堅持不變，內部的裂痕，始終不獲爆發的機會，現在總理不幸死了，圍繞容共政策問題的內部對立，就再也遏阻不住。

當時先生隨侍總理於北京，廣東的實權，在政治上有胡漢民與廖仲凱二人負責，在軍事上則有許崇智與蔣介石，當時後者因握有黨軍的實權，得以擊破陳炯明，楊希閔，劉承勳圖謀進攻廣州的軍隊，而在廣州的政治上開始伸展他的勢力。

廖胡二人，和先生一樣，同是國民黨的元老，有總理左右的三傑之稱。總理逝世後，第一個重要問題，是建立黨及政治上領導人的問題。在總理生前，總理是國民黨及革命政府的最高領袖，中山先生就是統合黨政軍於一身的大元帥。然而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訂的黨章上，國民黨的政府與黨的中委員會，都不能產生第二個總理。當時總理行使職權的最高機關，就是廣州革命政府的大本

營，現在總理一死，這大本營的職權執行，就成了一個問題。

胡漢民在當時雖是大元帥職權的代理人，而廖氏亦為軍校的黨代表，然總理死後的政治領導權，既不操諸胡手，也不操於廖氏，而一時竟有共產黨陰謀篡奪的趨勢。廖氏因為是國民黨改組時的有力份子，被目為左派首領，而胡氏相形之下，則又嫌右傾色彩濃厚，在內部對立的傾軋之下，一時竟若羣龍無首一樣。同時陳楊劉諸軍閥的陰謀竊伺，北方政府的高壓氣勢，以及同年五卅慘案以來的革命空氣的高漲，却在在要求革命的最高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誕生。

國民政府成立

那時先生雖因總理逝世而頗形消沉，但鑒於客觀情勢的要求及各方的敦促，隨即回到廣州，着手國民政府的組織，而被推舉為國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並為黨的最高領導人。這就先生在民國十年以前的政治生活經歷言，是未免有些不可思議的。在民國十年前後，先生雖致力於黨的工作，但却很少露臉於政治舞台，現在中山先生一死，他却馬上被推舉為中山先生地位的唯一後繼者，這就不能不認為是先生政治生活的一大飛躍。

一般則有用心者流，每解釋先生的得任第一次國民政府的主席，是由於所謂左派擁護所致，實則當時若有所謂左派，那麼應該是廖仲凱而不是先生。先生所以受黨的信託而主宰國民政府，不外因為承認先生是三民主義及黨政策的最忠實執行者。如果說當時國民黨內確有左派與右派之爭，先生却無所偏頗，而惟國民黨與三民主義是從。不錯，先生也是贊成國民黨改組政策的一人，當時他不但沒有

反對容共政策，無寧說是其贊助者。但其贊助的立場，是中山先生的立場，也就是國民黨與三民主義的立場。關於這一點，先生曾屢次這樣表示說：

> 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容共政策，亦於此時確定。惟容共僅一時政策，決不能謂容共即爲本黨改組精神所在。本黨改組之精神，在於認定三民主義爲救國不二法門。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民衆。欲求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則不能不使黨員眞能爲主義而奮鬥。欲求黨員眞能爲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致。此實爲本黨改組之精神。有此精神，然後本黨乃得一新生命。此與容共無關。謂容共爲改組精神所在，固謬，因反對容共，並改組之精神，亦拋棄無遺，尤謬。（汪集，卷四，三五——三六）

受託重任的意義

因爲先生持有這樣不偏不頗的見解，所以在黨內因失却一個最高領袖而呈現分裂的傾向時，他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擁護，而出任領導黨國，担任組織國民政府的重任。不過，當時先生也不無困難，先生的困難，也就是在於他是黨中一位不知有派別的中堅份子。譬如當時的中共，就本想利用這個機會推舉左翼色彩較濃的人物出任國府主席的，如兩廣中共區委陳延年（陳獨秀的兒子，）竭力主張推選廖仲愷爲國府主席，右派則擬擁戴胡漢民。惟廖氏本人及國民黨中多數有力份子，均主張擁戴先生，結果中共也不得不宣告讓步。

關係國民政府成立的經過，以及先生接受重託的意義，我們可以就下面的一則引文中看出。

當十二年冬至十三年初，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訂黨章時候，我們試看早已經知道，如果總理一旦死後，黨的政府和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都不會再有第二位總理的。這在黨章上寫得很清楚，大家可以覺得的，黨章上面幷不說是「本黨設總理一人」，是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為總理」，由此可以清清楚楚看見本黨除孫先生之外，是不會有第二個總理的了。如果孫先生之外，還有總理，那末，黨章內應該說「本黨設總理一人」才是，爲甚麼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理」呢？在這一條黨章上面，是明明白白的指出本黨所以有總理的緣故，是因爲孫先生是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導師。自從興中會，而同盟會，而中華革命黨，以至今日的中國國民黨，四十年來，都沒有過第一個人做首領的。所以他實是本黨一個天然的歷史的總理。如今孫先生不幸死了，那麼在黨便不會再有總理，在黨的政府，便不會再有元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事情。國民政府是受黨的委託的，黨的組織，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的組織，也自然同樣是採用委員制，是毫無疑義的。當着孫先生未死，我們可以一意跟着這個唯一的導師。孫先生既死，我們採用委員制要使各人都盡其所能，以共同負荷總理所交付的責任，繼續國民革命未竟的工作。這就是國民政府所以成立的原因。（汪集，卷三，七二——七三頁。）

這是一篇異常重要的文獻。在這一節短短的宣言中，先生以十分淸楚的字句，將黨與政府的組織系統，予以決定性的定義。而對總理地位的解釋，並國民政府委員制度的採取，實早具有防制黨與政府獨裁化的傾向。這確是先生對於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大貢獻。

廖仲凱被刺

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正當上海五卅慘案發生之後，全國國民的革命情緒，已達白熱化的程度。這時中國共產黨當然不會放棄這樣一個機會。他們利用這一時機，並利用國民政府初成立時的薄弱政治機構，在政府與國民黨的內部，拚命擴展中共的勢力，遂至引起一部份國民黨人的反感。先是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廖仲凱氏一身兼任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財政廳長暨要職。與汪廖形成黨中三鼎的胡漢民氏，則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然廖氏當時因有左傾之目，隨中共勢力的扶搖直上，廖氏竟為右傾份子所敵視，必欲去之而後快。因此在國民政府成立不久（十四年七月一日），廖氏旋於八月二十日在廣州越秀北路惠州會館中央黨部前被刺身死，而使國民政府蒙受非常重大的打擊。

其實廖氏之死，與其說是出於右派份子所為，無寧說是出於帝國主義的授意其鷹爪所致。蓋此時劉楊叛軍才經平定，六月二十三日就爆發了沙基慘案，是時廖氏一身兼任黨政要職，領導民衆，作反抗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奮鬥，不遺餘力，致為後者所忌，遂遭暗算。

當時暴徒所欲謀殺的對象，除廖氏之外，尚有先生本人，蔣介石氏及俄國鮑羅廷顧問等數人。而此事在政治上復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捕獲的主要兇手三人中（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胡毅生是胡漢民氏的兄弟，而胡氏本人平日既有右派首領之目，在本案中縱無直接關係，要亦不能免除責任。因此不久由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暫派胡氏出洋考察，以了却一場糾紛。

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在先生主持下，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爲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的第一次黨的重要會議。根據十四年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決議，該會議本應於同年八月十五日召集，惟因沙基慘案發生，致不克如期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要意義，是在反帝國主義的政治基礎上，確定了大舉北伐的發動。先生在此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曾說過這樣幾句話：

十五年元旦是本黨同志繼續承總理遺志去統一全中國的一個紀念日。我們回想起自元年至十四年，中華民國沒有做好，究竟原因在什麼地方，也很明白可以看見，我們不能說民元的革命是沒有成就，最少已經革去滿清政府的命，已經革去數千年專制政府的命，已經把中華民國的招牌，高高掛起了。可是中華民國的基礎卻實在沒有做好，因爲當時對內則民衆運動沒有普遍，對外則打倒帝國主義的目標，還沒有完全決定，所以十四年來，國家不能做好，人民還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因對外既沒有鮮明的目標，使一般民衆對於反抗帝國主義的觀念，不能發生，更無從救中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這實是中國革命未能成功的一個大原因。（汪集，卷三，八六頁。）

爲欲繼續國民革命未竟之業，先生以強調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性格，重復提出大舉北伐的建議，此項建議於同年一月二十七日向中央政治會議提出，立即爲接受了。而使中國歷史走上新的一頁的北伐運動，於是亦開始浩浩蕩蕩的發動。

不過，有一點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即在廖氏被刺，胡氏外游之後，中國共產黨假借反右派的口號，深深打進了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組織。在新國民政府成立之初，中共領袖如毛澤東，譚平山，吳玉章，林祖涵等人，即在新政府中佔得了部長的地位，這事情當然引起右派份子的不滿。在廖氏被刺之後，國民黨中一般右傾元老，即離粵北上，而有所謂西山會議派的組織，以鄒魯，居正，覃振，謝持，張繼，林森等為中心。對先生所主持的國民政府，攻擊不遺餘力。他們且提出如下三點要求：（一）政府中絕對不能容許共產黨存在；（二）廣州政府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和其他蘇俄軍事顧問，應即辭退；（三）中央監察委員會應該由廣州遷至上海。

從歷史的觀點看來，當時西山會議派的反共要求，無疑是對的，但我們不談政治則已，不然對於現實的政治情勢，應予更大比重的考慮。就當時的現實政治情勢言，以下各點，是必得予以考慮的：第一，總理遺囑中明白規定應執行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容共聯俄政策即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之一；第二，北伐大舉在即，國民黨為充實其政治力量，應求內部的團結；第三，國民政府的力量倘未十分鞏固，引起內部磨擦的一切措施，應予避免；最後，中共的野心此時雖已露其端倪，但還沒有十分露骨的表現，在表面上他們還是服從國民黨的。

中共勢力的全盛時代

不過，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共黨勢力的伸張，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只要

一看當時黨中央的負責人名單，就可以知道，名單如下：

（一）常務委員九人：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孫科，蔣中正，吳玉章，丁維汾，林祖涵，另一不詳。

（二）秘書處：秘書長不設，書記長劉芬。

（三）組織部：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

（四）宣傳部：部長汪精衛，代理部長毛澤東，秘書沈雁冰。

（五）青年部：部長甘乃光，秘書黃日葵。

（六）工人部：部長胡漢民，秘書馮菊增。

（七）農民部：部長陳公博，秘書羅綺園。

（八）海外部：部長彭澤民，秘書許甦魂。

（九）商民部：部長王法勤，秘書黃樂裕。

（十）婦女部：部長何香凝，中文秘書黎沛華，英文秘書萬季膺。

其中譚平山與毛澤東兩人固為中共份子，而秘書則幾無一不是中共的黨員，所以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為中共在國民黨的全盛時代，亦無不可。考察共黨的戰略，無疑是在北伐過程中先行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所以凡是與黨有關的組織，中共莫不設法抓在已手。除上述各部之外，中央所直轄的幾個訓練組織，亦莫不在共黨手中。當時這樣的訓練班有三個，一是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一是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一是中國國民黨婦女運動講習所。就中政治與婦運二講習所，均設在中央

黨部之內，而農運講習所，則設在番禺學宮，政治講習班原爲訓練北伐政治人員而設，當時直接的領導對象是湖南省，所以學生既多湘人，而五個理事，亦均爲湘人，如譚延闓，陳嘉祐，毛澤東，林祖涵，李富春。後者三人，都是中共份子。而實際負責人則爲毛澤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所長也是他，教務長蕭楚女，當時也是共黨份子。婦運講習所所長雖爲何香凝，但實際負責人則爲周恩來之妻鄧穎超。

這種情形，而今看來，也許可以說是先生一時的失策，唯在當時先生主持下的政府，祇有二個大目的：一即是對外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及軍閥勢力，一切對內實踐總理的遺囑。先生本人，對於共黨實一向並無好感，在先生任廣州教育會長時代，即相傳有陳獨秀赴粵活動而遭先生拒見的傳說。贊助國民黨改組的，不是先生而是廖仲凱，先生只唯中山先生的領導是遵，而在十五年六月舉行的國共聯席會議中，先生反共態度的顯現，尤有強烈表示。不過，這是後話。

汪蔣初期關係

總之，自廖氏被刺，尤其自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中共的聲勢是一天天的坐大了，不過在反對方面，自西山會議派揭起了分裂作用之後，也同樣聲勢日張。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發生的中山艦事件，就是此種左右勢力正面接觸的第一幕。

在觸及本問題之先，我們應得注意到幾個問題。第一，自廖氏被刺，胡氏外遊，西山會議派北上之後，廣州政府的最高領導權無疑是屬之先生之手。但先生因執行總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的決

策，將一部份的黨權，根據共產黨員服從國民黨的契約，移轉給了中共之手。而當時是北伐開始的軍事時期，握有當時實際軍權的人，自亦在政治上保有相當地位，蔣介石氏的此時崛起，自是不無原因。

蔣介石氏如何在國民黨中取得政治地位，在這裏殊有加以簡述的必要。在民國十三年五月，總理在廣州手創了一所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的前身，而蔣氏便是該校的校長。當時蔣氏純粹是一個軍人，在政治上初無若何地位。不過蔣氏曾往蘇聯考察過軍事，而十三年軍校之設，亦由於越飛和廖仲凱協商建議的結果，所以軍校成立之初，蔣氏遂被推為校長，以廖仲凱為黨代表。廖氏死後，先生一度兼任。對於國民軍隊歷史略有所知的人，一定知道當時黨代表的權力，是超乎軍事指揮官以上的。該校的教官，來自蘇聯的極多，就連加侖將軍也一度任過該校教官，而先生亦以宣傳部長的身份，擔任該校黨史與三民主義的講師，所以汪蔣關係，最初本來很好。

廖仲凱被刺以後，先生以國民政府主席之尊，兼充軍校的黨代表。至民國十五年三月一日，在先生兼任軍委會主席的時期，始決議改組陸軍軍官學校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通稱黃埔軍官學校，仍委蔣氏繼任校長，關於這一改組的經過與意義，在先生當時發表的一篇叫做「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典禮訓話」中，可以覆按。

本來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的時候，是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那時候為什麼要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為在民國十三年，所有的軍隊，名義上雖是總理的軍隊，大元帥指揮的軍隊，實際上都是軍閥，經費、組織各有他的目的，並沒有依照大元帥的意志去做。大元帥是努力於國民革命工作，而這班軍閥卻

就得用帝國主義和軍閥奮鬥的，看見這種軍隊，使他非常失望——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要創辦這個學校，純粹本着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和總理的指導訓練武裝黨員，希望在這學校裏養成一班有主義有紀律的下級幹部，然後再來組織黨軍。（中略）

各位知道：何以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合併在黃埔軍官學校，這個理由是：第一，黨立的學校是由這個學校開始，才有其他的軍事學校。第二，對於蔣校長的人格和他的努力奮鬥的精神，本黨各同志，都是深崇的欽敬，所以我們拿蔣校長的人格來改組這個學校，同時并請蔣校長依然担任本校校長。（下略）（汪集，卷三，一〇三—一〇四頁。）

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先生當時對於蔣氏的信託與寄畀之殷。先生在人事方面是從來無甚偏見的，祇要誰能忠於國民黨及其主義的立場來工作，誰就是先生所信託的同志，對於當時的中共是如此，對於蔣氏一樣人也是如此的。

「聯蔣倒汪」的醞釀

先生於民國十五年一月廿七日向政治會議提議大舉北伐，而蔣氏遂亦於同年二月一日被任命爲國民黨軍最高總司令。汪蔣合作，照理這時應該奠定健全的基礎。惟蔣氏此時雖對中共勢力的伸張表面無所表示，惟暗中因受右派份子的影響，亦已深具戒心。尤其在廖氏被刺，西山會議派發動「聯蔣倒汪」的策動之後，蔣氏有着手成立他自己的小組織。如讀者「蔣介石傳」第六章中，曾公然這樣說過：

……廖仲凱的遇刺使蔣委員長感到特外留神。他就組織了一個實力充足的秘密團體，使他能對共黨和外人的陰謀和對策都知道得很清楚。他在接受最高軍權之前，想對廣州將領們的忠奸獲得一個有系統的認識。（「蔣傳」，九九——一〇〇頁。）

這足見蔣氏智足深謀，苦心良多，與先生的胸襟坦白，信任他人的忠厚性格，迥不相同。廖氏被刺之後，蔣氏首先解除了當時廣州除蔣系以外唯一軍力的許崇智部隊，及至惠州攻陷，陳炯明勢力消滅，蔣氏就成了當時擁有廣州軍權的唯一人物。

當時西山會議派見蔣氏擁有實際政權，就馬上喊出「聯蔣倒汪」的口號。不過當時蔣氏首先欲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解除軍隊內部的對立存在。原來在當時的軍校內，因左右派勢力的滲入，致有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二種小組織的存在，前者是左的，後者是右的，這兩派的衝突非常厲害。蔣氏此時對於前者固不敢公然得罪，對於後者卻不無曲意拉攏之心。結果蔣氏遂解散二會而另外組織黃埔同學會，對共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悉令退伍。而這一事件，正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的主要因子。

中山艦事件的曲直

原來蔣氏此時雖未敢公然表示反對共黨，但其組織黃埔同學會並排斥中共份子一事，可以看作是他政治手腕的一種試探。蓋當時外間秘密派傳共產黨有圖謀綁騙蔣氏上艦，擄放俄國的傳說。這傳說也許是無稽的，不過蔣氏假借海軍局政治部主任兼代海軍局長李之龍擅自調動兵艦的事實，派兵包圍

廣州，事先未經徵得先生的意見——先生當時是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會主席——乃爲不可否認的錯誤。現在我們爲欲明白這一事件的眞相，不妨引證雙方的文獻，以判事態的曲直。

現在我們先就董著「蔣傳」對此事件的解釋：

……這事極其簡單，因爲中山巡洋艦長李之龍，一個黃埔軍校畢業的共產黨員，第一個對他公開地攻擊。這艦長自稱受過蔣委員長的指示，曾將他的軍艦停舶在廣州左近。蔣委員長立刻迅速地開始行動，他將李某幽禁，並且派遣軍隊到廣州去維持秩序，因爲當時城內雖沒有宣佈戒嚴，但實際上却早已如此了；鮑羅廷和他同伴所居的住宅，是被蔣委員長的軍隊包圍了起來。那時正在病中的汪精衛，反對向共產黨採取激烈行動，但蔣委員長却知道激進的手段勢已不能避免；他將廣州罷工委員會——一個紅色的宣傳機關——的糾察隊，和其他陰謀不軌的兵士都繳了械，並且佔了廣州兵工廠。大部的蘇俄教授和顧問都被扣留起來；除了李之龍外，還有差不多八十個人被禁在黃埔軍校圍牆內。這肅清工作經過三日之久，並且其間實際可說是沒有什麼殺戮的慘事。在這一次突擊完成之後，蔣委員長便向國民黨政治部報告他的行爲，並且表示甘願受罰，假使他所做的事，是已超過了他的權力的話。他的行爲被認爲合理的，雖然汪精衛很不以爲然，認爲軍事領袖對這種事，應該得到政治領袖們的允准後，方可行動。（「蔣傳」，一〇〇頁。）

如果我們認爲蔣介石氏的反共行爲是對的，然事件的處理，却完全是擅權的行爲。第一，爲了一部份共黨的不法行動——注意，當時國共尚未分離——而竟未得政府許可，出兵包圍政府所在地的廣州，並承認廣州並未宣佈戒嚴，至少應該說是越權的行動。所以蔣氏也知自請處分，然而就後來無數事件的演出，蔣氏此舉，實爲政治上鑄成一大錯誤的提出。

蔣氏所以有此舉動，實在由於他當時雖有反共的準備，却又未敢以政治上的方式出之，遂而求其次，遂有軍事政變之舉。蔣氏當時不僅未有公開反共的主張，且在十四年十一月七日在汕頭總指揮部演講時，還在使用「總理實行中俄聯合意義和世界革命統一指揮的必要」那樣的題目。

蔣介石動機的批判

先生秉其大公無私的立場，承認蔣氏當時行爲的動機，雖不無若干理由，然全盤措置，是絕對錯誤的。他說：

蔣同志做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獨斷獨行，未嘗謀之於我的。就事後蔣同志給我的手書及蔣同志所做出來的事情看來，可以歸納到以下兩點：

第一，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

第二，蔣同志以爲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於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制裁，以免大權旁落。

以上二點，是蔣同志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爲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纔得關於中山艦之一方面報告，便有衝動。後來雖然知道這一方面的報告，是不實的，但藉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爲非策，所以就這樣的幹下去了。（汪集，卷四，五九頁。）

證之前引「蔣傳」的記述，先生的批評，可說是絕對正確的。關於蔣氏當時的根本思想，如果再看了下面的引述，更可知道先生對於蔣氏的內心，知之何等透徹。

孫總理以前曾接受過蘇維埃聯邦的援助，但無疑的，蔣委員長完全是遵守着總理的遺訓，所以他認爲在可能範圍內與蘇聯合作，是他分內的事。（下略）但不曾遺忘，蔣委員長絕對不會被蘇聯同化和加入共黨的革命黨所蠱惑，他很知道蘇聯給於他的援助的可貴，但他的直覺告訴他，假如讓共黨執權的話，一定會給於中國以極大的不利。爲預防着萬一的事變計，他小心地將黨權交付給幾個十分可靠的國民黨領袖，而共產黨祗能做着政治的傀儡。（下略）（「蔣傳」九七，九八各頁。）

如果這幾句話當眞道着了蔣氏政治生活的基本性格，那麼我們實在可以看出先生與蔣氏的顯著不同點。如我們都知道的，先生與蔣氏，在反共問題的一點上，曾一度達到殊途同歸的結論。然而在於先生，對於某一問題達到根本結論之先，他必須對此問題作一全盤深入的考慮。我們不否認當蔣氏暗下作反共行動之前，先生仍有一個時期主張堅持總理的遺命，那主張不放棄蘇俄容共政策，這並不是先生對於共黨的謀略不明白，惟爲貫徹十三年改組的基本精神，維持黨綱黨紀，充實革命的實力起見，實不容驟的政策，恣意加以變更。他尤其反對當時一輩假反對容共爲名，而實現私謀的人物。他對於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後的時局觀感，曾這樣剴切說過：

弟等不忍總理逝世後，其改組本黨之精神，亦隨以俱逝，故努力與此等反動份子爲敵。幾次撲滅之結果，廣東全省，遂告統一。然反動勢力，初不因以少熄。蓋上述反動份子，雖斂跡於廣州，仍嘯集於上海北京等處，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謀傾覆廣東革命根據地。加以當時弟等方專心致志與此等反動份子爲敵，遂使共產分子得以乘間抵隙，漸成坐大。於是又激起一部份忠實同志之不平，漸至對於共產份子爲對抗的運動。此等忠實同志，純[illegible]理，與上述反動份子不同。上述反動份子，反對改組，而以反對容共爲藉口。此等忠實同志，則

皆贊成改組，惟對於容共，則漸由懷疑而至於反對。自此等對抗反動，突起於廣東內部，於是廣東之革命勢力，不免動搖，而反動份子，益擬其謀。彼等知廣東革命之勢力，未易傾覆，則務謀離間，以使之分裂。所以「聯蔣倒汪」之口號，盛行於彼時。第二次代表大會雖已告成，而不久即有廣州三月二十日之事。（任慕，卷四，一三——一四頁。）

三月二十日的早上，廣州市的情形還一如平時。當時北京段祺瑞執政府屠殺民眾的消息（三一八慘案），已經傳到廣州，惟此時廣州人民的注意焦點，完全集中在大舉北伐事件。是晨細雨濛濛，一般早起者根本還不知一件軍事政變正在醞釀中了。蔣系的武裝軍隊，（第一軍特務營，）於早晨三四點鐘的時候，即將在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團團圍住，繳了守衛糾察隊的槍械。罷工委員會的主席蘇兆徵，已聞風他避，祇有鄧中夏李森等被監視在內。同時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在大東路中央黨部對面的公館，也給包圍了，不過衛兵的槍並沒有給繳掉。左鄰東校場，斜對通黃花崗白雲山的大道，及紅花崗附近，均軍警密佈，形勢十分嚴重。

這形勢顯然是一種「苦迭打」的場面，而此時先生方在病中，對於蔣介石氏的獨斷行爲，竟不及及時阻止。蔣氏雖有如下一通報告呈報軍事委員會，惟在未得軍委會許可之前，他已採取了行動。蔣氏的呈文一節謂：

……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兵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項報告，深以爲異，因事前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竟擅升火，經一晝夜，停船校前，及十九日晚之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

錄日，中正鑒於共黨倒政府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面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攝理艦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備，以防不測……（「現代史料」二集一〇一頁。）

嚴正的批評

然則蔣氏何以知道這事出於共黨指使而有包圍各共黨機關之舉，何以後來又有種種打擊左派勢力的措置？這顯然說明了中山艦的事件，是有其政治的目的的，並不如蔣氏呈文中所說的那樣不可捉摸。關於這，我們且看一看先生對於本事件的批評。

如今我就三月二十日的事，下些批評。

我還記得當三月二十日之事發生後，西山會議派高興得了不得，曾發出一個嘉獎蔣同志的電報。以爲看見蔣同志依然繼續聯俄容共政策，方纔復歸於攻擊的態度。不但西山會議派如此，便是其他同志，也未免有些以爲蔣同志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橫豎三月二十日之事已經給聯俄容共政策以一個打擊，何不直截了當拋棄聯俄容共政策，省得以後又醞釀發出無窮糾紛呢。這些說話，完全沒有體察當時的環境。須知道當時一方面正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一方面又拆散了自己的聯合戰線，這是何等的危險。「夾攻中之奮鬥」，是甚麽不是壯語……

然則我於當時，何以不於事後贊同蔣同志之斷然處置呢？我曾說過，假使蔣同志於三月二十日以前，將這辦法，徵我同意，我將怎樣？我還是贊同，和蔣同志一致行動呢，還是拒絕，和蔣同志決裂呢？我不可不嚴格

的自己審問自己一番。國共兩黨之合作，任何一方面，都知道是暫時的局面，不是永久的局面，但一度聯合戰線之後，到何程度，到何時候，方纔拆開，始爲恰當，則人人所見不能一致：所以我此時如果將自己審問自己的話說出來，倒不如將我以後所做出來的事情，來做個證明，較爲適當。我於去年（十六年——註）四月初旬在上海的時候，不是拒絕過蔣同志等「不得中央決議即舉行清黨」的主張嗎？我於去年七月間在武漢不是向中央提議實行分共麼？我於向中央提議之前，先約同非共產之中央委員，開了十幾次的談話會，取得大多數之後，又招集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軍人非軍人都在內，作了種種的說明，及作了種種的準備之後，方纔向中央提議，通過之後，方纔實行。我這樣做法，或者有人以爲「遲慢」，以爲「容易誤事」。但我總以爲應該如此。便是賜我一個「黨紀先生」的頭銜，雖被醜詆，我還是總以爲應該如此。

明白了這一層，就可以知道我於三月二十日以後，所以不能事後贊同蔣同志的獨斷處置的緣故了。中央之沒有權威，由來已久，不獨北京政府如此，就是國民黨所建立的政府，也是如此……而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的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並沒有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第二師團黨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我的責任，應該怎樣？我這時候，以爲不問這事情做得錯不錯，而這件事情做法，不能說是不錯。我只責己而不責人，我以爲我不能盡責所致，所以引咎辭職……（汪集，卷四，六一頁。）

兩種不同的政治性格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先生對於三月二十日事件的反共意義，是並不反對的。他所反對的是假借反共為名而破壞黨紀，破壞中央權威，造成獨斷政治傾向的弊病。不過他一本責己恕人的精神，認為事件的職責，還在他自己，因此宣告辭職赴法。如果我們能想起蔣介石氏在西安事變後對張學良及其本人處置的情形，我們尤可看出這二個人物的不同政治性格。

中山艦事件之後，一部份共黨本想要求先生下令撤蔣氏之職，惟先生雖反對蔣氏的獨斷行為，然對共黨的囂張態度，根本並無好感。結果共黨遂不得不表示妥協讓步，撤退蔣氏第一軍中所有的中共黨代表，而一批俄國顧問也即離開了廣州，中央黨部亦給予全部改組。不過蔣介石氏此時並沒有徹底反共的意思，可證之四月間鮑羅廷重來廣州輔佐蔣氏的事實。這時先生業已宣告辭職。是年四月三十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即在蔣氏主持下舉行。因此，中山艦事變的目的究竟何在，也就不難推知。

五月間先生始自香港重上旅法征程，因其間雖經辭職，惟一因病體未痊，一因待胡漢民氏歸國，俾有所交託，遂遲遲成行。但一經登上旅途，那種為先生所特有的豐富文學感情，便猶似潮湧而至，且看他那時懷着何等樣的感情！

海上

明明天邊月，蕩蕩海上波；白雲與之潔，清風與之和。有如游子心，萬事相選磨；塵想歸已除，塊門仍縈宅。君看衆光微，盤旋成銀河；一羣縱所如，萬里無坎軻。

第八章　從寧漢分裂到寧漢合作

蔣介石掌權的第一步

先生既經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及各項兼職，蔣介石即於同年四月間召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黨務改組及北伐進行事宜。事實業已十分明顯，當時國民黨的三個元老——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現在都已給排擠掉了，廖仲愷已死，先生則被迫出國，而胡漢民雖一度回到廣州，但見形勢不利於己，旋即離粵赴滬。此時蔣氏既握有軍權，也就有了實際的政權，蔣氏為鞏固他的政治地位起見，即繼聯席會議之後召開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各項黨務整理決議案如后：

一、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不得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二、共產黨員不得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三、其他黨員之加入國民黨者，應報告其原來黨籍；四、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五、國民黨推舉代表與共產黨組織聯席會議，將共產黨員之加入國民黨者製成名冊提出於國民黨代表。

在這裏雖然相當表示了蔣氏反共的色彩，不過事實上蔣氏不僅沒有反共，而且接着他還同共產黨成立了一個協定，並設心周到，避免與共黨發生正式分裂。試看下面幾句話：

但他（蔣氏——筆者）接着與共產黨所訂立的協定，在理論上已經避免了分裂的危險。第一，協定中規定，無論共黨或其他任何願與國民黨聯合的黨派，都不准貶視三民主義；共黨應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

張與國民黨聯合的黨員名單，並須隨時報告委員會以新加入的人數等；共產黨員不能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又規定：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早已決定，任何上級委員會或會議內，共黨不得超過總數三分之一；共產黨給黨員的命令，又須在發出之前，送給由五個國民黨員和三個共產黨員所組成的委員會檢查過……（「蔣傳」一〇四頁）

那麼蔣氏當時無意反共是顯然的了，然則以蔣氏特務工作的方式彈壓共產黨，目的又安在？一言以蔽之，是在以制裁共黨爲名而達到攫取政治實權之實。因此在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之後，蔣氏就着手改組中央各部，共黨既不得任中央各部部長，於是中央各部長便悉行換了新人，其名單如下：

一、秘書處：秘書長葉楚傖，書記長取銷。

二、組織部：部長蔣中正，陳果夫代理。

三、宣傳部：部長顧孟餘。

四、青年部：部長丁維汾。

五、工人部：部長胡漢民。

六、農民部：部長甘乃光。

七、婦女部：部長何香凝。

八、商民部：部長王法勤。

此外蔣氏復建議添設一軍人部，即由蔣氏自任部長而以曾擴情爲秘書。這樣佈置以後，蔣氏遂於同年七月九日就任北伐軍總司令。並特地召回鮑羅廷爲顧問。其間用心，誠煞費周到。

生活在法國

然而蔣氏策略的成功，在某種意味說來應該說是西山會議派「聯蔣倒汪」謀略的成功。先生對此會說過這樣幾句話：

民國十四年冬間，統一廣東。十五年春間，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再確定容共政策。當時廣東已經統一了。所謂經過一個發展之後便必有一個風潮發生，西山會議派於是決定聯蔣倒汪的策略了。當時我們二人（指汪蔣——筆者）是一道奮鬥的，他們欲把我們二人開分，所以決定聯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種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蔣同志將來必然明瞭的，故自動辭職離開廣州。」（「汪精衛全集」上冊初集九一——九二頁。）

自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三月，其間十個月的時間，先生在法國安渡着學者的生活。不過對於國事的發展絕不稍弛其注意。他深知出國一舉，實屬事不得已，從責任心的一點言，他且時時引爲歉仄。祇是爲避免政敵的更進一步挑撥離間，不願有所發言而已。

離開以後，許久未和國內同志通消息，因爲知道蔣同志終必明瞭，爲避免一切離間挑撥，所以緘默不發一言。如果大家說兄弟不應該辭職，不應該去國，致黨的裂痕益深，這是兄弟甘受大家責備的！兄弟離開廣州之後，在法國讀書。學生的心情，彼此是一樣的。當七八月的時候，看見法報載中國革命軍的勝利，以爲可以安心讀書，雖則有時看見報上說某同志戰死了，很覺得難過。（引文同前。）

其間，先生曾一度病過，所以除讀書遊歷之外，不問他事。在「羅蒙湖上觀落日」的一詩作中，我們最能看出這一時期的先生心情。詩曰：

澄波萬斛搖朦朧。雲影下激如煙靄。忽從空明生絢爛。玉盤旋轉幻虬珠，凝暉流耀天之闕。淵光溢影想萬殊。紫蜺生潤麗且都。倜如滄海明珊瑚。綠雲隔水柔欲濡。灼如綠波泛芙蕖。飛紅萬點舞遊魚。天英紫鳳紛繁好。布帆粲若雲錦舒。白鷗閃閃成金鳧。是時輕煙淡欲無。霧華豔出如靜姝。胭脂新染凝脂膚。微渦欲動漾紅酥。鏡中眉嫵畫不如。清暉玉色長相娛。中流雙楫何紆徐。天空流靄相吹噓。當惟光景難具摹。幽閨深藏意有餘。蒼然暮色來須臾。洛陽燈火生模糊。疏星缺月良相須。與我攀杖歸蓬廬。

命運的主宰

我們有時也許不免有這樣的幻想，要是先生而生於中國政治清明之世，而能全部發揮其天才於文學生涯的經營，那麼在現代中國的學術界也許將樹立一大異彩。先生在政治生活上平常每以一讀書人自憐，實則中國的政治條件要是能夠容許他永久以一讀書人存在，我們相信以先生的清高性格，對此一定會瞎事慶幸。可是中國需要先生的政治領導，更甚於其私人生活的文學經營，當每次先生覺得有擺脫政治黑暗層的必要而重復度其學者生活時，政治的要求偏偏再三敦促他的領導。真的，就一個政治家的生活言，先生的政治生涯，與大多數的所謂政治家有一個極大的不同點。一般政治家，爲謀得政治上的地位，不惜苦心鬥角小心經營，而先生則把政治上的名利視之爲浮雲輕霧，一再圖加擺脫。要不是爲了顧念國族，我們敢相信先生定必視政治事業爲其生活中的最大桎梏。然而國族的命運卻不得不是先生的命運，就這一點講，先生實不愧爲現代中國的唯一大政治家，而且亦是中國國運的主宰人。從以上各章的客觀敘述中，這一點是任何人都得加以認

先生於民國十五年再度出國外遊，若僅從政治的觀點言，是不能充分解釋的。因爲這時先生業已任過黨國的最高領袖，他既毅然辭謝這樣的地位，顯然表示了他對於政治的功利觀念，早無所留戀。要不是國家對他寄託有最高的要求，要不是他意識到自己對於這種要求應得負起責任，那麼他實無必要牽入於後來一連串的政治糾紛了。可是事實又怎樣呢？當先生方辭職離國，國內馬上爆發了要求先生回國主政的廣大政治運動。「汪主席已允復職」，「汪主席已自法國啟程」的種種傳聞，在當時的報章上面，與北伐的軍事捷報同樣振撼了人心。別有用心者會假托說，當時的這種要求，祇是共產黨一種政治作用，可是事實卻駁斥了這類臆意的揑造。

不可動搖的政治地位

……九十月的時候，病得很利害，不能思想。十二月後，漸漸好了，連接中央及蔣介石同志的電報，催促回來。今年二月間，（指十六年——筆者），蔣同志又來一個電報，說你如果再不回來我也走了！那時心裏才十分難過，不能再讀書，精神與書本子已不能聯在一起了。後來再接一個電報說黨要分裂了，於是兄弟便不能不回來。（汪集，上冊初集，九二頁）

如果說先生在黨與政府中的領導地位，業已隨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艦事件而告消失，那麼上面引文中所提到的幾點事實，就將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因爲當先生在國外的十個月時期，正當蔣介石氏在軍事上完成了北伐的勝利。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各省，在這個時期業已歸入國民黨統治之下，所以若說國民黨的右派份子因「聯蔣倒汪」的口號，已在中山艦事件上獲得了成功，那麼蔣介石氏領北伐

軍事勝利，理應鞏固了這些份子的地位。可是在南京攻陷之後，蔣介石氏本人竟感到在政治上毫無辦法，至不得不喊出「你再不回來我也走了」的絕望呼聲。這足見先生在中國政治上的領導地位，是怎樣的受人推重重視，而這，卻並不是出於先生本人運用任何手腕以得來的。

事實是這樣的，蔣介石氏雖握有當時國民黨的軍事最高指揮權，並且憑其權術政治的手腕，在黨內保有相當的政治地位，但他卻不能勝任領導當時的政府——特別是中共份子操縱下的政府。原來中國共產黨雖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蔣氏表示暫時妥協，惟當他們看到蔣氏對於中共仍有機會主義的態度時，他們就在北伐工作的掩護下，大事擴展他們的活動勢力。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鼎盛時代，不是在北伐之前而是在其後。這一點，蔣介石氏當然明白看到。在先生辭職去國後，蔣氏雖將在廣州的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改組妥當，不過當他看到共黨在北伐進展中的擴展情形，他就不再放心把國民政府與黨的最高機構留在廣州了。

遷都武漢

民國十五年秋，蔣委員長拍電給廣州革命政府，建議將政府遷到武昌去，因為他希望這樣能制止諸如此類的一切糾紛。（指國共糾紛——筆者）政府與國民黨立刻舉行聯席會議，但因某方面的反對，所以一切都議而未決。十月底，蔣委員長派鄧演達和張發奎乘飛機到廣州去催促着政府向華中的遷移，而他們二人的使命是成功了。革命政府派孫科、宋子文、陳友仁、孫宋慶齡和鮑羅廷到漢口去視察國府遷都是否得宜。十一月底，他們到了武昌，並拍電報到廣州說，革命政府應立即移往武昌爲宜。（見著者「蔣傳」一五六頁。）

文中所謂「某方面的反對」，實則就是共產黨。廣州方面當時接得蔣氏遷都建議之後，中央黨部

曾召集過一次「中央各省海外及各特別黨聯席會議，」以討論這一建議。惟共黨及一部分國民黨員，因當時武昌城仍在劉玉春和陳嘉謨的手中，對於遷都武漢之議，表示若即若離的態度，後來武昌攻下，蔣氏乃復派遣鄧演達等親來促迫，並把鮑羅廷先弄到武漢。

然而蔣氏的遷都建議雖被接受，但撤到武漢後的國民政府，卻益發被共黨操縱於手，這對於蔣氏想以遷都而直接駕御政府的企圖，不免是一大打擊。試看當時的情形如何：

依着蔣委員長的願望，一切革命政府的重要人員，在到武昌去時，都須道經南昌，因爲他想給他們指示其重要的問題——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們都到達了蔣委員長那時設着行營的南昌。……一直到十六年三月一日，才到武昌去，而這是很重要的。從十六年的發軔起，共產黨對蔣委員長的計謀開始收到更大的效果，並且更爲公開。……

自此以後，在漢口一般執迷者的瘋狂領導下，國民政府的混亂更完全趨於無邊無際了……（引同上）

寧漢分裂前夜

這段描寫，確是眞相。當時蔣介石是在南昌，他除了用宣言的方式反駁中共的攻擊之外，竟覺得一無辦法。先生接得蔣氏「你如果再不回來，我也走了，」以及「黨要分裂了」的呼籲電報，便就是在這個時期，我們且看下去：

……此後的事情很快地在國民黨員的政治鬪爭中造成了一個轉機。汪精衛在四月三日從國外回到了上海，他立刻和蔣委員長作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議。蔣委員長因爲雙方的意見，似乎並不十分相左，所以便向各軍事長官，國民黨支部，報館和其他團體發出通電，說汪氏對於一切軍事，行政，經濟，和外交的國民黨事務，咸爲

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摘引一六三頁。）

我們在這裏所以不惜一再引用「蔣傳」，無非因爲想儘量做到客觀。在這個時期，蔣是決定預備反共了，然而蔣也曉得能够在政治上負起反共的領導任務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先生。這一事實，從前引的經緯中，是明白可以看得出的。

先生自接得蔣氏及黨各方面的催促電文後，即於十六年三月八日由法赴德，經由俄國返國，到上海是在四月一日。當武漢方面聽得先生回國的消息，他們感到亦急切需要這樣一位領袖。因此於三月十日起在武漢召開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他們選舉了先生爲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並組織部長，一方面並宣佈免除蔣介石總司令的職務。但蔣介石則聲稱除非黨中元老汪精衛，譚延闓，張靜江等同意免除其職務，他仍將繼續執行其職權。這形勢是說，武漢與蔣的分裂，是業已公開化了。

當先生回到國內，看到形勢已經如此嚴重，他就感到接受任何一方的主張，並不能解決問題而祇有使問題愈趨嚴重。因此他首先主張用召開中央全體會議的方式，來合法解決這一嚴重糾紛。黨高於一切，以及紀律爲黨的靈魂二點，是始終爲先生解決黨政問題的不二方針。先生認爲在他完全明瞭真相之前，他應得親自往武漢去跑一趟。蓋至少在法理上武漢仍是當時黨與政府的重心所在。然而他的這種主張與方針，卻爲一部份人所誤解，而引起後來的無數糾紛。現在我一看事實經過。

回到上海的時候是四月一號，那時蔣介石，吳稚暉，蔡子民，李石曾諸位二十多年來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見面了。見面之後，蔣同志等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贊成，一是趕走鮑羅廷，一是分共。從四月一號到五號，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這兩件事。蔣同志等對於這兩件事，很堅決的，以爲必需馬上就做。而兄弟則以爲政策論

係重大，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蔣同志等說道，中央已開過第三次全體會議了，全為共產黨所把持。兄弟說道，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決議來變更舊決議，而且南京已經克復，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可以由武漢遷到南京，第四次全體會議，即可在南京開會，會議怎樣決定，兄弟無不服從，如不由會議決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黨於紛亂崩潰，這是兄弟所不贊成的……（汪集，上冊，初集，九十三頁。）

武漢反共的三階段

這是說，先生的主張，仍着重於黨的組織與紀律。關於反共問題，在原則上先生當然絕對贊成。但容共既為國策方針所決定，反共自得由國策方針以處理。這主張無疑是對的，雖從後來種種的事實看，這種主張會受了頓挫，但卻並不是主張的不對而是因為反對者的阻力橫生。而蔣介石氏便是這一主張的有力反對者。

先生決意自任前往漢口，以討論決定蔣氏等所提議的事件。先生於四月六日下船，事先分致蔣氏及張靜江氏各一信，信中仍建議最好能於四月十五日左右召開中央全體會議，以求解決一切。可是當先生方在途中，蔣氏一方即於十日決定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並於十二日在上海各地舉行清黨了。於是寧漢遂告決裂，武漢的中央黨部亦於十七日以免蔣氏職相報復，一面於十九日誓師繼續北伐。

先生為求解決蔣氏的二項建議而親往武漢，卻不料到了武漢之後，武漢方面的份子反試利用先生的地位以加強他們反蔣的聲勢，這一點確未曾為先生意料所及。不過當時先生縱在左右夾攻之中，仍

不息進行其反共奮鬥。而且正唯因爲他在武漢親眼看到了共黨叛亂的實情，武漢方面的反共工作，亦就做得愈有計劃，愈徹底。

武漢分共的經過，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個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說服共產黨徒遵守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階段是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同上九十六頁。）

先生這種漸進的，徹底的做法，當時曾引起許多責難和誤會。尤其因爲先生在離滬赴漢之前，曾和陳獨秀聯名發表過一篇關務的宣言，於是對於先生的武漢行，更引起了紛紛的猜測。實則關於這篇宣言，是有着這樣一段經過的。

原來在先生方到上海的最初三天中，黨中要人吳稚暉，蔡孑民，李石曾等，因聽說共產黨已預備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圖指使工人在租界發起暴動，以引起國民黨的外交糾紛。他們便將這消息轉告先生，先生立卽向陳獨秀提出質問，結果陳獨秀遂親筆起草了一篇宣言，以表明態度。事實上與先生的反共決意，是並無關係的。有之者，祇是武漢方面的中共份子，欲假先生的名義以淆亂視聽而已，而這也本是中共的一貫手段。

共黨陰謀的發見

然則，武漢方面的分共行動何以較南京爲遲？第一，在先生抵達武漢之前，該處的局面已完全操縱在共黨手裏。馬上實行反共，爲事勢所不許。因在四月十九日誓師北伐之後，軍事的活動業已在前線展開。第四方面的主力軍如張發奎所統率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唐生智所統率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六

軍，已在滬京漢路與張作霖的軍隊作戰。更有一點，就在這些軍隊裏面，也混有不少共黨份子在內，是故此時後方發動反共，必致影響前線的戰事。

所以武漢方面的反共工作，這時纔得先從制裁共黨的活動着手。然至五月下旬，湖南長沙終於爆發了反共風潮，而至六月一日，共黨對於國民黨的重大陰謀，也跟着給先生發見了。

及至六月一日，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說「莫斯科曾有一種決議案，給我與鮑羅廷的，鮑羅廷有給你看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看。」他於是把那決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兄弟看過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前引九八頁。）

第三國際給鮑羅廷和羅易的決議案，包括下列幾點要點：第一點是要求土地革命不由國民政府以法令付諸實施，而由下層自行實行沒收土地：這是因爲當時的農民運動業已操在共黨手中。第二點不主張沒收士官兵士的土地，爲的是避免兵士的反對。第三點要求改組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增加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所謂農工領袖，實則就是增加共產黨員進去。第四點是要求武裝二萬共產黨員與五萬工農份子，以之爲共黨的武力。第五點要求國民黨組織革命法庭，以之裁判反共產主義的軍人，這也無異挑撥國民黨的內部殘殺。

反共問題的軍事考慮

武漢分共的工作，這時纔然到了一個決定的階段，而這時第四方面的北伐軍，恰好在河南打敗了張作霖，收復了黃河以南，先生遂於六月六日親赴鄭州，商量第四方面軍班師武漢的事宜，在這裏當

擬已懷有武力制裁共黨的準備用意了。

但武漢方面的反共時機雖已成熟，不過在種種考慮上尚不能操之過激。其間最大原因，厥在寧漢對立之後，武漢方面的北伐軍機構中，容有不少中共份子在。如唐生智第八軍中的總政治部主任彭澤湘，副主任兼秘書長張其雄，即是當時著名的共黨，而其嫡系之三十五，三十六兩軍中，尤多共產份子。尤其張發奎當時所統率的第四方面軍，幾乎一大部份操在共黨的手中。我們爲求瞭解當時武漢方面的反共困難，妥將張發奎所統率三軍九師，作一考索：

總指揮部總指揮張發奎

俄顧問特羅

參謀長謝嬰白

秘書長高語罕

政治部主任郭沫若

警衛團團長盧德銘

炮兵營　第一營長羅某　第二營長王某

憲兵營　第一營長李某　第二營長廖某

第四軍長王琪翔　政治部主任廖乾吾

第十二師師長繆培南

第二十一師師長富雙英（華軍改編）

第二十五師師長李蘊魂

第十一軍軍長朱暉日　政治部主任徐名鴻

第十師師長蔡廷楷

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

第二十六師師長許志銳

第二十軍軍長賀龍　政治部主任周逸羣

第一師師長賀錦齋

第二師師長秦光遠

第三師師長周逸羣（原教導團改編）

在這所轄的三軍九師中，賀龍的二十軍，不用說是完全是共黨的武裝隊伍。在十一軍中，二十四師師長葉挺是共黨。蔡廷楷的第十師，三個團長倒有二個是共黨（三十團團長范儘，二十九團團長彭銘。）在九個營長中，四個營長是共黨。許志銳的二十六師，共黨雖較少，但七十七團的團長許繼愼是共黨，三個營長與六個連長也是。在第四軍中，繆培南的十二師，三個團長中也有二個是共黨，即三十四團的趙某，三十五團的楊秉權。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的團長周士第，也是CP份子。就連總指揮部直屬衛團長盧德銘，炮兵營第二營，憲兵營第一營的營長等都是共黨。其他下層政治工作人員

則共黨先居其間，更不待言。

「夾攻中的奮鬥」

當時南京方面的吳稚暉，對於先生的清共工作步驟，曾深肆毀謗，然而在先生這一面，則不得不有實際情勢的考慮。所以先生當時雖知道反共事在必行，但必得採取穩妥的步驟。是故六月十三日先生自前方接洽班師回來之後，即一面召集中央黨部非共黨的份子，商討分共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黨的武裝同志，告以決議內容，並囑在軍隊中嚴加防範。此時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已聞風先走。蔣先生之意，當時仍擬以合法的手段消除共黨。故至七月十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在一個月內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討論決定分共問題。但不料數日後由上業已發見了共產黨決議撤退國民黨中共黨黨員的宣言傳單，一面卻主張共產黨員仍得加入國民黨，其破壞國民黨的決意顯然可見。

至此中央黨部遂即訓令國民政府充確共產黨人一律退出國民黨，同時復訓令軍事委員會命令國民革命軍各部隊長官，將共產黨員一律開職。這時共黨方面知道已經計無可施，在七月下旬，張發奎部下的一部份共黨軍隊，開到江西，後來就造成了八一南昌暴動事件。關於其間的全盤經緯，在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先生所發表的「夾攻中之奮鬥」一文中，曾發揮詳盡，茲摘引如下。

我們正在爲國民革命而奮鬥的當中，我們的隊伍裏，忽然發生了裂痕了，共產黨發表了所謂中央委員會七月十三日對時局宣言，退出國民政府了，我們的隊伍裏，忽然消失了一部份了。

幾個月來，我們和反革命者奮鬥，以抵制帝國主義者之經濟的封鎖，軍閥之武力的壓迫，以及反革命者之挑撥

乘隙無所不至，當然使我們遇着了無數的困難，與無數的障礙，我們有許多想做的事，與希望着，做不到手，有許多我們所不願見的現象，擺在面前，揮不開去，因此引起了一般人無窮的失望，與無窮的怨恨，我們一方面要用十二分勇氣，來戰勝這些困難與障礙，同時一方面還是要用十二分勇氣，來忍受這些失望與怨恨。（中略。）

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這是總理的政策，我們因為篤信謹守，曾經與違背這政策的人，實行決裂，無論他們在黨裏有如何的關係，和我們曾經如何同生死共患難，我們因為他們違背總理政策，便毫無疑義的，和他們實行決裂。如今放棄總理政策的，不出於他人，而出於共產黨了。有人很担心的對我們說，「你們未免太孤了。」我們不孤，我們有總理的遺訓，擺在我們的前面，猶如大海茫茫狂風駭浪之中，一個放出光明的燈塔，我們要忠實而勇敢的，繼續奮鬥，繼續向前進。

「錯誤與糾正」

我們應得承認，先生這時反共的意思雖已十分堅決，但其態度還是比較溫和的，譬如先生後來在另方面說過的，「夾攻中的奮鬥」，是「苦語不是狂語」。對於國事懷着真正關切的人，誰不希望革命力量的堅固團結。先生不辭一切反對而毅然前往武漢，担任調停任務，即就秉乎這樣的用心。當他到了武漢之後，雖看到分裂的形勢已屬不可避免，而造成這形勢的雖不是他，但他仍圖努力奮鬥，以挽救最後危機於一髮。若單就結果看，先生此行的使命似乎是失敗的，然其為國事的勞心焦力與其一片誠心，終不得不令人肅然敬佩。而先生所以在反共問題上採取迂迴作戰的方式，第一是為顧全現

體，第二是爲的維持黨的紀律。南京的反共最初所以不得不生衝突，就是因爲南京的行爲，目的雖對，却是出於破壞黨紀方式的。

武漢方面於七月十五日宣佈舉行清黨之後，先生旋即負中央任務來到江西。七月廿九日開反共會議於牯嶺，出席者除先生之外，有孫科，唐生智，張發奎，黃琪翔，朱培德等人，先生並下令通緝惲代英高語罕等多人，封閉九江市黨部，九江書店，九江國民新聞報等，當時業已開入江西的共黨軍部賀龍與葉挺，見反共形勢已日趨激烈，竟於七月卅一日在南昌舉行暴動，以圖先下手爲强，但亂事旋即爲張發奎軍隊所平定。而經此事變，先生反共的意志，遂亦愈趨堅決。至八月六日，先生遂即發表了一篇「錯誤與糾正」的宣言，中間曾這樣說：

我們有錯誤沒有呢？唯，有的。

我們最大的錯誤，是誤解了總理的容共政策。（中略）

現在共產黨已經在南昌公然與本黨宣戰了，公然破壞國民革命了，公然從國民革命軍中劉取一部份以去了。於此之時，本黨員如果還有蒙着面皮替共產黨迴護的，這人便是本黨的叛徒，我們如今不是引咎的時候，是補過的時候。

人的知識，是有限的，而革命是無前例的，只有有限的知識，而幹無前例的事，如何能不有錯誤，所難得的，發見錯誤，立刻糾正。

我們不能飾非文過，瞞着良心說硬話，我們只有悲痛，我們只有加緊工作，我們唯一糾正錯誤的方法，是先補過，後引咎。（汪集，上冊，初集，三五——三六頁。）

寧漢合作經過

先生既發表此坦白宣言，馬上被南京方面熱烈接受了，八月八日，南京方面遂即建議寧漢修好，由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蔣中正，胡漢民，李烈鈞，鈕永健，蔡元培，李煜瀛等聯名發表「齊電」。十日先生會同譚延闓，程潛，孫科，陳公博，唐生智，顧孟餘等發表了「蒸電」，實現所謂寧漢合作。然而在蒸電發出二日之後，南京的蔣介石忽然發表辭職宣言，離寧赴滬轉返奉化，旋赴日本，因此自寧漢合作而又爆發了新的裂痕。我們在瞭解其間經緯之前，應該將事情的經由大概敍述一下。

我們已說過，先生於四月初親往武漢，事先原爲蔣介石所反對。蓋當時先生之意，反共及其他政治問題，應召開四中全會商討執行。當南京於四月十二日先行發動反共之後，武漢政府即於十七日宣布蔣氏免職，而蔣介石却於翌日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並推選先生，古應芬，伍朝樞，蔣介石，楊樹莊，蔣作賓，鄧澤如，朱子文諸人爲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並有組織特別委員會以替代中央黨部職權之議。在蔣氏之意，無非欲以造成既成事實以待武漢方面的遷就。然而在先生一面，雖對反共措置認宜遷就既成事實，惟一方面爲顧全黨的紀律與政府的體統，始終堅持召開四中全會，尤其堅主恢復中央黨部職權，如其在蒸電中有謂「祇使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能開，則不但個人責任問題，卽機關改組問題，亦可於此解決。此方爲正當解決，亦根本解決也。」

南京方面既接受蔣電，蔣氏自覺責任攸關，當不能不出引退的一途。而與蔣氏聯名齊電的胡漢民，吳敬恒，蔡元培，李煜瀛等，亦先後離去。然而先生在這個時候，却認為應該「先補過，後引咎」，故於八月二十日偕顧孟餘，于右任，孫科，顧孟餘，唐生智等自武漢出發赴九江，到後會見朱益之，陳公博，程頌雲諸人。廿二日李宗仁由南京趕到相迎，先生抵京後，即秉其一貫主張，對寧漢合作與黨的使命提出如下幾點意見：

甯漢兩方同志的合作，還其間，絕無所謂個人意氣之爭，站在黨國的前頭，個人是不成問題的，況且如今兩方面同志間，方互相非咎之不暇，何從有意氣之爲呢？還有一點，必須聲明的，即兩方同志同應該知道引咎，尤其應該知道補過。

中央黨部和政府問題，所關甚大。如今第四中央全體會議開會在即，則一切取決於此會議。兩方同志，惟有一致促此會議之成立，及擁護此會議之決議，以解決一切糾紛，而奠定黨的根本，使分裂之局，歸於完整這樣則對於提高黨權的見解，兩方同志，也可以歸於一致了。（前引四二——四三頁。）

完成使命再度出國

後者的主張當爲先生一貫的意見，而前者一點的聲明，無疑是針對着一般隨蔣氏離寧的同志說的。先生抵京之後，曾一再聲明當務之急爲黨內的團結，故曾派遣顧組安與孫科赴滬折衝。然而先生的建議，却不幸未爲接受，蔣方堅決主張成立特別委員會以代中央職務。先生爲顧全事實，曾不惜徵引中[illegible]，贊成特別委員會的存立，但決不贊成特別委員會作超越中央黨部的存在。這是一點爭

執不下的問題。其次，在先生抵京後，中央本已決定於九月十五日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解決一切，惟事先的談話既不得要領，先生便於十二日提出自劾，離滬轉道武漢。

中山艦事件是西山會議派從中撥弄的結果，現在寧漢合作的再分裂，西山會議派的存在殆爲是一大要素。緣西山會議派爲達到直接參政權的目的起見，對於成立特別委員會一事，贊助異常熱烈，甚至不惜提出「反特別委員會就是反革命」的口號，而先生却指特別委員會就是反革命。他在回到武漢後在武漢政治分會的演講中，尤其強調黨的組織與紀律問題。然則先生有沒有放棄謀求寧漢真正團結的心理？並沒有。先生再度回到漢口，目的正在謀求真正團結的實現。九月二十一日先生再返漢口之後，旋即返廬山舊寓，在人事百忙之中，他的詩情却仍未減。在廬山小作休憩之中，也還有過這樣的詩作：

廬山望月得一絕句

兩山缺處某遙峯。雲霧含暉色萬重。玉宇瓊樓原在望。只須身入白雲中。

至十月初，南京方面又來電要求先生調停寧漢間的爭執，但談判方有進步，又因寧方主張取消武漢政治分會的問題，復爆發了唐生智出兵東征的不幸事件。先生鑒於奔走調停不果，即行離漢赴粵，預備作再接再厲的鬥爭。並敦請蔣氏隨其返國，於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再由粵赴滬，十二月二日在蔣氏私邸舉行預備會議，決定在南京正式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然熟料十二月十一日廣州發生了共黨變亂，先生方從廣州來，遂被其政敵執爲攻訐藉口，於是爲表白心跡起見，再度出國赴法。在這不斷

一年之中，先生奔走寧漢，領導反共，他不問個人的得失，致力國事的經營，終於完成了寧漢合作與反共的最大目的。先生此行返國，本是應邀中央的召喚，他的主張雖未獲實現，然而黨所寄託於他的使命，他並沒有辱命。惟這不到一年間的經過，反映及於先生的心境，總不免使他有這樣的感懷：

倚欄惟見水無堤，天與孤篷一線分。滄海濃波搖碧霧，沈沈暝色暗連雲。佳兵似火終難戢，止亂如絲轉益棼。獨撫風濤作孤憤，夢回猶認故山聞。（舟中感懷。）

第九章　兩次粵變的內情

通電二則

先生自民國十六年四月應政府之召返國，奔走寧漢滬粵各地，調停黨內衝突，至同年十二月而又復出國。一般都認爲先生十六年冬的再度出國，係二次粵變所促成。實則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蓋自牯嶺會議後，若照先生召開第四次中執會並恢復中央黨部的建議，則一切問題本可迎刃而解。但不料寧方在接受武漢合作之後，由蔣氏辭職開端，寧方要員均先後離寧他去，在九月九日的上海會議中，如蔣介石，吳稚暉，胡漢民，何應欽等，均不出席參加。此顯係表示寧方對於合作一事，根本沒有誠意。

惟先生此時始終認定補過重於引咎，因此不惜躬親赴滬，主持寧漢滬三方聯席會議。但大會中雖決定九月十五日召開四中全會，惟仍不放棄特別委員會之建議。如前章所述，關於特別委員會之組織，此時先生雖有顧全事實的考慮，願予接受，但對特別委員會超中央黨部之存在一點，則始終表示異議。因此在十二日會議後，先生鑒於調停已無可爲，遂決定自劾辭職，並發表通電二則如下：

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兆銘前因賀龍葉挺叛變南昌，自疚對於共產黨徒，防制過遲，致成此變，久思自劾以謝同志。因時局未定，應先補過，不宜遽爾卸責，故隱忍至今。今寧方同志，共圖維護，俾幾破碎之局，可歸於完整。正宜及時引退，藉候處分。敬祈嚴加制裁，以明責任，不勝企禱。汪兆銘元。（九月十三日）

其致各同志電謂：

各同志均鑒：此次寧漢同志合作，係根據於南京同志八月八日之來電及武漢同志八月十日之覆電。南京同志自承鹵莽從事，過舉極多。武漢同志自承對於共黨防制過遲，至深內疚。兩方同志各本責己恕人之精神，以策最善補苴之方法。其唯一目的，在使破碎之局，歸於完整。兆銘前次雖負疚而不引退，即期與諸同志一致努力達此目的。至於今日兆銘認為引退之時機已至。除呈請中央聽候處分外，謹此奉聞。汪兆銘元。（九月十三日）

黨員的責任

先生既告辭職，即返九江牯嶺私宅小住。他懷着「出門心惴慄，跬步畏陷阱」的心理，亦不願再去過問世事的混亂局面。但武漢方面的同志，對於此次寧漢合作的寧方態度，殊不瞭解，乃邀請先生赴武漢說明經過。先生至武漢後，旋即在武漢政治分會席上發表「寧漢合作之經過」演詞，不久仍回至九江。但這時寧方忽有廢止武漢政分會之舉，並下令討伐唐生智。在寧方認為武漢政治分會的設立，有與南京特別委員會對立之意，實則該會已早先奉命成立。現在寧漢既再告分裂，各方遂復催促先生再加調停。原來在這個時候，南京方面雖已成立特別委員會，但中樞的主持人物，幾部全數跑光。蔣介石尚未返國，胡漢民托病不出，而先生則又宣布辭職。在這種情況下，先生的再被各方促駕出山，自是當然的結果。蓋此時先生雖已辭職，但南京的特別委員會，仍推選先生為國府委員，軍委會主席團委員，中央黨部組織部長辭職。尤以武漢方面，要求先生復職的呼聲最高，武裝份子如三十

六軍軍長何健，第四第十一軍總指揮黃琪翔等，均紛紛致電先生呼籲復職。在各方的敦促下，先生遂於九月廿五日發表經電，聲明願以黨員資格，出加調停，其原電如下：

各報館鈞鑒：兆銘元（十二日）提出辭職後，遍接各方同志函電，以繼續努力相督責，無任感悚。竊維兆銘職務雖已解除，黨員責任未敢放棄。此時各方同志正謀團結一致，以完成國民革命建設三民主義之國家，兆銘何敢不自勉勵以從諸同志之後。謹當以黨員資格，奔走各方，以期稍盡綿薄。恕未一一華覆。汪兆銘經（九月廿五日）。

但這時調停寧漢實已絕望，蓋此時唐生智的軍隊已自九江而下安慶，與南京方面李白桂軍發生接觸了，而同時廣州方面適致電先生返粵主持政事，故上引的經電，實際上可說是答覆廣州方面的。在同日致黃琪翔的電文中，尤可看出這一點：

韶關廣州探送黃代總指揮琪翔同志勛鑒：巢電敬悉。弟於文日辭職後，歸隱山室，閉戶讀書。此兄陸遊學之地，亦即最近七月抄同與兄及向華輝日諸兄會此防制賀蔡篡變之場所也。曾幾何時，虎兕出押，為患未已，興念及此，可勝欷心。幸吾兄已率大軍凱旋故鄉，得此肅清餘孽，鎮安海疆，已無顧慮。大軍將士自去秋北伐以來，身經百戰，黃河以南，遍灑精神熱烈之血汗。稍假時日，休息整頓，必能以最後之努力，完成國民革命之工作。引領南望，不勝懸依，弟雖解除政府職務，而黨員責任猶在。重荷督促，焉敢退避，謹當以黨員資格奔走各方。際此各方同志團結一致合作之時，或能盡其一得之愚，為指臂之助。日前曾於武漢一行。如諸兄有所指令，當趕前候命，并一省故鄉也。汪兆銘哿。

十一月初，先生在黨內一片擁護汪主席的呼聲中，回到廣州任廣州政分會主席職。此時第二方面軍及張發奎之第四第十一軍，亦均凱旋班師，一致對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組織表示不滿，而有護黨運動的發起。護黨之目的何在，一言以蔽之，仍在先生之始終主張提高黨權，維護黨紀。緣四中全會之始終未見召開，以及南京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已使黨的存在瀕於末路。此種情勢若予存在，黨最後必宜告解體。故先生對於南京四月之暴動可以諒解，對武漢的反共過遲願請候處分，惟對黨體與黨紀的維持，則始終抱持堅決態度。

因特別委員會之產生，首先使寧方內部發生蔣氏一派與李白一派之對立，繼而釀成寧漢戰爭後，復引起第一次的粵變。現在我們且一看寧漢戰爭的原因。

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全國同志，一致反對，不獨武漢爲然。惟武漢政分會之强硬態度，實足爲全國同志之聲援，而亦爲南京特別委員會所深忌者也。於是南京特別委員會乃不得不從心積慮，以謀攻擊武漢。論者不察，乃謂武漢之戰，由唐生智進兵安慶蕪湖逼迫南京所激而成，吳稚暉於所作「贊否」中尤快心言之，此實與當時事實相反。寧漢合作以前，寧方軍隊，標榜西征，漢方軍隊，標榜東征，皆已見之事實。自八月間徐州失守，孫傳芳窺直逼南京，寧方軍隊，應接不暇，已無復西征之聲勢。八月廿三日，李宗仁至九江，與唐及譚延闓、朱培德、唐生智、程潛諸同志相晤，其所表示，願寧漢方軍隊，不復東進，俾寧方軍隊，得專心應付孫傳芳而已。其時唐軍仍在東進，其爲當然。既已合作，則寧共同撤隊，而朱同志則慮及東進結果，必影響寧方軍隊之疑慮，故東進與否，成爲當時考慮之問題。遂決議先由譚延闓探詢李宗仁南下，示寧方軍隊以誠信。至於東進與否，則視此後情勢，再議以爲決定。譚部抵南京後，孫傳芳軍隊方渡江猛攻南京，其勢甚危。

獨孫乃速電催兵東進，而朱爲志在此，亦不復興議。唐程乃各軍所部，張譚孫來電所示，東進赴援（中略）。至於孫傳芳軍中宣傳，謂唐生智與敵聯合作云云，此乃敵方反間之常技，據以爲信，雖愚者亦不出此，無待辯也。

孫傳芳渡江軍隊既已撲滅，而唐生智程潛所部，已陸續開至蕪湖宣城一帶。此在唐程，方以爲所部當可於全盤計劃所定之後，加入前線反攻，不知李白覩之，則以爲前者望其相救，今者轉思爲相逼也。假使當時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能在南京開成，則黨有中樞，一切權力皆屬於黨，一切軍事行動，皆取決於黨，此等枝節不成問題。無如當時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被阻，南京爲特別委員會所盤據，武漢政治分會方起糾正，勢成對峙。不先解決黨的問題，則軍事問題無從解決。（汪集，上册，物集一四二——四六。）

救黨主張廣大擁護

其所論肯綮，殊無批評餘地。國民黨既以黨的力量推翻滿清於前，復以黨的力量發動北伐於後，則黨之權威應如何重視，自不待言。但軍閥跋扈，黨權旁落，終至種種紛爭無以避免，這實在是國民黨的不幸，是中國的不幸。

先生至廣東發動護黨，唯一目的，還在謀黨權的恢復。先生此時常主張對於黨內任何派別，均可不究既往，容納其個人，但決不承認其組織，即使容許特別委員會的存在，但其性質亦祇限於政治委員會，俟謀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之後再作合理解決。無奈在李白主持下的當時寧方，憑藉武力，竟不加接受，而貿然發動討唐戰爭。

先生既至廣州，遂發表其個人意見謂：「兄弟此次回粵，其唯一目的係在提高黨權。自當治

關係孫總理的遺訓，故舉凡無論勢力怎樣大，也要在黨領導之下。現在南京組織非法特別委員會，中央黨部也要推倒，民衆痛苦均無法解決，建設方面更毫無整理。故我們應該一致去推倒特別委員會，在粵恢復第四屆中央全體執監聯席會議，繼續革命精神。」當時在先生號召下起而擁護的一時有何香凝，顧孟餘，王法勤，潘雲超，王樂平，陳樹人，甘乃光，李綺林，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諸人。

在何香凝的擁汪宣言中，當時曾特別調强說：「汪主席這次回粵，最重要的任務是指示我們作救黨運動。因爲我們中國國民黨，目前已陷於危亡的地位了，所以黨的一切糾紛，都無從解決。一切進行都形成了停頓狀態，因此影響於革命前途，殊非淺鮮。汪主席是總理的忠實信徒，他不忍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亡於新軍閥與西山會議派之手，毅然決然回到廣東來提出了『恢復中央黨部』，『在粵召開第四次執監委會』的口號。因爲中央黨部是本黨的最高機關。中央黨部一日不恢復，就是一日沒有黨。開第四次執監會，是解決一切糾紛的唯一辦法，四次執監會不能召開，就是一切糾紛不能解決。所以這個救黨的主張，是應該一致起來擁護而促其實現的。」

先生的主張既得廣大擁護，南京的特別委員會便覺得站立不住。蓋此時汪蔣胡三個政府台柱，都離開了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已失掉了指導的中心。故先生登高一呼，各方遂羣相響應。此時方逗留於日本的蔣介石，亦致書先生，表示贊成恢復中央執委會並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的主張，並敦促先生赴滬商討一切。在蔣氏建議之前，南京方面亦曾向廣州有過妥協的表示，惟主張第四次中執會應在南京召開。當時廣州方面即提出折衷辦法，主張在正式會議召集之前，在上海先成立一預備會議，再事決定地點。惟寧方堅持南京開會，妥協不果。及至蔣氏亦贊成在上海先開預備會議，局勢遂愈趨

直下。

南京方面的宣傳攻勢

廣州中委經累開會議數次討論結果，決定推選先生與粵省主席李濟深赴滬，並令張發奎隨行，同時決定三項條件，爲討論的基礎：（一）取消南京特別委員會，（二）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三）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委員會議。這顯然仍舊代表先生的一貫主張。

先生於十一月十八日到上海，但在十七日卻已爆發了廣州的第一次事變。這顯因是李濟深雖隨同先生同到上海，但代八路軍總指揮的黃紹雄卻依舊留在廣州，而李黃二人是支持南京特別委員會的，反之，新近班師返粵的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黃琪翔，都是堅決的反特別委員會者。彼此衝突的情勢，即在先生在廣州期內，亦已十分明顯。故當廣州中委決議推舉先生赴滬時，同時亦復派遣李濟深與張發奎同往，以免彼此留在廣州引起衝突。但不料張發奎雖至香港，忽於十六日中途折返廣州，於是當時的反對派，即藉故製造濫言攻擊先生，謂第一次的廣州事變，是先生預先「騙走」李濟深，而令張發奎發動的預定計劃。更有甚者，竟謂係出於勾結共黨所謀。譬如當時上海報紙，就有那此做作的記載：

張黃此次謀叛廣州，背後完全爲蘇俄所主動，記者早已言之。汪精衛赴滬，表面爲促進第四次會議，實則因蘇俄接濟餉械尚未運到，而內部因有從命關派之分，亦未一致，故不能不假四次會議之招牌，以緩和各方，使民黨咸注視於四次會議，而不暇計及衛計也。最近蘇俄所派來之指導員宵克夫斯等，已於日前秘密抵粵，

駕東山假領事館。（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新聞報」。）

實際上這不外是南京方面爲强調其在談判中的力量起見，所發動的宣傳攻勢罷了。如後來吳稚暉當頭陣所一連發表的幾篇妙文，以及李濟深，陳可鈺，廖百芳，徐謙，張人傑等的「談話」「彈劾」等，要不過幫着宣傳攻勢而已。事實上南京這種戰略實鑄成了大錯，因爲當雙方既謀合作，聚誦談判，所需要的是誠意宣傳攻勢祇足引起更多糾紛，而決不能幫助問題的解決，例如像吳稚暉的「讀了汪先生『分共前後』的發言」，東拉西扯，祇管舊事重提，反放開了當前的問題於不談。此類文章，雖足引起一時社會興奮，要亦無補實際問題。第一次粵變的內容究竟怎樣，最好還是用事實來說明。

第一次粵變的內幕

第一次粵變發生後，在廣州的何香凝等卽電告先生，報告事實的經過，所電如下：

汪精衛先生鈞鑒：黃紹雄企圖延長非法特別委員會的聲明，陰阻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擅調七軍集中西北兩江，又復挑撥粵中部隊自相猜忌。中央在粵同志，事前迭接報告，深恐黃紹雄此等舉動，足以助長特委，危害中央，破壞革命，延長私鬥。臨時軍事委員會諸委員以時機迫切，爰於篠（十七日）日舉行護黨運動，分別解散反側部隊。中央在粵同志僉認此舉爲當然處置，除一致承認并懇呈第四次執監全體大會加責糾雄以處分外，謹先奉聞。何香凝、顧孟餘、王法勤、甘乃光、陳樹人、王樂平、李福林、潘雲超巧（十八日）叩。

這一則電報，也許祇是一面之詞。惟中心問題之爲南京特別委員會的存在，乃爲無可疑問者。如果此時先生尚在廣州，雖反對特別委員會，亦不致引起武裝衝突。先生對事變的本身，曾概括其原因

謂：「李濟深黃紹雄之與李宗仁白崇禧，一致行動，人所共知。張發奎在武漢時，曾與唐生智不協，然其反對特別委員會之決心，則正相同。唐既不容於李白，則張亦必不容於李黃，此為十一月十七日廣州事件之原因。」（汪集，上冊，初集一五二頁）又在事件發生後向上海新聞界發表談話謂：「現在廣州事變之由起，依照兄弟觀察，不是由於對共產黨問題，乃是由於對特別委員會問題。於此有須說明者，現在廣州之中央執監委員，如陳公博等，與武裝同志如張發奎黃琪翔等，其對特別委員會之態度，與兄弟有些不同。兄弟主張和平補救，而他們則主張激烈反對。」

事實的雄辯

於此可見當時一切歪曲攻擊，是完全無根據的。至少先生這次到上海的任務，就是其反對派也不得不承認是完成了的。

……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在上海召集，十二月三日開幕。激烈地爭辯了一番，大有使國民黨重新受到分裂的威脅，但是，在十二月十日蔣委員長被任命為最高的領導領袖，並且這個建議，全體一致通過了。實際上，這次任命是由於汪精衛堅持而得成功的。他同蔣委員長和解了，並且一道重新合作起來；蔣委員長努力使老同志和左派領袖和解，是得到一些結果的，但在實際上，他想把右派同志的敵對的態度壓服下去的願望，顯然是失敗了。（董著「蔣傳」二三〇頁。）

事情非常明顯，先生既要他的主張得以貫徹，則不論受何攻擊，毀謗，他都在所不計。他排斥萬難，先把蔣介石氏恢復於最高的領導地位，藉以消除黨混爭的局面。他說：

……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上海開預備會議之際，法定人數已足，其不能赴南京開正式會議者，以李白諸人憑藉武力，盤據南京，為之障礙也。為排除此等障礙，乃不能不有「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并負責籌備在南京開正式會議」之提議……至於弟個人，以主張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故，備受反對者之攻擊。夫反對者之攻擊，初非弟之所畏，然李白李黃諸人暨吳張蔡李諸人，自去年四月以來，皆在南京與蔣同志隱釋舊嫌，今以蔣同志亦主張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故，對於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已不復反對，惟以蔣同志不與弟合作為條件。夫苟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能開，弟死且不恤，何有於引退……（汪集，上冊，初集一五五——一五六。）

在這兩兩對照之下，先生之人格如何，其為黨國的鬥爭精神如何，其個人犧牲的精神又如何，都是不必發言的。因第一次粵變留有廣暴之亂，以及後來反對派的囂張，要均為粵變後反動情勢所必然引起的結果。初與先生的努力奔走宣游無關。

廣暴事件的見解

十二月十一日的廣暴事件，一般說來，雖是第一次粵變事件的後果，因此時張發奎與黃紹雄相持於東西兩江，廣州市內駐兵單薄，故引起共黨發難的機會。但蔣介石氏復職後立即封閉蘇俄領館，並加緊反共，也是促使共黨急不待緩發動暴動的動機。總之，當時共黨「立三路線」的暴動政策，是廣暴事件的根本原因，而張黃的衝突，提供了一個絕好行動的機會。如果因廣暴教訓，國民黨能立即終止其內部糾紛而集中全力消滅共黨，則或許不至釀成後來一連串的共禍。可惜的是，無論自南京方面或廣州方面，當時竟把十二月十一日的廣州暴動事件，當做一件爭政的工具，而在客觀上掩飾了廣暴

事件的真相，使上海擴大會議業已完成的合作情勢，再種下了分裂的禍因。

先生對於第二次廣州事件的看法，是這樣的：

> 賀龍葉挺的軍隊，在廣東東江一帶，被擊敗之後，還有些零星殘部，原不難將他根本消滅的。但是因張發奎所部回到廣州之後，駐守東江的陳濟棠所部，和他們成了對抗的形勢。十一月十七日之後，對抗的形勢，更加嚴重。陳濟棠所以要對抗張發奎，自然不肯分割兵力去剿滅賀葉殘部。張發奎如果派遣軍隊去東江，在陳濟棠看來，無異前來挑戰，如何能原諒他們。為了這種對抗形勢，卻便宜了賀葉，得了死灰復燃的機會。（下略）

當時有人指責先生是為張發奎黃琪翔辯護，因為他們二人在第一次粵變後即被目為是共黨，現在共黨發動廣暴之後，自然更給一口咬定無疑了。因此先生所言的雖是事實真相，卻為這輩人引用做了人身攻擊的藉口。那位無政府主義者的吳稚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後來剿滅廣州共禍的，不是別人而是張發奎。

兩件大事

然則此輩人借故攻擊先生的目的又何在？這在先生答復吳稚暉的「兩件大事」中，是明白可以看出的。

> 反共是一件大事，恢復中央黨部也是一件大事，兩件大事都應該鄭重的做去。我和吳稚暉先生見解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把反共一件大事看得重而反把反特委一件大事看得輕。須知道如果祇是反共便算了事，那麼張作霖也是反共的，陳羣們也是反共的，我們和他們有甚麼分別。因為我們是為要實行三民主義而反共，我們是為

要擁護國民政府而反共。我們所以要擁護國民黨，因為國民黨要實行三民主義的，我們所以要實行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是適合中國國民之需要，能解放中國國民之痛苦的。我們既然要擁護國民黨，則不能不主張恢復國民政府中央機關，這如何不是一件大事。

當時吳稚暉指責先生「不應藉憑為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的機會，」先生以上的反駁，無疑是抓住了問題的中心。因為要不是因特別委員會非法存在的引起的一連串糾紛，張黃在廣州不致兵戎相見，共黨也就少了一個暴動的機會，雖說共黨暴動的陰謀是早已決定了的。可是吳稚暉一輩人，利用刺刀背景的力量，竟圖硬牽羅織先生的罪名，莫怪當時先生要憤慨說：「你係使着幾個總指揮的勢力，逼着我不住的打，定要將我打入共產黨隊裏去，也打得太苦了，可是我一個人雖會病死，但我的主張並沒有病，並不會死，大多數忠實同志並沒有病，並不會死。」（「兩件大事」。）

但先生終於自動引退了，這倒並不是因為受人誣衊而感到灰心。「我向來不怕人汚蔑的。我以為汚蔑我的，無損於我之人格，徒有損於他之人格。我之引退，是因為預備會議之結果，特別委員會已夭折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已進行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籌備，已由特別委員會手中奪了回來，還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了。」又謂：「弟之引退雖類似消極，然實則積極以助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進行也。」

勝利的引退

一個革命的鬥士，如果他的主張得到實現，還有再比這勝利嗎？要是以俗世的功利觀念言，先生

於十六年間的奔走，對他個人也許是失敗的，但就一個革命的鬥士言，他的信念畢竟獲得了最大的勝利。下面便是表白他胸襟的一篇辭職宣言。

中央執行監察各委員，蔣總司令暨各同志均鑒：自南京特別委員會發生以來，兆銘奔走滬漢間，以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取消特別委員會與諸同志一致主張，求其實現。十月十一日偕南京代表由滬赴漢，商定黨務政治軍事諸條件，而南京即對武漢用兵，為兆銘所不料。因事復有廣州之行，以期貫徹諸同志所欲實現之主張，十一月十八日即由廣州至上海以來，曾向各方說明此旨，且對於懷疑廣東軍事長官張發奎等之態度者亦根據觀察，為之說明，謂張發奎等決非共黨，惟共黨正欲顛覆廣州，乘隙入寇張發奎等所部，關於廣州事件必須通以黨的決議為適當之處分，若內鬨不已，徒為共黨所乘。何期不幸言中，果有十二月十一日之變，廣州全市慘遭焚殺。假使張發奎等果為共產黨徒或與共產黨徒相勾結，則兆銘昧於知人，雖萬死不足以蔽辜，惟徵之事實，則此次禍變乃由共產黨徒乘張發奎等調兵西北江，得間竊發。而張發奎等於變起倉猝之際，猶能率兵戡亂，前後三日，即已蕩平。雖追源禍始不能不責其事前防制之疏，而其無共產嫌疑，則已大白於天下。況張發奎等於禍變戡定之後，即爭相自劾，其效黨之初心，與其無挾持武力延長內亂之意，亦已大白。此後關於軍事之一切措置，自有蔣總司令悉心籌畫，必能永弭共禍，永杜內爭。數月以來，兆銘以參加反特委運動之故，備受特委方面之仇視。始則惴惴於惟恐兆銘無共產嫌疑，不惜百方以圖誣衊，今則惴惴然惟恐無所藉口，不惜別立名目，甚至不惜毛舉寧漢分裂時代之議論文字以圖抉已合之創痕。夫果效黨主張能確實達到，則個人問題何足致慮。當兆銘在預備會議提議催促蔣總司令繼續執行職權之際，固已附帶聲明，願個人引去，以息糾紛矣。共禍發生以後，心雖焚惕，誠不能置身事外。今則以值其時，惟禍變初平，諸與論丹，不能與國人親謀善後，共此艱危，所由引為深憾者耳。於此尚有一言者，清黨與黨務之急，而救黨亦目前

要圖，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可不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不可不恢復，特別委員會不可不取消，黨務化之從決不能由緣隙會以延其殘喘，惟諸同志勉之而已。汪兆銘錄

政治道德的信念

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先生偕夫人並曾仲鳴氏等再搭法輪出國。自四月返國，前後爲時不過八月，其間先生爲國事奔走各方幾無寧日。但反共終於完成，特別委員會終於取消，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亦見籌召開，黨權與黨的紀律，亦由此保持了。若謂一個偉大人物因其特殊的才能，而得完成了特殊的使命，所以不免受了小攻擊，以致不得不告引退，然而正唯因爲如此，偉大之所以爲偉大，愈得到堅定不拔的證明，先生對於人事關係的道德觀，本早就抱有這樣的觀念：

處世期以勇，持身期以潔，責己既已周，責人斯無缺。水清無大魚，此言誠詹詹，汚瀦較蚋聚，蹄涔蛇蠍習。哀哉市道大，徒以便[illegible]貪，燭之以至明，律之以至嚴。爲善有必達，爲惡有必殲。由來狂與狷，二德常相繫。（舊詩）

此時先生已是一個四十五歲年齡的中年人了。道德的信念，比之政治的經驗，對於一個中年時代的政治家，實尤具重大的意義。先生在此數年中，其政治生命雖備受頓挫，然其爲吾的道德信念，卻與時俱堅；因道德信念的堅定，其一定的政治信念，亦愈不可動搖。政治的本身原不是一種目的，而祇是貫徹信念的一種行爲經營，認爲政治的經營本身就是目的，則結果必致臨爲個人私已的利祿之爭。先生因認識這一點，所以其政治行爲的出發，必以道德基礎的確保爲前提。因有道德基礎，亦必

產生不可動搖的善的政治信念。證之先生於十六年間為維持黨紀，維持黨的道德所表現的苦鬥的精神，我們對於以上的解釋，實可信而有徵。

從十七年迄十八年九月的一段時期內，先生足跡遍歷中歐南歐，不息從事其個人的學術修養。其間對於國內政事，仍不稍弛其注意，且不時允國內外黨員之請，提供種種寶貴的意見與指導。如「覆駐法總支部函」，「一個根本觀念」，「致陳樹人書」，「覆林柏生書」等，均為這一時期所發表。

寄懷共和史歌

不過一般說來，先生在這一時期的生活，像他過去在國外時期一樣，應該說是偏重文學生活的經營。所謂「短檠不我棄，朝夕伴矻矻」，便是他這個時期的生活寫照。其譯「嚣俄共和二年之戰士詩一首」，尤饒有意義。嚣俄（Victor Marie Hugo），誰都知道是法國浪漫派時期的傑出文士，不僅在道德上夠得上說「由來狂與狷，二德常相兼」，且在政治主張上，還是「一個熱烈的共和政治的擁護者」。在拿破侖三世復辟時期，嚣俄曾因反抗專制政治，被驅放國外多年，及至法蘭西共和再建，他始歸祖國。所以先生於斯時斯地譯述嚣俄共史詩，實在是頗有意義的，現在我們且看這首長詩：

吁嗟共和二年之戰士！吁嗟白骨與青史！萬人之劍齊出匣，誓與暴君決生死。暴君流毒遍四方，日暮日與蒼相望。狄而斯與蘇多穆，就中北帝尤猖獗。此輩封豕從獵狗，生平獵人如獵獸。萬人一怒不可何，還看太白驅其首。

漫漫歐陸苦淫威，孰往備之響健兒。嘻嗟猛將為指揮，步兵塞野如雲馳。鐵騎蹴踏風塵開，萬衆一心無顧

関。勢若滄海鯨鯢躍，與此偕行兮和子以歌，大無畏兮死靡他。徒跣不蝕霜露多，眼不瞽日揮天戈。

日之所出日之所沒，南斗之南北斗之北，山之高水之深，何處不有吾健兒之足跡。絲光之鏽滿於肩，捉翦嶮門肘已穿。晝不得食兮夜不得眠。身行萬里無暇休，敵氣易落不知愁。試吹銅角聲嗚咽，有如天魔與之遊。

健兒胸中何所蓄？自由之神爲其穀。誰言纖綠雄，載海歸箏擅。誰言韜鼎毀，韓失供一蹴。吁嗟！吾國尤來多瑰奇，男兒格鬥如虹霓。君不見祖狄將軍破敵阿狄江之上，又不見馬梁將軍擺兵萊茵河之湄。

驁强先登銳無前，突騎勞出擐中堅。追奔審兩復兜鍪，水深及腹無迴旋。要誓城外看衛壘，鼓吹開營森列戟。王冠委地如敗葉，付與秋風掃踪跡。

健兒一身經百戰，英姿颯爽眾中見。目炬爛如巖下電，短髮蓬逢風獵面。神光勵肉昂，卓立迥高標。有如猿虎一嘯臨崖巖，怒氣呼吸聲蕭蕭。

悲懷激揚臨沙場，遙聲入耳如醉狂。甲刃相觸生霹靂，鐃歌傳響隨風揚。鼓聲緊促笳聲長，間以彈雨躍滂滂。有如雷霆百萬强，喑嗚叱咤毛髮强。嗚呼！寂然長嘯者何聲？華尼伴將軍死猶生。

革命之神慨然而長吁，蒼生億兆皆泥塗，誰無伯叔與諸姑，誰往救之勿踟躕，驅殺難珍死魂愉。健兒聞之裏，萬口同一聲。相將赴死如不及，前者雖仆後者繼。吁嗟呼！孰言窮覺天所僇，君看還到地球如飄蓬。

生平不識畏懼與憂患，力從長夜求平旦。由來衆志可成城，縮縮一身都是膽。共和之神從指麾，百難千災趨不辭。若云共和在天路，便當與子醫雲去。

漫遊詩紀

其間先生遍遊各地，足跡南至法蘭西與西班牙國境交界之比那還山區（Pyrenees Montains），

北至瑞士之懸希柏勝景。遊蹤所至，輒有詩紀之。

比那孃山水之勝，前遊曾有詩紀之。自西班牙諾沂瀑流而上，乘路時逕由經間可六七里，得一湖，其上更懸瀑布二。更上則雪峯際天矣。此前詩所未紀也。今歲復遊補之如次。

峨峨青芙蓉，去天不盈尺。一水孕其內，湛然作寒碧。水光眾峯影，綠縞互明滅。有如澄明鏡，上映天際雪。雪花飛入水，水與雪同潔。又如拓金盤，於此承玉液。昔聞太華頂，天池中蕩潏。此水將毋同，終古流不竭。想從天上來，浴此山中石。湧爲千頃波，掛之萬仞壁。遂令百里內，變化杳難測。建瓴走風雨，震澗鳴霹靂。我來溯青流，毛髮皆洒淅。水面打鏡潭，水心如箭激。迴旋之所薄，嶄刻露山骨。谷風挾空谷，白日潛無色。興懷湖上舟，復聽壑下穴。石危松不落，霜沃花更潔。悠悠無心雲，荒荒斷腸碣。繫星揭中天，下聽眾流咽。

湖濱有石突出，上植一碑，書有英人夫婦新婚旅行泛舟於此溺焉。湖流既清，對此碑益增遊人悲惘。

瑞士幾希拍瀑布自山巔騰擲而下，注於勃里安湖，遠映雪山，近蔭林木，余在此一宿而去。

誰與挽天河，直下幾千仞。人間塵萬斛，快然一洗淨。縱觀下雲梯，跌蕩臨玉鏡。流光散復聚，倒影雲霞影。舉先赤波滟，藉此得絕境。飄云風氣寒，松柏各蒼勁。月出水更幽，衆響俱寂靜。通明不忍去，更坐梁峯頂。

先生於政治生涯，忽瀾壯闊，驚目萬分，而其間一的思緒，一旦運用至文學方面來，又是飛躍本色分，令人驚人嘆賞。其思想而又清醒的蹤跡，直抒人神往不止。

第十章　反獨裁政治與擴大會議

對國內政治的批判

民國十七年的一年，先生息影國外，從事於讀書並遊歷生活。然而對於國事黨務，並沒有一刻弛其注意。像他自己所承認的，他此次再度出國，原爲事非得已。「我個人於十六年冬間，被迫去國，不能從事工作，至爲痛心」。所以出國的行爲，非表示消極，而祇是爲再接再厲奮鬥的一種準備姿態罷了。

對於出國以後的國內政情，他曾作過沉痛的批判說：

從表面說，至於今日，北洋軍閥已經打倒了，中國已統一於本黨治下了，孫先生的遺志，可說是貫徹了。從實際說，孫先生所以要打倒北洋軍閥，所以要以黨治國，其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使中國一般人民得到生存發達的道路和保障。爲這目的之障礙的，是帝國主義，做帝國主義之走狗的，是軍閥，及其他一切依附軍閥的各種人民蟊賊。所以爲實行三民主義計，不能不先將這些障礙物掃除。然則若要知道孫先生的遺志是否貫徹，必要看看現在這些障礙物是否已經掃除。如果這些障礙並沒有掃除，則三民主義之建設無法開始，孫先生的遺志，便不能說是貫徹。我們從實際觀察之後，我們祇有悲痛，祇有失望。我們覺得今日實際的現狀，不但孫先生的遺志沒有貫徹絲毫，並且正向着相反的道路來進行。（汪集，上册，初集，一九○——一九一頁。）

又謂：

十五六年間，掀全國人民的熱狂，使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被反抗而至於動搖，而在十七年間，卻使之再鞏固而復歸於穩定，卻令且繼長增高起來。（同上一九二頁）

當時先生對於國事黨務，曾提出整頓革命同志隊伍的主張，並建議以甄別人才，清釐理論二點為實施整頓的方法。他認為在十七年的一年間，雖有反革命勢力猖獗於一方，但一般革命同志的整頓，亦舉有良好成績，尤其對國外革命同志所發的理論與行為，極表贊佩。

獨裁政治的踏出

然則以上的批判與表白，究竟何所指而呢？關於解答這一問題，我們不得不將當時的國內政治情勢，作一考察。

應先生之召於是時前後自日返國的蔣介石氏，於是年一月九日在「各派希望」的號召下回到南京繼續執行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任務。爭執已久的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亦於二月間召開了。蔣氏向這次會議中提出了一份宣言，並通過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選舉政府與軍委會的委員等決議，蔣氏本人被舉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並決定全國黨員重行登記，規定在八月中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個時期的政府情勢，在一個軍人的親馭之下，其必然踏上獨裁政治的色彩，是極容易想像的。

在這一時期中，大家都認為蔣委員長第一次在事實上成為一個獨裁者　至少是一個指揮北伐的獨裁者。

（新著「蔣傳」三二六頁。）

惟先生之引退，既為表示以一己之犧牲，換取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召開，並黨紀之復振，實完成國民革命北伐未竟之業，所以對於蔣氏在指導北伐事宜上運用獨裁權力一點，是早予以諒解的。他說：「蔣同志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進行困難的時候，誠誠懇懇的，出來維護，對於武裝同志，辭諍忠告，以為武裝同志，離開了黨，便成為軍閥。這一番忠告，至少又使一輩同志，懷了忌憚，不敢阻撓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進行。我對於蔣同志，完全諒解，所以於去年（十六年——筆者）十二月十日，有催促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提議」。（同上——一八九頁）。

可是隨十七年北伐勝利的完成，蔣介石氏指揮北伐軍事的獨裁權，竟被運用到政治領域中來了。

當七月間蔣馮閻李等人在北京會師之後，蔣氏回到南京，雖表示其實踐諾言，辭去總司令的職務，但大家知道這祇不過是一種手段吧了。在八月初召開的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中，蔣氏的發言，即已透露了一個獨裁者的聲調。他對於黨務，有了他自己的主張。他壓迫當時稱為國民黨左派的一羣黨員出席會議，但也並沒有討好一些右派的元老。結果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是宣告不了了之。這時在紐約的孫科氏，為調停左右派的對峙，曾向蔣氏建議重行與黨內重要領袖汪精衛與胡漢民等合作，但實際上祇有胡漢民一人就邀。胡氏返國後，蔣氏即被推選為國民政府的主席，就從這時期起，他從軍事的獨裁踏進了政治的獨裁。這一如「蔣傳」的作者所說：「北伐的成功已將軍事的活動範圍變為政治的活動範圍了。」（二五四頁）

國民黨內部分裂的再發展，在三全大會問題上又達到了新的決定點。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本決定於八月間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如果說這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放在第一第二兩次會議的政治基礎上進行，蔣氏的獨裁政治設施，必然會受到重大的限制，因爲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如果從眞正的民主主義基礎上選出大會的代表，獨裁政治絕將不能立脚。因此蔣氏手下的一羣人，如當時黨的組織部長陳果夫等，發明了一種新的選擧法，即是由當局指派的選擧法。在這以前，在國民黨員重行登記的規程中，早已限制了一部份舊黨員的資格，現在更以指名的辦法擧行三全代表大會，則其意欲排斥異己，樹立淸一色的獨裁政治，是顯而易見的了。因此馬上遭到了以先生爲領導中心者的一派黨員的嚴厲反對。

有名的「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的歷史文獻，便是在當時發表了的。而「改組派」名稱的出現，也就在同一時期。不過當時先生身在國外，「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雖由其領銜，實際上並非出於他的本意，祇是當時國民黨中的一羣進步份子，一面雖痛恨共產黨，一面對於國內的腐化與惡化傾向，也同樣表示不滿。他們承認唯有先生的主張與行動，才是一貫代表表明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唯有先生才是執行總理主張的忠實信徒，因此這羣人在有形無形之間便自動地奉先生爲他們一派的領袖，以先生的政治立場，取作了他們自己的政治立場。這樣便產生了「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同樣也便成立了改組派這一並無形式的組織。

現在我們且一讀這一篇歷史的文獻：

反獨裁的宣言

海內各級黨部各民衆團體各報館鈞鑒：中國政治，完全爲封建勢力所支配，中國之社會與經濟，所以停頓於中古狀態，不能發展，亦由於國內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者互相結托，以保其以暴力爲基礎之統治權。十餘年來，各地軍閥，割地紛爭，無有寧歲，其所求即在擴充各個人之領域。在領域之中，任意支配人民之生命財產，徵兵拉夫，供其使役；抽捐加稅，備其聚斂；種植雅片，便其販賣；控制交通，任其勒索；而凡此種種，莫不以暴力行之。故封建勢力一日不剷除，割據之局面一日不終了，則國家統一必不可期，農工商業必不能發展，而全國之破產亦必日急一日。欲推倒封建勢力，必須使人民起來抵抗暴力，拒絕作軍閥官僚之掠奪品與剝削品，同時必須在此種運動中，將各界民衆，團結於健全組織之下，依其共同的民衆意識，與其各個的物質要求，造成民主勢力之基礎。本黨目前之使命，即在領導民衆，構成此民主勢力，以與封建勢力鬥爭。本黨以前之統一廣東，及北伐獲得勝利，即爲政策節段之成功。不幸北伐勝利之後，黨中腐化分子及投機份子，以爲地盤已得，權力在手，遂避難就易，拋棄本黨主義，違反民衆要求，吸引黨外之反動勢力，以瓜分自北洋軍閥手中奪來之政權。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所獲，生命財產及自由，毫無保障，一與北洋軍閥時代無異。政治集於官僚，人民不得參預，亦與北洋軍閥時代，毫無不同，致數十萬兵士黨員生命與數萬萬財產之犧牲，僅換得少數人之權利，此種只更換少數個人而不更換政治制度之革命，實已失掉革命之意義。雖表面上一切政令尚擁黨的名義以行，但實際上黨已不能代表民衆之意思，而僅爲軍閥官僚所利用。在民衆習聞的失望與悲哀之中，其一線之望，在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集，以爲眞正代表民意之大會一開，或使眞正民意可以表現，黨

的危機可以挽回。乃現在中央所決定之各國代表大會選舉法及各地代表產生法，益足促成本黨之官僚化而使民衆絕望。依照該代表選舉法及代表產生法，將近百分八十之代表，爲中央所圈定與指派，將本黨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躪殆盡。本黨曾反對段祺瑞之善後會議，以其爲少數軍閥政客所操縱；今本黨權力最高機關代表之產生，亦與類似，其將何以自解於國人？且已正式成立之黨部，不得選舉自己之代表，無黨部之地方，反由中央任擇與該地方黨員民衆毫無關係之人充數，則所謂代表者，已完全喪失其意義。若謂防範共黨之計，選舉不可公開，則甚爲欺人之談。中國所以有共黨之患，其原因在於軍閥官僚之橫行。使中國政治不能入於正軌，使中國經濟不能向於繁榮，故共黨得藉政治經濟紊亂之機，施其誘惑鼓動之伎，今主持中央者，以少數人之私意，蹂躪黨員與民衆之公意而飾之曰防共，此與北洋軍閥以反共之口實，而反對國民革命者何異？此種防共之法，其結果必益增共黨煽惑之機會而已！革命爲民衆之事，欲使革命不至完全失敗，欲使近年內戰與民衆運動之犧牲，猶得保留相當之結果，則必須扶植民衆行使政權，惟建立民主政權，然後可以建立廉潔而有效能之政府，然後可以實現國家之統一，然後可以開始物質之建設，然後本黨之主義可以實底，須知北洋軍閥政府之所以成爲萬惡之藪，匪獨其人不臧，實其背棄民主主義之軍閥官僚的專斷制度有以致之。此種專斷制度，無論用任何名義，不宜倣效，以蹈北洋軍閥之覆轍。本黨欲繼承總理的遺教，貫徹中國革命之使命，惟有嚴防共產黨及一切反動派之利用與腐化，團結本黨十三年改組精神，厲行民主集權制，使中央之意志爲黨員之意志，中央命令，可以指揮全體黨員之行動，然後黨之主張，乃可代表民衆要求；黨的力量，乃可摧毀封建勢力。同人等忝爲本黨中央委員，於已往本黨之官僚化無力糾正，於本黨之被反動份子破壞，無力防止，對於本黨，深滋慚愧！一年以來，同人等被反動勢力之壓迫，不能預聞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任何決議，而全體會議，又被人破壞，

不能按照議事規程進行，使依的基礎完全破壞，以至釀成今日紛亂之局面。五次全會失敗以後，同人等之希望，惟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從速召集，本黨同志之真正意思，可以從速表現，俾同人等之責任，可以從早終了。乃第三次代表大會雖然召集有期，而現中央規定之代表產生法，雖屢次提出異議，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不聞。同人等深恐此種大會一旦開成，其結果適與鞏固本黨及中國和平之期望相反，同人等爲遵守總理遺教，努力革命，對此種大會誓不承認。當此本黨陷於危亡，革命瀕於失敗之今日，決不畏懼強禦，始終與本黨忠實同志共同奮鬥，尚望全體同志共起圖之，特此宣言。

實際政權對理論政治的勝利

這篇宣言，除由先生領銜外，其餘署名者有陳公博，恩克巴圖，顧孟餘，柏文蔚，何香凝，王法勤，白雲梯，王樂平，朱霽青，陳樹人，陳璧君，郭春濤，潘雲超諸人。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本篇宣言，雖與先生無直接關係，但其所表現的內容，可謂與先生的意思相符合。先生曾謂在十七年間，一方面雖然是反革命勢力的復興，而另方面卻是革命勢力的團結。又謂從腐惡勢力的夾攻中，殺出重圍，以博得最後的勝利等云云，都是與這篇宣言的內容相一致的。

這份宣言，無疑是對於獨裁政治的企圖下了一個總攻擊。我們可以不必諱言，十七年北伐勝利的完成，以及中國的表面統一，原是建築在一盤什膾式的妥協基礎上面的。過去北洋政府時代的軍閥，政客，官僚，祇是看到大勢所趨，改張一面旗子，重換幾個名目，便也躋身進了革命的隊伍。真正的政治基礎，完全未經改過。在這種情形下，隨北伐勝利而登場的新軍人，在急功好利的觀念驅策下，

為題是舊軍閥的地盤與實力，便祗有走上以犧牲主義，犧牲黨為條件，而建立他們自己的勢力地盤。

然而，他們這種做法，當然引起了黨內一般青年份子的反對。因此當這一份宣言一旦發出：

……激起了其餘的左派份子到這樣的地步，他們多少是活躍着聯合起來反對蔣委員長，其中大部份的人都辭去了代表的職務，其餘則拒絕接受他們的職務。因為有了這些空缺，這些位置將以別的被委任者來填補，這事立刻引起了瘋狂地反對這充滿私黨的會議……（「蔣傳」二七七——二七八頁。）

這實在是一個頗有意義的說明。這也許證明了政治的現實違於政治的理論，良以一般黨的青年份子，雖在理論上囂張得有聲有色，但那些操有實際政權的官僚與政客，却就利用了他們執着理論，退出會議的機會，老老實實使這會議成了私黨化。因此，在十八年三月開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他們更對先生公然譴責，並解除了先生在黨內所任的副主席職務。蔣介石氏更對一羣擁護先生的黨員們揶揄說：「那些需要汪精衛回來的，實際上都是不願意他回來的；這些不喊着需要他回來的，實際上倒是歡迎他的。」（「蔣傳」二七九頁。）可是三全代表大會所表現的事實，却使這種揶揄變成了正面的諷刺。

廣西派的反抗

當時一般人，每認為十七年前後所顯現的國民黨內部的再分裂，不外是對於既成政權的領袖慾之爭吧了。這種解釋，固然不無理由，但要是將先生歸入這一類，那就有些可笑了。因為這個時候不惟先生身居國外，對於國內的政權，無從顧問，就是他的心思，也淡泊得如清水一樣。他當時作的幾首

詩，就是明證。

水榭旋押微微風，玉色清輝掩映中；月國是人人是月，一時人月已交融。（十七年作）（賜讀）

花枝紅映醉顏酡，簇擁遊人笑語和；我見爲花深禱告，折花人少護花多。

千紅萬紫各成行，日暖林塘藕藕香；此際園丁高枕臥，遊人自爲看花忙。

脩竹蕭森行徑彎，結鄰三五靄田家；遊人去後黃蜂靜，付與村童掃落花。（十八年作）（遊春詞）

三中全會是否表現了黨的最高權力會議，我們馬上會看到事實的明證。蓋在三中全會中，獨裁形式的政權雖取得了初步的勝利，可是接着起來的，是中國政局的再分裂。在三中全會同時，在蔣氏領導下的南京政府，竟圖同時運用建立獨裁軍事機構的方式來加強政治的獨裁，因而有編遣基本會議的召集。本來，欲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消滅地方性與封建性的軍閥割據勢力，原有其必要。但當時的編遣會議，一方面反與老牌的地方軍閥相携手，另方面則將對於北伐有功的國民革命的非中央系軍隊加以制裁，這一措置，當然引起了黨軍內部的激烈反對。

首先以行動來反對的，是廣西派的軍隊。廣西軍富有革命的精神，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實。在十七年北伐末期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隊伍，在攻下北京之後，本欲驅兵關外，以完成中國的眞正統一，但蔣氏却表示反對，並不惜以辭職相威脅。結果李白不得不妥協了。不過他們對於蔣氏，已經感到不滿。及至編遣會議實現，當時在武漢的李宗仁，即以武漢政分會的名義，令中央系的魯滌平去職，而改組了湖南省政府，並調動江西與湖南的軍隊，自樹一幟。此在南京方面，亦毫不客氣，竟下令扣留參加三中全會的粵方代表李濟琛，一面勾結閻錫山，與尙在華北的桂軍白崇禧部以威脅。這樣，第一

次的反抗，又在蔣氏的勝利下宣告結束。

關於第三黨的問答

這時在國外的先生，對於南京和各方面軍人的衝突，抱着很客觀的態度。他以「腐化」的一個名詞，概括了當時的實際形勢。是時有人寫信質問先生是否與所謂第三黨有關係，因爲自從改組派發出了上述一份宣言之後，國內人士對於國民黨內的左派與右派之爭，在觀念上發生了非常的混亂。先生爲答覆這種疑問，並解釋他自己當時的立場起見，就發表了下面一則問答。

近來接到幾封信，都是問我對於第三黨的意見，想我病中不能一一答覆；而且一一答覆，反覺得什沓，而沒有頭緒。所以我綜合這幾封信，將問我的話逐條指出，逐條答覆，做這一篇公開發表以當回信。同時並請求寄信給我的各位原諒原諒。

問：知道有所謂第三黨嗎？

答：我不大知道，只在國內寄來的什誌和報紙上面看見一些，關於第三黨的批評與紀載。

問：對於第三黨的感想如何？

答：本黨從前有二種蟊賊，第一種是腐化份子，其作用在蠹蝕本黨，第二種是共產份子，其作用在篡奪本黨；如今又添一種蟊賊，其作用在破碎本黨，所以說他是第三黨，不如說他是第三種蟊賊。

問：「突擊」雜誌有看見沒有？他對於本黨左派攻擊特別厲害是甚麼緣故？

答：「突擊」只看見一二期，他的作用是很明顯的。向來腐化和共產二派雖水火不相容，然於無意中還幫

合戰線向本黨左派猛烈攻擊的。因爲他們認定本黨左派，是他們第一個敵人，不將這敵人打倒，則某黨某黨皆無所施其技。如今所謂第三黨旣然以奪黨爲目的，自然不期然而然的師他們的故智，所以這三種蟊賊，必然形成一條聯合戰線。

問：聞得有些人說第三黨是本黨左派所組織的，然否？

答：要答此問，先要將甚麼叫做右派，甚麼叫做左派，解釋清楚。（中略）本黨黨內之右派，在改組以前已是事實，只是脫不了個人關係和地域關係。及改組之後，方纔有左派右派的名詞發生。據我所知，這兩派當時都沒有甚麼組織，不過從其言論態度行動而自然分化。我如今撮要來說，大概贊成改組的是左派，不贊成改組的是右派。改組的目的與意義，在我所做的「一個根本觀念」論文已曾說過，大概就黨的活動方面說，（一）要打倒帝國主義，（二）要喚起民衆。就黨的機體方面說，（一）要嚴密其組織，（二）要森嚴其紀律。右派份子，其積極目的不過欲取軍閥官僚而代之，以圖繼食帝國主義之餕餘，而其向來脾氣，又慣於隨隨便便，無拘無束，所以對於改組，不能不拚命反對。第一次代表以後，黨內許多糾紛，都是由此而起的。及至十四年夏間，楊劉掃除之後，右派份子感覺到在廣州革命根據地不能立足，遂開始秘密組織。這是從廖仲愷同志被害一案發現出來的。他們的秘密組織，似乎至今未散，至於左派，據我所知，不但當時並沒有甚麼秘密組織，直至今日，也是沒有。旣然沒有組織，則所謂左派，依然不過從其言論態度行動而予以形容吧了，所以如果他們的言論態度行動或是軟化了，或是變壞了，便不能繼續稱爲左派。他們因爲贊成改組，所以和某黨的不能相容，他們因爲是本黨的忠實黨員，所以和某黨的不能相容，這都是以前經過的事實。（中略）所以我敢斷然的說，凡是本黨左派，決不會贊成第三黨的。不但這樣，他們正在努力去肅清這種蟊賊，免致本黨爲之破碎，因爲如此

總受第三黨的蠱惑攻擊啊。

問：目前但有些激烈份子不滿意於本黨中央的設施，因而橫決以走入第三黨的啊？

答：這一點讀要看得清楚。如今先就本黨的組織來說，固然規定最高權力機關爲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爲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同時又規定區分部爲本黨之基本組織，固然規定各權力機關對於其上級機關應執行黨之紀律及決議，而同時又規定得提出抗議，由此可見上級機關並不是可以濫用權力壓迫下級機關及個人的。至於關於決議，更明白規定黨內各問題，各得自由討論，但一經決議後即須一致進行。由此可見關於各問題於決議以後要求黨員之服從，而於決議以前，則必須徵集黨員之意見，並不是可以不顧一切來獨斷獨行的。如此則黨員在黨內儘他自由，如果濫用自由，是黨員的不對。如果濫用權力以壓迫黨員的自由，是中央的不對，應該就事論事，不能一概而論的。再就目前的情形來說，中央兩字不提起便罷，提起只有傷心。如今中央果能自由行使職權嗎？做黨員的看見中央如此，相與擁護之不暇，何忍責備？去年九月間爲甚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能進行？爲甚麼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都至於關閉？去年十二月間，爲甚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得已要在上海開預備會議？爲甚麼不能到南京去開？凡此種種皆可證明現在的腐化勢力並不能把持中央，只能在中央以外做出種種障礙以妨害中央罷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今年春間雖然勉强開成，而種種障礙不僅依然如故，竝且日益加厲。我們不盡力擁護中央，反而對之不滿，豈不是「惡於室而作色於父」嗎？

問：第三黨趨勢如何？

答：從「突圍」的言論看來，第三黨是共產黨的右派，和本黨裏不贊成分共份子混合而成的。我們只看了分共以後共產黨所作出來的勾當，殺人放火，窮兇極惡，無所不爲，便可測知第三黨的前途，除了爲戰敵，更

無別的。總括說一句還是本黨的忠實同志相與努力來完成國民革命吧。（正集，初集一九九——二〇三頁。）

反蔣勢力的大團結

從這篇談話中，很可看出當時先生對於政府與黨的態度。對於中央政府，先生是表示應該擁護的，但必須以尊重黨治爲前提。但不料在三中全會中，因「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先生與陳公博諸人，竟遭擅斷開去黨籍，至十八年八月，編遣實施會議又復決定集中軍權，至此，在反對獨裁政治這一點上，反蔣勢力遂達到了最高結合。在南京任軍政部長職的馮玉祥，這時已回到了西北，一度幫助過蔣氏的閻錫山，亦表示了其曖昧的態度。

揭開反蔣的火蓋的，是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張發奎所發表的獨立宣言，當時張部駐在湖北。張氏是當時先生的熱烈擁護者，他的鐵軍，因富有革命精神，對於先生的國事主張，保有精神上的一致性格。因此當張氏鑒於南京違反黨義的獨裁政治傾向後，他即提出幾項要求，一即是重行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一是澈底清除黨內的封建份子和腐化份子，最後便是要求以先生爲黨國最高領袖。

當張發奎的宣言一經發表，他馬上得到了廣大的支持，改組派在這次響應的宣言中，已不若「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那樣來得溫和了。他們這時老老實實指蔣介石爲國民黨的叛徒，指他的地位，不過是步武舊軍閥的後塵，他們痛責蔣氏的擅斷獨裁，破壞了國民革命的目的。

至十月間，廣西派的李明瑞，楊騰輝，馮玉祥系的孫良誠，宋哲元，劉郁芬，門致中，石敬亭，

及閻錫山系的商震等，聯名發表通電，爲張發奎的宣言作聲援，並公開提出了歡迎一革命領袖汪精衛維護政權黨權」的口號。同時在河南的唐生智，也正式舉兵反抗。本來在北伐初告完成之後，蔣氏曾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而以北伐時代的其他三方面軍總司令，分任各地政分會主席，如武漢政分會主席爲李宗仁，廣州政分會主席爲李濟琛，開封政分會主席爲馮玉祥，太原政分會主席爲閻錫山。但現在這個妥協局面不得不告解體了。李宗仁跑回了廣西，李濟琛在南京被扣住了，致於馮玉祥和閻錫山，也公然表示了離心的傾向。

當時反對派在其宣言中向南京提出下列幾點質問：一、宋子文經手所發行的四億圓公債，用途不明。二、何成濬，宋子文，張群，陳果夫，劉紀文等左右蔣氏，在經濟方面中飽私肥，在政治方面離間中央與地方。三、國民政府並未實踐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諾言，致失民衆信仰。

種種的立場

其實平心說一句，這些地方軍人的反對藉口，雖有其部份的理由，但要不過是藉口而已。他們主要反對的原因，不外因爲蔣氏的獨裁措置，影響了他們的原有地位，削弱了他們原有的權力。所以其發動雖和改組派發表宣言同時，但意義却有不同。在改組派，他們反對政治獨裁化，是立脚於擁護黨的立場，而這種立場是爲地方軍人所沒有的。地方軍人此時所以亦復提出擁護先生，祇因爲他們需要一個有政治地位的領袖而已。先生本人，雖堅決主張擁護黨的立場而反對南京方面的獨裁傾向，惟對於

地方軍人的行動，是並不表示贊可的。他十八年回國，動機不是在支持地方軍人的行動以反對中央，而是想從黨的立場來調解中央與地方軍人間的衝突。所以他回國時所提出的口號，是護黨。

可是當時南京政府對於地方軍人以及政治上反對派的處理，竟圖運用武力壓迫的方式以求解決，因此國內戰爭終於爆發。

張發奎的軍隊在發表宣言同時，即向南方開發，於同年冬十一月到達廣西，與廣西軍相聯合，以白崇禧相任廣東討伐軍總司令，並由李宗仁，黃紹雄爲協助。但不幸在向廣州進擊途中，爲蔣系和陳濟棠的軍隊擊潰了。此時先生適從國外返抵香港，見此形勢，遂即出遊新加坡，陳公博，甘乃光等改組派中堅，亦出走安南。是爲十八年冬事。

另方面，馮玉祥的部隊於十月十三日自西安移其總指揮部於潼關，宋哲元部由潼關扼守陝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孫良誠部自隴海線進攻鄭州，韓復榘，張汝遠，石友三部由津浦綫北動，企圖會師武漢，以討伐南京。

但蔣系的軍隊，在十一月間即在臨汝鎮，開封，洛陽各綫遏阻了西北軍的前進，安徽的石友三，河南的唐生智，都先後遭擊敗了。反抗南京的軍事行動，在十九年一月間即大體上宣告結束。綜觀十七十八兩年的種種亂動經過，原與先生無直接關係。然而南京方面在十八年的軍事勝利，使獨裁政治的氣氛益發高揚，乃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在外交方面，爲鞏固國內獨裁政治，不僅廢除不平等條約絕口不提，且公然進行了與英美帝國主義的勾結，對內政方面，爲籌取江浙系買辦階級與財閥階級的支

排，亦放棄了總理的民生主義。因此在國內政治各方面引起了更大的不滿。

蔣閻衝突

當十八年各地方軍人起而反抗南京時，北方軍人中唯有閻錫山沒有公開參加。但閻爲其本人的權利關係，對於蔣氏的獨裁傾向，自亦難免不滿。十八年冬蔣氏獲得勝利之後，西南將領與西北將領，都已屈居下風。惟閻氏因態度曖昧，獨得保守實力於一隅。閻氏於蔣馮衝突之際，曾一度表示過將偕馮玉祥同時出洋，當時蔣氏採取個別擊破的戰略，一面與閻錫山妥協，一面出兵討伐馮氏。及至馮氏失敗，閻氏感到南京的壓力將直接臨到他自己頭上，遂突於十九年二月十日致電蔣氏，表示辭職，一面亦諷示蔣氏下野。

閻錫山的這種做法，目的無非想避免與蔣氏實力衝突，而運用政治上的手腕。但閻錫山的要求，給蔣氏完全拒絕了。閻氏在他辭職宣言中，提到中國的危機已日益深刻，黨國前途，十分暗澹。寒心不安，武力已不足恃。故要求蔣氏同時下野，讓黨務由黨員去解決。閻錫山更提到他因爲不能解救西北軍於饑餓，有失信軍民之處，如果蔣氏亦無辦法，則國家恐將蒙赤化之禍。

蔣氏答覆閻錫山，謂此時下野並非時期，要求閻氏爲共同救國而留任，並要求閻氏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第三次全體大會，但閻氏推故不往。這樣電報一再往來，政情愈見複雜，蓋西南西北各方的將領，又趁閻氏行動的機會，紛紛復起要求蔣氏下野。

因改組派的積極活動，南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竟遷怒於先生，宣佈了開除先生黨籍。同時改組派的中執委員王樂平，忽於二月間在上海被刺，此事使先生極爲憤怒，遂公開發表宣言譴責南京政府，一方面改組派的主要幹部陳公博氏，亦於此時來到北方，與閻馮等人有所接洽。陳氏先在天津與覃振等磋商解決北方黨務問題，旋即會同胡宗鐸，張知本，陶冶公等電太原，邀鄒魯，謝持，王法勤及趙戴文，商震等赴北平，蓋因各方都主張先解決黨務問題後再行成立政府。

事實上軍事的行動已經成立，閻錫山於四月間就任北方軍總司令，蔣氏於五月一日發表討伐閻馮的四言誓師詞。同月閻馮軍隊會師彰德，鹿鍾麟與徐永昌通電就任閻委前敵總副司令職。而蔣系的何成濬軍，亦開始以飛機向鄭州投擲炸彈。

五月廿七日，北方黨務會議召開，參加者除閻馮系，改組派外，西山會議派亦在其內。其人物陣容爲改組派之陳公博，顧孟餘，柏文蔚，王法勤，陳嘉祐，白雲梯；西山會議派之鄒魯，謝持，覃振，居正，許崇智，傅汝霖，茅祖權；閻錫山系之商震，趙戴文，趙丕廉；馮玉祥系之鹿鍾麟，薛篤弼等，並網羅其他國民黨一二三期之中央執行委員。

擴大會議的失敗

先生此時本息居於香港，原無意問鼎政治。但對於獨裁政治，既爲先生所反對，而此時又爲各方竭力推戴，遂於七月二十三日率領顧孟餘，曾仲鳴，黃惠平等經日本到達天津轉赴北京。於北方黨務

會議的宣言中，先生主張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求取決公意，消納黨內個人與派別的意見，並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對組織方面主張成立中央擴大會議。

擴大會議於八月一日正式宣告成立，八月四日，在太原首次舉行汪閻晤面，七日召開擴大會議，推選先生，謝持，趙戴文，王法勤，許崇智，茅祖權，柏文蔚七人爲中央常務會員。復於九月二日，推選先生，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唐紹儀，李宗仁，謝持七人爲國府委員。九日在北京懷仁堂舉行就職典禮，後加推石友三與劉文輝二人爲國府委員。

在擴大會議的宣言中，對於蔣介石的獨裁政治，痛加斥責。認爲蔣氏執掌政權二年以來，以施訓政爲藉口，實行把持權力。擴大會議決與最短時間，制定根本大綱，先行保障民權，並即速召開國民會議，予以追認。爲區別擴大會議與南京政府的政治立場起見，宣言中特指出南京以黨政軍三位一體之說，掩飾其獨裁政治，而擴大會議，則欲明顯劃分黨與政府的權限，以避免權力過度集中化。主張根據建國大綱，劃分地方與中央的權限，喚起民衆，行使政權；根據建國大綱，準備實施地方自治。

關於對外政策，先生於事先曾特別聲明，大意謂：「對外關係，根據故總理之方針，在於求中國之自由獨立與國際之合作。對於日本，一如民國十三年總理北上之際在神戶發表者，謀中日兩國應徹底親善合作。」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在十七年的北伐過程中，曾經發生過一次開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惡化關係首頁的重要事件，即濟南事件。濟南事件的本身，後來雖經妥協，但因爲濟南事件，南京政府在蔣氏領導之下，就漸次走上了近攻遠交的錯誤外交路綫，換言之，南京政府是走上了親英美帝國主義的

路綫去了。可是先生的卓識，却早已洞察了中日惡化關係的癥結。故此時先生所發表的外交政策主張，雖未引起重大注意，但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件，却終於在歷史的關係上證明了先生觀察的正確。

然而，擴大會議的結果是失敗的。問題是在張學良。按自十七年張作霖於皇姑屯被炸，張學良易幟之後，在北方的政治勢力上，張學良依舊是一支不可輕視的力量。尤其當時北方軍隊正在中原與南京軍隊相抗，張學良的動向，更有決定的作用。是故在北方的政治組織中，也拉進了張學良。

此時張學良方在秦皇島，而覃振，薛篤弼，賈景德等亦奔走於此避暑地點，有所接洽。張學良旋即回到奉天召開東北幹部會議。這時閻錫山的軍隊在山東喫了敗仗，這樣才決定了張學良的態度。張於九月十八日發表通電，謂「國是解決，靜候中央辦理」，同時並自奉天出兵，向北京推進。張學良的這種態度，遂使擴大會議歸於流產，而先生亦即重復返抵香港。

第十一章　汪蔣合作

蔣胡衝突

擴大會議的失敗，其直接影響所及，是蔣介石氏獨裁政治機構的逐漸强大。蔣氏此時於軍事方面的權力，已無人敢加問鼎，張學良的支持，使蔣氏的軍事地位更見鞏固。但蔣氏畢竟是一個軍人，他在國民黨的政治聲望，欲馬上實施露骨的獨裁政治，時機尚未成熟。在擴大會議失敗後，南京政府雖在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第四次中央全體會中開除了先生以下參加擴大會議者二十一人的黨籍，但蔣介石的獨裁政治當時還不够有號召的力量。在政治上他仍得借重國民黨的元老，當時蔣氏雖一身兼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並陸海空軍總司令三項要職，然國民黨元老之一的胡漢民氏，這時方以蔣胡合作的姿態，在五院中佔着立法院長的一席。

立法院長地位之尊，自然無待解釋，而且胡漢民氏這時又是以唯一黨國元老的姿態參加蔣氏政府，他的地位和聲勢，對於獨裁政治的機構，便無形中成了一重阻礙。蔣氏在排斥先生之後，爲顧全黨內輿情，雖不得不與胡氏合作，但其去胡的心理，未尚一日釋懷。尤其因爲胡氏曾竭力反對過蔣介石氏在人事行政上的機會主義手段，頗遭蔣氏所忌。胡氏於民國十七年九月參加南京國民政府，於二十年二月被禁，在人事行政與政治主張方面，曾與蔣氏屢次發生衝突。不過在這個時期，蔣氏武力統一中國的事業尚未告成，實施政治獨裁還說不到。以先生在外，胡氏在內，這兩支國民黨的元老勢

力，不得不謂蔣氏建立獨裁政權的絕大阻礙。但至民國二十年，先生這一支元老勢力隨擴大會議的失敗已暫遭頓挫，而蔣氏武力統一局面的大成使獨裁政治的傾向有了實現的可能。於是蔣胡的衝突，便也在這個時期到達了爆發點。

在民國二十年初，在「社會雜誌」的創刊號上面，胡漢民發表了一篇題名「我們今後的任務」的文章，胡氏在這裏強調了提高黨權與實施訓政的兩點主張。他認爲當時的統一國內工作已告大成，政府與黨，這時應該從事訓政時期的建設事業，以準備人民自治工作。胡氏確認訓政工作應該由黨來訓導，而政府則担任執行。胡氏曾闡述其主張謂：

有很多人說，政府與黨部，如果同辦自治，今後黨政的衝突，一定更多了。其實不然！因爲黨任訓導，政任執行，其中很有明白的界劃……須知在以黨訓政的今日，黨部組織之「組織」「宣傳」與「訓練」，其工作並不止於黨員乃至黨部而止，所謂組織，是要遠萃遺散，將如散沙一般的衆人，組織成士敏土一般的「民」，以鞏固國家的基礎！所謂宣傳，是要宣傳本黨的黨義，使它深入民間，使人民心悅誠服，身體力行，成爲國民人人共守的常經。所謂訓練，是要啓發人民的知識，增進人民的能力，以堅定其主義之信仰，具備其做民的條件。如果黨與人民絕緣，不能做到「接近人民」與「領導人民」的兩句話，則黨的作用根本已失，所謂黨者，祇是黨其所黨，非吾所謂黨了。

反獨裁政治的再展開

這一段話當不止限於字面所示的意義，而是有所爲而發的。蓋在當時，蔣氏的獨裁勢力，業已深

入了黨的組織而駕御了黨。一般說來，民國二十年的蔣胡衝突，是爲了訓政時期的約法問題，但實際上卻是爲的黨權的爭執。大別說來，蔣介石主張强化政府的統治性格以取代黨的最高機能，而胡氏則絕對要求承認國民黨高於政府的優勢。蔣介石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實施臨時憲法，而胡氏則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是一回事，施行約法爲另一件事。以立法院院長的地位而言，當時胡氏的主張，自然不無若干理由。然而在蔣氏目中，胡氏的主張卻成了推行獨裁政治的莫大阻礙。因此蔣氏竟以幽禁手段，迫令胡氏辭去立法院長之職，而重復在勉强統一的國內政局中掀起了重大的漩渦。

蔣介石的非法監禁胡氏，首先引起了西南黨員和軍人的反對。在胡氏系四大金剛古應芬的說動下，廣東實力派的軍人陳濟棠首先發難。此時先生方息影香港；先生與胡氏本爲好友，但自國民黨有左右派別之分以來，先生與胡氏之間，在政治主張上亦不免有所分歧，事實上自南京組府以來，先生與胡氏之間從未出現過眞正的合作，這當然也影響到外間對於這兩人間私誼的猜測。不過在反獨裁政治的一點上，兩人間在民國二十年又結成了合作戰線。先是先生息居香港，行蹤並不公開。至五月中孫科劉紀文等相繼南下，於是「南華日報」始見有「汪精衛先生太平洋船中之談話」發表。五月二十三日，先生於港公開接見賓客，至翌日遂偕孫科氏同赴廣州。

此時南京已於五月五日召開所謂國民會議，並於十二日通過臨時約法。獨裁政治的一意孤行，使得廣東方面不得不迅速考慮重組政府的事宜。廣東方面首先要求蔣介石下野，指責拘禁胡氏的非法行爲，但他們所獲的答復是武裝勢力的壓迫與威脅。蔣介石氏憑其過去的經驗，已深信武裝統一中國的手段是實施獨裁的唯一法門。反之，廣東方面則堅決反對武力統一的主張，要求施行均權主義，即主

與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應該並行。這種政治立場的差異，加上無數感情與利害的衝突，更使廣東方面感到有自行成立政府的必要。

廣東國民政府於五月廿八日正式宣告成立，並組織非常會議以與南京的中央會議相對抗。先生於非常會議的宣言中，特闡明非常會議的任務謂：「待至依據黨章，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會議之日，非常會議之任務即告終了。望我同志，共體此意，今日之事，以精誠團結為第一義，過去之糾紛付之淡忘。」

其實廣東國民政府的成立，在先生的目的仍不過欲以之貫徹其維護黨紀與貫澈黨治的主張而已。然而不能諱言的是，廣東國民政府的組織陣容，因格於情勢，實未必能代表先生的初衷。廣東國民政府成立之日，以先生、唐紹儀、孫科、許崇智、古應芬等五人當選為常務委員，以李宗仁、唐生智、許崇智、陳濟棠等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以李文範、劉紀文、麥煥章當選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並委陳友仁為外交部長，鄧召蔭為財政部長。此外參加者有鄧澤如、蕭佛成、鄒魯、林雲陔，鄧青陽等西南派人物及林森、王寵惠、馬超俊、李烈鈞、陳耀垣等非中立派即為胡孫系的人物。諸此代表，雖在反對蔣氏獨裁一點上保有共同立場，但其個別的政治主張，則極為複雜。所以先生雖屬望非常會議能以精誠團結為第一義，而實際的表現則並未做到如此。

廣東國民政府成立之日，即發表宣言。大旨聲明秉於護黨救國，完成國民革命的目的，宜對南京政府加以討伐。對於有名無實的南京政府，決難加以承認。組織中央政府，建立國家大計，以之指揮討蔣軍事，實為當務之急。當時先生並提出三點具體口號，即由建設而圖統一，依均權以求共治。前

一句口號，即主張以建設事業完成統一目的，以否定蔣氏的武力統一論；後一句的口號，即是主張以均權主義否定獨裁主義。先生雖認爲這二句口號各含有不同的意味，但其重要性則一。蓋此二點主張同爲治國的基本，若能付之實行，財政外交各項問題即可相次解決。

中日問題的思想根底

廣東國民政府成立後，先生的政治卓識業已感到了中日兩國間的危機暗潮正在滋長之中，蓋自濟南問題以來，中日兩國間的不快關係本就未獲圓滿解決，而蔣氏於十七年完成北伐之後，其親英美的傾向亦日見顯著。反之，先生之對於日本，雖在其尚未參加實際政治生活以前，曾積極表示過其對帝國主義與侵略主義的反對，但在其根本思想上，他實早已有了中日應該合作共存的認識。他反對帝國主義與侵略主義，這基本的態度即在今日不僅不稍變，且反愈趨積極。但在對日本的場合，他始終認定中日兩國的關係應建築於合作的基礎，而決非由相爭相鬩所能解決。

早在「巴黎和會後之世界與中國」及「中日問題」的兩篇文章中，先生雖積極顯露了他的反帝國主義與反侵略主義的鋒芒，可是在具體地提到中日關係時，他就不禁處處表現了他的感慨心理。例如對於「巴黎和會與中日問題」，他一開頭即這樣感慨系之的發問說：

「中日問題，何故提出巴黎和會乎？中日兄弟之國也，兄弟之事，何故不能自了，而至於請求巴黎和會之公斷乎？……

在這全篇的文章中，雖充滿了反侵略主義的激烈論調，但如果我們將當時的時代背景所予先生的影響以暫置不論，那麼我們就很可以看出他對中日問題的根本見解。例如他在同一文中，在汎論日本與中國關係之得失後，即謂：

……然則併吞中國因為中國之禍，而未必即是日本之福也。是故為日本生存計，不可不於併吞中國之外，別求其方法。和平派所謂「中國而能自強，日本當與之提攜」，殆近之矣。夫人類爭存，以利害相反之故，而其共存，即由利害相同之故，淺識之流，每以為中國日本，大小懸殊，中國而能自強，日本將無容足之地，此其持論，似中日利害相反，無可共存，誠可謂大謬不然者。第一，中國四千年之歷史，雖有對他國之侵略而無抵抗，無對於他國而為侵略，實不失為國際之良友。第二，四五十年來日本已先中國而進步，以中國之地大物博，苟與之提攜，則關於國民之經濟，可以兩利的方法而得無窮之增益，由此二者，中日之利害相同，燦然甚明，固有共存之條件，而無爭存之原因也。綜觀歷史，凡人類之結合，皆由近而及遠，由親而及疏，故始於家族之結合，繼之以氏族之結合，繼之以民族之結合，又繼之以人種之結合，然後乃有世界人類之結合。方今黃種之國，存者幾乎，本可立於共存之域，何必強而納之於爭存之域乎？夫中國若不能自強，必無與由日本共存，此義為吾人所深喻。然而於中國發憤自強之際，日本對之，其將何如？其將助之進步耶，抑將聽其自生自滅，而無容心於其間耶，抑將從而摧殘之，使不得進，既進復退，以返於積弱，而終於滅亡之運耶？……（汪集，下冊，四集，二三——二四頁。）

我們對於其間數十年的歷史因果，雖不必故作結論——因為這頁歷史到眼前尚在發展過程之中——不過從上述的引文中，我們實很可以領略先生對於中日關係的根本思想，各為其國的政治立場，在一定的場合當必予以尊重，但我們儘不妨說先生在個人的感情上是一個徹底的對日親善主義者。排

日本外交界人物須磨彌吉郎氏（戰前任過南京日本總領事）所言，在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時，先生適在病於歐洲，當他接得日本震災的消息時，他不禁這樣感慨說：

中國的得保獨立，雖經迂迴曲折，要亦得力於日本極多，此實中國所不得不認識者。此次日本若因天災而將不能恢復，則中國前途亦頗有影響。此事非僅將為日本一國之不幸，且亦為中國及東亞之不幸。

這一段插曲，在說明先生個人對日的感情上，是很有意義的。先生革命思想的啟發，如其所自述中，就是來自日本留學時代，而其參加革命工作，並在革命的過程中親眼目睹日本志士的犧牲協助，自然不能不無感動於中。在現代中國的領袖人物中，懷有同樣感想的，實不止先生一人。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一個澈底的中日親善論者，他還發表了他的大亞細亞主義。即如蔣介石氏，在骨子裏亦未嘗不無中日應該親善的觀念，例如還至中日戰爭爆發前夜，蔣氏在各方面尚被認為是一個對日妥協主義者。不過這是後話，此間暫且不提。

九一八事件與國內團結

因此，在廣東國民政府成立後，先生本於擴大會議時代的同樣見解，仍圖在進行國內建設的同時，謀中日外交關係的改善確立，於是政府特行派遣陳友仁和劉紀文赴日周旋意見。可是這時卻已爆發了導九一八事件先聲的萬寶山事件與朝鮮事件，中日雙方的意見不僅未能接近，且兩國對彼此的認識，因國民間的感情惡化，反日益惡劣。同時廣東國民政府的內部，因不能脫卻私人爭政的意味，故先生最初所求的主張與目的，至此不得不宣告失望了。

廣東與南京方面，於二十年夏雖曾達到過一度緊張關係，但雙方從未放棄過妥協的接觸與活動，尤其因九一八事件的突發，使雙方的妥協關係有了急轉直下的展開。南京方面自胡蔣衝突事件後，其內部政治機構本已大受影響，而江西的剿共工作又使蔣介石不能專心對付政爭，他方面先生參加廣州組府，目的原在促進以建設統一中國，並促南京方面的覺悟，及至看到廣州內部的爭政傾向，他對組府前途也早就表示了消極。自桂粵奏雙十節事件以後，先生且已向廣東政府辭職避居香港。因此九一八國難的促成了雙方急轉直下的妥協，可說是事勢所必然。

於九一八事件後，先生首先感到國內團結實爲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於是經過思園的幾番籌議，決先派遣顧孟餘至上海先作接洽，同時南京方面經過九月二十一日的中央黨部緊急會議，爲折衝和平會議起見，決定派遣張繼、蔡元培及陳銘樞三人至廣州談判。一行人於九月二十八日至香港後，先在九龍與代表粵方的先生、孫科及林雲陔等舉行秘密會議。至卅日妥協成立，南京代表於十月九日返抵上海，惟粵方堅持在和會召開之前，必須先行釋放胡氏。蔣方允此要求，於十三日恢復胡氏自由，翌日胡氏即偕同陳銘樞、吳鐵城、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等赴滬靜候廣東代表來臨。

十月廿一日，由先生率領的粵方代表一行，包括孫科、伍朝樞、李文範、陳友仁、鄒魯等到了上海。翌日蔣介石氏由京飛滬，在孫科住宅中舉行北伐以來初次的三巨頭會議。最初，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初，粵方曾堅決主張蔣介石應該自動下野，並以此爲解消廣東國民政府的先決條件。但這祇是廣東國民政府的主張而非先生個人的主張。先生抵上海之後，鑒於國難形勢的嚴重，認爲當前的要務是各方面拋棄前嫌而速謀精誠團結，先生秉於這樣的見解，不願再見因個人的爭政而使南京與粵方再走

權爭。

因此先生在會晤蔣氏之後，並不堅持蔣氏的下野而僅要求蔣氏放棄軍事獨裁，建立民主集權，俾舉全國團結共赴國難之實，對於這一公正要求，蔣介石不僅表示願意接受，且亦不得不承認他自己的錯誤與責任。蔣氏縱然認識他的政治領導力量還遠不够，尤其當舉國上下羣情激昂，一致要求政府對國難採取行動之際，蔣氏益發深感有取得先生等人的合作必要。可是上海的和會雖開始進展，廣州方面的一部份人却仍堅決非蔣氏下野不可。當時離四全大會開會期已近，先生遂即提出一個折衷辦法，即是由寧粵雙方同時開會，而寧方的會議，即於二十年十二月三日假座上海大世界召開。不過後來因胡漢民已返香港，廣東方面在胡氏的影響之下，對於上海的和議曾一度表示不願贊同，此其結果，即一方和議妥協雖告成功，並於民國二十一年元旦在南京成立統一政府，但實際上汪胡蔣三大巨頭則並未參加實際政府。

汪蔣合作的形成

胡漢民的避走香港，以及蔣介石的辭職，使得寧粵合作又復呈現貌合神離的狀態。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林森取代了蔣介石爲國民政府主席，這可說是當時對獨裁政治唯一勝利的象徵。先生與胡蔣二人當選爲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此外在中央黨部的常務委員中，除這三位巨頭以外，爲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等。不過我們祇要一看當時政府實際負責人的一份名單時，就可看出這次和平妥協的結果，基礎是極端薄弱的。在五院院長和各部部長中，其分配的情形如

下：行政院正副院長，孫科與陳銘樞，立法院正副院長，張繼與覃振，司法院正副院長，伍朝樞與居正，考試院正副院長，戴天仇與劉蘆隱，監察院正副院長，于右任與丁惟汾。此外爲李文範的內政部長，陳友仁的外交部長，黃漢樑的財政部長，陳公博的實業部長，何應欽的軍政部長，陳紹寬的海軍部長，朱家驊的教育部長，葉恭綽的鐵道部長，羅文幹的司法部長，而軍事方面則爲朱培德任總參謀長，李濟琛任訓練總監。

以這樣一個政府，欲處理九一八事件前後的國家大問題，顯有未足。和平會議的目的，本在重建中國的最高政治領導權，但結果能夠負此重任的三個巨頭，反沒有一個參加由和平談判所產生的政府。這不僅表現了中國政治上的一大弱點，而且就當時的形勢言，也是暴露了中國政治上的一個絕大危機。

就在這個時期，南京方面正陷在絕對的混亂狀態中，各地蜂湧至京爲九一八事件向政府請願的學生群衆，在激昂的情緒下竟將好幾個政府要人毆打成傷。各方面鑒於內外情勢的緊急，要求馬上建立一個絕對統一的中央政府。一月五日，陳銘樞催促三巨頭到京的電文中有謂：「……政府雖告成立，而我重要領袖猶天各一方，未能薈萃，致使黨政最高指導機關提挈無人，失其重心」等語，足見新政府感到自己的力量已不足應付此嚴重局勢。

這時胡蔣的意氣衝突依舊無調解的餘地，所以解決當前時局難關的使命，不得不落在先生的肩膀上了。至一月十六日，先生毅然赴杭州親自訪晤蔣氏，並聯名促請胡氏南下，及至接得胡氏無意晉京的復電之後，先生遂決計接受政府的建議，出任政治領導。當先生與蔣氏在南京聯袂謁陵之際，對於

當面的時局和過去的種種回憶，不禁交相痛哭失聲。旋即在勵志社會同馮玉祥等籌商大政。其時擔任外交部長的陳友仁氏，主張採取對日絕交與召開九國會議的强硬政策。惟先生認爲對日外交關係軍事，不可操之過激，且認爲九國會議的實現可能很少。我們在這裏要注意到一點，即在中日關係已成僵局之初，先生即主張直接交涉而不主張依賴國際解決。在他一月二十五日所發表的外交方針中，即斷然以確保中國主權爲基本宗旨。結果陳友仁因其主張不得實現，遂實告辭職。同時行政院長孫科，代理財長黃漢樑及傅秉常等亦均先後辭職赴滬。中央遂令先生掌行政院兼鐵道部長，而蔣氏則專任軍事。至此先生與蔣介石氏合作的局面始告形成。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先生就任行政院長職，適爲一二八事件之同一日，這不能不說是命運的巧合了。我們考察先生一生的經歷，他的名字總和現代中國的大事件聯在一起「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這句話在先生的一生中，已不知實現了多少次。如果說命運之說是不足爲據的，那麼我們就更不妨說先生的大無畏精神，以及其堅毅的勇氣與對國事的責任心，造成了他自已成爲一個現代中國大事記上的一種紀念碑人物。在先生參加擴大會議，參加廣東國民政府之際，尙有人批評先生的行動不免帶有政爭的色彩，可是從一二八前夜他毅然負起最艱難的責任一點言，則過去的一切批評，就完全失却了根據。因爲在這樣的時候出來負全面的政治責任，決不是一個祇有政爭目的的政治家所敢爲，此乃不爭之事實。

關於一二八事件的本身，我們在這裏無須詳述，因爲這就是一頁未完成的歷史。這裏所能說的，是先生當時處理事件的主張。在一二八事件後，先生隨同政府遷至洛陽，在二月十三日，他第一次發表了他的「一面抵抗」與「一面交涉」的國事主張。這主張在當時與後來曾受到過不少人的批評，可是我們如果將當時未知，現在已知的種種歷史發展放入考慮，那麼我們祇有抱憾先生當時的主張未能徹底實現的份兒，而決不會批判先生主張之爲錯誤。我們知道當先生與蔣氏合作之初，在共赴國難的要求下，他們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祇是先生的主張比蔣氏的更積極，更顧到現實。蔣氏在共二十一年一月所發表的意見書中，對日外交上消極地主張「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這固不失爲當時情勢下沒有辦法的一種辦法。先生所主張的一面抵抗與一面交涉，在原則上和蔣氏的意見本相符合。不過在意義上，先生所提出的二句口號，更能發揮積極意義。

這是甚麼理由呢？很明顯的，軍事方面的戰爭既已爆發，則武裝的抵抗，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唯一手段；然而在抵抗中不放棄交涉，是不忍見兩國間問題的解決除戰爭的極端手段外即別無解決的辦法。換言之，先生相信軍事與外交，是二而一的手段。既不和，亦不戰，在當時的情勢下決不是處理問題的實際辦法。然而戰與和的抉擇，亦應有最高和最低的條件。此即先生當時所主張的，在最低限度以內可加忍受的，此即和；在最低限度以內而不能忍受者，則不得不出之一戰。先生曾批評當時流行的見解說：

現在多數人陷於二種錯誤的見解：第一是認爲中國是弱國，斷乎不能抵抗日本。若和日本開戰，則中國難免和從前的義和團一樣，大受損害，此乃弱者論。第二是強硬論，譬如「殺盡倭奴」，「殺到東京」那樣的口

說，祇要每次在大會中受人拍手喝采，任何誇大的話都可說。以上二種見解都是錯的。我們在野者不必主張強硬，在朝者不可自吐弱論。

現在國民政府並沒有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所以同時併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領土，不喪主權。在最低限度以下時，我們決不讓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時，亦不故作強硬。這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政府今後的措置，應嚴格規定最低限度的標準。若在最低限度以上，則政府應顧慮國家人民的力量及軍事財政的狀況，不惑於一部份人士的一時強硬論，縱使為國民所誤解，亦應忍痛簽訂。若在最低限度以下，則簽訂固亡國，不簽訂亦是亡國。但知流血的亡國還有復興的機會，不流血的亡國永無復興之日，則政府應勸民衆不顧一切準備犧牲。

這就是政府所下的決心，不僅向諸位說明，且在日日付之實行。最低限度以上，我們忍受，卽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們拒絕，卽是抵抗。

現在不能籠其不和不戰。而是應該和，應該戰。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而能忍受者，此卽應和。若在最低限度以下而不能忍受者，則僅有毅然拒絕，出之一戰。

淞滬協定

這意見不是先生個人的意見，而是當時政府的全體意見。及至一二八戰爭爆發，先生復於二月一十日通令全國，下最後決心，為長期奮鬥，以求貫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本旨。可是在同一個時候，政府中的英美系份子，從未放棄過以國際力量壓迫日本就範的觀念，而當時英美以及左派份子的鼓吹

長期抗戰，更使一部份人士深信中日問題可由國際的力量來解決，結果遂有國聯調查團的出現，同時結束一二八戰爭的淞滬協定，亦於此前後宣告成立。先生於總理逝世七週紀念日，曾發沉痛演說。但對淞滬協定的簽訂，雖受各方面誤解，仍表示負責。關於這一點，林柏生氏曾這樣剴切說過：

一二八以後，在政治負責當局與軍事負責當局汪蔣兩氏領導之下，中國所走的完全是這一條路線。交涉與抵抗的意義，上面業已說過。所謂交涉，便是在極端忍讓之下，求得解決；所謂抵抗，便是到了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時候，爲領土主權人民生命財產計，不能不奮起而爲正當的防衞。淞滬戰爭的時候，日本以武力相加，已至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境地了，所以盡力抵抗。抵抗失敗，便負責交涉，簽訂淞滬協定，這是交涉與抵抗的經過。（文見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中華日報」專論。）

但在反對方面，當時也有人批評先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張爲不徹底，這輩人認爲交涉中的抵抗，抵抗缺少決心，抵抗中的交涉，交涉缺乏誠意。可是自一二八戰爭到淞滬協定的過程，却證實了先生的主張是自有其根據的。就後來的經過看，淞滬會議當然並沒有解決中日問題，而反因此使圍繞這一問題的危機潛伏愈深。然而就當時的情勢言，中日關係還不盡於戰爭之外即別無解決辦法。先生在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宣言中，曾力言政府當時的任務，是在怎樣嚴格決定和與戰的最低限度，同時勸喩國人不可感情用事。蓋因和戰爲國家大計，在不辱國，不喪權的基本前提下，應該在儘可能範圍內走和的一途，這是一個眞正負責任的政治家所應做的工作。我們當該記得，直至中日本格戰爭的前夜，蔣介石氏尚有和平未至絕望決不輕言戰爭的表示，而先生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本意，亦即在此，而事實上淞滬協定的確也未有喪權辱國的內容，且還對中日外交提供了一個轉圜的機會，祇是

這個機會後來未見適當運用吧了。

最低限度的解釋

然而當時政府對於最低限度的考慮又是怎樣的呢？在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先生於首都接見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的記者時，曾發表過一節重要談話，很可概視當時政府對於和戰最低條件的抉擇態度。

問：滿洲問題之解決策如何？

答：余迄最近，均在野，故於政府方針，初非所稔。今後欲商議將來方針，余意若雙方以誠意相接近，則自能達於解決點。

問：廬山會議所定之方針（指同年六月中旬先生偕羅文幹，顧維鈞等在廬山與蔣氏協商對日政策——編者）蔣公使（指蔣作賓氏——編者）歸任後有否新發展？

答：蔣公使歸任後與齋藤首相外相等迭相會晤，一再說明政府之意嚮，覺反響寂然，失望殊甚！由斯知兩國之接近，固非易也！滿洲國雖告成立，君以爲能克竟其獨立乎？

問：…………

答：日本倘謂非使滿洲獨立不可，使其事果現，則中日兩將結百年之仇讎矣！縱不若如亞爾薩斯勞倫之例，顧中日殆將胥爲其困。不如此冒險，而能使日本較獨立爲更有利，並不使中國受損害，以此方法而解決，顧非最善耶？

問：…………

答：一言以蔽之，卽日本在滿所有條約上之一切權益，中國還以誠意承認之。逾此，則不能讓步。

問：共產軍之跋扈，較滿洲問題，非更於中國以致命傷乎？滿洲則拋棄之，對共則採取中日之共同戰線，尊見如何？

答：拋棄滿洲問題，是爲領土分割。孰謂爲共同戰線而可以拋棄領土乎？今國民黨內豈有願與其顧此失彼而喪失滿洲，無寧聯俄當日之爲愈也……（原文引自「申報月刊」一卷三期。）

這段談話，不僅在當時未有正式否認，而且在這談話發表前一月（六月廿五日），先生已有「外交已窮，惟有努力自衛」的宣告召告國人，表示最低限度，已至窮途。而這最低限度，在當時卽是承認中國雖無力以武力以收東北四省，但亦不願承認滿洲獨立。關於這一點，在前引的林柏生氏文中，也有這樣的表示：

認定目前形勢，東北四省決非武力所可收復，如此則唯汪蔣感電所說的，確立一個最低限度。所謂最低限度，卽決心不承認×滿。在最低限度內，可以忍讓，可以委曲求全，逾乎最低限度，則惟有決裂，惟有犧牲，寧死不辱。（二四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專論。）

張學良彈劾事件

我們對於歷史事件的評價，應唯一抓住此事件的現實爲基礎。從抗戰到和平，中間不知有多少矛盾，但矛盾正是歷史發展的基本條件。我們應該重視的，是怎樣能在歷史的刻刻矛盾發展中抓住刻刻的現實，而運用之於實際的政治。今日之我攻擊昨日之我這一句話，決不應該當作諷刺意味看，而應

視之爲歷史進步的鞭策。我們應重視歷史，而更應重視刻刻的現實。

在這種意味上，先生於過去之敢於跳進火坑，號召抵抗，以及後來的復爲於負責簽訂和約，可謂完全體現了歷史的眞理。他的一面抵抗與一面交涉的主張，實在懷有無限的苦心在。他的提出最低限度，也完全是出於當時情勢的實際考慮。這是一個大政治家所應有的風度。

戰與和，一是手段，一是目的；其間的抉擇不能憑了感情或意氣，而當根據國家的利害。在一二八時代，即有許多人在感情的驅使下要求徹底長期抗戰，然而他們對於國家的實際力量，並沒有眞正的估計。因此對於淞滬協定的簽訂，不免發生了種種誤解。其實當時先生的中心主張，可以包括在二句話中，即在不得不抵抗的場合應該抵抗，在可能和平的場合應該和平。所以當八月間因張學良藉口抗戰而向中央勒索軍費時，先生就不禁憤怒萬分，願以辭職力爭了。

先生於是年六月中旬參加廬山會議後，即偕顧維鈞羅文幹等飛平與國聯調查團有所接洽。此行先生實抱有二種使命，第一，即是想以外交的路徑向國聯調查團有所陳說；第二爲準備外交路線萬一走不通，他要求北方的軍人在他們自己防區之內，實施一面抵抗。然而當時稱兵一方的張學良，對先生則稱病不見，對中央則先欲要求軍費，因此關於北方時局，即有種種謠傳。及至八月五日，先生即憤服離京，翌日向各方發表辭職書五通，其致張學良一電謂：

溯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賴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奮死抵禦，爲我民族爭生存，爲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於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得暇作戰，暫恃賴

者，然爲安定內地，鞏固後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當日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旣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簞壺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部者，即爲五百萬，至少先交二百萬，所責於鐵部者，則爲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際，中央財政竭蹶萬分，亦有耳目，兄豈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實行抵抗之前，弟亦斷不忍爲此揮霍。弟誠無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於弟，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爲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惟兄裁之。汪兆銘魚。

反軍閥不果再度去國

這份通電一經發出，外間卽發生了種種的猜測，誰都不相信事情就是這樣的簡單。一部份人猜測因爲先先生曾到過北平要求張學良出兵東北，張答以須本人親自商諸蔣氏，而蔣則諉稱因剿匪軍事羈身，不能到京協商，同時二次廬山會議亦不克實現，故先生遂不得不告辭職。另一部人則認爲先生對張不滿，曾向中政會提出處置辦法，經決定令先生與蔣氏負責辦理，然蔣並無若何表示，先生遂願以去職力爭。

惟據當時任鐵道部次長曾仲鳴先生的談話，則謂：「汪氏此次辭職，實因北平綏靖主任張學良藉抵抗之名，要求軍費之故。汪氏以行政院長，當可免張學良之職，但經再三考慮大局之結果，決自行引咎而同時勸告張學良辭職。」

張學良於接得先生通電之後，當夜即發表談話謂：「得汪院長來電，極爲痛心，値此外侮日亟千鈞一髮之際，原應共赴國難。私人之間，詎容再生意見。汪先生欲予去，儘可直告，何必牽涉其自身，又何必於電文內，摻入遠於事實之語，」接着結論是：「立當部署所屬，準備交代，決不拂袖引去，危及治安。」

先生於辭職後，卽向中向推薦蔡元培于右任戴季陶三人任行政院，並指責張在北方截留稅款，未發軍餉。其致中央促准張氏辭電中，有謂「請准張學良辭職，以爲打破軍人割據局面之發軔」等語，詞意非常堅決。

這一個局的形成，使政治上引起絕大的不安，然而政府中人對於先生的苦心是十分同情的，他們深知先生此舉決非含有私人意氣而實迫於大局。因此中央決對先生挽留，迭次派遣大員請行復職，並准張學良辭職。如是往返十日，先生鑒於各方切望甚殷，表示願在中央黨部服務，但關於行政院長職，決請副院長宋子文代理，聽候三中全會最後決定。

先生對於張學良的一節插曲，實際上本含有反軍閥的鬥爭意義，蓋一面抵抗與一面交涉的政策，必須在軍事與外交取得步調一致之後始克求其實行。但欲軍事能配合外交，軍人各自爲政的局面必須打破。而張學良的割據一方，對於折衝當時北方局勢、尤非加以排斥不可。至於張藉抵抗之名欲勒索

鉅款，祇是提供了這事件爆發的引子。是故在中央旣准張辭職之後，先生認爲反軍閥的目的已達，亦即表示願再在中央服務。

但不料先生十六日返京，復經三天的廬山會議之後，中央對於張氏去職的決定，忽有了不同的考慮。首先，蔣氏爲顧全張面子起見，在准令辭職之後而仍殷請其出國，接着華北五十七將領復有與張氏共進退的宣言。此時熱河方面情勢告急，張遂藉口指揮軍事，戀棧不去，而中央復於准張氏辭職之後畀張以代理華北政委會主席之職，如此行爲，直同兒戲，同時國內又有韓復榘與劉珍年衝突事件發生，知制裁軍閥之不足恃；而國聯調查團報告的發表，亦使國人大感失望，先生於茲一因舊病復發，一因對時事的消極，遂決意去國休養。

先生於九月三日赴滬就醫，旋赴莫干山，復因病勢關係，決意出國求治，於臨行之前，除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其六點批評外，並予其臨行談話中發表感想謂：

兆銘自去年十月由廣州至上海，今歲一月入京，以至於今，共赴國難之念，始終未曾少有變異。惟政治設施，十未逮一，內疚神明，非言可喻。夫政治不修明，則雖欲共赴國難，亦可無所藉乎。然政治上之張弛緩急，各同志間見解容有異同，則又不可不以共赴國難之念，歸之於一致，此兩者似相矛盾，實則相成。所願諸同志精誠不懈，而審愼從事也。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本爲蔣胡兩同志及兆銘三人。胡同志久未赴京，兆銘今又因病曠職，致蔣同志獨任其難，思之懸懸於心。

其衷心懸揣，自是不難瞭解。幸先生此去，爲時甚暫。汪蔣合作之第一章雖於茲暫告結束，但其合作基礎，則依舊存在。

第十二章　國難政治的經營

「跳火坑」共赴國難

民國廿一年十月廿二日，先生率同眷屬隨從一行，赴德國之士年根鐵療治休養。先生事先雖屢堅辭行政院長職，惟因中央決議挽留並予三月病假，而以宋子文暫代，故此次出國的性質，純屬因病休養，與當時一般人所猜測的政治病截然不同。先生於青年時代奔走南洋，旋又困於獄中生活，以其少年多病之軀，遂致罹有糖尿病，頻年發作，迄未根絕。先生之屢次出國，目的即在求治。

先生出國不久，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旋自洛陽遷返首都，本應於是年九月召集的四屆三中全會，亦於十二月十五日在首都召開。然而胡漢民以及大部份的西南委員，並未參加此項會議。此次會議最重要的一點決議，即決定召開國民參政會並保障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等的自由。但在他方面，蔣氏以武力統一中國的企圖，並未因這些民主色彩的決議案而稍爲放棄。

早在民二十年十一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本已決議蔣介石氏應負責北上收復失土，但另方面在安內攘外的口號之下，蔣氏僅全力注意贛省的剿匪事宜，對於因九一八事件所引起的中日問題，既無謀政治解決的決心，亦無武裝抵抗的準備。所以當時全國上下雖呼號國難緊急，反映在國內方面的，却是四川軍閥的火併爆發於前，而繼之是所謂共匪的「長征」，就連新疆邊省，亦因內亂告警。中國存亡的危機，在這時已發展至最高點。

中央對日既無最高的決策，由九一八事件所引起的雙方情感，遂致更趨惡劣。淞滬協定雖暫時造成了中日問題樂觀解決的空氣，但因政府未能加以適當運用，這種空氣也就成了曇花一現。至民國廿二年二月，華北的戰事又見爆發，這次已經迫臨熱河，日方要求中國軍隊退進關內，其間雖經一度猛烈抵抗，惟其性質僅限局部而無通盤計劃，結果熱河省主席湯玉麟遂亦步張學良的後塵迅速放棄了防地。

繼東三省之後又復喪失熱河，其情勢的嚴重使政府與黨成了衆矢交攻的目標，先生是時息居德國，以熱河一失，平津將危，若不早圖政治上之解決，國是行將不堪聞問，同時復受中央一再敦促，遂不顧病體未痊，毅然就道返國。於三月十七日自德安然抵滬。但先生因病體關係，在返國之初卽表示雖願在中央黨部服務，惟對行政院長一職，則願請宋子文實就。

不過輿論方面，均渴望先生儘速復職，冀免中樞長此乏人主持，例如當時滬上時事新報評論之「迎汪精衛氏並論行政院長」，大晚報評論之「汪不能辭長政院」等，均爲民間對先生渴望輿情之一斑。三月廿五日，蔣介石氏亦復由華北巡視中飛返南京，先生在各方環請之下，遂於翌日偕同孫科，顧孟餘等至京晤蔣，於三月底重行復任行政院長職。決計以「跳火坑」的精神，共赴國難。

華北停戰協定

先生復任第一步，卽取代羅文幹自行兼外長職務而令唐有壬補之，一面並起用黃郛爲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這種重大措置的結果，使中日間的緊張關係，忽現了一線光明。當時紛傳中

央外交有妥協傾向，其實先生當時對於日本的外交態度，可以觀測自黃郛氏抵平津時向外發表的談話中。黃氏之言謂：「華北局勢危急到此地步，進行亦頗不易，必須各方通力合作，任何事件，方可有濟。外傳本人到平後，有與日本妥協說，絕對不確，本人想此時，中華民國國民，無一人敢於對日方妥協。軍事方面由何部長（應欽）負責，本人亦可參加意見，對日交涉非一天半天即能有辦法，本人當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應付華北危局。」

就黃郛氏事先與先生及蔣氏數度談話觀察，這篇談話無疑是當時中央的意志，亦即是先生的對日外交態度。事實上當時國內雖有極緊張的抗戰情緒，但政府方面鑒於國內治安未臻鞏固，以及屢次局部抗戰的失敗結果，認為對日問題仍宜着重外交途徑。即如蔣介石氏，雖曾在華北緊張之際一度前往保定，但自在南京與先生會談之後，亦認為剿共重於抗戰。先生於三月卅日復組行政院，蔣氏即於四月四日乘艦赴贛，於十日召集各將領訓話，在聲明北方軍事交託何應欽之後，即發表其對當前問題的主張謂：「抗戰必先剿共，徵之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前，絕對不能言抗戰，違者即予以最嚴厲處罰。各方務專心全力，必期最短期間，肅清匪共。」這已經很明白的表示了當時中央的態度。

華北停戰協定，終於在先生苦心經營之下，簽訂於廿二年五月卅一日。這是不待解釋的，華北停戰協定所表現的是中國在軍事上的屈服，對於民眾的心理上是一種苦悶的打擊，但停戰協定的真正意義，則一如先生當時聲明中所剖白的，正是表現了政府敢於負責的表態。

有人非難過去不抵抗而喪失國土，今日則由抵抗而喪失更多領土；實則以中國現有之國力，最初就知道臨

抵抗亦明覺無勝利之望。其所以抵抗者，無非出於愛國心的要求。是故外國所臆測之有承認割讓國土說，敢保證斷無其事。政府現正實開始與日本交涉，其是非利害，唯有訴之國民的誠心與永久的判斷。

國內政治的漩渦

事實上中國在這個時候，戰旣不能，和亦無望，所能為者，唯有以任重負遠的精神，一面力事國內政治的振刷，一面循外交路線從事折衝。欲擔當這艱的艱難任務，非有堅毅卓絕的精神不可。自華北停戰協定之後，先生所主持的政治外交，便是採取這種方針。

國內政治問題還是當時全般問題的重心。在華北停戰協定成立之後，西南當局對於中央的外交方針與對內政策，卽已表示不滿，他如察哈爾問題的難於解決，華北的軍事善後問題，新疆與四川的叛亂，剿共問題的緊張，在在使國內政局動盪不安。為處理這些問題，先生於同年七月間應蔣氏之邀，前赴贛省參加廬山會議。結果對於察哈爾省異動的馮玉祥問題，終於由汪蔣七月廿八日儉電所提的四項原則宣告解決。華北戰區的接收與平榆通車，通郵各項問題，亦漸次獲得解決。

但國內政治的危機，並未因此而見消失。在南京政府內部，對於以外交方式與日本折衝的問題，亦有不滿情緒的抬頭，尤其自八月底宋子文從美國獲得棉麥借款，在倫敦簽訂白銀協定，與國聯成立技術合作，返國之後，在內政與外交上發生了不小的影響。英美系份子在南京國民政府中的得勢，當然使得對日外交發生了波折。九月間第三次廬山會議雖表示中央決策，宋苗贊同，並聲言借款用途決全部用於經濟建設事業，但其影響所及，與後來一連串的事件交相匯流，實不可不予注意。

因西南份子的反對中央，十一月間的閩變事件遂亦宣告發作。陳銘樞是這件變亂的主動人，他的社會民主黨便是這次變亂的組織中心，構成閩變事件的中心人物，除陳銘樞之外，是李濟琛，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陳友仁，徐謙，黃琪翔等，他們中間幾乎無一人不曾受過蔣介石氏的提攜，所以現在他們利用時機，提出徹底民主的主張，其真正的政治目的，是不難推思過半的。

爲解決閩變事件，釜底抽薪的辦法當在取得西南派真正有力份子的合作，廿三年一月召開的四中全會，便含有這種目的。然而張繼，馬超俊，陳璧君，王陸一等奔走港粵的結果，雖勉强拉攏參加，但終於未曾取得息影港地的胡漢民氏合作。胡氏對於閩變問題，僅提出八項廣汎的主張，結果西南方面遂僅派鄧青陽，劉廣秀，李綺庵，關素人及黃旭初五人爲出席四中全會的代表。

閩變事件一時幾有使南方引起嚴重外交事態的形勢，但幸處理得法，旋即敉平。惟在華北方面，因通車通郵及貿易問題等懸案未獲解決，日方遂要求我國徹底實行塘沽停戰協定。四月間先生至南昌晤蔣，並召喚黃郛南下，所謂南昌會議，一時遂成國內時局重心。其實政府方面對於北方問題所唯一致慮者，厥在因通郵通車而致引起之對滿關係。此種外交不克徹底的根由，實還因於當時國內政治觀點的未能統一。無論是淞滬協定或塘沽協定，如果政府當真願在對日問題上走外交協商的路線，則此兩項協定未始不是中日問題的轉機。可是當時的實際情形却不然，在先生主持下的行政外交，雖極圖根據此兩項協定的精神，謀求直接解決中日問題，可是代表另一種政府勢力的英美系份子，却圖積極結合英美以爲中國聲援。棉麥借款，白銀協定以及拉西曼來華參加技術合作等一連串的事件，使好容易打開的中日外交門戶爲之閉塞。

針鋒相對的中日外交

在南昌會議同時，日本外務省於四月十七日發表的一篇非正式聲明，卻啟示了中日問題的將來前途。這篇聲明的原文如下：

日本因其對華關係中之特殊地位，故其對於與中國有關係事件之意見與態度，或不盡與他國相同，但必須諒解者，日本須用其全力以行使其使命，而履行其在東亞之特殊責任。日本不得已退出國聯者，以因雙方在意見上不能協定維持東亞和平之基本原則也。雖日本之對華態度有時與外國相異，但此差異乃不可避免者。因日本之地位與使命故也。日本無時不欲維持並增進其對外國之友好關係，固無待言，但同時吾人以為保持東亞之和平與秩序計，吾人天然的必須行動，雖單獨行動自負責任，亦所不辭。吾人職務所在，不得不如此也。同時能與日本分負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任者，唯有中國，故中國之統一，中國土地完整之保持，中國境內秩序之恢復，皆為日本所切望者。證之歷史，此種期望，除中國覺悟及其自己努力外，莫能達之。是以吾人反對中國方面利用任何他國勢力以圖抗拒日本之任何舉動，吾人亦反對中國所採可利用一國以制他國之任何行為，在滿洲與上海事變之後，外國所擔任之任何聯合行動，縱出以技術或金融名義，當然含有政治意味，此種性質之擔任，如實施到底，勢必發生糾紛，終至釀成如劃定勢力範圍，共管中國，或瓜分中國問題之討論。此實為中國最不幸者，而亦有極大影響於日本與東亞也。日本雖未有干涉任何外國在金融或商業問題上各個與中國談判，既有益於中國而又無礙於東亞和平之維持者之必要。但在原則上，必反對如上述之擔任。至於以軍用飛機供給中國，在中國建造飛機場，及遣派軍事訓練官或軍事顧問前往中國，或承募借款供給政治用途之經費，則顯然可離間中日與他國間之友好關係，而擾亂東亞之和平與秩序。凡此舉動，日本將反對之。上述之日本態度，觀於日本

前已進行之政策，即可知之。但因聞外國現有藉口一種名義進行聯合行為之積極運動，故此時不得不實行聲明其政策。

此雖為一非正式聲明，但在中日關係上實為一種重要的文獻。當時問題的焦點，在日本祗願意中日兩國之糾紛，由中日兩國自身協商辦決，對此意見，中國政府表面上雖加接受，如見諸前述兩協定之簽訂者，但在另方面則確未曾放棄其引援第三國力量為己身聲援的企圖。此在同月十九日我國外交部所發表的聲明中可以看出。

中國深信國際和平之維持，端賴世界各國之集體努力，國際間如欲維持長久之和平，尤須促進互相諒解之誠摯精神，與剷除可成爭端之根本原因。世界無一國得在任何地方，主張有獨負維持國際和平之責任。中國既係國聯會員之一，對於提倡國際合作，促成國際和平與安全，認為其應有之義務。中國於努力達到此項目的之際，從無欲中傷任何他國之意，更無擾亂東亞和平之念。中國因實行上項目的，而與他國發生之關係，一如任何獨立主權之國家間應有之關係。

中國尤須說明者，中國與他國之合作，不論其為借款或技術援助，常限於不屬政治之事項。至於關於軍用品如軍用飛機等，及雇用軍事教育團或專家，亦僅為國防上之必要，大都為維持中國之秩序與安寧。他國對本國苟無野心，則對於中國力謀建設及安全之政策，殊不必有所顧慮也。

在中日現有之情勢，有不能不鄭重申告者，即兩國間猶如任何國家間，真正與永久之和平，總須建設在善意與互相諒解之基礎之上。倘現有不平之事態，可予糾正，中日間之關係，可令其改善，而顧及兩國間之共同願望，則上述和平基礎之設立，事半而功倍矣。

此種外交詞令的針鋒相對，使兩國外交關係又一度趨於緊張。於南昌會議中，因先生竭力主張採

取緩和方法，通車通郵及接收榆關問題等相繼圓滿解決，可是因政府內部親英美派的活動愈盛——如廿三年底美國派遣經濟調查團來華，拉西曼調查報告之發表等等，使兩國民間的誤解愈深，至十一月間，兩國輿論竟發生了圍繞「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問題的大論戰。

兩國輿論的筆戰——日本方面

此項論戰起因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刊載該社上海特派員田知花氏的一篇通訊，而同社復據該篇通訊發爲社論。田知花氏在其文中開首即謂：

現在之中國，本非衷心希望中日關係的鬆弛，縱或有之，亦不過因懷疑日本對華方針，而出於對日本威力的牽制策，此則雖因滿洲事變所受之深刻刺激，但是根本原由乃因過去幾十年日本國際外交之不順，於不知不覺間培植之迷夢——即輕視日本國際地位之觀念，此種迷夢一日不打破，縱確立一百個對華政策，亦難望中日關係之調整，記者於此深信，必使中國知日本之實體。

在述及先生之外交方針時，田知花氏加以譏論謂：

汪氏所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口號，雖出自對內之立場，而汪氏之所謂親日政策，實即此種「一面交涉」之蒙昧，蓋因滿洲事變之刺激，政府懾情勢劇化之卑計，乃對內籠民心之激昂，對外裝和平之態度，力求一時之收拾，而脫自國之憤懣。故自此立脚點而設定之對日政策，極言之不過一種假裝而已。

事實既已證明，華北關題並不如日本所期待之發展，停戰協定之善後問題，尚餘許多細目，至今一年又半，迄無進行。加以中日間之根本問題，如排日之禁遏，日滿經濟之提攜等，已成不能涉及之狀態，對日關係，僅不過繫於欲明欲滅之微光。一遇狂風，則將爲黑暗所襲。所謂狂風者，即指日本之將來與汪兆銘外交之

基礎，如現在所取之假裝的對日政策之汪兆銘氏，雖視之爲機會主義者亦無疑義，則日本將來對華政策稍讓一步或萬一須應付國際危機而不能顧及中國之際，則氏之對日政策，即將一變，其事甚明。

尚有其他國民政府首腦部不滿汪氏之政策，一時暫守緘默，且顧維鈞顏惠慶王寵惠等歐美派，均抱不同之政見，欲利用歐美以打倒日本在東洋之勢力。彼輩常持其在外國任所時所作成之強烈抗日方策，即蔣介石氏之門，在其背後潛伏之宋子文氏，對於國民政府之基礎，握有無言之決定權。此種事實更增示汪兆銘外交基礎之薄弱，同時蔣介石之意向如何，亦爲不可忘却注意之事，蔣氏及其他政客乃重視歐美對於極東之發言權，相信恃歐美之力，可以阻撓日本在東洋之獨霸，因三國干涉而交還遼東，因華盛頓會議而山東放棄，擬日日本外交敗退之景況，曾爲今日中國適用之迷夢，順列強之力不足，而口唱「自力圖存」……

兩國輿論的筆戰——中國方面

此種議論一經傳至中國，上海輿論界即起而發難於先，全國新聞界亦景從其後，遂造成中國報界對日輿論總動員的局面。茲摘引當時「中華日報」之社論以概示其一斑。「中華日報」之社論題名爲「大阪每日新聞之謬論」：

田知花通訊原文，關於中國對日外交的觀察，一本日本人向來之態度，譏諷攻擊，無所不至，此種論調，習之已久，原無足怪，所可異者，每日新聞社說尸尸然以「中日關係正常化」爲詞，而田知花通訊中之所言，無一字一句而非爲「中日關係正常化」作梗者。日本人日言，「欲對中國打開真正的協調親和之關係」，而歷年以來，蘊存於日本人之心中，表現於日本之行動者，無一非乖離違戾之蘊蓄，協調乎，親和乎，吾中國人求之，誰敢破壞之，吾東亞人求之，誰敢破壞之，吾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求之，誰敢破壞之，吾願日本人深長思

之也。

……田切花强調中國亦非「衷心希望中日關係之調整」，然同文同種如中日，休戚相關如中日者，而其關係胡爲而不能調整，田切花亦曾一反躬自問否乎。是則中日問題之鎖鑰，日本人能於此平心一求其究竟，則中日關係之調整，思過平矣。夫國際間關係之所賴以調整者，無他，和平而已耳，信義而已耳，惟彼此同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後能相與以言和，亦唯彼此始終以信義相處，而發和平云者乃爲眞正之和平，而非徒爲強權者掩耳盜鈴之空言。中日關係之調整，必於眞正和平與信義中乃能求之，即一切國際間關係之調整，亦必於眞正之和平與信義中乃能求之，此吾人之根本觀念，所可爲日本人及全世界人士告也。（下略）（原文摘自廿三年十二月「中華日報」社論。）

此外如申報之「中日友好之關鍵」，新聞報之「日報妄事推測」，時事新報之「如何打開中日的僵局」，時報之「大阪每日新聞之謬論」，晨報之「爲中日關係告日本人」，杭州南京日報之「闢大每記者謬論」，華北日報之「近三年來之中日外交關係」，杭州東南日報「闢大每記者謬論」，天津庸報之「中國的立場」等等，均爲同一論爭中的文獻。而在同一時期，中日輿論界對兩國關係的論爭，亦至爲熱鬧。胡適與室伏高信，陳高傭與室伏高信，周憲文與山崎靖純，以及由室伏高信，太田宇之助，中野正剛，大西齋，小島精一，杉森孝次郎，原勝等氏在「日本評論」上所舉行的「中日問題之諸座談會」，也同屬於這一時期的波浪。

內政上的重大勝利

然在先生主持下的內政外交，不論周圍的風雲如何險惡，仍一秉其堅毅不動的勇氣，向旣定步驟

積極推進。在內政方面，自廿三年冬江西剿匪告一段落，先生趁蔣氏巡視華北及西北歸來之際，於五中全會召集之前，與蔣氏聯名發表了整飭內政的著名「感電」（廿三年十一月廿七日），其內容要點凡五條，因性質重要，茲舉其綱要如下：

（一）關於法制，中央祇宜規定原則大綱，富具伸縮力，其實施辦法及詳細條理，則由各省市自行厘定，以期因時因地因人各得其宜，而無削足適履之病；

（二）關於用人任命之權固操之中央，而人選則應由各地方主管長官就有法定資格者選擇保薦，至於任期，則以三年一任為原則，且明定保障，任期中不應無故撤職，任滿之時，其成績優良者，並由中央重加任命，予以連任，以期收人盡其才之效；

（三）關於地方行政及經濟設施，應由地方斟酌實情，擬定計劃，編制預算，呈請中央核定施行，但須按其期程，考其成績，而不必過事干涉，使得自由發展；

（四）關於中央與地方之財政，應明確劃分，凡屬於全國性質之國家財政，應由中央統收統支，例如對外有關之關稅等，其稅則與收支，尤應絕對歸中央管理，地方固不得干涉，其他國稅，亦應守中央所頒布之稅則與稅法辦理。至於地方財政，則由地方管理，其在過渡期中，地方財政確有不足者，則由中央酌擬補助，使內外相維，以資調整；

（五）關於國防軍及地方兵警之區別，應確定標準，國防軍為捍衛國家之武力，故關於國家之正規軍，其管轄指揮，須統一於中央，但在過渡時期，得依平時之隸屬關係，對於部屬之任免，得由其最高主管長官呈保中央任命。至於地方兵警，如保安隊，保衛團，警察隊等，除編制數額須由中央核定外，訓練調遣之權，概屬於地方長官，無論國防軍或地方兵警，若有向外國購置武器之必要，應呈請中央代為購訂，以求器類之均一。

除此五點外，對於人民與社會團體，在宣言中亦明文闡明得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並剴切聲明國民黨為救國而努力，決不願蹈一黨專政的謗名，謂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並無施行獨裁政制的必要。

這一篇宣言的所以重要，除了其表現力求內政修明與統一外，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其對獨裁政治意識的制裁。這表現了汪蔣合作的最高潮，也表現了先生的政治主張戰勝了獨裁政治的謀略。所以這份宣言一經發表，不僅引起全國輿論的絕對擁護，且在五中全會中得順利通過，這不能不說是先生代表民意的成功。

外交上的重要建樹

在外交方面，自南昌會議個別解決華北問題後，日本廣田外相於廿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特在帝國議會闡明日本外交之「不威脅不侵略」方針，聲稱日本為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計，希望亞洲各國一體協力。旋日本駐華公使（彼時尚未昇格大使）有吉明與鈴木中將進京謁晤先生與蔣氏，說明廣田外相在議會演詞的真義與日本對華的真正態度。兩國關係頓呈好轉狀態。二月十三日，國府明令取消抵制日貨法令，於同月廿二日的政治會議中，先生在「關於中日外交方針的報告」中，曾謂：

> 吾人欲使中國成為一現代國家，有二個必要條件：一即統一；一即建設。實現統一與建設，必須有長期之和平。是故中國對於任何友邦，均願在平等互助的原則之下，保持並增進友誼的和平關係。而況日本與我國，在地理上，歷史上，文化上，種族上，均為一保有密切關係之鄰國。

余曾記憶總理孫先生於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在神戶所作之演詞。其中曾述及「就中日關係論，不論從何

方面言，唯有兩國國民攜手協力，以謀兩國前途之發展。」此項演說，爲總理一生最後的演說，爲我同志所刻骨不忘。總理一生對中日外交的根本方針，亦不出此。然不幸者，中日兩國不僅未舉親善之實，且二十餘年來兩國間不斷發生意外糾紛。惟吾人深信中日兩國關係，因過去保有悠久歷史，現在雖有糾紛，以雙方誠意，終不難解決。

此次閣議廣田外相演詞，認爲與吾人年來主張，在精神上大體吻合。中日兩國既有此共鳴，有此相互協力，由此即得改善機會，恢復常規。總理當時對中日提攜的希望，亦得期其實現。

要之，若中日兩國人士，不拘一時利害，不感一時感情，能以誠意而主持正義，爲兩國間謀永久和平，則中日兩國之根本問題，必得合理解決。此不僅爲兩國福利，東亞福利，且亦爲對全世界和平之最大貢獻。

同時蔣介石氏亦於二月一日發表談話，略謂：

此次日本廣田外相在其議會所發表對我中國之演詞，吾人認爲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切之諒解，中國過去反日之感情，與日本對華優越之態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爲敦友睦鄰之道，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裁制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爲，以示信義。

蔣氏於二月十四日對日本記者發表的談話中，更明白闡述其對中日問題的態度謂：

中日難局之根本解決，當以道義兩字爲出發點，中國人民，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本無排日必要的理由，但中國人民實普遍的具有深刻的反清思想，即排斥清室統治的思想，積三百年間之不斷奮鬥，始得解脫滿清壓政之羈絆，全中國人民至今尚有極沉痛之回憶。自東北問題演變至現階段，創痛愈深，此一思想可爲擴深帶因，萬難消除，如東北問題，一如今日之現狀，則此種反感心理，日見深刻，非任何力量所能消滅，故研究中日提攜能否實現，萬不能忽略此種國民心理之重要因素。中日兩國識者之提攜，應先從改善兩國間之現

狀，並恢復其常態關係做起；且當有互助互惠之誠意，而不可含有其他之作用。

「救亡圖存的方針」

蔣氏此種意見，與先生於廿四年元旦所發表之「救亡圖存之方針」一文所述，並無若何不同，祇是先生着重總理生前所示的中日關係應取方針，更甚於重視現狀。他在這篇文章中根據總理遺囑的要求，詳細分析中國近百年來外交之得失，並國民革命發動的經由，同時對於平等與自由的眞諦，在中國精神本位上作了一個正確的解釋。接着他才指示救亡中國的根本方針說：

第一，我們必須知道，現在的國難是意中事，不是意外，是蘊積了幾十年而爆發於一旦，不是忽然而來，我們必須下決心，準備長期的奮鬥。

第二，我們必須知道，以前的推翻滿清，以及推倒袁世凱，以及掃除國內南北大小軍閥種種工作，不是徒勞的。這是國民革命前半期的必要工作，經過這些工作，方纔能夠掃除障礙，使國內歸於統一；得以集合國內的心力物力以從事於後半期的國民革命工作。

第三，我們必須知道，後半期國民革命工作，便是應該用力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謂用力，便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種種力量；所謂應該，便是與世界最強國較短長。我們必須具有與世界最強國同等的力量，方才能享受世界最強國平等的待遇。這是需要眞實的力量，不是可以僥倖得來的。

根據這種遠大的眼光與見解，他更進一步具體批判國內一部份人士的不當態度說：

他們責備政府不能和的理由，以爲今日政府既然自顧力量不能收復失地，那麼何不採取「毒蛇螫手，壯士斷腕」的辦法，忍痛言和，打開僵局，徐爲後圖。（中略）中國國民黨既然以革命自任，應該有此決心與勇

氣，既不能戰，卽當言和，不應如此顧慮多端，優柔寡斷，適蘊資備，似乎甚是，他卻忘記了中國今日的環境。（中略）

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與日本也曾以兵力衝突過幾次，如淞滬之役，長城各口之役，除了中國以兵力抵抗之外，有其他各國動過一兵一卒嗎？（下略）

（上略）以上所說，是證明每一個國家都有牠一個特殊的環境，決不能印板相同，因此應付這個環境的方法，也就不能印板相同。（下略）

一波三折的中日關係

中日雙方，既有相接近的見解，兩國經濟提攜的口號，亦就顯見活躍。日本外務省橫竹商務官，適於此時由上海考察返抵東京，遂向日本政府提出中日經濟提攜的重要報告，日政府卽根據之作成具體合作方針，包括五點內容：一、中日經濟關係之調整，中國先應決意重建經濟政策。二、其具體方法，改革畸形之糧食輸入政策，注力改進農業，日本當予積極援助。三、促勵中國大量農業生產，以便日本工業應用。四、重視中日兩國貿易關係，日本由中國增買棉花三千萬元，中國取締排斥日貨運動。五、對於中國財界產業界之應急處置，不以借款形式爲之，而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元信用制度，以期圓滑兩國貿易制度。日方此項建議，無疑係針對當時中國政府在經濟上積極依賴英美的傾向。一時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的呼聲，遂亦響遍兩國。

但不幸的是，中日兩國政府，雖遂有接近的表示，尤其在先生方面，認爲這是中日關係改善不可失之交臂的良機，因而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政治會議中，由先生與蔣氏聯名提議，正式廢止統制日

貨令，並在宣傳政策與教育政策方面，亦有所變更，以邵元沖代替葉楚傖爲中央宣傳部長，修改不妥教科書。至六月十日更正式頒發「邦交敦睦令」。可是在另方面，英美系的政治經濟勢力，利用中日多年來交惡的感情，已深深把握了中國的輿論。如其不信，請一看當時國內外重要輿論對於中日經濟合作問題所表示的態度吧。

當此中日經濟提攜説與英美日諸共同援助中國財政經濟説發勝之時，中國國民黨覺悟者有三：第一，國際局面漸變，整個中國問題必於今年重登國際政治之舞台；第二，中國國民除在經濟上採用自力回生策，在政治上採用民族利益至上主義外，別無辦法能應付此新局面；在國際場中當然寧爲雞口，勿爲牛後。（大公報）

最近日本方面雖滿佈中日提攜的空氣，但我們却有不知中日提攜途程究竟在那裏的感想？（晨報）。

日本政府當局，如不了解中國人民對日的眞正心理，而唯以消除排日運動不澈底之藉口，責備中國政府，則其結果，一切中日合作之計劃將歸泡形。（密勒氏評論）

日本對華有特殊之關係，固無人加以否認，惟其他各國，尤其是英美等國，在華利益未必有遜於日本，此等國家在華地位，亦極爲重要，不當加以透視。（倫敦泰晤士報）

日本倘有放棄其軍事侵略，更新中日局面，恢復外交常軌之誠意，這於日本自身，於東亞和平，以至於和世界和平，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我們以爲中國政府，亦不宜優柔寡斷，應該根據既定方針，予以考慮。（中華日報。）

當時的國內外輿論，幾無一致正面贊助中日經濟提攜以至全面合作，這就是中日關係的大不幸。

日本政府目睹中國內部政治意見未能一致，即轉而單獨謀對華北作有所政治經濟活動。在華北空氣再

底處於緊張縣中，代表英美系主張的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人，對於先生的外交政策，亦愈露骨表示不滿，而秘密政治團體的活動，更使外交推進發生阻礙，七月間先生因病暫退休青島，至八月九日，終於提出辭職書，

南京生活的回憶

計自二十一年春先生入京主持大政，於茲四年以還，其爲國家盡瘁的苦心，極爲當時輿論所諒解，這在我們此後行將引用的文獻中可以看出。在這相續四年的首都生活間，先生對於南京，自然發生了一種親切的感情，這在他「南京的正月」回憶中，會有所敍述。

在中國最感特深的正月，是一九一二年的正月。上一年末，舊曆十一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先生到上海，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從這一年起，中國廢止過去陰曆，採用陽曆。

在這個正月裏，孫中山先生參拜明孝陵。對於孫先生的參拜明孝陵，無政府主義者的吳稚暉，李石曾等，大加攻擊。他們的論旨是：主張民權的孫先生，爲甚麼參拜舊時君主的陵墓。我自己對於先生的參拜，並不反對；但吳與李的議論也別有見解，很有趣味。可是不久，我便感到爲他們的議論所動心是不行的，孫先生的參拜孝陵，從民族的見地來看，是很有意義的，他們是站在無政府主義立場上來反對的，我是不會對他們共鳴的。

這個時候的事情，還有一件，是不能忘掉的，那便是中山先生就職的宣言。這是我起草的，先生對於我所寫的，一個字也沒有改，照原草發表，這在當時年青的我，感到一種意外的喜悅。在這宣言中，有「臨時政府

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的一句。這實在講是借用了我在法政大學畢業時，山田三良先生講國際法時所講的一話位常常在講撤廢治外法權，廢止領事裁判，但在向列強要求之前，先得盡作為國家社會的一員的義務」的。

回憶當時，我在那個時候，考慮過下述的一個事。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宋教仁等大為反對。其理由是：現在孫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那末，恐怕在北方，以袁世凱為中心，將計劃反對宣統退位。但是在實際上，却正相反，在南京孫先生表示了堅決的態度，結果，促進了北京的工作的實現，促進了袁世凱的決心。孫先生一到宣統退位，便於二月十二日，發表「咨告辭職讓薦」。於是袁世凱被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於三月就任。（中略）

民國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我在南京過正月。這個時候，正是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最高潮時期，警察對於廢止舊曆正月，大發關係。在一般民衆，舊曆正月是一年一度的大事，是特別快樂的節日，警察的取締，我覺得太過份。我勸告警察當局及市府當局，緩和其取締，但無效。我覺得在南京過舊曆正月沒有趣味，想到上海去過，但因為不方便，沒有去。但是在南京，總不感趣味，便到鄰近的湯山溫泉去。在一家鄉下人家的門口，貼着這樣的春聯：

打倒帝國主義

實行新生活運

用紅紙頭貼着這樣春聯的人，是以為這是祝賀正月文句而寫的；這文句，是由黨部發出的新生活運動的宣傳標語。原本是「打倒帝國主義」，與「實行新生活運動」的標語，但是一個是六個字，一句是七個字，是對不齊的，做春聯是不行的，於是就把七個字的一句，隨便勾去了押末的一個字。

「秦」與「晉」，平仄也不調，這完全是隨便亂弄的，二句都是六個字便行了，這裏顯示了書箱中蠹的諷刺。我看了忍不住一笑。（節錄「正月的回憶」一文）

南京對於先生，是猶樣的富於記憶與趣味，尤其自廿一年春至廿四年冬間，除僅少的幾個月外，他幾乎常住在南京。可是正就是在廿四年冬，先生爲了貫徹他的政治主張，竟遭遇了奸徒的暗算，幾不喪命。這是循着八月間辭職復職以後的事。



第十三章　乙亥艱難

痛苦的政情

民國廿四年七月，先生宿疾復發，遂離京至青島休養，旋因懸繫眾多，於八月八日向中央提出辭呈。先生於一二八前夕出掌中樞，受命於國事危急之際，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應付國難方針，先後處理淞滬事件與華北問題，原冀先圖國內團結，以打開中日關係間的僵局。事實上自華北協定以來，中日關係，本漸急轉直下之勢，若一秉此種方針而繼續折衝，中日問題，並非絕無解決希望。孰至六月間先生之對日外交方針體現為禁止排斥日貨運動並發為邦交敦睦令後，中樞內部，竟突呈意見分裂，英美派份子如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人，公然提出異議。無政府主義派中委李石曾氏，且明言要求政府清算對日綏靖政策，而蔣氏部下的青年將校，及在共黨與藍衣社煽動下之學生群眾與民間組織，抗日情緒，轉見激昂。致使煞費苦心始轉圜一線的中日大局，復呈陰霾四合的黑暗現象。

故先生之辭職動機，雖一部份出於病體要求，惟對於國策實行之種種阻難，亦不免深感失望。「中華日報」曾論當時先生辭職事謂：「今日之事，以鞏固中樞，確守國策為第一要義，國難至此，事之大患，不惟患無可行之策，而尤患無負責之人，不惟患無負責之人，而尤患無可負責之局，蟲蝕囂囂，所爭何爲，浮議誤國，豈無可取，此有識之士所爲痛心疾首，而論政者引為深憂者也。計自廿一年春汪蔣兩先生共主中樞以來，外而救亡圖存，內而定亂建設，凡所建議，一以共赴國難為先，用能

摒除一切，維繫大局，四年之間，外患內憂，相繼沓來，獨幸勉力支撐，賴以不墜。雖其頭緒不逮賢人，殫竭綢督，至三且再，卒以大勢所趨，民心所繫，不得一逞。」不失爲正論。

一般輿論，對於先生引去，亦莫不以同情與勉勵之言詞交相加譽，責令中樞當局加以慰留。如大公報之言論謂：「汪院長辭職，殆由於病體之實際的理由，而非因有何政治的暗潮之故。察汪氏爲現政府兩大柱石之一，所負責任，極為艱鉅，河北事件以來，焦勞應付，因以致病。黨中不論外交辦法者雖有人，然汪氏並未因而灰心，其赴滬轉青，純爲體力不支，非政治上消極之意也。汪蔣二人合作負責，年內政治上有絕對需要，兩人諒解至深，決心亦固，一任軍事，一任外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此係實情，今仍未變，或所需尤應……月來偶有一部情報，謂胡漢民氏行將回國，似謂其可到京主政。惟若詳加考察，當知絕非真相。蓋胡之回國到京，俱非絕對不能，假令回京，亦絕不能代汪氏之職務。其理由甚簡，即以目下國事之困難，胡氏久病之身，將更不能勝此繁劇故也。此外就黨國諸重鎮中，衡量資望才能，以覓一可代汪氏者，亦甚難發見。故就政府之需要論，勢必堅決留汪。」

同報又復于另一次中論先生辭職之原因與中樞必須推行國策謂：「察汪氏之決辭，雖以健康爲重要理由，同時似事實上有感於負責之困難，其注意點，大抵在現行制度機構問題，而非對人。現制，院部大事，皆決於中政會，該會委員多而意見雜，汪感觸頗深，而決然求去。」

先生以行政院長而兼主持外交，在當時的形勢下，其責任何等重大，其所需要運用職權的權力，理應如何堅強，這都是不待解釋的，可是中國歷來政治上最大的弊病，却正在於需要運用權力者而受多方牽制，而一輩不負政治上實際責任者，則利用彼等在朝或在野的地位，對於政府興覆，每好作高

謂武而不負責任的發言，以謀抬高其自己政治地位。所以當時先生的引去，實非對人，而實是政治制度客觀情勢所發的痛苦所致。觀于上引各方輿論，即能了然。

先生辭呈到達中央，各部部長亦即相繼引退，一時政治風雲復起，外間揣測紛紜，政府方面鑒於輿情對於先生的擁護，而中樞亦一日不能無二人主持，遂即一面派蔡元培葉楚傖赴青島慰留，一面舉行廬山會議。結果蔣氏表示對於先生的國事主張絕對擁護，由中常會決議慰留。蔣氏並派張群攜其親筆函面致先生，表示對於既定國策方針完全支持。如是往返旬日，先生鑒於職責所在不容堅辭，遂於同月十七日由青返滬，旋即進京與蔣氏會晤，於廿三日宣告復職，一場風波，總算暫告平靜。

精神團結的面面觀

以先生之爲人，他決不會想到當此困難嚴重時期，尚有一輩政治上的投機主義者圖利用時機從事於反國策的活動。當時的國策是認定中日關係應憑友好精神覓取外交途徑的解決，此不僅爲當時政府所賦畀於先生的任務，而亦確爲中國救亡圖存的唯一出路。於同年九月號日本「經濟往來」雜誌上，刊有蔣介石的一篇題名「如何改善中日關係」的文章，在論及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問題時，蔣氏曾這樣解釋謂：

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結局可以「和平」兩字盡之。和平是對各國公開的一般的政策，日本欲與中國分擔東亞的和平責任，則對於中國應採適應的政策，欲期中日親善，須由互相的同情，而不應該是偏面的，這就是說，中日的親善政策，應該樹立在互相平等獨立的基本原則之上，相互的親善，由相互的理解爲始，中日兩國，自然需要互相徹底的理解。我們研究日本的現狀，理解其指導精神，看定一般的動向，而其認識世界的大

勢，同時日本亦應該認識中國的國情，決定不離現實的政策，這樣纔可見自主外交的確立。國民外交，在現下的局面，極其緊要，中日兩國國民，應以東亞永久的和平爲對象，而謀兩民族的諒解和提攜，應使兩國國民的文化合作，經濟提攜等而互採適應的政策。

固然的，蔣氏這種意見，是受汪先生主張的影響，所以在兩個實際領袖之下，中國這一時期政治外交方針，理應完全一致。但問題却發生在一羣欲利用擁戴領袖以達其私的政治目的的政客。這羣人的利益是與國內精神團結背道而馳的，他們惟恐上層政治毫無裂痕，使他們無機可乘，於是小組織與秘密團體就發生了，最高國策雖要求對外交折衝解決中日問題，而小組織與秘密團體，卻反利用中日問題所引起的民間感情，暗中煽動，以阻礙國策的實行。

國民黨中的親英美份子，便是這種小組織中的有力的一支流。宋子文商借棉麥借款成功，親英美勢力在中日感情隔閡間便發生了極重大的作用，接着國聯技術合作人員，北美經濟考察使節團等的相繼來華，更使政府中人與大部國民發生了依賴英美援助卽可制裁日本的錯覺。一個國家，在外國兵臨境下的時候，依舊想循和平外交的方針，其不免國民感情反對，原屬當然。但要是政府內部本身，能力持鎮靜團結，曉喻國民以大義，事情仍有可爲。不幸我國政治制度，當時還不克提供這樣的健全基礎。

其次，中國共產黨的存在，亦爲妨礙既定國策實施的一大阻礙。當時江西剿匪雖告一段落，但共產黨的政治意識，利用國內民衆的反日感情，以及國外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義大利與阿比西尼亞戰爭，在中國青年羣衆中反日見深入，馴至釀成西安事變的結果，而根本推翻了當時的既定國策。

再看最高黨政方面，胡漢民氏始終未曾參加當時國難時期的政府，先則蟄處香港，遙許國政，忍受「港胡」的稱號，繼則出洋僑遊，使「寧粵」時形之對立名詞，常爲精神團結的苦痛諷刺，先生雖於廿三年底與蔣氏聯名發表感電，表示團結合作的誠意，惜未爲胡氏所接受。而在蔣氏本人，雖佯示支持先生的外交方針，然因親英美系的孔宋諸人，均爲蔣氏姻戚，而蔣氏本人，亦並未徹底放棄依賴英美力量以爲對日聲援的思想，同時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人事機構及其措置，顯然是一種對日經濟國防的步驟，而李滋羅斯來華之後中國金融貨幣制度的突變，更事實上淹沒了中日經濟提攜的呼聲。蔣氏在其「如何改善中日關係」的同一文字中，曾謂「和歐美列強提攜，並不一定能夠把中日的提攜排斥掉，謀中日的提攜，也不一定能夠使中國和歐美列強的提攜陷於不可能」，此種兩面徬徨的言論在當時的形勢下使蔣氏終於走上依賴英美的路線，是不難想像的。

還有一點，也是我們所不得不注意的，就是若讓先生的政治外交主張得以貫徹實現，那麼在國內政治上，蔣氏的獨裁企圖就將永無實現可能。而蔣介石氏却從來沒有放棄過獨裁政治的願望。在這裏就不得不發生矛盾。即蔣氏一面雖支持先生的外交政策，一面却通過親英美系與秘密社團的存在，在各種方式下阻礙此種外交政策的實行。結果蔣氏雖成了抗戰的「民族英雄」，先生却在六中全會中險乎成了殉道的犧牲。誠然，我們不願將六中全會的直接責任責之蔣氏，但其立場的不徹底，因而縱容其屬下秘密反日份子的活動，是不能否認的。

初，中央爲召開五全大會，特於廿四年十一月一日召開六中全會，而大會主要目的，即在謀加強全國精神團結，共同推行既定國策。故各地出席中委人數，打破已往四年的紀錄，連從未出席的閻錫山，這次也赴京參加了。當時國內外報紙，對於本次會議，無不加以重視。大會於一日晨九時舉行開幕典禮，先生被推爲大會主席團主席，其開會詞有謂：

……四全大會正值國難嚴重，大會口號爲精神團結，共赴國難……今國難尚未解除，而愈加嚴重，我們當更加努力，更加努力，吾人對於國是之痛心，增加了無限的努力，我們決心以無限的勇氣來擔負這責任，來謀國難之解除。我們希望本此精神，及其決心，在此全會獲得到極有價值的討論，因而得到極有價值的決議，以見諸實行。

詞畢，全體中央委員聚集中央會議廳前攝影，此時蔣介石氏臨時有事，在中央會議廳樓上與張楚傖談話，故未曾參加攝影。九時廿五分，各中委均在會議廳階前分排站立，先生立於前排中正，同立者爲林森，孫科，戴傳賢，閻錫山，居正諸人，而在旁觀看之中央黨部職員及各報社新聞記者約千餘人。攝影畢，全體中委正在魚貫步入會議廳時，觀衆人叢中突有暴徒持鎗竄出，對準先生連開七八響，第一鎗中先生之左頰角，立在先生左側的中委張繼，瞥見一持鎗之西裝青年，立刻上前從背後抱住兇手腰部，孰料兇手膂力過人，一面掙扎，一面繼續開鎗，中委張學良適亦在旁，見情乃飛起一脚，將兇手踢倒地上，另一兇手欲出助，亦爲張之衛士擊倒。

當先生中第一鎗時，其夫人並陳公博，曾仲鳴等，均已奔至先生身旁，但在尚未抬動身體以前，又在背肋及左臂各中一彈，前後共中三彈。先生見其夫人手撫己頸，雖血流滿面，仍神色鎮定，謂其夫人曰：「我爲革命黨，結果如此，毫無遺憾。」夫人亦答曰：「人必有死，吾等革命者，即或不

命，我仍必繼續努力……但君已受重傷，當速赴醫院救治，能不死，固尚可努力，即非，在吾等革命者中，亦不過如此。」先生發音時，語聲朗亮，其遇變不亂的精神，與其青年時代謀刺攝政王一樣，如同一轍，而此時則先生年已五十三矣。

蔣介石氏聞得槍聲，亦從廳面跑出，會同前述諸人先將先生移入沙發，一面由朱家驊叫七百號自備汽車從左面二門開進會議廳，一面由黨部叫紅十字會救護車到場施行急救，旋由先生夫人，蔣介石，孔祥熙，曾仲鳴，褚民誼，陳公博諸人伴送至中央醫院，因流血過多，一時曾陷入昏迷狀態。

慘案既發生，中央黨部立即關閉大門，各中委均紛紛擠入會議廳，所有職員均回辦公室，所有記者均暫避臨視。慘案於晨九時半發生，先生於十時抵中央醫院，蔣氏于十一時由中央醫院返中央黨部，即聽報告先生傷況，旋即率領衛士親在各處巡視一遍，捉獲嫌疑犯多人。至於開槍兇手孫鳳鳴其人，當場擊斃重傷。

陰謀計劃與輿論反響

兇手孫鳳鳴，係安徽人，年卅二歲，前曾任十九路軍排長，福建十二師混成團機關鎗連連長，在先生被刺時，係已至京一年餘，任職晨光社記者，與該社社長胡雲卿，總編輯賀波光等，蓄意謀刺先生已久，其所持左輪手鎗，即為胡所給與，事先設法領得全會第六十三號記者出入證，即假此混入行兇。此一案件，顯係預謀已久。因當孫被擊傷送入醫院時，不僅不肯就醫，且在其衣袋中搜出雅片煙泡，企圖自殺滅口。又當軍警當局前往晨光社搜查時，發見桌上留有書信一件，上書「留交來人們」

五字，信上寫「木社之事與鄭智謀，吳璞，周希皓三君毫無關係，特此聲明」等語，足見這是一件有計劃的預謀。

十時甫過，先生遇刺的新聞即已到達上海，號外呼聲，一時傳遍全滬，姑轉錄當時某報的特寫如下：

像一顆猛烈的爆炸彈，投進了這一條「報紙之街」的望平街，雖然時間在上午十點十五分，但在望平街每一個角上都顯露了一種特殊緊張的神氣。

消息是用了最高的速度在傳遞，報館的工作人員，都突然開始集中，然後用了散兵線戰鬥方法，去向各方面刺探消息。

幾十分鐘以後，排字房裏緊張起來，再一會，報館的門首，貼出了一張很鮮明觸目的「號外」預告，那是「汪精衛今晨被刺」。報館門口的閑人，一時愈來愈多，都在伸頸盤注意這驚人的消息。

同時所有望平街上的報販，都全體出動，擁上報館來了，他們都擠塞在報館門口，站在沿街的階沿上，等待號外報紙的出動。

下午三點將分，號外報紙的機器動了，三點十五分，像海水的怒潮，報販們把號外搶出手，他們幾乎用了瘋狂的一種行動，用了飛奔急速的步調，把號外的報紙，舉得高高地，由望平街上，朝北，向拋球場起，橫過了一條南京路；朝南，向河南路，[illegible]，直通愛多亞路。

他們都用了同一樣嘶啞的沙喉嚨，高聲地嚷着，每一句都是那樣激動地刺着你的耳朵：

「要看汪精衛被刺嗎！」

街上，人更騷動，更興奮了，誰都搶過一張報紙，非常激動緊張地看下去。

真到深夜，在靜僻的街頭，還可以聽見「號外」「號外」的聲浪。（廿四年十一月二日「立報」）

這聲浪旋即波及全國，各大報紙的輿論，對於先生都充滿慰問和同情的言論，如申報謂：「當茲國難最重之日，端賴各方精誠團結，六中全會集各方領袖人物於一堂，以共謀其國之大計，事前接洽匪易，人民屬望正殷，而詎來此意外一擊，危及最高行政長官，以增進國是之糾紛，而輕貽外人以口實。」新聞報謂：「首都之地，發生此等事件，除清末外，此實為第一次。」而天津大公報則更謂：「先生在非常時期，為國家担負非常責任，其冒有非常危險，平日早有非常決心。遭此事變，在個人是安心任命，然為國家計，實不能不抱萬分遺憾。」

一息尚存以身獻國

先生遇刺，身被三槍，兩中要害，一在左頰，一在背肋骨間，而以左臂之傷為最輕。左頰之傷，擦損一骨，碎片落左眼中，致發炎，傷口一度洗滌縫合，其後以流血膿水，再行割除。嗣復以子彈所竄處乃在左顳部，八日檢出子彈時又復開割一次，計頰部除受彈傷外，先後施行開刀手術凡三次。背部之傷，彈留肋骨間，施行愛克斯光檢驗時，曾一度開割探險，其後傷口有瘀血流出，又不得不再行割治。計背部除受傷外，在京前後開割兩次。左臂之傷，未及骨與脈管神經，洗滌縫合後即痊可。先生在中央醫院療傷期間，歷時凡十九日又五小時。以傷勢尚須經過愛克斯光詳細檢驗，而滬上醫院設備比較完全，且欲乘治宿疾，遂於同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卅分出中央醫院，當夜由其夫人等護送至滬。延牛惠霖，牛惠生，諾爾三醫師會診，並在宏恩醫院愛克斯光檢驗。知左頰一部份仍有碎片留內，背部

傷勢亦較明顯，察覺子彈係由左方經過背脊之肌肉斜向左方射入，而留存於第五第六兩肋骨附近。旋由三醫生續密商議開刀，地點即在先生憩寓安和寺路，惟因爲時過久，先生體力不支，子彈迄未能取出。

先生本患糖尿胆石兩症，自受槍傷後，宿疾復發，其所經痛苦可知。但先生初入院後，對於國事仍異常關切，且索閱報紙，後爲醫生所勸解，僅由旁人誦讀聽聞。當先生尚在京中央醫院時，中央社記者謁訪，先生曾表示其感想謂：

昔英士被刺於滬，執信被刺於虎門，余皆未及赴。仲元被刺於廣九站，舁歸醫署，余奔往撫視，仲元覺留笑曰，觀君等哀痛迫切之狀，使余不能死，不其慰耶。仲愷被刺於中央黨部，舁到中山醫院，余馳往則氣已絕，惟見廖夫人號咷而已。當余舁到中央醫院時，身中三槍，自度必死，幸得以隨諸先烈之後，亦復心安理得，而諸同志之悼惜撫視情狀，宛然仲元被刺時也。顧仲元已死，而余傷非致命，且得名醫，勢當可生，以慰諸同志。夫革命黨人以身犧牲，死何足惜？且國難至此，生亦何幸？既然留此餘生，則一息尚存，仍當本鞠躬盡瘁之旨，黽勉從事，斯方足告慰諸同志耳。

當時論者慨嘆先生在既受重創之後，仍未嘗減其勇，未嘗忘其責任，其革命者的眞精神，亦足爲國民模範。這裏我們有一節素描，一節訪問，都是與當時事件有關而頗足反映先生爲人風度的佳作，併特轉載如下。第一節是「想起汪精衛在廬山」係刊在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三日的「立報」。

汪精衛院長一白面書生，竟會遭人狙擊。而狙擊之地，在中央黨部。狙擊之時在六中全會開幕之晨，尤爲意外之事也。

猶憶去年七八月間，筆者小歇牯嶺，汪亦因公至其地。某日薄暮，夕陽在山，涼風拂衣，偶偕伴河畔

則見遊人一群，嬉笑而來。其第一人着長衣，態不雅。第二人着灰色西服，戴巴拿馬草帽，即爲汪氏。汪左一人着灰綢長衫，手攜一杖爲黃郛。後緊隨一人爲唐有壬。其後更有一人着灰嗶嘰長衫，雙目炯炯有光，面貌清癯，而體態有神。其後更有二三人，態度大方，度均爲黨國要人。彼等且言且行，與遊人相遇，讓開讓道，初不介意。即有識者，亦並不因其爲貴人，而略事趨避也。恐事後告人，謂要人必如此，方足表現平民政治精神。或曰，要人在山，日日出遊，均無戒備，不徒汪氏。山行本險，然心境平坦，則無往而非坦途矣。此言感記之……今聞汪遭不測訊，轉覺何處是坦途，何處不是坦途，更難說矣。（作者山人。）

國外輿情的敬仰

另一爲法國「小巴黎報」女記者加斯克，因聞先生遭意外，特將其過去訪問先生之回憶整理發表，以示愛慕傾折之誠，蓋因先生遇險之事，不僅國內同情，即國外輿論，亦深致關切的敬意。

中國行政院汪院長突遭狙擊，中國沉悶局面，忽使人劇烈注目。余於震驚之下，忽想及此領袖群倫之美丈夫，蓋余近曾謁晤汪氏於其京寓中也。汪氏任行政院長兼署外交部長，實爲中國政府之真正領袖。而此 孫總理之繼承人，確爲復興中國之靈魂。茲將汪氏向余表示之同情，略述梗概，並將余之所回憶者拉雜記之於下。

汪氏在滿清時代，爲激烈的革命家，嗣後則有詆毀之爲共產黨者。共和告成，皆知汪氏有特才，常請其擔任各項要職。既行政領袖，學識淵博，心地忠實，思想卓越，而其演說之神妙，尤能傾倒無數聽衆，且其淳厚謙直，亦足令人驚異。本報駐南京代表斯爾換雯氏，曾向余言，當南京開全國運動會時，曾見汪氏不帶衛隊，與羣衆坐於使新都生色之大運動場之參觀台上，焉得不令人折服。又聞法學教授兼中國政府法律顧問愛斯加拉氏謂，汪氏氣宇軒昂華貴，未有接近之而不爲其所吸引者也。余前曾極欲晤汪氏，爰離去人烟稠密的上海，而

赴南京一行。乃有人告余汪氏身體不適，且極忙碌，恐不見客，使余甚爲失望。某晚忽接電話，謂汪氏明日歸余相見，殊出余意料之外，豈運數使然耶，抑因余之堅決使然耶。汪氏寓所寬敞，器具係英國式，舒適精美，雅致異常。窗外草地平鋪，遍植花卉，且有噴水池。余由汪氏之老友鐵道部次長曾仲鳴氏招待。曾氏文章卓絕，善詩詞，能操純粹法語，與余縱談歐洲政治。門忽啓，見一美少年入，身穿中裝，至余面前，溫厚端莊，目光深銳，炯炯射人。此人爲誰？固汪氏也。汪氏與蔣介石氏同爲中國柱石，早已遐邇馳名。乃就面貌觀察，似僅年二十五歲之少年者。余曰，院長係少年乎，汪莞爾曰，余五十二歲矣，心多憂慮，面皺乃生，我人漸老，由內而來。余曰，敢問孔子非從修心，且善攝生乎？汪曰，據我看來，西方科學昌明，但探中國先哲明智，亦不無裨益。西方宗教，現漸趨於哲理化，在中國則不然，精神上素得自由，傳教士徒枉費心力，不得成效。余曰，或謂孔廟現已無人祭掃，或謂民國亦廢祀孔子。汪曰，此可並行不悖，宗教上價値，雖甚衰落，但孔子之哲理名言，其勢不稍減退，蓋人無論智愚，可於其哲理中取得光明與規範。此時桌上羅列茶點，種類精美，清香熱氣，殷殷上騰。余曰，院長能貫徹主義，當費極大代價。汪曰，余廿五歲時，曾度一年六個月之牢獄生涯。余在北平攝政王經過之橋下，埋伏炸彈，不幸有犬狂吠，衞士立即注目，炸彈及余黨被搜獲，其後革命發生，余被釋，余在獄中所有之希望，不致落空。余靜聆其言，非常寬懷，面上則常帶和藹之色。余曰，院長爲四萬五千萬人民之政府領袖，其工作何等重大。汪曰，然；有社會問題，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三，時有水旱之患，有財政及經濟問題，因經濟恐慌，工商業不易發展，更有匪患問題，若輩藏匿山谷中，隨時侵略城市，勒繳稅款，擄掠殺戮外人傳教士及中國富人。余曰，院長何法以應付之？汪曰，一九三一年時之勝利，諒早明瞭，因剿匪軍隊及福建叛變發生，赤匪乘機反攻，諒亦早已猜悉，目下湖北廣西及福建三省內的匪患，業經肅清。但僅賴剿匪，勢必不足，務須爲政治上之設施，竭力抬高經濟地位，整理金融市場，發展工商事業；

鋪設道路，疏通溝渠，修築防堤藉阻黃河水患。上述國家建設，雖實不免缺乏通貫，惟就現狀觀之，確有進步情形。政治上統一，尤為重要，否則國家建設，終不能達到圓滿結果。現漢與西南領袖籌商，藉以排除困難，俟國民黨開大會時，當更為協調，希望能劃清中央及地方政府之權限，各方都能滿意，試一閱世界地圖上我國所佔之地位，則知吾人不斷努力之成功，自需相當時間。余曰，建都南京，院長是否贊同？汪曰，是，我國因地理上關係，不免受外來侵略，南京居我國中部，保護較為周到，於政府行動，亦較為便利，且北京過去印象太深，迭受侵略，新中國當有一新都。余曰，院長向和平道路上努力，余已知之。汪曰，余與世界上主張和平者，同一心理，我人信仰和平，為國和平，國際條約於我人以爭取和平之機會，認為足以維持邊界。滿洲及熱河被侵略，使我人明瞭條約担保力甚為薄弱，中國不侵略他國，但於相當時當知自衛，我人逐漸整飭軍隊，但我人用最大力量，以與日本和平接近。既有誣毀我人為侵略者，但忍耐及訴諸正義，對於注意於和平及人道者，並非爲無用的利器，希望日方能鑒於更較公正的態度。余提及日方之威勢，波及滿蒙全部，如菲列賓澳大利及越南等。汪曰，一切困難，無有不能排除者。中國有光榮歷史，現雖倘處於暗淡道路中，其將來自不能居於卑辱地位，仍將爲亞洲文化之領導者。政治上得採任何方式，但所不能易移者，卽爲民主政體之大主義，可謂「寧亡國而不亡主義」，此種主義，可以犧牲生命。當時窗外暮色蒼蒼，園中水聲潺潺，汪氏言詞略加停頓，向外遠望，但並不驚慌，不幸之意外，或已被其逆料，但並不能擾亂其心靈之安寧。余幸得與此聰穎卓絕，心境寬宏之人物相接近，而與其離別情形，亦覺不能忘卻。與談及此，余遂告別。

一個政治家的評價

從以上的談片中，我們知道先生自民國廿一年初迄廿四冬被刺的四年間，其從事實際政治，實在

煞費苦心。先生在這四年間的從政基本態度，是以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號召，力導國家和平的建設。在這四年中，中國的邁進於建國工作，極呈蓬勃的生氣，是誰都能記憶得的。而這一事實，正是以證實了先生領導性格的偉大。

不錯，先生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旨開始這四年初期的政治生涯，而結果則偏重於和平的交涉，如淞滬協定與塘沽協定，均常為激烈份子引為攻擊的口實。然而我們考慮到某一個政治家的政治行為，應將其可資運用的國力的強弱作為判斷的基本背景，而決不能歸諸個人的因素。在政治上所謂負責，就是對國力的負責。當時曾有人批評先生從政之後，把他的原來主張取消了，然而，更重要的卻僅是實現主張的方式，而決非是主張的本身。先生有過「國可亡而主權不可亡」的宣言，則其如何重視基本的主張，是不待解釋的。蓋所謂政治主張者，其主要目的當在保持整個國族的生存，國族的獨立自由平等。先生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號示國民以救國的方式，而其重點應用，當然必須顧及實際政治的條件。所以先生後來所採取的和平外交方針，雖未必能盡滿人意，但就中國的國力背景，也就是其政治條件言，實在是一種最苦心的政策。這種政策如得順利實現，不僅和平可保，且亦有利於國家生存與主權的保證。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不在能為其本身取得一時的民族英雄稱號，而是真正能對其國家與國民負起責任。僅僅附從感情的要求，與領導國民以正途，其間一是庸俗政治家容易墮入的陷阱，一是偉大政治家的立身。

先生於一二八前夕踏上政治舞台，負擔起當時無人敢負的艱難責任，這已經是非要巨大毅力與勇敢不可了，而在其後四年中，在兩國國民感情的偏激囂張下，獨先生能力排感情的意氣，執行對內完

成和平建國，對外履行和平信義的國策，更非是一個有眞正偉大氣魄的政治家所莫爲。然而正唯因爲如此，遂遭宵小所忌，他們無法以同樣光明正大的方法推翻先生的主張及其行爲，最後祇有出之暗殺的一途了。然而暗殺僅能傷先生的身體，却絲毫無損其忠勇爲國的精神。

出國就醫

先生於移滬就醫後，卽向中央辭去本兼各職，雖五中全會卑先生爲中政會主席，亦經辭去。五中全會後，中央政府卽經完全改組，以胡漢民為中正爲中政會正副主席，葉楚傖爲祕書長，以蔣氏兼行政院長，戴季陶考試院，居正司法院，孫科立法院，于右任監察院。各部部長方面，以蔣作賓長內政（蔣爲日本士官學校第四期步兵科出身），張羣長外交（張爲日本士官學校第十期騎兵科出身），孔祥熙長財政，何應欽長軍政，陳紹寬長海軍，王世杰長教部，吳鼎昌長實業（吳爲日本應慶義塾理財科出身），顧孟餘長交通，張嘉璈長鐵道（張亦爲應慶義塾理財科出身）。蒙藏委員會爲黃慕松，僑務委員會爲陳樹人。隨着新政府組織告成不久，全國廣大的抗日運動高潮卽相繼激起，在先生被刺相隔未及二月，爲先生從政時期外交左右手的唐有壬氏，亦在上海以被刺聞了。

唐有壬氏於同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其甘世東路滬寓被刺殞命，而先生留滬後，一因病情未告痊癒，更以環境險惡，遂於翌年二月十九日出國就醫。事先，先生出國一事，嚴守秘密，惟各報記者，已有所聞。至同日下午二時半後，先生偕同曾仲鳴夫婦，褚民誼夫婦，林柏生夫婦，及陳耀祖等分乘汽車六輛，離其安和寺路私邸。爲避人耳目計，一行先由哥倫比亞路，大西路，福煦路，愛多亞路而至外

灘新關碼頭，旋又折入甯京路，轉福州路經廣東路，再至新關碼頭換乘茂新渡輪上愛斯奴侖號啟程赴德，先生夫人則並未同行。先生於出國前，曾表示並不放棄對國家的責任，聲明何時病愈，何時歸國，並謂如果外交緊迫，則不待病愈，當隨時歸國盡力。先生先至德國，訪世界唯一外科療傷家名醫蘇伯克教授就診，旋時往返於法國及捷克間，迄西安事變後始再行返國。

刺汪案件的背景，據當時法院方面的發表，謂係閩變份子所指使，牽涉者有陳銘樞李濟琛等，範圍頗大，不過先生一本寬大爲懷的態度，後來該案審判告一結束後，他曾呈請當局予以寬大發落。先生的人格偉大如何，這裏又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中山先生的偉大及其影響

先生富於愛國精神勇於負責觀念，並其個人的宏大人格，實受中山先生的感格極多，其記「孫先生軼事」一文中曾有謂：

我之識先生，在乙巳年，其時先生在東京。及乙丑年在北京侍先生疾，以迄於易簀，前後恰恰二十年了，在此二十年中，我和其他同志，屢屢想知道先生生日，先生總是不答，有時笑說：「我不說給你們知道，但到了那一日我必請你們吃晚飯。」然而先生一年之中請我們吃晚飯不止一次，如何知是那一日呢。

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先生將由廣州出發，經上海去北京，先二日，叫我起草對於時局的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並約於十二日到先生處吃晚飯。我因稿未成，沒有去呢，至深夜始脫稿，進之於先生。其時廖仲愷等猶在座。先生欣然命筆，將近代實業團體之「近」字改作「現」字，笑說：「我只改此一字」。我同仲愷出門

，仲愷告我：「今日是先生生日啊！」我爲之恍然，頗以未能共吃晚飯爲憾。誰知道這便是末一次的生日請吃晚飯了！先生生平未嘗許人替他做過生日，這是我們應該取法的。

先生曾有一次見我做事慌張，便教我說：「凡做一件事必須聚精會神，不可做着這件，又掛着那件。須知道做事要機警，而機警則全在精神貫注，如將極利的刀，劈極薄的木片，差一分，是一分，不能疏忽的。」而舉少年的一件事爲證，曰：「我在少年時候極淘氣，有一日逛九龍，見一江湖賣藥者，信口開河，說他的藥怎樣好法；我則信口批評，說他怎樣怎樣壞法。旁觀的人，隨着哄然大笑。賣藥者老羞成怒，立時取出一塊石頭，厲聲對我道：『你說我的藥不靈嗎，你看我將你的腿立時打折，立時將他醫好』。說完他便舉石要打。我那時候穿着一件藍布長衫，闊闊的袖子，背着雙手，右手還拿着半段未食完的甘蔗，我立時將那半段甘蔗縮入袖中，舉起手來向他說：『這算甚麼，你看我將你一槍打一個窟窿，立時將你醫好。』賣藥者不覺失色，手拿的石頭便舉不起來了，旁人從而相勸，一場凶險，冰消瓦解。當時若沒有機警，不少也惹出禍事來，可見機警是辦事之所必要的；機警半由天才，但於辦事時，精神貫注，久而久之，便也會生出機警來，你的性質於機警最爲缺乏，應該留心練才好。」我初時聽見先生這一番話，爲之笑不可仰，後來覺得句句都是至理，無奈二十年來，於自己的短處，終不能補救，時時上當，誤事不少。每一念及，眞是愧見先生了！

丙午丁未戊申這三年間，我隨先生住河內，計劃起革命軍於兩廣。有一日，先生打一個密電給在邊界的一個同志，因此被捉了，先生非常懊悔，每每自責不已。直至那一個同志被釋出來，先生還常常提及，並且責我道：「凡我做一件事，你不該就我覺得對那一方面着想，你該就我做得不對那一方面着想，這樣我做的事才不會不對。」噫！先生詢過之誠，聞過之切，改過之勇，眞正令我起敬起畏。這一件事，當時共事之人，如黃隆生同志等，也必然記得的。我們同志要學先生，要從此處學起。每當革命失敗的時候，同志未免有些意氣沮喪

的，其強自排遣的，或下下棋，或看看小說，甚至跑出去喝喝酒，解解悶氣的，我呢，書生習氣，不免做幾句舊詩，長吟短嘯，如今想來，實在肉麻極了，先生則不然，拿着幾本的書，從頭閱看，孜孜不倦。此外，圖張掛地圖，用鉛筆標出，某處將來做都埠，某處將來築要塞，某處將來開運河，等等，幾日之內，換了幾張圖，津津有味，絕無一句頹唐的話，一些憂悶的神氣。這固然是先生之精神不可及處，然亦可見先生心目中，無時不有一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湧現於其前也。辛苦四十年，至今還不能實現出來，傷哉！

實則先生之追憶中山先生的美德，已不期然反映了他自己的為人，他自己又何嘗一刻忘卻過燦爛的中華民國，他敢不辭艱難，不辭毀謗，甚至不惜冒犧生命的危險，負起艱鉅的責任，無非是為的獻身於國。而到了後來，對於暗算他生命的一輩人，還得代他們請求寬赦，則其公私生活的人格如何光明，如何偉大，可謂決不在中山先生的美德之下。至於他的書生本色，實在也無自愧之處，人的性格，不表現於事業，都得表彰於感情，他在二十五年出國，三月卅經印度洋時，曾將他的感懷發為詩詞說：「自被瘋魔常損慮，轉令魂夢得粗安」，實是表現他為人的氣魄。

第十四章　西安事變以後

詩人姿態的再現

先生自二十五年二月因傷出國就醫，迄廿六年一月因西安事變返國，其間恰値三百餘天，其行踪遍及歐洲各勝地。每到一處，輒感慨勃發，表彰之於詩詞。在這三百餘天中間，先生又從一個當代的政治家而蛻變爲一個詩人了。政治事業固佔去了先生大半生的時間，但他在爲公生活的另一面，却不時在私人的感情中表現出他的天賦個性。在本傳中曾一再說過，我們想瞭解先生的爲人——其實瞭解任何個人都是一樣——非得透過公的生活的背面，去把握他的私的個性與特質不可。誠然，一個立志獻身於公的生活的政治家，應該犧牲他一切的私，但感情却並不在內。因一己之喜怒哀樂而影響於公的事業的偏見，這種感情運用的方式固不足取，然而一個人的天性優劣，拋棄了感情的流露就無從識別。以政治事業的複雜和多樣性，政治家的不得不以多樣的面目去應付環境，是可以瞭解的。但若沒有先天的宏大氣魄，後天的貞堅品質，在政治舞台上一旦有了地位，就免不了爲隨波逐流的時潮一起捲去。換句話說，在私的生活上沒有自我意識的人，在公的生活中亦不能有堅定的信念。所謂自我意識，是指的自我的善惡判斷。公的事業的成敗往往有待歷史的論定，但個人的善惡觀念，却不時從一個人的感情流露中可以肯定。世界上有許多偉人所以能屹然不爲一時的潮流所沖擊，到後來畢竟與歷史共垂千秋者，倒不是因爲他們能看透的歷史的本身，而是因爲他們具有超人的慧眼，在私知所抉擇，在公也知所抉擇。

先生於公的生活之餘，時常喜歡自然，而從其間啟發種種感情，發爲詩賦。他在私的生活上雖謙稱自己是一個書生，不過他的書生並不迂腐，他懂得自然，也懂得人世。因爲他懂得自然，他常以詩人的特色點綴他的私生活；因爲他懂得人世，他能進而有所貢獻於國家。因此當他在爲公的生活而犧牲了他的生命之後，他復以一個詩人的姿態出現於自然界的勝境了。下面的幾首詩，便是先生在歐洲療傷期間感情發揚的一斑。

瑞士道中

分流驛石互縈紆，盤轉山川入畫圖。濃翠園林新雨後，淡金樓閣夕陽初。天然風景原無異，人事綢繆恍不如。好和湖光入尊酒，便尋幽夢到匡廬。

旅仙湖上

波光淡而恬，水碧靜以清。澹如仁者心，渾厚韜光明。於時宿雨收，天高地亦平。扁舟蕩其間，萬象迴眼生。輕鷗非故人，相見已忘形。微華漾餘暉，既得遊飛鳴。和以和絃歌，清氣亦來聲。何當泯猜嫌，物我皆咸寧。

鬱玆諾湖上望對岸山

萬壑如郛周。茲山最巍峯。上峯曜冰雪，下谷幻煙靄。中巖橫青翠，都教醉夕曛。蒼茫何所見？泉聲九天聞。

幾司柏山上

平生所經歷，藻繪不可名。惟此獨且奇，每見心爲傾。遠從碧山來，雅自游清冥。一巔最高峯，其勢如[illegible]

低。直下千丈强，石破天驚聲。千巖萬壑間，往復遞相應。十步一換態，百步一換聲。漸漸入中湖，浮綠與天平。山深日已夕，新月猶未生。遠樹壓四圍，峯頭猶微明。山色如明鏡，湖光如晶瑩。筆墨所不到，聊以聲冷冷。胸中若冰雪，對此匹練橫。有懷當如何？木末尋流鶯。

廊羅蒙柏道中

青山相對出，懸瀑以百數。使我於其間，有目不遑顧。耳亦不遑聽，但覺風虎虎。驟折者謳啾，水抱而行趨。我聞山與水，二美不能具。動靜惟其宜，柔剛各有寓。瀑也實兼之，得一以千古。況多多益善，四立皆環堵。試觀縱橫勢，逸氣唯所馭。山爲飛且鳴，水爲歌且舞。始知天地間，落落無寬步。嗟哉沉盛人，一笑辭詞字。

孚加巴斯山中書所見

夙聞最高峯，是瀑所來處。朝來仰天望，曚昧隱雲霧。靈巖自山起，問徑躡層級。旋聲忽在耳，隱若導前路。隨之入山深，數數與之遇。林木造茂蔽，瀦觸什吞吐。山腹雖中斷，石壁深且阻。巨壑哆其口，衆水紛下注。鑱鑿仰一角，潛落受千杵。撐撞力不竭，拗折歇彌怍。崩騰不少讓，互壓作飛舞。氣含冰雪冷，勢挾雷霆怒。旋搏生迴瀾，搖撼動底柱。小石已靡粉，有怨散復聚。大石與其齒，初若相齟齬。及其沸而白，轉乃相水乳。化爲一川雲，滾滾下山去。山脚石更峭，犖确無寸土。冰澌所淬厲，黝若生鐵鑄。其隙生小花，嫩綠作霜縷。亦有矮屈松，老幹纔尺五。鼯狖攜已難，猿鳥失所據。鷹隼不得食，空際盤旋苦。喘息及山頂，足躡離再步。俯首惟沉寥，萬象在一俯。層冰何峨峨，寒色自太古。湖水寂照之，凝碧若可茹。歘然試一掬，凜冷在心腑。

聖莫利茲山上

翠谷深處霧淪漪，淸絕朝暉欲上時。高柏自搖風露影，四山爲當雪霽姿。峰頭已有天壤闊，託足元無世可遺。爾不勝寒猶不去，振衣高詠太沖詩。

山石合中國七千尺故以左太沖振衣千仞岡之句爲詠。

重過麗棠湖

湖外飛樓月下舟，八年前此共淸遊。湖之於我頻青眼，山亦逢人匪白頭。小作勾留聊似燕，了無忘機不如鷗。飄搖蹤跡知何處。領取川原澹蕩秋。

中共提出的條件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首謀用武裝的陰謀威脅國民黨接受抗日政策的成功。事件的勃發與結束雖極具戲劇性的迷彩，但自國共再度「合作」以至抗日行動的促發，無疑是以西安事變爲其序幕。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引用衆多的文獻，祇要看一看共產黨於西安事變後向國民黨提出的條件，以及後來國共合作的因此成立，就可以明白。當時中共向國民黨提出的條件是：一、共產黨將停止從事用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企圖。二、中國蘇維埃政府將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而紅軍亦將改名爲國民革命軍，並由南京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統轄。三、將於特區政府範圍內，努力實行三民主義。四、共產黨將停止沒收土地的政策。但同時要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允實行如下的政策，以作交換：一、停止一切國內戰爭，並集中一切國家財源，準備抵抗國外的侵略。二、保證言論自由，並釋放所有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及各軍隊商議救國方案。四、於最短期內完成抵抗日本侵略的所有準備工作。五、改善民生。（以上條件均引自董著「蔣傳」下冊五五六頁。）

我們在這裏不想討論政治問題，但很明顯的是，當時國民黨雖在表面上拒絕了此種條件，惟西安事變後不久，國共再度「合作」終於實現。蘇維埃政府的名義雖取消，中共的特區政府不僅實質上存在至今日，且其聲勢擴大，已遠甚於往日。

當時先生方養疴歐陸，自西安事變當日接得中央急電並敦促即速返國的電訊後，即自德國啓赴意大利熱內亞搭德輪波茨丹號啓程，於二十二日下船。至二十六日途中，接獲蔣介石氏恢復自由消息，惟因深感國事危急，仍繼續旅程，於一月六日抵新加坡，十日由馬尼剌往香港東返。先生於臨行前曾表示：「數年以來，中國係以一致之團結，備最後之犧牲，日積月累，始獲得幾微之進步……乃西安事變，突然而起，毀國家之綱紀，紊軍隊之紀律……此逐漸獲得之進步，將橫被摧殘，內憂外患，將益陷于紛紜，」證之後來事實，均不幸而中。

急難返國

自先生返國消息發表後，中央方面即派周佛海，邵力子，周啓剛，彭學沛等遠迎至香港，先生夫人與陳公博等，則更遠迎至新加坡。至一月十四日，一行人同抵滬埠，其所受歡迎情況的熱烈，與三百天前悄然離國的情形，殊使人頗多感慨。某報曾記當時盛況特寫如下：

在歐休養三百多天的中政會主席汪兆銘，為了「急難」昨天已經歸抵故國！汪所乘波士丹號，預定停在公和祥碼頭，所以到昨午十二點多鐘，由京來的許多要人，和民衆團體的代表，都在那裏恭候。孔祥熙，張羣等也都在歡迎人員當中，民衆代表都拿着大小歡迎旗幟，靜靜的站在鐵柵外。

下午一點半鐘，李大超，周[illegible]在公和祥人堆中出現，他們帶來一個消息是「汪主席已在吳淞上岸了」。於

是大家都感覺到失望。原來波士丹輪於昨午十二時半到吳淞口，吳鐵城、褚民誼，蔡勁軍等幾個人，就乘了鐵鋒小輪在吳淞江海港檢疫處碼頭首先登輪歡迎。後來趙丕廉，陳樹人等數十人也分別坐着小輪去歡迎。吳等登輪後，汪與各歡迎人員一一握手寒暄。汪穿着一身淺灰色的西裝，臉上紅光煥發，比出國時豐滿多了。吳鐵城陳上蔣委員長電一通。汪即在吳淞上岸往霞飛路褚宅休息。

汪等於下午一點半纔到褚宅，記者首先趕去，那時張羣趙丕廉也到了，接着是大批要人來訪，葉楚傖，王正廷，孔祥熙，李烈鈞，楊虎，杜月笙等，也都來了，遞片子的差役忙壞了。汪對國事，詢問甚詳，與張羣談國際大勢，達一小時之久。李烈鈞來時，汪詳詢蔡元培病狀，並囑李代為致候。

汪昨天因來賓太多，昨晚下榻褚宅，因微患腹痛，曾召醫師諾爾檢驗身體。昨天歡迎人們對汪一致的印象是：「汪先生胖了！」

其實此時先生健康尚未復原。西安事變發生當時，本擬前赴英國醫治膽囊炎，嗣因憂念國事，終毅就道返國，所以到了上海後仍不得不繼請德醫診治。先生抵上海之初，即發表書面談話謂：

兄弟當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在熱內亞下船，曾發表書面談話，一月六日過新加坡時，復有書面談話發表；十日過馬尼剌，曾以此兩書面談話，交與報界；十二日過香港時亦然。（中略）國內重要問題，當前待決者固多，然兄弟未與中央同人詳細討論以前，不欲單獨發表意見，此層尚望各位原諒。

今只能為各位一述近來感想。兄弟在歐數月，因養病關係，未嘗與政府及各人多所往還。然聞見所及，覺友邦人士，對於我國處境之艱困，多抱同情，而對於我國之一致努力求生存進步，尤抱甚多之期待，此與可慰

慰者。歸舟經新加坡，爲尼刺，香港等處，獲晤僑胞，及披閱國內寄來之報紙，則兄弟之感觸尤深。覺得當患難之時，無內無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認識，及一定之主張，而休戚相關之情，其流露自然而懇切。此種　總理平日闡發精誠之訓，而九一八以來，精神團結之表現。有此眞誠，我國之死中求生，亡中求存，於是乎賴。本此眞誠而發揮之，則自義聞南，全國同胞之中，有何隔閡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釋？所願相與黽勉，以求日進者也。

最後尚有一言：中國今日當務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則有賴於民力。民力之增進，即救亡力量之增進，不可不加意培養。培養之法，固在精神淬厲，而物質供給，亦同等重要。中國國力之不振，由於民生之憔悴，故一般人民生活狀況之改善，及痛苦之解除，實所以救民亦即所以救國。此又所願視爲一事，而相與努力也。

精神團結的解釋

一言以蔽之，先生回國之初，即抱有二種政見：一即國內之精神團結；一即民生之改善。爲了前一目的，先生在離出新加坡時，即會發表釋放因案人犯的談話，其言有謂：「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糾舉，於情不無可原。擬回京後，懇請國府，將一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可是在西安事變後，共產黨人也企圖利用「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口號，假借建立人民陣線的名義，以實現他們自己的目的，因此先生於二月十八日抵滬之後，即行出席中央黨部紀念週，對精神團體的本意，下了一番更周詳的解釋。

其一，兄弟以爲所謂精神團結，共赴國難，固然不是指黨內的而是指及全國的。但是所謂人民陣綫，是有

一定的政綱與綱領的。例如法國現在也有人民陣線的口號，其內容是各黨聯合，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站在團一戰線，其最後條件是各黨都沒有武裝。法國內閣總理萊翁勃倫除了火十字團的武裝，同時也不許共產黨及其他團體武裝。法國只有一個政府，並沒於法國民主政府之外，更有所謂蘇維埃政府。法國只有一種軍隊，並沒於法國國防軍隊之外，更有所謂紅軍。法國的人民陣線是這樣才能發生，是這樣纔能存在。這一層希望援用人民陣線口號的人們加以注意。

這是針對共產黨假借人民陣線的口號，以圖打入其勢力於國民黨的陰謀的重要警言。共產黨又復利用國內團結，一致對外的口號，企圖挑撥對外戰爭，而冀挽救其本身迭次所圍剿行將覆滅的命運。先生對此，更進一步明白指出此種陰謀。

其二，有人說道：「當今之務，攘外爲先，安內爲次。」殊不知安內對外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不能從輕重來分，而應從先後本末來分。因爲對外是以國家來決定生死存亡的，必須本身有對外的能力，方纔有對外的把握，斷沒有本身不健全而可以有對外的。我們總還記得，淞滬之役，政府調江西軍隊赴援，而共匪即攻贛州；古北口之役，政府調長江軍隊赴援，而共匪即破撫州，攻南昌；經此兩次創痛，武裝同志以及明瞭內容的人們，銘心刻骨，知道不安內不能攘外，所以才有這幾年間的血戰。這血戰並不是置得安內徹攘外爲謬，而是深知安內爲攘外之先著。這一點不可不加深切之注意。

應該堅持反共

然而在當時，經西安事變「兵諫」之後，莫說共產黨公然假借共赴國難的口號，提出國共再度一合作」的要求，即連國民黨人本身中，亦不乏深信共黨業已有所覺悟，而有接受共黨建議之意。剝罷

工作這時已事實的停頓，而國共雙方代表的晤談，更顯得形勢有急轉直下之勢。可是先生自武漢反共以來，對於共黨的種種謀略，早已深有經驗。如果共產黨當真能取消其本身組織，以國民的資格翻然悔悟，此在先生當所歡迎，然而共產黨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一貫作風，取消蘇維埃而代之以特區政府，這在先生當不能相信共黨有悔禍的誠意。

其三，有人說過：共匪已經有共同禦侮的表示了，可見與昔日情形已經不同。然而，我們要知道，這種表示是否靠得住呢？有沒有保障呢？從前的事實告訴我們：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共產黨曾經鄭重聲明，他們之加入國民黨，是為國民革命而來，不是為宣傳共產而來。但是後來，他們所行，不踐所言。國民黨裏面，有些還是相信他們的，有些已經懷疑的；因此之故，國民黨內接續不斷的起了數年糾紛。事後判斷，不是國民黨失信，而是共產黨失信。但是共產黨肯說失信嗎？他們以為革命是為目的不擇手段的，所謂守約守信，在他們說來，是封建的道德，不值一顧。他們的觀念是如此，我們有甚麼理由可以相信他們的表示是真實的，並且是有持久性的呢？這種過去的痛苦經驗，不能不值得喚起我們的注意。

先生這種見解，就今日既知事實言，誰都不能不佩服其料事如神。然而在當時，這種意見不僅未能為黨內所誠懇接受，抑且未能為一般國民所理解。他們以為先生是一個妥協主義者，先生雖在同文獻中說過：「我們於奉獻我們的心之外，我們還準備捧獻我們的血」的話，可是在當時熱熾的偏狹感情下，一般輿論竟認為「準備」尚不足表示決心，有人甚至這樣說：

……我們讀汪先生演詞到這一段時候，覺得汪先生出國將近一年，與中國隔膜，雖然是親歷其境的人，但是顯得分外隔膜了，或者是為了療病的關係吧，其實我們早已對日人讓了十二分十二萬分的讓步忍耐，非

備我們早已向日人掬獻過我們的心，並且犧牲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現在我們自己已經到不能再生存下去的地步，我們也已經開始揮灑熱血，爲什麼還要說「準備」？……（廿六年一月十九日「立報」評論）

同時也有人批評先生說：

汪先生長行政院時代，曾令國人失望一點，即爲外交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政策。國人當時有這樣的感想：交涉中的抵抗，抵抗缺乏決心；抵抗中的交涉，交涉缺乏誠意。如此，則交涉不成，抵抗亦不成。汪先生長行政院時代，外交上無甚成績，原因或即在此。此一年來，國人對禦侮抗日一點，更爲奮發，更有決心。汪先生抵國之初，必須認清此點……

其次，汪先生長行政時代，令國人失望的又一點，即在台時候之行爲與未上台時之言論，相差太遠。台下議論，台上設施，固不能一字一語都能符合，但偉大政治家，在重要政綱政策上，總應力求言行相顧。今後汪先生對禦敵一點上，主張如何，立場如何，此亦爲國人最亟願聞者，願汪先生有以慰國人。（「益世報」評論）

救亡圖存的方針

但他們並沒有瞭解先生的所謂「準備」，目的不僅在準備戰爭，而是在於以準備戰爭的決心，爭取最後的和平。即是說：「越是預備戰爭，和平越不易決裂，必須大家知道戰爭之不易，戰勝之沒有絕對把握，方纔肯向着維持和平那條路走。」（「安內與攘外」二十六年二月一日在國民政府紀念週演詞。）這是說，不論從萬一不幸的戰爭着想，或爲爭取和平着想，準備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國民的感情要求馬上採取行動，政治家爲俯應國民輿情，自亦必須予以理論上的領導，但對實際行動，則決不能單純取決於民衆一時的感情。所謂台上的行動應與台下的言論一致，中間不能不考慮一個過程。

一面抵抗與一面交涉主張所以為人誤解為不徹底，也就是因為未盡瞭解其間的關係。而在當時，在先生之意，認為無論攘外安內，必須解決的前提條件是團結一致，而團結一致的先決條件必須是消滅國內的共黨破壞勢力，這便是準備。他曾這樣堅決的說：

……我們如今講救亡圖存，畢無高論，惟有誠心呼籲全國民眾，認清環境，立定腳跟，仍向將救亡圖存之整個計劃和一定的步驟做去，萬不可為共匪所搖惑，中了他們挑撥離間的毒計。因為救亡圖存的計劃和步驟，雖然條理萬端，總括起來，不外「對外要保衛國土」，「對內要團結民眾」的兩句口號……（「對外要保衛國土對內要團結民眾」，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中央電台廣播詞）

這已非常明白的表示先生的真正意向與決心。先生雖叫國人為應付萬一的戰爭，要作準備，但這個準備的最大目的是在保全和平，用於戰爭是萬不得已的下策。如果這種準備能通過對外保衛國土，對內團結的要求而能保持和平，那便是中國的大幸，也便是實現了先生偉大的政治心願。先生並不否定戰爭，祇是要人民先有準備，他更明白反對一切假借保衛國土之名而行分裂國土之實的抗戰，他指出「共匪卻偏要假藉抗戰的名義，以保衛國土之名而行分裂國土之實。」（前引）在對內團結民眾一點上，他也反對「共匪卻又偏要假藉『人民陣線』的名義，以團結民眾之名，而行拆散民眾之實」。（前引）

當時先生對國事的主張，仍一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旨趣，要求全國上下照既定計劃與步驟做去，他再三說明準備戰爭祇是為的要維持和平，他竭力主張外交應恢復常態，對於共產黨的挑撥離間，應力予排斥。這一切都證明了先生後來的領導和平反共建國運動，是其言行一貫的必然結論。同時也證明了他對於一定主張的奮鬥不屈的精神。

兩種鬥爭任務

先生對於當時的國內政治，同時負有兩種鬥爭的任務：其一，是對共產黨假借民主主義而圖實行分裂中國陰謀的鬥爭，這在先生批判人民陣線的言論中，業已發揮無遺。其二，是對黨內獨裁政治傾向的鬥爭。後者的任務比之反共的鬥爭，內容實遠爲困難而複雜。因爲中國是實行民權主義政治的國家，民主精神是實行民權主義所必要的，先生對此曾備切說明：「中華民國是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國民黨是民權主義的奉行者。」（「論民主政治」一文，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演講。）所以民權主義與民主政治，實爲二而一。但英美派的份子在當時既企圖以中國民權主義的政治性格，強調親英美的政治路線，而中國共產黨亦復企圖假借民主主義的號召，侵入其勢力於國民黨。此種混亂的觀念，在當時實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因此先生在行政院各部的歡迎會席上，以論「民主政治」爲題，首先闡明中國的民權主義說：「我們確信民權主義是一種最適合於民主政治的學說原則，絕不是隨意模仿十八九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學說者，所可同日而語。」這是針對親英美派曲解民權政治所下的批判。

另方面先生鑒於世界政治的國家集權傾向，他認爲澈底的行使民權，必須與國家的強大權力相並行。他指出英美等國雖行民主政治，但在國家非常時代，政府仍得集中權力，行動不受牽制。而中國在訓政時代，又值內憂外患道重交迫，爲使民權主義得以實行，必得提高國家的權力。但這樣豈不將爲獨裁政治的口實嗎？其實並不。先生認爲在平時應該給予人民以政治自由，而且以爲平時給與人民政治自由愈多，國家一旦有非常變故，因人民平日政治能力强大，故愈能應付自如。換言之，惟施民權政治的條件，端在平日人民政治能力的培養。這樣又可預防獨裁政治。

但為防止國內分裂份子利用民權主權的口號起見，先生復解釋政府權力的集中與人民政治能力的培養，是應該並行不悖的。他的結論這樣說：

至於政府權力之應該集中，應該統一，以期應付國難，與培養人民的政治能力，並無矛盾。蓋應付國難，政府與民眾相依為命實其本軍；政府憂患於人民，人民信任政府暨其活動。政府沒有民眾作基礎，無論民主政治不能樹立，即獨裁政治亦不能樹立。……中國今日在內憂外患重重交迫之下，惟有以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共同利益為根據，以求團結，方纔立得定一個強有力的基礎；由此強有力的基礎以産生強有力的機關，即所謂政府，以應付國難，這正是向著　總理所定民權主義的大路上走來，救亡圖存有賴於此……（引同上）

這不僅為民權主義的最正確解釋，且為適合於當時政治情勢，並同樣適宜於今日政治情勢的正確解釋。

三中全會根絕赤禍

先生至此，仍未放棄其對和平的努力，不過客觀的情勢，卻也不能使先生失望。他這時方從歐洲歸來，他親眼看到當時歐洲各國武裝和平的趨勢，因此他雖渴望維持和平，卻也並不忽略戰爭爆發的可能。他一面囑咐國民準備實力以保障和平，同時也告誡人民這種準備也是為的戰爭。他很沉痛的說：

在這趨勢中，中國的情形，是怎樣呢？論起我們原來的志願，是想在國際和平的環境裏，努力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國家。無如數年以來的現象，與我們志願實在相違，不但無和平之可言，而滅亡之禍，且迫於眉睫。我們的政府及人民，只有咬緊牙關，立定了腳跟，去做救亡圖存的工作。其對外方針，數年以來，已經中央再三指明了，不惟說明，且已逐漸見諸事實了。以交涉論，努力於恢復外交常軌；以抵抗論，努力於不使制

主主權稍有喪失。這種方針，是救亡圖存所必由的途徑。以前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安內與攘外」二十六年二月一日演詞）。

而實現這種方針，先生一再聲言其基本前提必求諸國內的團結統一，從而破壞此團結統一的共產黨陰謀，必須予以根本摧毀。在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揭幕的三中全會中，實現民權政治，根絕赤禍主張，且復進而成爲正式議案。先生在三中全會的開會詞中曾提出三點重要問題。第一是如何收復已喪失的領土，保衞未喪失的領土？第二是西安事變反側初定，隱憂未已，剿匪工作，功虧一簣，決不能中途放棄。第三是根據民權主義，樹立民主政治，以完成建國工作。這三點要求中的第二點，即反共，在三中全會中特以根絕赤禍的重要決議形式，發表宣言如左：

本黨以歷史之使命，奉　總理遺敎，致力國民革命，以建設國家，復興民族。本春秋無外之指，對於世界，殷殷焉嚮往於大同之治，對於國內，更斯無町畦畛域之見，惟求集中國力，奠定統一之基，以謀中國之自由平等。故凡服膺三民主義，遵奉革命方略，而願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者，無不引爲同志，而竭誠容納，此爲總理創立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以迄中國國民黨一貫之精神。是以興中同盟時代，延至具有民族意識之志士，十三年改組後，則容納共產黨員個人加入本黨。史實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產黨人加入本黨之後，竟食誓言。在本黨掩護之下，初則對本黨陰分壁壘，繼則對本黨多方分化，當時本黨猶力予容忍，冀其自悔，遂致國民革命軍出衡湘、定武漢，乃復遮斷本黨與民衆之連繫，播植赤化之禍種，以謀顚覆本黨革命建國之基礎，甫揭東下寧滬之師，乘擊北定鄭汴之役，演成兩湖之恐怖，構成寧漢之痛史，北伐大策，幾致停頓。又復倡言創立紅軍，破壞本黨幹部，鼓動階級鬥爭，斬取革命政權。本黨爲鞏固黨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計，乃

不得不當機立斷，以有清黨之役，此共產黨人以自絕於國民者自絕於本黨，往事歷歷為當世所共見共聞者也。顧彼一面鼓其邪說，煽惑青年，一面結集成隊，四出騷擾。為患十年餘，荼毒十數省。遠之如武漢，南昌，廣州，長沙之變亂，以及粵之海陸豐，閩之龍岩，永定，贛之吉安 上饒，永新，銅鼓，弋陽，湘之平江，瀏陽，華容，鄂之沔陽，黃安，監利，豫之商城，潢川等縣，匪蹤所至，田疇為墟，又復偽立政府，致贛粵閩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躪最久，人民之苦痛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責，對於毒害人民之匪類，致不得不予以痛除。數年以來，節節清剿，賴我將士智勇忠誠，秉持三民主義，犧牲奮鬥，卒能抉其根株。凡經匪來盤踞而為國軍克復之地，立即為之區畫條理，招輯流亡，不數月而漸復舊觀，民獲安居，咸慶得所。以我寬仁，易彼殘暴，相形之下，婦孺皆知。彼等自江西總崩潰後，由湘黔滇邊境而西川，而青陜寧甘晉等省，於人民則裹脅之後，繼以殘殺，於社會則摧毀焚燒，惟恐不盡。城市農村之經濟，莫不盡力破壞，靡有孑遺。是皆陳事昭彰，無待縷舉。尤可痛心者，九一八以來，國難嚴重如此，全國國民在統一政府之下，實行集中國力，精誠團結，悉心建設，充實國防，以禦外侮，猶恐不及，而共產黨人乃乘國家危急存亡之際，肆意擾亂於淞滬之役，則猛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猛攻撫州，危及南昌，使抗敵之師，為之牽掣。其他破壞國防，摧殘民力之事，更變本加厲，言念及此，舉國共憤。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餘，倡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惟是鑑往思來，不容再誤，非彼等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為中華民國良善之國民。則中央為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億萬人永久之利害於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暴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殷憂。就目前最低限度之辦法言之，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

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爲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衝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爲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於奪取民衆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國爲之割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要之，凡獨立自主之國，斷不能容許有反國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團體。亦決不能容忍任何殘害民生，毀棄道德之行爲。本黨負建國立人之責，共產封建割裂專制殘酷之策略，及其以國際組織爲背景，而破壞國家統一之行動與宣傳，實與建國立人之要旨絕對相反。吾人須知，必先恢復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與道德，樹立中華民國獨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復中華民國固有之版圖，承繼我中華民族歷史之光榮，以實現三民主義。故赤禍之必須根絕，乃爲維護我國家民族至當不易之大道。凡兹所言，果具決心，而以事實表現於全體國民之前者，均所容與，否則仍當以國脈民命爲重，決不能輕信諾言，貽國家民族以無窮之患。此乃本黨責任所在，故爲全國同胞昭告者也。

和戰之間

遍觀宣言，證之前引各種言論，其出於先生一貫主張，燦然無疑問。至於關於外交方針，開放政治兩點，在三中全會的大會宣言中，亦復強調對內謀團結一致之準備，對外謀恢復外交常態之主旨，努力謀求和平，而以召開國民大會，以之實施民權主義。惟實行此兩要點的前提，則仍在消滅共禍。關於這一點，先生在「三中全會宣言的意義」講詞中，更反復強調說：

……我們必須知道，如今有些人主張寬容共匪的，其理可別爲眞糊塗假糊塗兩種。假糊塗的不必說了，眞

糊塗的，他何嘗不知道十三年以來，共匪日藉加入國民革命，而實則破壞國民革命的事實？他何嘗不知道十六年以來，共匪蹂躪地方，塗炭生靈的事實？他何嘗不知廿一年來，共匪在國難期間擾亂後方，牽制兵力的事實？他所以爲這種主張，與其說是可恨，不如說是可憐。因爲他們這種主張，就所謂飲鴆止渴。鴆是不可飲的，無所謂得與害，有不顧一切，一飲而斃之勢。例如對外方面，感覺孤立，國內生計方面，感覺痛苦無告，都可以說是大渴特渴。以是之故，連鴆也要飲起來。我們只是說明鴆之不可飲，是無用的，我們必須竭力找些可飲的水，以止其渴。所以此次宣言中，有許多部份是痛切說明鴆之不可飲，同時有許多部份是說明什麼水可止渴。例如對外方面，申明忍耐的限度與犧牲的決心，以及認清國際和平之路線等等；國內生計方面，指出經濟建設，須向民生主義之大道以前進等等；都是可飲的水，大家應該趕快的找出來，以爲大多數人民止渴的……

當二十六年三月初旬先生奉中央命令前赴北方參加「綏遠守土戰事陣亡軍民追悼大會」的時候，他雖仍未放棄和平的希望，但秉於一面抵抗與一面交涉的認識，亦認爲抵抗有其本身的意義，例如在他「綏遠抗戰意義」的演講中，曾說：

我們要知道這次抗戰的意義，在歷史上，在時局上，都有莫大關係。因爲歷史上，我們遇見外侮的時候，往往不只是外侮致我們於滅亡。其致我們於滅亡之最大原因，實爲內奸。以中國人亡中國，是我們歷史上一種最可痛心的污點。這種污點，如不將他洗滌乾淨，則亡國之禍，終不可免。這次抗戰的最大意義，是打破了以中國人亡中國的歷史陳迹，是以我們愛民族愛國家的同胞的熱血來洗滌這些污點；這種熱血，是最可寶貴的，是最純潔的，憑藉這些熱血，不但洗淨以前的污點，而且喚起了現在的國魂……

這種解釋，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立場言，完全是正確的，因爲無論是戰，是和，其最基本

的考慮是國族的生存。在當時的情勢下， 先生認爲中國祇有兩個歸宿：「其一是人人爲守土抗戰而死，使中華民國爲四萬萬的公共墳墓；其二是使中華民國走上自由平等的大路，我們的子孫共有共治共享和天堂一般的快樂。」（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我們祇有兩個歸宿」演詞）。同時則復諄諄告誡人民，應認清國際和平的途徑，堅持和平未至絕望，決不輕易戰爭的信心，在現實的情勢下，仍處處爲國家和平的大前提着想。這乍看起來似乎矛盾，却正是表示了先生不凡的胸襟。

事實上當時國內的抗戰意識雖日見抬頭，但中日和平的途徑，在先生努力恢復正常外交的主張下，則尚未閉絕。有一個時期，且頗呈樂觀之勢。例如在先生赴北方時期，由兒玉謙次氏率領的日本經濟考察團，來到中國，而日本外相佐藤，亦有「過去一切，應付諸東流，未來交涉，將以平等地位談判」的發言。兒玉氏一行人到了南京後，中日親善的空氣一時又驟見熱鬧。蔣介石氏在勵志社歡迎席上的致詞中，且復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親以爲寶」的話，表示甚願兩國和平合作。繼之在上海復存中日貿易協會的召開，爲中日和平的希望放了不少光明。可是可惜當時的輿論與民情，對於中日兩國的力謀接近，不僅不表示贊助，且旁敲側擊，作種種猜測，竟釀至毫無結果。後來因華北關稅問題而日益發展的中日惡感，要是當時能由中日雙方的經濟代表圓滿談判解決，則戰爭本身，實不無避免可能。不過這又誰能逆料得到，而今思之，亦唯有徒興唏噓而已。

先生自西安事變回國後所盡的種種努力，是表示了中國在抗戰前夜徘徊於和戰之間的苦悶。惟大勢所趨，和平的奮鬥，終於阻遏不了戰爭的爆發。

第十五章　抗戰爆發

劍拔弩張的形勢

民國二十六年春，中日關係的惡化狀態，業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張羣和川越的交涉，實際上早告停頓。蔣介石本人托病長期告假，一面却在籌備廬山會議。三月間王寵惠取代張羣爲外長，張羣被派出國遊歷。四月間孔祥熙赴英參加英皇加冕典禮，王正廷出使美國。五月底行政院移廬山辦公，許世英表示辭職，……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了英美派路線的抬頭和中日外交途徑的閉塞。

就是在日本，因佐藤外交政策的遭受頓挫，川越大使亦不得不有回國之行。雙方輿論情緒的惡化，亦無已復加。四月間日本「讀賣新聞」曾刊載我國預備對日作戰的消息，並刊載地圖，指我國已築成三大防線，準備對日宣戰。又謂我國進行操縱滿蒙及朝鮮國民獨立運動，同時「朝日新聞」亦謂孔祥熙的出使英國，張羣的出洋遊歷，目的均在激動英美，以陷日本於不利地位。「多列帝國」則更進一步主張對華討伐政策。

在中國方面，王寵惠就任外長之初，即對中日經濟提攜發表諷刺微辭，表示經濟提攜中國雖願接受，但束縛了對方手腳的提攜，則非中國所能接受。這種富有色彩外交辭令，與張羣時代過不相同。但主張對日強硬最烈的，是西安事變以後的中國共產黨及受其愚惑煽動的多數青年。而在日本民間，刺激中國行爲的事件也同樣層見迭出。如四月間日本名古屋舉行太平洋展覽會時，因名古屋全城公共汽車與電車均懸五色旗，致引起我國外交部的抗議。

當時最能認識這種悲慘局勢的，應該是川樾大使。彼時中日交涉業已停頓，一時無再開之意，因此川樾大使於返國之前，即力主雙方應即各自反省。他承認中日外交關係當時雖瀕絕望，但中國仍有調整兩國國交的誠意。祇是他覺得中國應該諒解日本不能放棄其生存與發展。同時對於日本本身，他也主張應該認識中國統一的傾向，爲緩和中國對日本的感情，日本對中國應放棄武力高壓政策。

這種公正的主張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的，可惜當時兩國在狂熱感情的主宰下，一個要「膺懲」，一個要「抗日」，終於陰錯陽差的打起來。先生於五月三日的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中，曾發表我們是抗日不是排日的言論謂：

……我們對日本的態度，簡括說一句話，是抗日不是排日。因爲我們無害人意，故不是排日，但是人既有害於我們，則我們不能不予抵抗，此即所謂抗日。我們今日的工作，都有一個中心，這中心就是加强國家的抵抗力，我們應該每日自省這一日的工作，於加强國家抵抗力有所貢獻沒有。還有關於建設方案，中央同人不斷的在努力研究。總理已經指示我們一條經濟建設的大路，便是用和平方法，來達到最後目標，製造國家資本，經營大工業，而中小工業則放任私人經營，國家予以適當保護，我們還該依此唯一方法進行，希望國內文藝等家體會這種意義，不要僅僅發表些消極的破壞思想作品，應進而以積極的建設思想來工作，這於國民經濟建設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在先生當時的意思，決非表示中國應該馬上採取抗戰的行動，而是必須要有抵抗的準備。如後來事實所示，先生對於蔣氏貿然策劃抗戰之舉，鑒於當時國力的不能勝任，是根本不贊成的。但爲國家的最後生存，爲表示政府一致的態度，他主張中國應該積極準備抵抗，不過即使如此，他仍不忘

提醒國人這種準備的用意，是依照總理指示的和平方法，以達最後建國目的。

抗戰爆發的背景

變方劍拔弩張的形勢已成，在當時中國的處境，抵抗呼聲的高過一切，是容易理解的。尤其是國內的反對派政治因素——如中共和桂系軍人——更願樂於利用國民一致對外的心理，煽動戰爭而圖遂到他們私的政治目的，六七月間蔣氏所主持的廬山會議，便充分表現了這一點，周佛海氏在他的「回憶與前瞻」一文中，曾就當時的情勢分析說：

……在蘆溝橋事變初起之時，兩國的當局，何嘗沒有就地解決的意思；何嘗不採取不擴大的方針。但是雖然都有不擴大之心，而都陷於不得不擴大之勢。在日本方面，當時在華的軍人，是氣燄萬丈的。他們以為中國仍舊是可以不戰而屈的，仍舊是可以威脅成功的。所以儘管東京方面，聲明不擴大方針，而平津方面，則儘然採取擴大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就是當時的當地軍人，也沒有把當時局部衝突，演成現在這樣全面戰爭的意思。在中國方面，當時的現象，更是可以驚心。朝野上下的調子，沒有不高唱入雲的。但是調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之外，沒有不明白這樣打下去，中國決不能僥倖成功的道理。這些道理，共產黨，桂系及當時不滿意中央的人，沒有不知道的，蔣先生尤其比任何人要清楚。大家都知道戰爭不能擴大，不願繼續，而偏偏都高唱持久的全面戰爭。這種悲慘的矛盾，決不是將來的歷史家所能瞭解的。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份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調持久的全面戰爭。蔣先生是絕頂聰敏的。這種把戲，那裏瞞得過他。所以他們的調子唱得高，他的調子唱得更高。在他的意思，以為他的調子一高，一方面可以壓服反對的人，使他們失掉了倒蔣的理由，同時對日本也表示自己的決心，使日本知

證這次不是可以威脅成功，而促成日本的反省，以擴單事件的解決。他的用心，實在很苦。不過他這種用心和辦法，不僅不容易獲得他預期的結果，反足以作繭自縛，逼迫他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我在廬山談話會的席上，親見他發表關於盧溝橋事件的意見之後，立即就發生這種感想。……

馮氏是跟隨蔣氏很久的人，他對於抗戰發動的背景，分析自然不會錯的，戰爭就由於這些複雜的原因陰錯陽差的打了起來，歷史悲劇的慘酷，實再莫甚於此了。

七七事變與廬山會議

在這種情勢下，先生欲持其和平主張，已爲事實所不許，不過我們敢謂先生當時的態度是消極的，復因舊疾復發，在廬山會議召開之初，他適在上海療病。惟因格於國事危急，不得不扶病出席主持這一重要會議，但他心與願違的感情，却終不無流露之處。

釣臺

旅時出處自從容，留得高風有釣蹤。卻憶山川重秀日，鷗夷一棹五湖東。
莓蘚侵尋蝕舊碑，江山風雨助悽其。新亭收泣猶能及，莫待西臺慟哭時。

別廬山

纔接風光眼便醒，別來蹤跡似飄萍。願君不帶風塵色，留爲行人著意青。
（三年兵舟至九江望見日占）

廬山道中

隱翠爲前導，何妨路阻修。松香蒸日氣，草色浸煙光。樹擁全湖見，峯回半剎藏。詩成剛擱筆，雲海已茫

花。

七月二日，先生病體稍愈，始由京偕同曾仲鳴與醫師等人乘建國輪赴潯轉廬山，上引第一首詩作，即是當時的寫意寫景。此項會議雖由先生與蔣氏領銜召集，然參加者的名單，早經蔣氏圈定。廬山會議的正式舉行是在七月十六日，適在蘆溝橋事件後十天，全國抗戰的空氣既已萬分高漲，而會議的內容又如前引周佛海氏所言，有關蔣氏政權前途的重要關係，在諸此情勢敦促之下，蔣氏是不得不走他不願走的路了。當華北盛傳蘆溝橋事件將有和平解決希望之時，蔣氏突於七月十七日發表了他的「最後關頭」的宣言，並確定最低限度的四點立場謂：一，主權領土完整，不受侵害；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改變；三，中央所派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廿九軍駐地不受約束。不過蔣氏的態度雖極堅決，但他仍確認和平是中國的最高國策，他在同一宣言中曾說：「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的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是此理。」又謂：「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

既然不可以求戰，但在共產黨，桂系軍人和全國失意政客一致高調抗戰的輿情下，蔣氏卻又不得不以戰的姿態來強調本身政權的立場，因此他就提出了「應戰」的口號。以當時北方的局勢而言，應戰無疑是必要的措置，這亦如周佛海氏在其同一文中所說：「我當時的意見，以為在北方，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樣的毫無抵抗。因為如果在北方不堅強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國的決心和實力，就不能戢當時一部日本軍人的氣燄。我們要以實力表示我們是不可以不戰而屈，我們要以實力使日本知難

而退。但是我們要堅持一種政策，就是我們是爲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爲擴大戰爭而抗戰。所以我們的抗戰，只應限於北方，不應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戰。」

但不幸的是，蔣氏的應戰口號一經提出，立即給中共份子和國內其他失意政客軍人利用之爲擴大爲全面抗戰的呼號，戰爭的調子愈唱愈高，全國國民的感情日益鼎沸，當時中共且復通過其代表周恩來之口，表示南京如果實行全面抗戰，中共願意悉聽蔣氏指揮，一般迷信共黨宣傳的人，當眞相信中國可由全面戰爭而完成國內統一的素願。蔣氏在諸此高調逼迫之下，復於七月廿九日發表了更進一步的談話，聲明政府唯有發動整個的計劃，決不再作局部問題解決之想。這也一如周佛海先生在他「回憶與前瞻」中所說的：『因爲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着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得高，牛角就不得不鑽得深。同時，蔣先生本想以高調威脅日本，而日本當時在華的軍人，也不肯在蔣先生高調之下示弱。於是乎這邊調子越高，那邊態度越强。但是調子高是假的，態度强也是假的。無論調子如何高，態度如何强，當時都沒有從事全面長期的戰爭的決心和準備。不過一方面沒有想到高的調子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變低：別方面也沒有想到强硬的態度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化軟。於是兩方面在假的空氣之下，竟演成了眞的空前的慘劇。……』

「說老實話與負責任」

七七事變後，蔣氏即回到南京，廬山會議遂由汪先生一人主持。至七月廿九日蔣氏在南京發表了更

積極的談話之後，抗戰擴大的形勢業已不可避免，這情形雖非先生所願見，但大勢已經如此，爲表示舉國一致的立場，以求戰事或能倖免擴大起見，先生於七月底亦即搭乘永綏艦趕返南京，並發表「最後關頭」的談話，大意說明中國自九一八事件節節委曲忍痛退讓以來，今華北事件已至最後關頭。「但是人家的進逼是無止境，而我們的後退，卻不能也無止境，所以就一定有一個最後關頭。到此關頭，我們就應站住，不再後退，不惜任何犧牲。是以今日若不犧牲而猶言準備，則準備毫無意義。我們是弱國，抵抗就是犧牲，犧牲的程度，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總之，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我們雖弱，不能打倒人，但犧牲是辦得到的，假設不犧牲，那不是不能，而是不做，也就是沒有犧牲決心，而只有做傀儡的決心了。」

當時的情勢促使國人要有這種堅決的態度，是完全可以瞭解的，因爲國家到了生死存亡關頭的時候，不能不有破釜沉舟的決心，祇是戰爭的決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爲爭取和平的最後手段。一個國家而被逼至甩出「戰爭」的最後一張牌，原屬萬不得已。是故不得不戰的時候固然需要最大的決心，但在同時卻不能不刻刻記住何以要戰的目的。當時先生積極支持戰的立場，即是根據於此的。他在八一三前（八月四日）發表的一篇「說老實話與負責任」的結論中，即有這樣幾句話：「綜而言之，我們守着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一致的呼聲了。」因爲這篇文章是先生對於抗戰所表示的最後態度，我們更不妨一讀其全文。

各位同胞：在此存亡危急的關頭，兄弟所要說的，只是幾句話，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論到資

任，服從大家都有的，服務政府機關的，各有各的責任，服務社會機關的，也各有各的責任。就政府方面來說，從前的措置如何，現在的措置如何，將來應該如何的措置，這固然是很大的責任。就社會方面來說，幾年以來，人民所供給的血汗，實在不少了，除了以法定的貢獻，供給國家之外，還有許多的義務捐以至娛樂捐，其於負責任可謂已盡。然以之比較日本，對於所謂「華北軍緊急費追加預算」，一動筆就是四萬萬圓，其相去又如何呢！

中國歷史上有兩句最痛心的話，一是鄭國說，臣為韓延數十年之命，然秦成亦秦萬世之利也。明知不能救韓之亡，而徒欲延其數年之命，這樣的以人要還求延最後之喘息，到底不是辦法。一是張悌說，吳亡之際，方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之亡，而僅欲一死以自盡其心，然想到了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隸了，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然則不能不商量怎樣的大家負責任了。兄弟的意見，以為大家都要負責任，則先之以大家說老實話。所謂說老實話，是心口如一，心裏這樣想，口裏這樣說，這是很要緊的。中國宋末明末會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心裏所想與口裏所說，並不一樣，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負責任，而歸別人去怎樣負責。當和的時候，拚命的指摘和，當戰的時候，拚命的指摘戰。因為和是會吃虧的，戰是會打敗仗的，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立於無過之地，讓給別人該死，於是熊廷弼傳首九邊了，袁崇煥凌遲棄市了，此之可悲不在其生命之斷送，而在其所有辦法。在這種大家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的空氣之中，只有隨處碰壁，除了以一死塞責之外，簡直替他想不出一條出路。宋亡將及百年，明亡將及三百年，這樣長時期的亡國之痛，已够受了，自十九世紀以來，亡人之國，不只武力，一切經濟文化皆可為亡人之國的工具，所以除不亡則已，既亡之後，絕無可以復存。除了波蘭，因特殊情形，亡而復存外，更無可舉之例。在大戰中，俄國敗於德國，幾乎亡了，德國戰敗於協約國，幾乎亡了，然卒能保存，且能復興，這都是以垂亡之際，人人下了救亡圖存的決心，人人肯說老實話。須知，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說且

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略，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這種做法，無他妙巧，只是說老實話而已。這說老實話，不是等閒的，人人能說老實話，纔能人人負責任。反之，人人不說老實話，則必人人不負責任。人人不負責任的結果，除了亡國，還有那一條路。我們知道現在戰爭有強國對於弱國的戰爭，有弱國對於強國的戰爭。強國對於弱國的戰爭，利用自己力量豐富，運用迅速，期以一舉而殲滅弱者，使無復戰鬥能力。弱國對於強國的戰爭，自知力量不及，但是已經下了決心，就要將所能使用的心力物力，完全使用，不留一點一滴，那麼自己的力量，固然使盡，而強國的力量，也為之消耗，強國於是便不能不有所顧慮了。我們必須知道，強國之對於弱國，如饕餮之徒，貪得無厭，如果吃着甜頭，那自然越吃越甜，永無不吃之理，除非吃着了苦頭，方纔會把吃蝕打了回去。所以我們若能將所能使用的心力物力，完全使用，不留一點一滴，則至少總可使他吃些苦頭。還有一層，我們也必須知道，現在戰爭不只是有形之戰，而且是無形之戰。一個強國，平日對於其他強國，雖不以兵力相見，然野心既大，樹敵必多，其兵力已有備多力分之苦，何況除了兵力之外，還有經濟戰，商務戰，工業戰等等無形之戰，時時刻刻都在性命相搏，絲毫不肯相讓。因此之故，一個強國對於一個弱國，為有形之戰，以消耗了兵力，以至於財力，則無異對於其他強國發生了破綻，使之得乘隙而入，其始只是若干消耗，其終且成為致命之傷。一個強國無論如何的強法，對於此點，決不能無所顧慮的。明白了以上的意義，則可知一個弱國對於一個強國，不得已而應戰，極度的犧牲，是萬萬不能免的，而這種極度的犧牲，決不是白白葬送了去絕無效果的。反之，不肯犧牲，犧牲而不肯徹底，則強國不但吞食得容易，而且消化得也容易，這便使他越吃越胖，不但不因消耗而發生破綻，且將以這一個弱國為資源，更為吞食其他各國之用了。有人說道：「我們雖是弱國，但我們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估量太高，則將輕於嘗試，估量太低，則將陷於消沉」

。這些話語，雖然是至理名言，但是估量兩字，是不容易做到的，例如歐戰開始，德國原欲聚其兵力於最短期內，擊破法軍，直入巴黎，當時德國估計自己兵力，必然可以做到，但是後來遇著比國要直之抵抗，以及法國馬斯河之立定陣線，原定計劃不能達到，這是德國估量自己力量太重，法國力量太輕，以至於此。德國的軍事學，世界有名的，尚且對於估量不免有差。又如近來義大利之攻擊阿比西尼亞，當時各國的軍事觀察家，皆以為阿比西尼亞多沙漠不毛之地，而且又有雨季，因時義大利軍隊，必不能前進，然而後來義大利之進兵迅速，阿比西尼亞之一敗塗地，竟不待至雨季，一般軍事觀察家所估量的，完全錯了。由此可知估量二字，是不容易做到的。大抵一個強國對於一個弱國，用兵之始，必欲以雷霆萬鈞之力，壓倒之於一擊之下，當此之際，這一個弱國，惟有硬着頭皮，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捨此實無生路。又有人說道，我們雖是弱國，但我們是愛好和平者，如果被人侵略，將必有尊重和平者之援助，這些說話雖然也是至理名言，但是，我們雖然愛好和平，而和平之存在，不取決於愛好和平之志願，而取決於維持和平之力量。沒有維持和平之力量，而言愛好和平，這不是愛好和平，而是輕蔑和平。世界上固然有尊重和平的國家，但只知尊重和平，而不知拿出力量來，與其稱為和平之尊重者，毋寧稱為和平之嘲笑者。然而拿出力量來是不容易的，第一必先要我們自己拿出力量來，第二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雖然是人類應有的道德，然就現在世界上國家民族林立的局面來說，那一個國家民族不是為自己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那一個國家民族肯為別個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除非是共同利害，即使是共同利害，而權衡輕重，斟酌緩急，也大有提刀四顧，躊躇滿志之餘地。由此可知一個弱國被人侵略的時候，全靠自己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實無生路。於是有人說道：「然則以弱敵強，豈不困難？」拿破崙說字典無難字，我們說字典無易字，因為知其難而說是易，那就不免隨便的說，隨便的做，說既不老實，做又不負責任。反之，知其難而說是難，知其難而仍然向着難去做，那就說是老實的說，做是負責任的做，這決心與勇氣，當然增加十倍，即使困難十倍於此，亦可將他打破。我們大家說

老實話，我們大家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以引起無謂的衝動，因為這種衝動，是易於鬆弛的，我們不作奢想，以引起無聊的希望，因為這些希望，是易於幻滅的。綜而言之，我們守着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定，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的一致呼聲了。

聯蘇容共政策的再現

這是最透徹的知己知彼論，尤其是對國家和戰關係的抉擇，說得最為澈底。人人肯下救亡圖存的決心，肯說老實話，肯負責任，那麼「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這幾句話，不僅說明了當時先生擁護戰的態度，且也說明了後來主張和的態度。

盧溝橋事件擴大為八一三滬戰後，南京於九月九日即召開中央政治委員會與中央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組織國防最高會議，網羅全國軍政黨各方領袖，而由蔣氏任主席，先生副之。全面抗戰的踏出，最中下懷的當然是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了。八月廿九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一經發表，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即以其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由南京向全國發表宣言。宣言中雖借「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名義，聲言已得「中國國民黨的諒解，」「表示願決心與共赴國難，」但卻乘機提出了比國民政府應戰主張性質更重大，範圍更廣汎的主張，他們在宣言中曾這樣說：

……中國共產黨願乘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標，這就是：（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二）實現民權政治，及開國民大會，以期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生活，首先須切實的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共產黨在「抗戰」之上冠上「革命」的標榜，顯然一開始對抗戰的目的就懷有異圖，至於主張戰時制定憲法，召開國民大會，號召救濟民生，幾無一不是向國民黨政權進攻的政治手腕，他們雖然宣佈願以服從三民主義，取消蘇維埃政權，取消沒收土地政策等為交換條件；不過證之後來的事實，也同樣無非是為實現前者目的的手段而已。但不料親自發動過十年剿共的蔣介石，在西安事件後仍復支持過三中全會拒絕赤禍宣言的蔣介石，竟承認了共黨的巧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而發為公開的容共宣言謂：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總理嘗說明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于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備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瀕危殆。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異見，而共趨于一致，足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咸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為

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今日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効忠國家之機會，對于國內任何派別祗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于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爲總理創製之三民主義，此爲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抗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爲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爲保持 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鬥，世界明達之士，必能深切瞭解之也。

「低調俱樂部」

這證明了西安事變的本質，後來外間的種種猜測，都不是無原因的了。李維諾夫後來發表的「反共」是地質學的名詞，也使從蔣氏的這一重大轉變而獲得了根據。聯蘇之後，接着容共，這不僅一變了中國十年反共的立場，且亦變更了應戰之初的抗戰內容。先生對於應戰性質的抗戰，因其爲表示國家爭取生存的決心與其實力，而表全力擁護，但因應戰而重啟聯蘇容共的惡夢，是他全力所反對的。無論先生與蔣氏，在他們決定應戰之前，無不確認爲中國是一個弱國，雖然不得已而應戰，但預料戰則必敗，惟不戰而和，在當時已不容有這樣的考慮，而唯一的希望，厥在以戰的決心，戰的力量，以求和平的早日實現。而這樣的戰爭，在先生認爲其政治性質是不宜過份擴大的。聯蘇因爲刺激日本，

與中國的應戰並無幫助，而容共則適足為藉中國而分化應戰的力量，且提供國際共黨勢力的藉口，總而於我無一利而有百弊。戰則必敗，這是當時政府中人的一致見解。惟除此見解，亦有三種另外看法，一是戰必大敗，和必大亂；二是和必大亂，戰未必大敗；三是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先生的看法是屬於第三種的，不過先生認為戰雖必敗，但當時的情勢已不可不戰，祇是戰的內容必須是應戰性質。及至蔣氏接受聯蘇容共的主張，先生遂悵然應戰前途的可憂，而亟亟於從戰的途中恢復和平。周佛海氏在前引的同一文中，即曾闡述這種情勢謂：

然而戰必大敗，和却未必大亂。當然，當時，現在仍舊如此——共產黨，桂系和其他失意無聊的份子，都以抗日為倒蔣的工具，拿着抗日的題目，去逼迫蔣先生。但是如果蔣先生在適當的時期，毅然主張和議，政府的力量，實在足以控制全國而有餘，實在足以壓服各種反對勢力，便不致於大亂：

在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堅確的認識之下，我和幾位朋友，就一面設法約人直接間接向蔣先生進言，一面設法傳佈我們的主張。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為此事寫給蔣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當面也談過多次。所以我們當時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湊巧主張相同的幾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裏，有些每日必來。於是空氣漸漸傳出，漸漸的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們毫不顧忌，而且把我們這個小小團體，叫做「低調俱樂部」。有天在富貴山大地下室裏面辦公，熊天翼約我到一個秘密的房間，很嚴重的對我說道：「你要小心，不宜亂說話。廣西方面某要人，說你是非戰集團的主要人物。」我謝謝天翼的好意，對他說：「中國人只知自愛，而不知愛國。如果我們認為於國有利的主張，為什麼這樣愛惜羽毛，藏在心中而不敢出呢？」

在當時，我們當然知道立即停止戰鬥行為，不僅是不可能，而且是不應該。我們主張一面繼續的抗戰，一

國不能斷絕外交的線索。這種線索，不僅不應斷絕，而且應該有所加強，以便於適當時期，提議停戰。同時，我們主張在堅強的軍事抵抗以外，不宜從別的方面，再給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實，使他們作爲擴大戰爭的理由。不幸我們所不願意的現象，繼續不斷的發生了。中俄互不侵犯條約成立了，蔣先生容共的談話發表了。前者給日本以刺激，後者授日本以口實，是毫無疑義的。當中俄協定公佈後的兩三天，某晚我聽見蔣先生的容共聲明，明天就要發表。我覺這兩件事，先後接着發表，實在是毫無好處。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請蔣先生稍緩發表。天翼也以爲然。湊巧蔣先生那晚約他談話，他就陳述這種意見，並要求採納。但只是遲延了三天，結果，終於發表了。於是我深深的認識了抗日勢必聯俄，聯俄必須容共的命運。因此痛切的感覺，內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共黨，外有圖收漁人之利的蘇聯，戰事一定擴大，一定延長，而使中日雙方，兩敗俱傷，而爲他們的犧牲了。

南京失陷前的一幕

是年十一月九日，上海已全遭包圍，先生即發表了一篇求國家與民衆團結的沉痛文章，此後就到漢口主持政務。十二月十三日南京不守，二十日國府宣言遷都重慶。事先，在南京失陷之前後，亦即在日本政府發表第一次近衛宣言（十二月十四日）之前，因德國駐華大使出任調停，先生曾乘此機會致力過實現中日和平，而且得到過蔣氏本人及政府重要幹部的支持。此即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在漢口中央銀行所召開的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的議事主題。

當時蔣氏本人雖在前方指揮軍事，但出席此項會議的，除先生之外中央大員有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的有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及秘書長張羣，秘書主任曾仲鳴等

。而由當時曾任外交次長的徐謨報告德使陶德曼調停和平的經過。

徐謨報告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因陶德曼大使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接得德國政府的訓令，往晤孔祥熙，二十九日復見王寵惠（當時外交部長），說明德國政府曾訓令陶氏，謂德國駐日大使曾在東京與日本陸軍大臣與外務大臣談過話，探詢日本是否考慮結束當時局勢，並問以在何種條件下方能結束。當時日本政府即提出七項條件，託為轉達中國當局：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擴大，但行政權仍屬中央，惟希望中國將來不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長官。將來華北有新政權成立，應任其存在，惟當時日本並無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當時在談判中的礦產開發問題，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行政權仍舊。四、關於排日問題，希望照二十五年張羣川越談話所表示的態度做去。五、防共問題應攷慮辦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應尊重外人在華權利。

當時蔣氏在南京，得此消息後，即令徐謨於十一月底陪同陶使往南京，以便當面一談。一行於十二月二日抵京，徐謨先向蔣氏報告陶氏談話經過，蔣謂須先與在京各級將領一商。當日下午四時，即舉行高級將領會議，與會者有顧墨三（祝同），白健生（崇禧），唐孟瀟（生智），徐次辰（永昌）等，徐謨本人當亦參加。徐謨將斷情重複報告後，在座諸人即問有苛刻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軍備，徐氏即答以陶大使言並無其他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於是蔣氏先詢問唐生智意見，唐未即置答，復問白崇禧，白謂祇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蔣再問徐永昌，徐答祇如此條件可以答應，顧祝同的意見亦相同，後來唐亦贊成各人意見。結果蔣氏遂表示意見謂：一、德國的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稱亡國；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同日下午五時，陶德曼在徐謨任翻譯之下，往晤蔣氏，所談與漢口時相同，祇是說如果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條件恐非如此了。蔣氏遂卽表示謂，對於日本不敢信任，惟相信德國是中國的好友，願接受德國的調停好意，惟同時希望將兩點意見轉達德國政府，一是德國應該任調人到底；二是華北行政主權必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爲談判的基礎。不過日本不能自視爲戰勝國，以爲此條件爲哀的美頓書。德使卽表示意見謂，中國政府在談判中，應該採取忍讓態度。蔣氏答謂雙方都應如此。蔣氏又謂，進行談判，應先停戰，望陶氏能向德國政府轉達此意。同時蔣氏復表示日本若自視戰勝國而事先宣傳，以爲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就不復談判下去。

蔣家班的和平運動

但此次調解，終因雙方遷延而告失敗。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十八日蔣氏在漢口大本營邀先生，孔祥熙，孫科，張羣，王寵惠，陳立夫，邵力子，李宗仁，白崇禧等舉行重要會議，討論有關繼續戰爭的事項，同時爲謀加緊對共黨聯合起見，決定設置中央軍事會議，其下分設軍事委員會與國防會議，前者處理軍事，後者執掌內政，外交，財政等一切。先生對此表示反對，遂於二十七日提出辭呈辭去國防委員會。

然則蔣氏是否當眞堅持抗戰到底呢？陶德曼大使第一次調解的經過，顯然表示了蔣氏是願意和的。南京失陷後，德大使再作第二次調解，因爲十二月廿四日日本廣田外相對於和平條件有過二次答覆。當時先生卽同張羣，王寵惠，孔祥熙等相商，考慮接受和平條件，並將此意告知蔣氏，蔣因問題重大，答謂需與白崇禧，李宗仁，閻錫山等將領商議後始可決定，因此自十二月二十七日至翌年元旦，

經次召開國防會議討論和戰問題，於大除夕到達接受德大使調解和平的決議。惟蔣爲避免主和責任，商定將行政院長一職交由孔祥熙主持，張羣爲副院長，元旦日孔張即相繼就任新職。但二日白崇禧，閻錫山離漢赴前方，四日蔣氏亦去開封，因此和議再遭擱置。而日本政府於一月十六日發表了不以蔣氏爲對手的重大聲明，至此和平運動遂遭中斷。

不過就在日本政府發表了一月十六日的聲明之後，蔣氏對於和平希望，依舊沒有放棄。梅思平氏的「和平運動之如是我聞」一文中，就會這樣說過：

日本政府發表一一六的聲明。但是蔣先生和平的期望，並未斷念。去年（二十七年——筆者）二月間，蔣先生就派某君到香港成立機關，專作與日本人聯絡用的。某君奔走於上海東京香港武漢之間，都是有詳細報告給蔣先生的。蔣先生還和某君說：「我是有反共的決心，但是必須待戰爭結束之後，我才可以開始作撲滅共產黨的工作；這一點希望日本方面諒解的。」不久，蔣先生又命侍從室某君攜投鉅資與香港某君，向日本徵詢關於第三國調停的意見。

在宇垣初任外相的時候，蔣先生又命張羣致賀電於宇垣，這賀電的大意如下：「兩年以前，我（張羣自稱）任外交部長的時候，閣下給我賀電，命我以東亞和平自任；我現在亦以此辭奉贈閣下。」從此以後，張羣命其心腹張季鸞藉大公報在香港出版之名，常川駐港，與日本方面聯絡。當時他們的建議，是很離奇；說要陳立夫到菲列賓去與日本某人見面，再由日本派大員到衡陽和蔣先生見面。談的都是手續，未曾深涉內容。所以結果一無所就。

和張羣雙管齊下的，就是孔家的和平運動。初步奔走的是有所謂孫秘書，後來孔夫人以及孔公子都和日本人見面了。更奇的孔家的和平運動，是把甚麼條件都答應了。可惜日本方面接洽的，不是政府負責的代表，所

初步和平運動的頓挫

前文所說的「某君」，當然是高宗武，所謂侍從室「某君」，是周佛海氏。原來自盧溝橋事件擴大爲滬戰之後，以先生爲中心，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等諸人，即已傾向和平，在南京尙未失陷之前，他們曾通過胡適，青年黨的左舜生，李璜，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大公報的張季鸞等，先後向蔣氏進言和平，但蔣氏總推說時機未到，並表示『我們並不是不能和日本談和平；不過日本的要求到現在爲止，是沒有止境的。我們最初以爲日本祇想要得滿洲，後來又說要華北，將來也許是要上海，要廣東的。要是日本祇要求滿洲，要求華北，在我的責任上是可以與日本相提攜的；不過，日本的要求，到現在爲止，並沒有限度。』（周佛海：「和平運動之前後」刊載廿九年十一月份東京「日日新聞」。）

陶德曼調解二次失敗後，先生和周佛海等仍在漢口，他們仍不放棄和平的進行工作。當時周佛海氏是侍從室副主任，主任是陳布雷。周氏一羣人即以先生爲中心，計劃先設立一個蒐集日本情報的機關，以便策進和平運動。起先這個機關預備設在漢口，但在漢口不易獲得和日本的接觸，因此周氏即商同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請其去香港擔任活動。此事起先得到蔣氏的許可，並允月給八千圓經費，但後來給干龍惠阻止了，蔣氏又復改變意見，命高仍留漢口。不過結果因周氏願負全責，高氏依舊到了香港，蔣氏對此既成事實，並不表示反對。後高宗武由香港到上海，探知日本有和平的意思，隨

卽回到漢口，並蒐集其他來源的情報，報告蔣氏日本有和的傾向，於是蔣氏再命高宗武到香港。當時蔣氏且對高說：「把這一主要意思傳給日本。我們並不是反對和平！不過先反共然後和平，這是不可能的。祇要停戰，我們自然會自己反共的。」（見前引）

高宗武在香港漢口間往返多次之後，「低調俱樂部」的一羣人決定遣高直接往日本去一趟，此事事先並沒有告知蔣氏。但後來蔣氏曉得了，也不過說了幾句「荒唐，荒唐……」，並沒有如何反對。那時日本是平沼組閣時代，高會見了平沼首相和有田外相，他們表示希望先生能出來主持和平。高獲得此種意見回到香港之後，恐蔣氏將他扣留，並沒有回到漢口，僅托周隆庠氏將報告轉給周佛海氏，再由周先將報告給先生看過，然後交給蔣氏。蔣看了不表示甚麼，隔了三天，才命陳布雷停止供給高宗武每月八千圓的經費。

以上的種種證明了和平是當時政府幹部的一致考慮，祇是蔣氏受其青年將校與中共份子的包圍，不能當機立斷，遂幾次失却了和平的機會。

其間，民國廿七年元旦，蔣氏擴充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將原來三十名的委員增加至七十五名，共產黨的朱德也在內了。至五月間又復恢復陳獨秀，周恩來，毛澤東，張國燾，葉劍英，郭沫若等二十三名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抗日之被利用爲共黨進身之機，是愈來愈明顯了，先生的失望與消極情緒，也日見流露。

黃花嶽麓互聯綿，此日相望倍愴然。百戰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風烟。國殤爲鬼無新舊，世運因人有轉旋。少壯相從今白髮，可堪癡立墓門前。（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始至長沙謁嶽麓山黃克強先生墓以舊曆計之適爲三月二十九日也。）

第十六章 汪蔣決裂

良心的苦悶

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擴大爲八月十三日的中日戰爭以後，先生在黨與政府中，始終站在指導的地位。在黨，他是國民黨的副總裁，在政府，他是中央政治委員會的主席。二十七年七月初旬在漢口召集國民參政會議時，先生又被推爲議長。

然而先生雖於黨於政府居於崇高的地位，在當時的環境下，他竟不能有公開發揮他政治主張的權利。中國的發動抗戰，原是出於萬不得已。對於這萬不得已的行動，先生站在一個領導政治家的地位，自然表示全力支持的。先生曾屢次這樣說過：「當初以爲日本要滅亡中國，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最高的目的自然想救中國於滅亡，最低限度不能救國，亦可殉國。如果當初的抗戰是由於這種純粹的不得已的動機，那麼，在今日必然以當初一樣的誠心誠意來謀和平之實現；因爲只要能使中國不致於滅亡，則最高的目的已達，當初的戰，今日的和，完全是一貫的，沒有一些矛盾。」

這雖然是後來主和後的說話，但先生對於和戰的根本目標，是始終有一清楚的認識的，此即在於拯救中國四個大字。從「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八一三前夜「最後關頭」宣言，這一根本認識絕對沒有變更過。因此當先生在抗戰的過程中看到共產黨和新軍閥交相利用這一戰爭的機會，反將加速中國於滅亡的危機時，他在內心中就感覺到非常的痛苦與憂慮。因爲他自己居於政府最高幹部的領導地位，他對抗戰爆發後政府內部的種種腐敗現象，自然看得異常清楚。他原以爲抗戰是出於拯救中國目

的的不得已的手段，可是在抗戰之後，他清清楚楚看透了這一手段一旦爲共產黨和新軍閥抓在手中，就變成了殺害中國自身的利器了。軍事當局不克盡守土之責，共產黨的以「焦土政策」與「游擊戰略」實行流寇之實，尤使先生對抗戰前途感到莫大的痛心。

因爲抗戰祇是拯救中國的不得已的手段，和平才是最後的目標，所以先生在抗戰過程中，曾利用每一個機會向大家提醒這一點。尤其在南京失陷之後，中國的力量已使外國認識，抗戰的勝利雖然無望，但以此種力量的表現，中國很可以提出光榮的和平原則條件，在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漢所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先生就曾利用這一時機，於大會宣言中闡明中國抗戰的原因並其目的謂：「自塘沽協定以還，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

當時徐州方告喫緊，爲甚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偏偏重申中國之抗戰原因與目的，而並不一味強調抗戰行動的本身？關於這一點，先生曾有過明白的解釋謂：「在這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兄弟所起草的大會的宣言，是怎麼樣的呢？就是根據二十四年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方針來做的，我們把爲甚麼抗戰的原因說出來，我們把我們對於和平的希望，及和平的條件也說出來，說明白達到這個和平的希望，我們就恢復和平，達不到我們就繼續抗戰，在這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頭一段到第三段，說得很清楚的。以下就是關於內政外交關于教育各種問題都有說。那時候的環境是怎麼樣的呢？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已經陷落了，二十七年四月的時候，徐州也很緊急，大家

覺得這個局面是很危急的時候，在武漢大家要做一個拚命來支持，不過自家覺得國力及各種的關係，去年蘆溝橋的抗戰，真是一個不得已的，所以不能不把抗戰的目的來申明，再不能不把和平的條件來申明，說明白那些是我們堅持不能讓步的，那些是非讓步不可的；當時的宣言，為的是適應了當時的環境，來定這個方針的。」

對抗戰政治的批判

事情非常明白，先生早在徐州失陷之前，即已感覺到中國應即利用其半年來抗戰所已表示的力量，來自動闡明和平的原則了。可惜先生的這一主張，雖在當時會議中以宣言的形式獲得一致接受，但在實際政治上，卻爲「抗戰高於一切」的高調所掩沒了。

至同年十月，日軍進攻武漢的形勢已成，此時江浙濱海各省早告不守，而自徐州淪陷後，日軍會師武漢的氣勢一天盛於一天。反顧國內，抗戰前途，日呈艱難。先生曾批評當時國內的形勢說：「自抗戰以來，所失去的地方，其幅員之大，時間之短，歷史上宋亡明亡的時候，都無其例。」但這還不打緊，最糟的國內政治，跟着軍事上的失敗，一天天的愈見黑暗。這也如先生所批評的：「不過宋亡明亡的時候，每失一地，還知道痛心，朝廷要下詔罪己的，將帥要革職拿辦的。如今呢？卻滿不在乎！有過一位監督委員說了一句：『失地不聞痛心，喪師乃曰鎮定，』立刻將他撤職。從此以後，獨有無聲，許多重要城鎮，在失去的時候，加上些『轉移陣地』，『變更戰略』等等字樣，更重要的，再加上些『已無戰略之價值』，『已予敵以重創，戰略上之目的已達，無固守之必要』等等字樣，說

出來時，臉上沒有一點難過。」

這種重於文章詞藻的抗戰，自爲先生向重說老實話的責任感所不能容。早在八一三前夜先生所發表的一篇題名「說老實話與負責任」的宣言中（全文見第十五章），他就預先下了這樣一段警告說：「所謂說老實話，是心口如一，心裏這樣想，口裏這樣說，這是很要緊的。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心裏所想與口裏所說，並不一樣，最妙的方法，是自己不負責任，而看別人去怎樣負責。」

當時的國內政治形勢，使先生痛感有說老實話的必要了。他感到日軍進攻華南在即，徐州失守後的武漢形勢也很危急，新軍閥嘴裏的抗戰到底，共產黨嘴裏的焦土政策，若聽任嚷嚷下去，必至斷送了抗戰的目的無疑， 因此先生特於是年十月首次的向海通社記者作談話的方式，吐露他的肺腑之言謂：「中國在抵抗侵略之際，同時幷未關閉第三國調停之門，不過此項調停之能否成功，須視日本和平提議之內容爲斷耳；如條件不妨礙中國之生存與獨立，則或可爲討論之基礎，不則絕無談判之餘地。」

主戰派與輿論的矛盾

這篇談話發表之後，蔣氏與共產黨的輿論機關，立即發動了反攻，對先生的主張濫肆攻擊；在上海方面，尤見激烈，現在不妨摘錄當時各報的言論，以示蔣氏與共產黨對抗戰意見的一斑。

（申報）「主和即漢奸，」「講和即滅亡，」本報昨既剴切辯述之矣。至於國際第三者之所謂調停，論

其本質，乃爲從旁疏解而非片面之求和；論其形態，要在彼此妥協而非弱者之投降；故汪精衛氏近頃猶有我國決心繼續抗戰而始終未塞調停途徑之說也。（中略）抑調停之空氣，何自來乎？日本進兵華南，無論其主觀上有何縱橫之妙，然中國必以此事實反證調停之更不可能。蓋惟撤軍始可爲調停之初步，未許以進兵爲調停之工具，此則中國朝野所屢屢詳明表示者。若以進兵華南爲有裨於調停，則其立論之蠻橫，乃爲日本已向自速其潰敗之途猛進，調停之機運，斯有日益之黯耳。外電傳說紛紜，隔靴搔癢之談哉。

說曰「主和即漢奸」，「媾和即滅亡」，但在原則上亦並不反對調停，所怕者祇是日本的進軍，這種態度，眞是反映了當時重慶內部的心理矛盾。對於這，先生曾予調侃的批評說：「爲甚麼言和就是漢奸？如此說來，憲法上規定國家有媾和的大權，是規定國家有做漢奸的大權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和』字，其解釋應該是『忠孝仁愛信義漢奸』了！」至於關於「惟撤軍始可爲調停之初步」，先生的解釋是：「從來兩國交戰，都是由停戰講和，由講和而撤兵；如今蔣既高調繼續抗戰，則交戰形勢仍然存在，撤兵從何說起？」

共產黨的輿論機關，當然是絕對反對中日言和的，如當時上海的「譯報」，即有這樣的說話說：「中國如果永不中日本這和誘降的陰謀，關閉任何形式的調停之門，則日軍在華南行動的結果，終有一天必然招致英法等干涉，因此，日軍的進攻華南，無異於替中國推動國際對日施行武裝制裁。」共產黨利用重慶向來依賴外援心理的弱點，企圖挑撥國際對日的制裁，來阻遏重慶內部和平勢力的抬頭，這種用意是顯而易見的。可是當時另一類親共色彩的「導報」，對於這一點却有着矛盾的看法：

「當此調停謠言甚囂塵上的時候，當此日本的友軍德義正在慫恿英國出面對中國進行勸降運動的時候，一方面我們認到了英國官方與商界人士的鼓吹贊助，奔走活動，進行調停，另一面可看見國內漢奸們的陰謀拉攏，企圖從內部推動中國的屈膝工作。海通社這時發表汪先生的談話，實在含有極可玩味的意義。」這種矛盾，是表現了共產黨內部的苦悶。

高調與大炮的誤人

為甚麼重慶明知抗戰不能有前途而要高調繼續抗戰呢？共產黨的立場是明白的，他們唯恐中國不亂，所以對於任何和平都是反對的。然則重慶明明不反對調停，不反對和平，却偏偏要以交戰詞藻來高調抗戰，這究竟為了甚麼？拆穿了說，那還不是如先生後來在答覆某一華僑質問時所說的嗎？

「戰的時候，和之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征服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一般人因為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將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稱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皮的不舒服。一般人如此，是不足怪的；但是政府却不可為這一般人所轉移。一般人同仇敵愾的心，政府固然應該加以鼓舞，庶幾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衰而竭；然而政府更應該知道虛驕之足以誤事。一般人儘管高調，政府則必須握着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纔是合理。如今不然，政府的高調比一般人來得更亢熾些。政府既日日背着良心，來說謊話，一般人何苦自討沒趣？何況話一說出口，就被人指為漢奸，一般人心中想想，亡國是大家有份的，漢奸的惡名却要我一個人來承當，這更是何苦？這麼一來自然而然的，心雖想其危而口不敢言了。這是不說老實話的原因，也就是不負責任的原因，也就是亡國的原因！

上引先生向海通社記者所作的談話，是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在重慶發表的，當時日軍已在大鵬灣登陸，廣州和整個華南業已非常危急了，但重慶當局和共產黨的輿論，依舊向人民欺騙說：「日軍想攻佔廣東，非有一二十萬的兵力不可，這又需要一筆鉅大的戰費，將不是日本的財力所能勝任愉快。即使他的財力能夠動員一二十萬兵力到廣東來，但以兩粵現有的正規軍，再配合上百萬的武裝民衆，也足以阻止日軍的進展。日軍的這一行動，只不過增加自己國力的消耗而已。」（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譯報社論）。

可是事實又怎樣呢？「就廣州來說，在去年十月以前，民衆所聽到的是當局叫人民安心，日本軍隊斷斷不能來到，直至十月初旬，還是如此說，及至日本軍隊將要來到了，當局帶領軍隊先走，將民衆丟下，而臨走的時候，還要放一把火，把居民商店燒個精光，這是廣州民衆處在前方後方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至於丟剩了的，燒剩了的，在當局看來，只有恨他死不盡，燒不光，還不斷的唆使土匪，用遊擊的名義來繼續焚燒搶掠的工作；這是廣州民衆處在淪陷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當局為甚麼如此呢？是奉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為甚麼如此呢？是奉共產黨的教條。」（二十八年八月九日先生演詞。）

對路透社談話及其反響

先生身居政府領袖地位，眼見抗戰的前途是如此的一團糟，他的責任感和良心，都不能容許他再緘默了。廣州失守前夜他第一次吐露了他的和平的要求，廣州失陷之後，他又再度重申了他的意見：

據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路透社的重慶電報：「國民黨副總裁兼中政會主席汪兆銘，今日在此对路透社記者發表談片，謂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爲討論之基礎，否則無調停餘地，一切視日方所提出之條件而定，吾人被迫訴之武力，目前戰爭，非吾人所發動，吾人願隨時和平，不過須有不妨礙中國獨立之條件耳。就中國方面言，吾人未嘗關閉調停之門戶，在比京九國公約會議時，吾人未嘗拒不接受調停，去年德政府出而斡旋時，吾人亦未嘗拒絕之，即在最近國聯討論適用盟約第十七條時，吾人曾有準備結束戰爭之表示。」（下略）

當然，這一談片的表示較之向海通社記者的談話來得更明顯具體了，所引起的反動衝擊，自亦更烈於前。當時除了發動各團體聯名反對和平外，各報且復採取一致的攻勢調：

和平原則所予人之不良印象，勢有以使然，然其間要點，若附有充分之說明，亦得減輕印象不良之程度，或且得以避免誤會之揣測，談片開宗明義云「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如」乃假定之辭，然「日本提出講和條件」之假定前提，何自來乎？議者，來自外籍記者之發問？但紀錄談片者未加說明，幾乎不疑其來自汪氏之方寸間。一心主戰，何來假定講和之動念？至於所謂「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原「國家」有其莊嚴之疑義，「生存」有其必要之條件，不容絲毫假借。然世有不能自衛，而待國際共同承認之國家；有形態儼然，組織井然，而宗主權屬人之國家；等而下之，傀儡偽國，不足齒數，然承認之者非無其人焉；三者皆「生存」，前二者且得爲國聯會員，安得否定其爲「國家」？汪氏本意，絕不類此，然談片之中，若說明中國必須領土完整，主權完整，立國主義有選擇之自由，衛國國防有建設之自由；斯針鋒相對，以見生存之非苟全偷生；若是對明則反應將異於今茲矣？（二十七年十月廿三日「申報」）

這樣，汪先生的意見得到了更其鮮明的發揮了。這中間，汪先生雖然沒有把「不妨害中國國家生存」一語的含義明確的揭示出來，但汪先生這種頑的「調停」，「和平」的主張，在客觀上無疑的混淆一般的視聽，麻痺中國抗戰的意志，特別在現階段上，會很嚴重地影響到中國的抗戰工作的。（十月廿三日「循環報」）

日本軍隊衝入廣州，我們並不惶惑，祗要中國抗戰繼續，一城一地的得失，本來不算甚麼，我們早已說過。然而汪精衛先生之再論和議，我們實不勝其悲憤。因爲抗戰如果中途出賣，根本談不到獨立生存。短識之士，不計國家存亡，奪於私己，猶爲之嘵嘵置辯，我們實在不知他用心何在？這是使我們「惶惑」而又「悲憤」的。（十月廿四日「華僑晨報」）

時至今日，如猶有人欲謀妥協或投降者，實勢將爲國人所共棄。南京淪陷時，曾有人高唱談判和平，但今日則無人敢再作此建議，如有人作此種建議，實係破壞吾人抵禦外侮之決心，無疑爲一漢奸，爲虎作倀。（十月十五日「新華日報」）。

嚴正的答覆

我們在這裏從右到左的強硬主戰論都引用過了。然而這些輿論的內容畢竟表示了些甚麼？一言以蔽之曰：「嘴硬骨酥。」說主和就是漢奸，早經先生批駁過了，說既主戰就不能言和，那也同樣是昧於高調之說。這一如先生所說的：「我最奇怪的，是聽見有人說道：『當日既然主張抗戰，如今又主張和平，豈不是矛盾？』這句說話，眞是奇怪！如此說來，兩個國家，既然打起來，就應該一直打到底，絕不應該再有和平的日子了。這句說話，在道理上如何說得過去？」

因此曲解者和反對者雖多，先生卻絕不因之而動搖其主張信念，當時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氏曾函

致先生說：「日方暫時得意，終必失敗，路透電傳先生談和平條件，僑胞難免誤會減抗戰到底決心，實則和平絕無可能，何若嚴加拒絕，較為維繫人心也。」先生對此的答覆是：「中國為抵抗侵略而戰，故對外關無拒絕和平之表示，去歲比京會議主張調停，中國接受而日本拒絕，國際遂決定日本為禍首而援助中國。今歲國聯大會援用盟約第十七條，主張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中國接受而日本拒絕，國聯遂決定對於日本實行經濟制裁。凡此皆足證明日本為戎首，中國為抵抗侵略，故能得世界之同情與援助。蓋抵抗侵略與不拒絕和平，並非矛盾，實乃一貫，和平條件，如無害於中國獨立生存，何必拒絕，否則中國正與有接受之理。中國之立場如此，決心如此，光明正大，絕無絲毫屈服之意，僑胞誤會，尚盼開示。」

這是見先生的和平動機，絕非出於一己的考慮，而是根據於抗戰的本來目的，並有中國與國際關係的旁證，所以立場是完全光明正大的，是出於國家利害的要求的。要是先生也是昧着良心，與嘵硬骨爵者一樣同流合汚，那麼以他的地位，眞如他自己所說的：

我在重慶時候的處境，你是知道的。我祇得一間房子，有幾十個衛士繞圍着，我的安全是無問題的。如果敵機來呢？我會入地下室，如果重慶又像南京武漢呢？我會隨着遷移。我在中國國民黨是副總裁，在國防最高會議是副主席，我沒有最高權力，我言而聽則幸甚，言而不聽，則言者無罪，一旦不幸到了大崩潰的時候，我還有希望名正言順出來收拾，收拾不來，我以一死報國，生前蓋愆，死後亦獲令名。（廿八年三月卅日覆華僑某君書。）

這都是發自心底的實話，以先生在重慶的地位，他儘可以發一些不負責任的高調，騙過了人民，敷衍了政府，安享英雄的令名，何樂不爲。可是他的氣質却永遠是充滿着責任和良知感的，「我從二十多歲投身革命以來，就不曾替自己打算過，何況如今已經五十多歲了，眼看着國破家亡，我那裏還有這些閒心，來替自己打算？我自從抗戰開始以來，想到中國不得已而抗戰，時時刻刻想抗戰怎樣可以持久，怎樣可以獲得勝利，同時也想着怎樣可以覓得和平。我對於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裏，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先生於其「雙照樓」近著中，曾悲壯嚴正地表示過他的心緒。

疾風吹平林，衆樹失芳菲。古今傷心人，淚眼看花飛，花飛正紛紛，生子已離離。今日青一捻，他日大十圍。一樹能開千萬花，不惜一花化作千萬枝。花亦解此意，飛去不復疑。焉飄隨長風，安擇海角與天涯。今年送春去，明年迎春歸。新花未滿枝，故花已成泥。新花對故人，焉知可爲誰。故人對新花，可喜還可悲，春來春去有定時，花開花落無盡期。人生代謝亦如此，殺身成仁何所辭。（飛花）

驀地秋聲，捲起我，亂愁如葉。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燐碧血。魂夢不堪關山闊，瘡痍漸覺乾坤窄，便劫灰冷盡萬千年，情猶熱。煙斂處，鍾山赤。雨過後，秦淮碧。似哀江南賦，淚痕重濕。邦殄更無身可贖，時危未許心能白。但一成一旅從頭起，無遺力。（滿江紅）

一點冰蟾便做出，十分秋色。光滿處，家家愁寂，一時都揭。世上難逢乾淨土，天心終見團圞月，歎滄田滄海亦何常，圓圓缺。雁陣斷，蟲聲咽，天寥闊，人蕭瑟。將閨中涕淚，沙場暴骨。搗取九霄風露冷，瀉來萬里關河潔。看分光流影到疎巢，烏頭白。（滿江紅庚辰中秋）

歎等閒，春秋換了。疏髭雙鬢非故，料難留得餘生在，縱饒餘生更苦。休重數，算刻骨傷痕，未是傷心處。酒闌對汝，問搔首長吁。支頤默坐，家國竟何補？翔飛意，豈有金丸能懼。摧殘尚剩毛羽，曾窮心力迴天地，肯變滄遙修阻。若試數，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躑躅，歎落葉枝頭，當風獨戰，猶似喚邪許。

（摸魚兒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晚，家人忽以杯酒相賀，蓋爲五年前余被斫不死而設也，因賦此詞。）

這裏引述的詩詞雖時間有先後，然其一片忠心耿耿，則始終浩然一貫。當時在主戰派與共產黨的壓迫下，一般人對先生的主張雖不敢公然表示擁護，但暗中同情實不乏其人，周佛海，高宗武等「低調俱樂部」一派固無論，即政學系，藍衣社，國家社會黨中的穩健份子，在反對共產黨假借抗戰名義企圖侵奪國民黨的政權一點上，也無不同情先生的和平主張。當時在與先生保持密切接觸之下，如陳立夫，曾養甫，朱家驊等人，曾有過中華同志復興會的組織，目的在於樹立反共運動的中心。至於先生原來的一般同志如曾仲鳴，陳公博，褚民誼，林柏生，谷正綱，彭學沛，顧孟餘諸氏，當然是絕對擁護先生的主張的。

反對焦土政策

先生於抗戰過程中所認爲最是痛心的，是共產黨所號召的游擊戰略與焦土政策。尤其是廣州武漢及火燒長沙諸役，最使先生感到痛心。他對於廣州與武漢兩役當局軍事上的失策，曾下過痛切的批評說：「試問這些犧牲有得到一點代價沒有？當初燒的時候，日本軍隊不會因此不來，燒了之後，日本

軍隊來了也不會因此站不住。試問這一場燒，除了燒死人民，燒絕了人民生產所寄託的財產，還有其他甚麼意義？廣州燒了還不算，武漢臨去的時候，也照樣一道命令要燒個精光。因爲奉令的人於心不忍，燒得不甚澈底，因此索性長沙於未丟以前，就澈底的燒個精光了！……而且除了這樣的大燒特燒之外，還要帶着游擊隊零零碎碎的燒，要使全國都變成瓦礫，變成灰燼……」

但話得說回來。先生在抗戰爆發之初，他自己也曾主張過焦土抗戰的。二十六年七月「最後關頭」的宣言中，他曾這樣堅決說過：「我們是弱國，抵抗就是犧牲，犧牲的程度，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土地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那麼後來他反對焦土抗戰豈不是自相矛盾了嗎？但要知道，戰爭的本身祇是一種手段，「既然不得已而出於戰，因戰之故，雖人與地皆成灰燼，亦所不辭。」（「答問：」）。這是當初先生主張焦土的主意。可是在廣州，在武漢，尤其是長沙，焦土政策的施行完全是不戰而使人地皆成灰燼，這就與先生當初的主意完全相反了。他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重慶所講的「爲什麼誤解焦土抗戰」中，曾這樣解釋過：

因誤解焦土抗戰而致引起長沙大火，誠極痛心。

抗戰所恃者是人心。若得喚起人心，則一切物質均得供抗戰之用，反之，若不能喚起人心，卽物質亦不獲自由。故假定爲破壞都市，亦止於燒盡一切物質，決不能殺盡一切人民。

反之，若吾人得喚起人心，則人人知道爲民族生存與獨立而戰，皆爲民族爲國家而犧牲自由。遇到非死守某城時，當然必能死守至最後，人與物共歸灰燼。來不及破壞時雖不得不將好好的都市落於敵手，然而只要人心在我，卽在淪陷區中，亦可利用一切物質從事破壞敵人的工作，進而完成收復失地的工作。因爲物質是無論

如何不會變漢奸的。只要沒有做漢奸的人，自然不能爲漢奸利用。

敵人的困難，尚有考慮的方法，至於我們又如何？若像長沙那樣到處焦土化，那就一切完了。如果將戰區內的一切物質盡行燒却，我們將以何處的資源以資抗戰？燒燬淪陷區的一切物資，剩下來的只是一大羣無衣無食的人民。這怎麼辦呢？帶着跑吧不能動，殺之則於心又何忍。遺棄之則眞的資敵了。況且此中未必不有不少國民在做收復工作，我們沒有資助這種收復工作人們的必要嗎？（筆者按：因手邊無原文，係自外語材料譯用，故與原文或不免有出入。）

全面戰爭的解釋

先生這一言論，當然遭到了共產黨的激烈反對，但反之同情先生的人也愈多了，像非蔣直系的軍人如王陵基，潘文華，鄧錫侯，這時都對先生的主張表示同情。因此先生不僅不爲共產黨的反對所屈服，且更進一步揭發共產黨戰略的陰謀，在十一月廿日所講的「全面戰爭」中，他進一步批駁游擊戰略說：

有人說敵人難得佔據我方的線與點，而決不能佔領我們的全面。所以我們應以全面戰爭對抗敵人。這一認識是正確的。然而非完全正確不可。若除去「我們應以全面戰爭對抗敵人」的一句，卽不完全，不正確了。

敵人爲佔領我們的領土，第一期的方法僅限於點與線；第二期後將逐漸擴及全面，這像聯絡道路一樣，是先築幹線然後作支線的。交通線落入敵人手中，就像血管被切斷一樣，據點而爲敵人所掌握，就愉如被扼住了咽喉。若不去求解脫，則何處可求活路呢？然則所謂戰自何處？不用說得是在於刪除了「我們非得用全面戰爭抵抗敵人」的一句。我們對於全面戰爭的意義，不能單止於注意全面，而特別應該重視戰爭。

要之，我們應斷然戰爭，不可不戰。在未佔領的地方，爲何有誅求民衆財物的必要？爲供應戰爭，你出財，我出力，民衆當然不會得有怨言的。爲甚麼有武裝民衆的必要？你出錢，我出命，民衆也不會得不滿的。若僅假借名義而圖保全實力，則不論宣傳如何巧妙，結果終難掩蔽衆目。

自己躲踞於敵方佔領下的點線之外，而夢想實力，這種人尚沒有知道「全面戰爭」的意義。在敵人進攻的時候，從此處復處游走，以圖夢想保全實力，這種人也沒有知道「全面戰爭」的意義。用明末流寇的方法，用於國內戰爭，或可顛覆政府，然用之對外戰爭，決不能頑抗強敵，蓋所謂游擊戰爭，在游來的時候將一切餘下的都帶走了，游去的時候一切都歸於潰滅。這樣是大量的消耗了民力。政府的基礎在於民力，民力一旦耗盡，政府就不得不倒。明朝就是由於流寇滅亡了的。

對外戰爭，尤以民力爲資源，民力耗盡則僅自己滅亡，不會是敵國的滅亡。所以決不能用國內戰爭一方式的游擊戰術。這種特點，希望大家注意。（引文來源同七）

反對游擊戰術

這裏我們可以明白看出先生對於抗戰本質的認識正確。在中國不得已而戰的場合，他是一個徹底的主戰者，不過一定要是徹底的戰，而戰的目的是在求中國的和平獨立與生存。他的態度是非常堂皇的，正像他爲人的氣魄一樣，他在戰的過程中，並不諱言中國願意接受和平，且敢提出和平的原則。他敢於在戰爭中對一味唱高調者提出警告，他尤其反對嘴硬骨酥的軍人與政客以及共產黨的利用游擊戰口號而圖保存他們自己的實力。如果救國只有抗戰一途，他就主張認真的戰，而不是以戰的名義帮致分裂亡國之實。他最最反對共產黨假借游擊戰的名義而實施土匪燒殺的技倆，他會痛切的說：

游擊戰是流寇的別名，我早已說過。可是這些流寇正被蔣獎勵着，再加上共產黨的操縱着，把持着。……可是一變而為游擊戰……能收復失地嗎？自然不能，能打仗嗎？自然不能。然則能做些甚麼呢？能騷擾地方；能殘害百姓。鄉村地方，遇着兵匪，工業不用說了；說到商業，如果是坐店，游擊隊會來攤派，除此以外，還會來綁票，并將你弄光了不肯住手；如果是行商呢，遇着游擊隊，美其名曰檢查，將你的衣服統統剝去，換一套破爛的給你穿上，便算是很客氣的了，其理由是，怕衣服裏面有夾帶。兩三月前，有一個人，帶了七百銀子，想由石岐去澳門，剛剛出城，七百銀子被游擊隊繳去了；這個人沒奈何，只得學學游擊隊的辦法，逢人便搶，一面搶，一面走，雖然遇着幾次游擊隊，却也搶了幾次其他旅客的東西，最後走到澳門，居然七百之外，還賺了三百。……至於農民，他靠着一塊田地為生活，耕種勤勵的時候，游擊隊當然不會來分勞，可是按畝派捐，是一文也不能少的；這樣的一面牛馬般的辛苦工作，一面還要籌款納捐，已經够受的了，及至收穫，可更傷心，游擊隊來，搬得了的，都搬了去，搬不了的，放一把火，燒個精光。說這是焦土戰，這是最後勝利的最大把握！

……如此下去，民安得而不窮，財安得而不盡？而民窮財盡的結果，只有國亡種滅。東晉南宋，雖不幸為外族所傾覆，還能偏安至百年之久；明末則弘光永曆，并殘喘亦不能苟延。這是什麼原故？因為東晉南宋時代，還沒有這麼多的流寇，即有之，當時政府，還能加以撲滅，所以民力不至耗盡，國家也就賴以不亡，明末則流寇所至，赤地千里，民力盡了，國欲不亡，又安可得？如今呢，較之明末，更可怕了。以一個軍事委員長的蔣先生，跟着共產黨，提倡流寇主義，土匪呢，編做游擊隊；地方保安隊呢，編做游擊隊；正式軍隊不屬於自己直系的呢，也慢慢的都編做游擊隊。繼續抗戰靠此，最後勝利也靠此。簡單一句話，抗戰不足，國亡種滅有餘！（「敬告海外同胞」）

和戰的決裂

這種大胆直率的言論，引起共產黨的痛罵先生爲民族統一戰線的破壞者固無論，就連蔣介石氏本人，也感到十分難堪。先生這種發言，在當時的環境中是十分危險的，然而他眼見國亡家破在卽，憑著一個革命者的良知，他實在是顧不得這許多的了。他首先要反對共產黨的抗戰戰略，他繼之想使蔣介石氏走上抗戰的正途，這樣便造成了他與蔣氏及共產黨形成對立的局面。

另外兩種因素，對於鼓勵先生的勇敢態度，也是有十分影響的。第一，以先生居於重慶內部的中樞要位，他深知人心嚮往和平，只是大家雖有此心而不敢有所表示吧了。他看到他幾次所發的「和平爆彈」，雖遭共產黨人的反對，但暗下的同情者，則反日益增多。別人怕危險不敢發言，這責任只有落在先生的肩膀上了。其二，自廿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武漢失陷之後，日本政府又曾有過和平的表示，當時日本政府曾發表宣言謂：「帝國所冀求者，在於建設確保東亞永遠安定之新秩序。此次戰爭之究極目的亦卽於此。國民政府而能拋棄從來之指導政策，改替其人的構成，而舉更生之實，參加新秩序之建設，則並不相拒。」這裏雖沒有提出和平的具體條件，但其願和平的意向，則已非常明顯。

先生因此曾屢屢向蔣氏作講和的勸告，蔣氏表面上雖佯允考慮，擬至十二月九日，蔣氏遂由前方返抵重慶，先生復作激切勸告，當時蔣氏尙不明言反對，然至十二月十三日黨紀念週會議席上，蔣氏卻事先不經先生同意，貿然發表了一篇重申抗戰的長篇宣言，其結論有謂：

中國抗戰前途益呈光明。各戰線國軍，業已退至山地以阻日軍，是以地形益爲有利。要之，以抗戰而統一

全國，以誠意而團結國家民衆，則任何强敵均不足畏。

這顯然是對先生勸告的一種挑戰態度。先生此時已忍無可忍，遂於十六日面對蔣氏謂：「使國家民族淪陷滅亡，這是國民黨的責任。我等應即聯袂辭職以謝天下。」然而蔣氏却答說：「此時我們辭職，又叫誰負責任？」其間先生與蔣氏之間，在國家和戰的大問題上，終於達到了決裂點。在下面的一首詩詞中，我們很可以看到先生悲哀的心事。

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凄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潮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挐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摵摵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憶舊游「落葉」）

（本章完，全書未完。）

第十七章 脫離重慶

周佛海氏的敬仰

先生離開重慶，是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事先周佛海氏假視察宣傳工作的理由，於同月六日已先期飛抵昆明。就個人關係言，周氏和先生的私人關係，遠不如他和蔣介石氏來得密切，周氏在其「回憶與前瞻」一文，更這樣說過：「有人以爲這是汪先生和蔣先生演的雙簧；否則，我不會離開重慶。有人以爲蔣先生派我出來，暗中監視汪先生的行動。」周氏在私人感情上，對離開重慶而別離蔣氏，是表示不勝慨然的。

可是在主張和平的一點上，周氏不僅和先生的理解相一致，且復以先生爲其中心領袖。他在前引文中曾說：「……自從八一三之後，我們無形之中，就以汪先生爲中心，企圖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現在到了這種嚴重局面，我當然要去請教汪先生。當時汪先生痛憤尤多，感觸更深。對外說老實話，共產黨徒固不待說，孫科之流也加以攻擊。一般同情的人，不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對，向蔣先生提出意見，始終沒有確實的結果。但是在重慶有甚麼辦法呢？所以汪先生以毅然的精神，決定爲國家爲民族，犧牲自己的一切，離開重慶，以便公開的發表和平主張，從事和平運動。我的主張既然和汪先生一樣，又爲汪先生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所感動，所以也決心擺脫一切，追隨汪先生，爲國家民族，盡我應盡的責任了。」

先生畢生以事業與人格感動於人，在周佛海先生的寥寥數語中，實在說得再也明白不過的了。在另一個地方，周氏對於先生的爲人，尤再三致其敬意說：

我乃是中國國民黨的後輩，雖然在庚戌以前，還是鄉村一個學童的時候，就聞了先生的大名，但是直到民國十三年春天，於無意之中，纔在上海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風采。那個時候，國共已開始正式合作，共黨主要份子，有許多已加入了國民黨。毛澤東也加入國民黨，做宣傳部的秘書。我那時因爲還在日本京都留學，所以還是共產黨員，沒有加入國民黨。我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時候，赴國民黨黨部去看毛。當時黨部是在環龍路四十四號。當我和毛正談得起勁的時候，忽然一位身材高大的偉丈夫，破門而入。我當時不知道是誰，毛替我介紹道：「這是汪先生。」一位景仰十餘年的革命先驅，忽然從天而降似的站在我的前面，一個渺小的學生，眞是手足無所措，不知道說甚麼纔好。毛報告我的名字之後，汪先生似乎知道我的名字，和我握手，並寒暄了幾句，然後和毛談了一刻的事務。這便是我第一次拜見先生的經過。

晤談雖然只有片刻，我立即感覺到和這樣藹然的人物接近，眞正如坐在春風之中，使人溫暖，使人愉快，使人心醉，我又立即感覺到這位人物，對於羣衆的魔力，對於羣衆的吸引力，一定不小。我因此又感覺到這位人物，將來一定是有着廣大羣衆擁護的政治家，一定是能夠領導廣大羣衆去奮鬥的革命導師。這便是我第一次拜見先生時的印象。我的印象的正確，以後的事實替我證明了。

民國十三年赴廣州，參加國民革命之後，瞻仰先生的風采和言論的機會較多，對於先生的景仰更進一層。二十六年事變發生以來，深談的機會更多，先生的爲國之忠，用心之苦，治事之勤，赴義之勇，任難之毅，使我得了不少的薰陶和感召。自從發動和平運動以後，出死入生，追隨左右，至今將近五年。其中所經的危難困苦，不是筆墨所能形容，而先生安之若素，處之以定，絲毫沒有因爲危難而稍殺其氣，稍變其志，所以纔能以

赤手空拳，奠定還都大業，使中國於軸心國家之中，占一重要地位，而角逐於國際舞台，這樣的勳業，其根本的動力，全在先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犧牲而勇毅的精神。

要敍述一位偉大人物思想性格的全部，是不容易的。好像泰山之巍峨，滄海之浩瀚，我們不容易描寫其全貌一樣，我現在就這一點略爲說明。

我要說的就是先生的民主精神，無論對同志，對部下，無論做大事，做小事，都是循循善誘，諄諄訓誨，務使同志或部下，明瞭這事的原委，明瞭何以要做這件事，明瞭這事如何做，然後纔命令做。他決不以命令叫人盲從，決不沒有指示使人妄動。封建時代的專制，近代的獨裁，他是決不採取的。他能得廣大羣衆的擁護在此，能歷盡艱難而創業也在此。（見張江裁編著「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周氏序文。）

脫離重慶的決心

然則先生之脫離重慶，是否是爲事先和周氏等人的預先謀略呢？先生爲人向持正大光明，他於決心離開重慶之前，曾屢次向蔣氏提出他的和平主張，然終未爲所納。及至廣州失陷，長沙大火之後，他的和平主張是益發堅決了。一般人每認爲先生的和平主張，是響應的日本近衛宣言，這話驟聽來說，固然並沒有錯，但實則先生離開重慶是在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近衛宣言發表在相隔四天之後的二十二日，所以發電所響應的雖爲近衛宣言，先生脫離重慶的行動，却完全是出於獨自立場的，這即是他的熱切的愛國心理，和深刻的憂國情緒。在離開重慶之前，他曾屢屢表白過他的這種胸襟，下面的三首詩作，便是最有力量的啟示。

南嶽道中杜鵑花盛開偶作——絕句

果然火焰燿南嶺，一樣嵐光作紫霞。四萬萬人心盡赤，定教開作自由花。

登觀融峯

直上觀融峯，遠望八千里。黃花岡海中，不辨翡翠與沆瀣。古來此中多志士，國難之深有如此。吁嗟呼！

山花之丹是誰愛國心，湘竹之斑是誰愛國淚。

杜鵑花

昏啼到曉恨無涯，啼遍春城十萬家。血淚已沾心骨赤，更教開作斷腸花。

在這種赤誠的流露中，可以明白看出和平主張的出發點，決非如一部份人所誤解的來自人事關係的政治衝突，而確是根據的愛國的至上信念。為了這一信念的偉大感發，先生不辭冒嘗一切可以預想的危險，在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這一天，趁蔣介石氏方自前方返抵重慶的機會，在重慶對岸的黃山蔣氏別邸中，他向蔣氏提出了最後的諫言。當時在席的，除了蔣氏之外，更有孫科，孔祥熙與陳誠諸人，後來又和蔣氏作單獨談話。然而蔣氏除了承認他與中共合作的困難與期待英美之鮮少希望外，對於和平的根本主張，仍然猶豫不決。蔣氏的態度依舊是一貫的敷衍，而在先生則感到已忍無可忍，他曾當面責備蔣氏的失信，這次會談的結果，遂使先生下了離開重慶的決心。他在後來「覆華僑某君書」中，曾說：「我於去年十二月九日經過一番劇烈辯論之後，知道在會議裡無採納之望，纔於十八日離開重慶。」而離開重慶當時的唯一目的，不在避免個人的危險，而在覓取他的發言自由權利。

先生飛離重慶的一幕，當然是含有萬分危險性的，因為自從他屢屢發表他的和平主張之後，他個人的行動早受蔣氏手下嚴密監視了。尤其在周佛海六日離渝赴昆明之後，蔣氏突於七日從前方回來，

命令陳布雷電促周氏立即返渝。周氏接得電報後，心中萬分着急，以爲先生尙未出來，如果自己奉命返渝，決難再行脫離，他一個人跑到香港也無能所爲，然而公然違命則又恐影響到先生的行動。周氏在這種進退維谷的處境中，遂先行以觀察尙未完耑爲由，覆了一個延期返渝的電報，同時另派心腹持函通知先生，說明他本人已决心離開昆明赴河內，並詢問先生此舉是否有礙。當時先生卽告以因本人和他過去並無深切關係，蔣氏不致疑心到他們彼此間有甚聯絡，並囑其先期往河內。

到了十二月十九日這一天，蔣氏方出席某項靑年會議訓話，先生以副總裁資格，可以不必到場。而是日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參謀長某，方欲自重慶返昆明，先生遂利用此一機會，由交通部次長彭學沛經手弄到了飛機票，偕同飛抵昆明，龍雲與周佛海等迎於機場。翌日由龍雲備機護送，飛往越南的河內。

豔電經過和重慶的反響

先生離開重慶的行動，自然在重慶的內部引起了極大的衝動。蔣氏獲息先生已離重慶後，立卽下令封鎖各報發表新聞。不僅一般人無從曉得先生的行動，卽重慶參政會議的參政員諸公，在遲至先生離渝十天之後，還不知道正確消息。例如事後大公報記者去訪問當時在香港的參政議員張一麐時，張會說：「二十九日（卽先生豔電發表之日——筆者）那天參政會副議長張伯苓來一個電報，請我們找汪精衛，這時他的通電還沒有在報上登出來。但我們找過好幾個地方，都找不着，曾仲鳴的家也找過，可是連曾也不在喔！……。」

然而先生離渝赴河內的消息，不久卽爲外報所傳佈，蔣氏不得已，遂於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國民黨

紀念週席上，聲稱先生因病告假四月，赴河內治療，並謂一二日內，即將經港轉赴國外。實則此時就連蔣氏本人，亦不能斷定先生的行蹤，祇是抱着先生能出國的希望罷了。因此遲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敵方的輿論還在用「個人進止無關大局，越過難關求取勝利」的字樣，掩飾他們的苦悶心理。

這兩天為了汪精衛先生在河內發表的事，各方揣測紛起，其實這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觀於蔣委員長前天在軍校紀念週的演說，益可明瞭。

中國現在已進入大時代，其遭際為數千年歷史所未有，整個的國家民族，都正在險阻艱難的中間，創造新紀錄。凡是中國人無論在政治，軍事，或社會任何方面，負有重要責任者，都應當參加這種創造新的歷史的工作，同時也就是爲個人造歷史。這一種神聖的責任，當然極危險，不是人人擔當得起來的，其中或因內在的原因或緣外來的關係，中途退卻，也屬事所恆有，我們試看自從抗戰，政治軍事各界，有過多少的人事變遷，便知在這大時代中，淘汰作用，迅速而廣大，所以人人應該致力爲自身保持以往的好紀錄，打開未來的新冊頁，這是個人的責任，然而亦可算本身的自由，因爲其人果屬力所不勝，勢須退障，或興盡收聲，無意繼續，則事非得已，他人固亦愛莫能助。但是無論如何，大時代的洪流，總是浩浩蕩蕩，瀉注而下，決不稍因爲些波動，停止不進。中國抗戰局面，始即類此，大勢已趨，已非少數人力所可轉移，至多不過個人退出前線，絕對不容撼搖大局，我們對於汪先生的離渝，看法即係如此。據重慶近訊，中央甚望汪先生力疾回渝，主持中樞，我們也抱同一希望，切盼先生早日歸返，繼續努力，創造國家民族的歷史，也就是爲個人政治生活，新撰光榮的紀錄。萬一竟因健康關係，必須退到後方休息，則我們又敢斷言，在目前形勢，個人進止，決不影響全局，此點國人亟應認識明確，毋庸過慮。

關於汪先生的進退，社會上往往傳爲與對日的和戰有關，此點蔣委員長前天亦已非常透闢，大可平息浮言

。我們根本認爲對日只有如何支持抗戰求取勝利的問題，而沒有妥協行成之可言，因爲日本唯一目的，就是引誘中國屈服，並無所謂和平，最近近衛談話，一則曰：建立東洋新體制；再則曰：訂立中日反共協定；三則曰：承認防共駐兵，設置防共特別區域；四則曰：開放全國，容日本人在內地雜居。這些條件，豈是有獨立主權的中國所能忍受？所以要認汪先生主持這樣的和議，未免太侮辱汪先生，且也，和戰大計，專屬全國國民意志，決非政府中一二人或少數朋黨人物所可主張，因此謂汪先生代表黨政中樞與夫軍委會，固非事實，謂其個人竟要作此活動，亦殊不近情理，因當今日之事，國民反對屈服，軍人甘心效死，一個無拳無勇的文人，如之何可以把局面扭轉向過來？連日因汪先生的一走，和平謠言，光怪陸離，此眞可爲親者痛，仇者快，語云：「流言止於智者」，經過蔣先生的一番解說，國人當可不再輕信自擾，致墮入術中。

總而言之，現在還是「抗戰第一」的時代，雖是國際形勢好轉，我們越應加倍奮鬥，以期早收最後的戰果。日本的用意是要藉着和平問題，使中國的對日抗戰轉向，從新挑起我們的政潮和內戰，使得黨潮高漲和戰紛爭，然後她又可以從中操縱，不戰而亡中國。我們此際，務要全國警戒，信仰領袖，堅持國策，一切派別糾紛，個人情感，都應收拾起來，有力全向日本用，有氣都找日本出，任何複雜的問題，都要使其簡單化，任何感情的衝動，都要把他捺下去，拚命撐過了這一關，勝利必然到來，否則一着之失，前功盡棄。我們本着這種觀點，重視軍事，而於黨政領袖任何個人的出處進退，總都覺得是不成問題。我們敬愛汪先生的歷史和資望，希望他不要退出這個大時代中造歷史的神聖工作，更不願無稽的和平謠諑，一定要與他聯綴一起，因此，我們始終希望他力疾回渝，照常任事，使這不成問題的問題，結局還歸到「不成問題」。（廿七年十二月廿八日香港大公報社評）

這是何等的輕描淡寫。但汪先生響應二十二日近衛三原則的豔電，終於在廿九日發表了，致中央常

[illegible]的高級幹部雖有認識，也同情和平運動，但在重慶方面，除了極少數高級人員外，對於和平原則和具體的內容，根本就沒有看到。豔電雖在二十九日發出，但至翌日晚上，始在香港方面首先見之發表，其間經過，林柏生氏曾經有過一段敘述。

我到香港，第一件工作，是着手考慮準備發表汪先生在河內的第一次聲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豔電）。當時，我在梅思平是由重慶政府派到香港去的中央宣傳部特派員，所以堂堂皇皇地，由重慶出發，公然到香港去……

我和梅思平在香港，因為是重慶的宣傳部特派員，我們便公開活動了。事前的工作，是開始集合文化人和通訊社，研究怎樣來發表汪先生的通電問題，在充滿抗戰意識的香港，把這一個炸彈似的和平通電發出去，我們是考慮到不能不以生命來換取的。三十日的晚上，重慶方面大概已經知道我們的企圖了，便對香港的報館，加以猛烈的警告；也正好在這一天，我們把那份通電發出來，香港各報館便不禁愕然。

以重慶特派員的資格，發表汪先生所領導的「和平通電」，他們的驚愕是不足為怪的。電報在報紙上發表以後，馬上便獲得宣傳部長葉楚傖和蔣先生的隨從陳布雷的密電，詢問「周佛海現在在那裏」了。重慶爲甚麼要這樣問，是很容易明白的。我的答覆是：「周佛海的住所並不曉得。」而這個時候，周佛海和陳公博，卻在趕在香港與河內連絡着，做和平運動的地下工作。（「和運史話」新中國報社出版。）

重慶的謠言攻勢

因此，重慶方面雖想掩飾，也已事莫能為。一時舉措慌張，內部混亂達於極點，事先既謂先生係以病赴河內療養，這時卻又傳說先生離渝事前曾有縝密計劃，如二十八年一月三日的路透電，即有謂

「據此間政府人員聲稱，汪精衛於月餘之前，已縝密計劃離渝，時肄業昆明南開大學之汪子，突然離校，汪自身離渝之前，其眷屬及秘書人等，已先攜行李書籍首途赴河內，僅留司閽一人於渝宅，此可見其決心不復返此。」又謂：「汪之處心積慮通×求發，自去夏即在進行之中，當武漢未失守前，汪曾秘密派高宗武赴日，求見日陸相坂垣，坂垣令中國課長影佐代見，問高代表何人？高答：「代表汪。」并謂如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汪無能為力，即不能講和。日如真度對國民政府，將來可下手。坂垣遂認此點可為談判進行的基礎。時宇垣尚任外相，坂垣遂通知宇垣以此為談判基礎。高在日與近衛商妥由汪發表和平聲明近衛響應。迨高回來不久，廣州即失。汪乃對路透社發表和平談話，但近衛並未響應。武漢退後，坂垣變卦，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并通知汪着其離開重慶，另創新局面。汪即準備離渝，先將其子女及細軟物送走。去年十二月中，蔣委員長自衡陽來渝後，悉汪陰謀，惟仍寬大為懷，促其覺悟。汪亦自感不安，遂決計突然出走。在未走前，汪已與近衛商妥響應近衛聲明。近衛聲明中原無取消治外法權一條，汪商請近衛加入該條，以為如此可以顧全自己面子……」（香港申報）

這些揭發確也相當高明，可是事實完全給顛倒了，因為當初派高宗武到東京去的是蔣介石本人而非先生。於二十七年四月武漢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蔣即命高辭去外交部亞洲司長之職，另畀以重要任務，派駐香港，與日本接洽和議。這在周佛海氏的「和平運動前後」一文中，說得十分明白。而先生也曾說過「外間所傳高宗武個人自由行動，絕非事實也。高宗武接洽和議，屢有接近之機會，而蔣介石因其個人在黨內關係，屢生反覆，以致和議久久無成」的話。（廿八年間招待上海報界談話

。）至於當時先生在重慶，近衛公爵在東京，怎麼好爾識得如此周詳，甚至可以隨便增減條件。捏造的太巧妙了，也就不免露出捏造的馬腳。這且不談。

不過豔電所予重慶內部打擊的重大，以及其引起之苦悶情緒，確得不能隱瞞的事實。暫時間這一籌莫展。毫無對策，除了拚命製造謠言外，祇有佯作鎮定，且不敢立即對先生採取行動。在豔電發表後重慶的直接反響是：「下週中或將有政治之大調動，聞國民黨副總裁一席，將予著名左傾之一人，其人大約非共產黨之領袖，但因此可令共產黨更與國民黨接近。據此間政界聲稱，如是益可表示中國人民之團結一致。汪之攜貳，此間政界曾暫爲驚惶失措，但旋即鎮定，政治機構毫未露荏弱之象，重慶外交界平日密切注視大局，今據聲稱，汪氏之潛逃，反日增強國府之權力，汪氏雖得若干人之擁護，但若證見汪之政策離奇，大爲不安，近多離之矣。某觀察家語路透社訪員曰，政府之有汪氏，不若無之之爲愈，蓋汪氏懦弱無能，舉棋不定，此次政府迅速宣佈汪氏罪狀，大足安定民心。研究目前政局之中外人士，大都不信汪氏即將加入南京或北平新政權，而貿然與一種危險投機企圖相結合，此間華人相信如果汪氏出此，則毫無成功之根據，彼等之意，汪氏今或將隱居在一便利地點，以注視大局之變遷。」（二十八年一月四日上海版申報路透社電。）

重慶智識份子苦悶的一例

這一節揣測逃離的論調，實最足表示當時重慶的猶豫態度。自豔電之後，重慶雖對先生宣佈開除黨籍，但另方面則不絕暗中使人與先生接洽。二十八年二月間，蔣氏曾派其秘書陳布雷及外長王寵惠

請求先生出國，並致送出國護照。但先生則堅持其求他的主張得蒙採納，個人一切，均所不顧。在這期間，重慶對於先生的態度，可說是相當妥協的。在政治行動上，他們力避對於先生的正面攻擊，而側面則利用先生的友好，企圖以感情羈絆先生，就中中政會秘書張九如致先生一書，便是很好的一例。全文雖長，並多迂儒之論，然其弱音哀調，頗足啓示當時重慶高級智識人之徬徨苦悶。茲引錄原文如右。

精衞先生明鑒：僕於上月廿二日（即上年十二月）自中政會秘書處出，同人竊竊私議，謂中政會主席已去國，詢之人，又皆莫明其故。私念大敵在目，滿滿同仇，先生將何之？海外僑胞知問何所爲而來，其將何詞以對？國危民辱，倘身他人宇下，又何以爲願？在昔孔子去魯，遲遲其行，可止則止，可仕則仕；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其心猶以爲速。先生豈若小丈夫然哉，悻悻然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二十六日，總裁於紀念週中，言先生因病留南，初無他意，則又私自念曰，仲尼去魯，猶望龜山，靈均懷楚，竟投湘水，人當疾痛慘怛之時，愈不能忘情於父母之邦。所境此情，不唯人爲然，鳥之巢毀於風雨，猶徘徊睇視而不忍遽離，有不勝其傷感留戀之情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先生其歸歟，國危如斯，若不歸，而都中傳言，先生用世心切，別有主張，而願分負抗戰責任，甚至不復返，恐將蒙仇，則又竊憶文文山詩云：「鷸蚌上下爭誰何，螻蟻等閒相爾汝，猿鶴山河殘云杪，飄零海角春重暮。李陵衞律雖滿天，趙奐至今使人吐，種瓜東門不可得，暴骨匈奴留其所，平生讀書爲誰事，臨難何憂復何懼，已矣乎，易簀不必如曾子，結纓猶當效子路。」而臨爲傳者之過。及一月二日，各報端皆大書「汪兆銘違反紀律，危害黨國，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而先生艷電，亦同時現於報前，不覺失聲痛呼，先生何爲出此言也，近衞聲明，總裁曾於廿六日詳加揭發，廿七月各報已刊提要，即使倘未得讀全文，以先生之明，豈不知之，何竟遽有斯舉，上危國本，中搖軍心，外墮邦目，內戕天良，一至於此

，須知道路傳言，不顯分負興亡責任歟。則今日大勢甚明，向前奮鬥，始有生路，後退一步，便陷萬劫地獄，不必言敵與我爭，勝機在目，即使如先生所料，凶多吉少，而亡國之責，亦非一走即了，蓋因一去愈頹，對國族之遺臣，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可逃遁而逃之，豈惟已往勳名，一朝毀滅，終生大變，百世難改，即今盛臨陣脫逃之罪，實已難逭於目前，遯世之長沮桀溺，所以被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孔子，比之為不可與同群之隱隱者，夫豈不以此哉。且萬一全國淪胥之後，寧有淨土，將爲首陽，後世適委靡之野，婁秀之邪，又誰罪竊事端，曲原心跡，此不顧分負興亡責任觀之不可通也。若謂及今而和，猶可稍緩桑榆之收，再戰則必入於泥塗之窪敗，則敵之野心甚熾，決不容我偏安，及今士氣尙銳，舉世交譏，即墨不亡，侵地可反，一朝罷兵，則我氣將頹，敵燄愈熾，手足已束而不可復動，堂奧已洞而不可復守，授敵以刃而殺其殺人，自斷其脈而冀延命，世寧有是理耶。盧乎史可法之言曰：「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遂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猶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民氣既服，國本即搖，殷鑒不遠，明在宋明，此又稍稽史籍者，皆知瓦全之不可恃，乞和之同於降敵也。其欲效宇文熾中之姑受偽封，內結北方之士，外延南宋之命，以求得志於一旦歟，則敵之防備，甚於防賊，今日間諜之衆，百倍往昔，既已自投羅阱，縱欲苟全一己之性命，且不可得，尙何能謀興復乎。且陵辱之慘，尤非先生之所能忍也。當年在漢廬時，倘不甘爲告朔之餼羊，必求發抒己意而後快，則敵人左手握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其情如文子所言，而其殺辣且過於宰牛殺豬，又何能受，漢奸淨衞彭羅曰：「一興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容以爲，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顧影，何以施眉目，舉措進功，何以爲人」，此固時極端外施，神明內攻，我躬不能，尙復有何忍辱負重之道，此又所以求伸之說之未可爲也。若謂戰日而敗，則萬國亡而共戴也，稍且而勝，則敵我俱毀，而共處慘烈關備，興亡於共，

不如亡於敵，猶可乘機外附，成非常之業歟，則顛倒更甚矣。姑不論敵必敗，我必勝，共產黨欲不為三民主義努力而不可得，均已為鐵定之事實也。亦不論復興之下，必無一男之窮亮，假令淪亡，亦必亡於己之瓦解，決不亡於敵之鯨吞，又為必然之理也。即姑退萬步，曲如所慮，共產黨獨能乘機代興，然亡於異族，與亡於中國共產黨，究孰親孰疏，孰得孰失，豈待深辯，且寧亡外人，不為家奴，此滿廷自滅之因，亦本黨革命入手之基也。若仍持滿廷之見，則自身已成為革命對象，又安能徼天之幸，以圖一己之富貴利達耶。夫人之甘於遺臭萬年者，亦因當前尚有所得，遂不暇計及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耳。今及身既無所得，而降志辱身之餘，又時受良心之譴責，且使數百世孝子慈孫，無顏見人，世間蠢事，又寧有過於是耶。若謂成敗利鈍，匪所逆睹，惟有盡吾心之所安，理之所得，猶雞以赴，其濟則忍恥以旺國，不濟則以死繼之，以謝國人，以後之節，曠前之非，後世必有喜吾過人之用心者。則當知天下之事，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為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為也。事雖萬不同，未有出此兩端之外者，吾之所行，果當為耶，則必為是為正為善，果不當為耶，則必為非為邪為惡，二者之不可並行，正如笑與哭之不可並舉，愠與喜之不可並說。今受人之形而反自為過人，欲並哭笑愠喜而一之，猶將窮而飛，緣而馳耶，況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苟民族忠節不虧，則無論若何顛沛，終有復興之日，則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下？又安有為民族保忠節為國家圖恢復之餘力，世惟氣能立己者，方能立國，古今忠節之士，決不忍一日置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猶恐他日為惡，豈有身陷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前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醒，斯時斯心，忠節賤，姦詐賤，反躬自問，何以自明，甚矣其惑也。準此論點，為公為私，無一可通，而先生竟貿然出此，其故安在。反覆推究，乃不能不歸罪於先生修養之未周，與左右繫惑之已久，有以至於此也。先生之為人，蓋不出於知雖情盛意弱之途，惟知虛短計，故在對敵方面，自始即缺乏知己知彼之深論，自始即不信抗戰之可勝，即稍有所信，亦不能一，其初既存

一地方事件之見，其後又存一稍緩可了之想，而於全面持久戰之必然性，初未細究其根，以爲此僅殺敵民氣之說辭，本非確定之戰略，及見失地日多，前途渺茫，於是益信己見之是，更本此以測國策之非，愈測愈凶，愈凶愈惱，愈覺非別闢蹊徑，必將載胥及溺。年餘以來，先生之心頗服膺，均不出幾機念動之打算，決國之行，艷電之言，殆蓄之久矣。人之言行，原不能出於其所知，即不能出於其所期。勝期於勝，敗亦期於敗，有以制之，斯有以射之，有以望之，斯有以趨之，所以定其期者知也，所赴是期者行也，所以應是期者效也。若所知既不深，所期固不宏，事變之跡象一與所期合，即又如器之已滿，其遇敗也，固如暴雨之潰沼，即遇勝也，亦如厚襆之額底，殊無更進於此之條，既已滿足無餘，雖欲不傾於頹敗而不可得，既頹敗之是懼，則況然而言，卒然而行，怒然而能，汗漫荒忽而無所歸宿，滯與流滯而不知爲計，殆爲必現之情態，而其所以自解者，則又不出於敵力而行四字，決不復想及力出於己，不以人而移，極其力以敗始，則亦以敗終，苟以慄慄畏懾惴惴自保爲偉力，適足以斷己之力耳。又惟知處短纖賤，故在對人方面，自始即未深察親疏厚薄之理，因不甘寂寞之一念，欲別造天地以適己，殊不知世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子弟與鄉人皆在席，簞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固非厚於疏而薄於親也，亦因家人骨肉之間，情重於物，相與至於無間，雖用之而不以爲慢，置之而不以爲憾，予之而不以爲榮，奪之而不以爲辱，惟其慊然相期於形骸之外者已久，故決不以薄物細故而遽爲向背，此種至理至情，一經道破，則美蔣公之絕倫超羣，固非周孟起可比，而關雲長入川之憾，亦一笑而解矣。今先生在黨則爲副總裁，在政則爲中政會主席，在軍則爲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在民則爲參政會議長，名位之隆，僅次於蔣公，縱有時不能獨行己意，實制度限之，時勢局之，非國家故斷先生以斧柯而不之假也。若嫌猶不我彀，已違事實，倘更疑嫌而不親，尤闕自外，今之悻然而去，若出於此，是小之則爲簞食豆羹見於色之流，大之實爲御元戎聯元以翻敵，以其私憾，敗國殘民之罪深矣。忿戾勃興，背友負國，刑戮大焉。推其情感衝動

，故接物處事，往往爲氣所蔽，氣平之時，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一時無兩，而於事之布置，亦能使纖屑皆合，審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昔年之所以能刺攝政王於虎穴，被逮而不屈者，是氣成之也。一涉氣暴，則淆亂散越，心失主宰，動多乖戾，今茲所爲，亦是氣餒之也。先生有氣敢任而失其養，故不免流爲血氣之勇，一念自是，則氣滿，自視其身，不勝其大，輒謂吾力可以轉乾坤於俄頃，探國命於虎口，一念自毀，則氣涸，視國視己皆不勝其小，以爲處此殘局，不變其道，國將不國，胸無所主，一視外物爲轉運，隨物而消，隨物而漲，隨物而大，隨物而小，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己亦不能自知也。一身不能自主而欲以此主宰國運，豈能有濟。人貴有自知之明，尤貴善用己長，先生之爲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能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堅毅救急於多事之秋；長於情而短於節，故能悱惻刺入於危險之地，而不能咨嗟忍受於長期之艱。前之所以中節者，用己之所長也；今之所以失算者，用己之所短也。倘復參之以小智，糅之以私慾，惟短是逞，將愈變而愈失其眞。昧同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惟天眞者能之，非徇私負氣者可以濟事也。氣之於私，不謀而合，倘能不暴其氣者，始能不徇於私，惟不徇於私者，始能臨變皆宜，冉有之用矛，不爲驕齊。顏回之後至，不爲懦民，曾子之避寇，不爲畏葸，子思之守國，不爲厚衛，此數子者，行不同而心則正，其道皆成於無私，其原皆在於不負氣。今先生既以氣將事，一心之間，已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所集，交衝競進，而不得其正，又安能不動輒得咎乎。惟意志脆弱，故不能熬過難關，耐過厄窮，居窮則悲辱，居難則憂困，不知窮不與辱期而辱自至，難不與困期而困自至，爲一定之理，不可離者而欲離之，安得不屈於今日之一辭。古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在其志力堅定，安於其常而已。惟先生缺此素養，故自處則侷促拘拘，處境局促，固有之規模氣象，遂不足以將外來之毀譽，言論則煦煦孑孑，不黑不白，不清不濁，見有譏誚汲引者，則以爲少不更事，從而議其後，居崇下則煦煦衍衍，軟熱和同，自謂可以優容羣衆，而不知同陷溺後之禍，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而於軍國

大計之裁奪，亦望以平日內幽燕人者處之。迨逆之來，兇焰何以驟其猶突。總理彌留時，先生請示南針，沉默久之，始振目視曰，「我視汝等甚危，我死，敵必軟化汝等，汝等欲不爲敵害，必接受敵之軟化，我何言哉。」是則先生今茲之所爲，總理在二十年前，已知之矣。惟一回憶，總理當時欲語復停，反覆叮嚀之哀痛神情，得不惕汗淋漓乎？亦惟先生缺此素養，故貪慕權借之形見於外，倭王因得入其謀，日與置先生於爐火之上，以遂其慾，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凜然示人以不可犯，則不仁者不敢至先生之門，不義者不敢登先生之堂，況敢以狗彘之行擾先生乎。內邪能閑，外變自遠，敵詐雖詐，又何致以捏詞爲餌；即敢嘗試，而吾以籌殺不固隙之誠待之，亦終可使敵之詐極其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蓋兵雖詭道，而所以內睦羣倫外禦頑敵者，終不外乎誠。誠則不惑，敵誘不得入，誠則不貪，敵餌無所施，誠則不搖，敵計不能亂，用是誠以撫御，則民不疑，非反間之所惑也。用是誠以抗戰，則民不惑非詭謀之所能襲也，敵之所以敢於嘗試者，早有以窺先生之缺此誠耳。（下略）

光明與黑暗之間

這一封長信，就發信者的主觀態度言，似尚不失友誼的誠懇，頗有「責備賢者」之意。然而誠必爲智，誠必爲仁，必爲勇。如果誠而僅爲一己之令名，則一如先生所言，他在重慶的地位，一是中國國民黨的副總裁，在國防最高會議是副主席，我沒有最高的權力，我言聽則幸甚，言而不聽，則言者無罪，一旦不幸到了大崩潰的時候，我還有希望名正言順出來收拾，收拾不來，我以一死報國，生前甚適，死又亦得令名。」爲計及一本『萬歲名』打算，誠「理之所得」矣。可是在個人的得失與國族的相[illegible]，[illegible]終於[illegible]後者。[illegible]能判別國家的利害得失，是

惻隱；他不忍見「余愛護孫先生所手創之中華民國，淪亡於無識者之手中」，是謂仁；「故毅然排萬難冒危險以主張之，」是謂勇。他早已預料到他的主張必被目爲「漢奸」，必被目爲「賣國」，但爲「使中國得以蘇息，得以復興，則余將堅持到底，雖犧牲生命亦所不惜。」這種精神，這種氣魄，其難能爲主張個人「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的迂儒所理解，亦誠不足爲怪。

然而像上引的那封信，畢竟還是出於善意的，雖然是個人主義的感情論。至於更有出於完全惡意的。譬如吳稚暉辱駡先生爲「晦氣星」，及對先生「憶舊遊（落葉）」一詞所下的譏評，則其居心更爲不堪問聞了。可是先生是早已說過那樣的話：「對於我主和的動機定然不少惡意的或私意的揣測，我亦何能免於危險！這是我所不顧的。」先生既抱此大無畏的精神，旣抱此勇毅光明的態度，則一切辱駡，又何能損傷他絲毫。暗傷是怎樣的味道，冷箭是怎樣的形式，對於一個抱定犧牲精神的偉人，豈暇計及，黑暗終究掩障不了光明。何況此老自清議時代以來和先生的筆墨官司，早成人間鐵案，那麼現在且來看看他的譏評究竟是發現了怎樣的一副人格，似亦無妨。

先生的原詞在前章中已經引錄過，詞曰：

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飈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潮又重經。

有水出根寒，挐空老枝，同訴飄零。

吳評曰：假使不作「東流」，則阿比西尼亞王能發火嗎，一息尚存，何必楚囚相對，飄零同訴。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槭槭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

。悵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

吳評曰：「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恰似借物付×，便有「其乎不敢」有辭於國際之間，何作者曾斷少年之頭欲引刀成快，以回天心矣，不可健忘也。

接着，他又步韻填了下面一首詞

為萬春華日，早綴枝頭，吸露高清！慣少真堅實，受嚴霜小遇，驟作深辭。常記背寒追彀，反覆太紛紜。忍需木體林，根殘枝禿，誰向國爭？

天心好荊棘，拼菊摧蘭折，獨絕猶榮。暴雨飄風後，看豺狼末日，終息咆聲，知否八公山上，草木亦齊驚？得掃蕩入國，斬荊投海，下金陵。

筆者應該聲明一句，吳詞末句「斬荊投海，下金陵」的讖詞，是根據先生原詞初稿「只極目烟蕪，寒螿夜月，愁秣陵」一句的，但他怎能瞭解得先生的寶貴的感情，偉大的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衷心呢。我們且看看：

空梁曾是營巢處，零落年時侶。天南地北幾經過，到眼殘山賸水已無多。

夜深案頭明燈火，閣筆淒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為洗神州。（虞美人）

驚風飄落葉，敢作沙石走。擾擾非不僨，擲地忽已厚。仰觀高林杪，柯條漸疏瘦。

危巢失所歛，岌岌不可久。宿鳥暮歸來，棲託已非舊。踟躕巢空枝，蜷縮終相守。

此時登遠者，歎息各搔首。西風日凄厲，殆欲摧萬有。何以謝歲寒，臨難義不苟。

蒲柳尚發先，松柏恐彫後。敢辭晚節苦，直恐初心負。高人爾中干，佳節邁重九。

還當掃落葉，共盡一尊酒。（重九集掃叶樓分韻得有字）

暗殺在香港開始

現在我們再看事實的一面。自先生飛抵河內後，重慶在表面上雖佯作鎮靜，揚言豔電雖經收到，但覺措辭緩和，並無積極行動，故暫取沉默態度，靜觀其後（均當時報章用語）。然而暗下卻發動藍衣社份子，開始偵察先生的行動，並對其他積極參加和平的份子運用暗殺手段，第一個遭其暗算，險遭不測的，便是在香港發表豔電的林柏生氏。現在讓林氏本人來講他的遇險經過吧。

「二十八年一月八，九日間，重慶的暗殺，開始向我們轉念頭了。特務工作隊的首領戴笠氏，也在香港出現了。戴笠這一個名字，想來大家是曉得的。戴笠到香港後，他忽然通知要和我們會面，在表面上，我們都是重慶政府的機關，和戴笠也是同志，要是我們隱藏起來，雖則也是必要的，但面不很好。我們便答覆他：「好，請決定會面的時間和地點。」他便通知「地點在思豪酒店，時間另行通知。」所謂思豪酒店，正是他們的秘密機關，要是到那裏去的話，一定有生命危險；不過，當時我們是不怕犧牲的，於是又通知他「可以在思豪酒店會面。」但後來一點回音都沒有了。

在這期間，他又通知中央通訊社的社長蕭同茲要和他會面，在通知書上很不客氣地寫着：

「最近寄到你寫了很多和平論的東西，和重慶對立着；可以不可以到我們自己所站的陣營裏來做宣傳嗎？攻擊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

對於這通知書的回答：

「在和平的途徑上，必要的論爭，是不可免的，絕對不是攻擊重慶政府。而重慶要我開除汪先生的黨籍，是不是攻擊個人呢？這又是何從說起呢？」

了。後來他們便集中了對我們主辦的「南華日報」攻擊了，又煽動了工人[illegible]的空氣，但我們的報紙還是照常發行[illegible]，不過排字房和印刷部的工人，却在威脅下逃走了；因此，我們的同志間，有好幾天便不能不從寫原稿起，一直到自己來排字和印刷了。後來，果然對我們的工人發生了毆打的事件。

我從報館回家，每天總是晚上二、三點鐘的時候，在歸途中被暗殺狙擊是極容易的。「要是被敵人包圍了，是危險的。」我們都這樣地說。一月十三日的晚上，我回去得很遲，一直到天亮時在報館裏；這一晚上，在我家的附近，有一個人被暗殺了，聽說樣子很像我的。這一個男子也斃在街頭，而我却奇蹟地沒有送掉性命。

十六日晨，香港警察廳的政治部通知我們——我和國際研究室的林思平，和現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去問話。當時，我們同時是做着「南華日報」和國際研究室工作的，無論如何不能不到警察廳去看一看。

十七日午后三時，我一個人便去和政治部長會面了。他說：

「我們得到的證據，因爲想暗殺你，另外一個不幸的人却被殺死了。」

並且親切地要我注意，又用暗示的口吻，要探聽我們的運動。他問「汪精衛現在在那裏？」「和平運動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又用非常鄭重的態度說：「當心暗殺團，不能不講求一點防禦方法的。要是寫一封信到警察廳來，可以准你們攜帶自衛手槍。」

說定以後，我和政治部要辭別了。在歸途中，我果然被襲擊，被二尺多長的鐵棒從頭上擊倒了，幸而我的頭骨非常堅牢，不致連命都沒有了。（節引「和運史話」。）

開除黨籍的是非

接着在河內有曾仲鳴，在香港有沈次高，這都是證實了重慶最初對於先生行動所示的「鎮靜」，「惋惜」，「靜觀」等等的言詞，都含有險惡的用意。政治鬥爭而出之暗殺行爲，已足够暴露了一方政治立場的薄弱，黑暗。重慶爲甚麽不用堂皇的理論鬥爭來證明他的政治正確呢？他們豈不知道先生爲了國家，爲了自己的信念，早抱着「鴻飛意，豈有金丸能攫」的決心嗎？縱「摧殘幾度羽毛，誓窮心力迴天地，未覺道途修阻」的堅毅精神，恐終非能爲徒知一時血氣的人們所瞭解吧。

不過艷電的發表對於重慶的打擊是深刻的。廿八年元旦，重慶政府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臨時會議，宣佈開除先生黨籍，並由中央宣傳部發表對外聲明。當時重慶內部的舉措慌張，在下面的一則新聞中，很可看出，此節一月三日重慶所發的電訊：「中央宣傳部對汪兆銘荒謬言論，曾於一日發表對外聲明，加以糾正。當日因中常會尚未有開除黨籍之決議，故該聲明對汪兆銘荒謬言論，除駁斥外，僅表惋惜之意。此聲明因東（一日）晚不克送各報刊登，故於冬（二日）與中常會決議，同日在報上發表。然此項聲明，與中常會聲明，稍有抵觸。茲特重行聲明，中常會已決議，汪兆銘此種行動爲違反黨紀危害黨國，予以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之處分，則本黨同志，全國同胞，自應遵照此項決議，整肅綱紀，不稍姑息。須知遵國法，守黨紀，此爲本黨革命精神之所寄託。上項文件，因發表較遲，故在宣佈前有鄭重聲明之必要，特此聲明。」

可見當時重慶政府內部，對於先生行動的驚慌。所以中宣部的宣言，把初就未能遵照中常會的

意旨。實則重慶政府之用中常會名義開除先生黨籍，其手續是非法的。因中國國民黨的最高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祇有違反大會者，乃爲違法。而先生之豔電建議，係依據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決議，即：「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因此，在日本政府既有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衛聲明之後，豔電之所建議，是完全符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精神，從而此種建議既非荒謬，亦非違法。違法的責任，是在不根據此宣言的重慶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當時重慶中宣部對外聲明，與中常會決議所以有所牴觸者，即爲其法的根據的矛盾結果而已。

第十八章　河內紀詳

「河內的正月」

先生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飛離重慶，抵達昆明之後，翌日即借了龍雲的一架飛機，逕往法屬安南的河內去了。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張安南的法文報上，在中國記事欄極小的一角，就出現了一條路透社重慶的電訊・只有：「汪精衛逃出重慶，避往河內」的寥寥數字。然則先生爲甚麼會到河內這地方去呢？河內雖是安南的首都，但這地方除了與它有特殊關係的人外，平常知道這裏情形的人是不多的。

河內的市街，因爲是法屬殖民地的首都關係，當然是富有法國風味的。除廣東街和安南土人的幾條街外，一般馬路都很寬大，路旁樹蔭披覆，蔭翳蒼翠，其間點綴着一幢一幢的洋式住宅。房子都不很大，但間隔則很寬闊，空地就是小花園。這是一個熱帶的勝地，却並不是一個政治都市。

河內全市的人口不過十五萬，以安南人最多，法人次之，而華僑只有四千左右，遠不及海防與西貢爲多。所以先生到這裡來要以華僑爲中心展開他的抱負，是很少可能的。而且能作政治活動的工具的報紙，在安南就只有用法語，安南語及中國語（只限西貢，因當地有華僑數十萬）三種，每天發行不過千份上下，內容既極貧乏，且通訊亦完全數哈瓦斯的支社所提供，在國外通訊方面只有從英語國

播轉載的路透、同盟、中央、海聯等所傳的消息。那麼想在這個地方展開政治的宣傳活動，自亦無考慮餘地。

那麼先生所以到河內去，究竟出於怎樣的動機？在「河內的正月」的回憶中，他自己曾這樣說：

回憶在去年河內過的正月，實感孤無聊。

我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飛離重慶，於二十九日，發表第一次通電。特地到河內去發表通電的理由是，因爲在重慶，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到底是不可能的。

照蔣介石的手法，我發表了這樣的通電，表示了態度，一定用恐怖手段對付的，這是我所深知的。但是在二十二日，近衞聲明發表了。在我，不能再空費遷延上的時間了，同志周佛海、陳公博、陶希聖、梅思平等，爲了發表第一次通電，到香港去了；在河內，只有我夫婦，曾仲鳴，與二三隨從。我們在那個時候，絕無護身的武器。我們並未爲危險所包圍，因此，不能要求越南當局保護；而且，一受了保護，與同志的連絡上，頗不方便，所以，越南當局雖則提出保護，但我們拒絕了。但是現在河內的市內，是危險的，所以選擇市外山上叫作「富褒島」的避暑地的旅館中。是冬天，所以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別的人。在寺院似的大旅館一室中，我們四五個人，在緊張中，但卻靜悄悄的，迎接和平運動開始後第一個新年。元旦晚上，我得到情報，知道重慶方面在緊急剝奪我和同志們的國民黨籍。對於這個情報，我與曾仲鳴俱覺驚駭，這一頓，大家都沉思了一晚。才倉促的措置，使我對重慶，於情有所不忍。一方面，在當時，日本方面的意見，我們也不明白。近衞聲明，總之，日本方面，在具體上究竟如何，完全不明瞭。於是，我們決定，暫守沉默，靜觀事態。

我們打算，把一個新年，在靜寂的山上的旅館中，過得清靜，耽於過去的回想及思索，來渡過去。可是，自十七日，發生了同志之一的林柏生，在香港被暴徒襲擊受重傷的事件，空氣緊張了起來。是一月二十八日

吧，得到緊急情報，說有十幾個怪人，從山下向唐泰島來，我便下了山。當他們到達旅館的時候，我已經走脫。從這個時候起，我在河內另外借了一幢房子。

當時，越南當局提出保衛我的住所，但是我拒絕了，只是在我住所附近，站一個警官。住所全然沒有防衛設備。三月二十一日，同志曾仲鳴為重慶的暴徒所殺害，便在這住所中。發生了這件事之後，越南警察當局，完全包圍了我的住所，以為戒備。蔣介石深知我的脾氣，但他一再非難，說我不知道他的脾氣。脫離重慶之後，我沒有立刻積極的行動，還在同志之間，有相當的批判。曾經有人批判說，萬一我在唐泰島為重慶的暴徒所傷害，和平運動不將全歸泡影嗎。但是，正直的講我心情，對於才脫離重慶，立刻轉向，向打倒重慶的路上邁進，這在我的心情，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有人說，這種感情，只是婦人女子之仁。

我自己也以為，非虛心坦懷的批判自己不可。但是，在實踐自己的信念的途中，時常陷於孤獨中，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心中絕無所懼。脫離了重慶，在河內過的這孤獨的正月，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卻的。

高朗街二十七號

這裡所說的「唐泰島」避暑地旅館，就是多迦斯加·泰爾爵旅館。地址是在河內市西北八十七公里的一座標高千四百米突的石灰石上。這座多迦斯加·泰爾爵旅館，就是河內市內的都城旅館，在唐泰島開闢的避暑地，只有夏季是開放的，平常從十二月起至翌年三月，是關閉的。先生所以選中這個地方，當然是取其地方偏僻，不易為人注意，同時也是為如前文中所說的，一面藉以休養，一面靜觀鑑覺對表後的事態發展。

當先生方抵河內之初，適逢重慶的外交部長王寵惠，為交涉運送軍火的問題，也在河內。因此外

界一部份人士，誤認爲新聞所傳先生到河內的事，是電碼上汪精衞和王寵惠的傳誤。可是當時有著名駐在安南的日本記者，奉到他們總社的命令，說先生確已到了河內，着令儘速調查出先生的行蹤，這些記者，便向當地總督府內購得內線，進行調查活動。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上，他們得到第一個情報，說是：「汪氏確已偕同其夫人至河內，居巴斐尼街二號，由某中國珠寶商之幫助下，秘密其身份，現已入市內某醫院。」

日本記者們即設法與此珠寶商人相接近，同時並向當地著名醫院特納山醫院及聖保羅療養院等進行調查，結果卻並無所得。到了十二月卅日，他們又獲得情報，謂：「汪氏在河內郊外八十七公里之譚奈島，」又謂：「在海防郊外二十二里地之多宋」，但結果還是撲了一個空。

這時在香港方面，艷電已經發表了。先生確在河內的消息，愈來愈無可疑問。事實上先生一行，雖於此時交由都城旅館寄出六件行李和食物等到多迦斯加．泰爾爵的避暑旅館中，頗有久居之意。同時由曾仲鳴氏在河內市中的都城旅館本部租任聯絡。先生及其夫人並女公子等，則居於多迦斯加．泰爾爵旅館的三百三十四號房間中。可是先生在這裏並沒有能住得長久，如其在「河內的正月」中所說，自一月十九日得到林柏生氏在港被刺受傷的消息，同時獲得庸奈烏山附近出現怪客的情報後，即於河內買了一座新屋，於同月二十八日遷入。房子是在高朗街二十七號，裝有二隻電話，並買了兩輛汽車，頗有久居的樣子。

重慶這方面，自然也獲得先生行動的情報，因爲這時先生並未有所積極行動，蔣介石氏於暫時之間，也就力持沉默態度。當時重慶的新聞，雖宣稱先生居住河內，但竭力宣傳不久即將出國赴歐，祗

說先生的主張僅在反對聯蘇容共兩點。迨至一月二十四日，美聯社自重慶發出的消息，更有如下的報道：「據消息靈通方面稱：汪精衛現仍逗留河內，意氣殊爲消沉，聞彼參加××政府之企圖已完全打消，因（一）日本內閣改組，（二）遭留京維新政府之堅强反對。目下汪氏採取「三不」主義，（一）不參加×組織，（二）不主張無條件抗戰，（三）不與平沼內閣往來。」

曾仲鳴被害的經過

實則重慶的觀點，一部份固出於故意的宣傳，另方面確亦因當時的先生，除了豔電的原則主張外，尙無任何積極行動。在先生方面，如其本人所說，一因方經脫離重慶，以其素重道義與感情的人格，最初絕無與重慶造成破裂局面之意。再則亦如其前文所言，對於日本方面，除了近衛宣言的三原則外，日本的具體意向如何，此時先生實亦無從明白。而在日本方面，當時也不無一部份人推測先生脫離重慶的行動，是出於汪蔣二人間的默契的。他們認爲因蔣介石氏過去堅持抗戰建國的立場，公然提倡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也許在暗中諒解之下，讓先生出面來談判和平。因此當時重慶的宣傳，不僅避免正面攻擊先生本身，且在二月間，尙有過蔣氏派員致送先生出國護照的事。

在先生本人，他主張個人的進退毫無問題，只要重慶有考慮接受豔電建議的表示，他就隨時可以出國。然而就在其間，藍衣社的暗殺活動，却已從香港展開到河內來了。

當曾仲鳴先生在河內市的都城旅館中擔任內外聯絡時，他早已爲藍衣社的份子暗中包圍了。雖然有些同志警告他要小心，但曾氏却坦然的說：「那裡的話，他們祇不過監視我們的行動而已，絕對沒

有危險的。」可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午前二時，曾氏不幸遭了毒手，地點就在高朗街二十七號的新居。

高朗街二十七號的洋房，本爲華僑福建人郭某所有，該處地方極爲幽靜，屋內有大花園一座，共分三樓，先生夫婦與曾氏夫婦，即分別居於三樓的鄰室，二樓爲會客廳，下層則爲衛士及僕役等居住。凶手約有五六人，於二十一日侵晨二時半光景，先從鄰居某家，以斧頭砍斷竹籬，從屋外鐵柵爬入花園，至後面空地，以人踏人的方法，攀上窗門，再以繩索爬上三樓屋檐，先將在樓前的衛士一人用槍擊中腿部，又在廚房門口擊倒二人，遂衝至曾氏臥室房門，將門砍破，時曾氏夫人方君璧女士已聞聲起視，首在腳部中一彈，凶手旋即向曾氏作密集轟擊。行刺者見目的已達，以爲被刺者爲先生，於是急圖遁去，然在先生衛士及當地軍警追擊之下，終於在白蘿蘭地方，捕獲凶手若干人，至於正凶王老僑，爲藍衣社的現役軍人，後來在上海被捕處刑。

曾仲鳴先生因胸部中三彈，穿過大腸，送往當地期生醫院時，旋即重傷殞命。然而曾仲鳴先生在彌留之際，毫無遺憾的向先生說：「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甚麼不放心的。」曾氏的死固然是喪失了先生的一個親密的友人和重要的助手，然而一如曾氏夫人方君璧女士所說：「在此時代，抗戰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當以一己之死，換取國家民族之生存。」

曾仲鳴先生行狀

先生在「曾仲鳴先生行狀」一文中，更這樣沉痛壯烈的說：

「嗚呼！余誠不意今日乃執筆爲仲鳴作行狀也！當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黨部爲凶

所狙擊，坐血泊中，君來視余，感甚，余以詩慰之，此狀今猶在目前，乃今則君臥血泊中，而以詩慰我也。余當日雖斷於死，而卒不死，乃今則君竟一瞑弗視也。國事至此，死者已矣，生者當以死繼之，其有濟於國與否，未可知也；即幸而濟，茫茫後死之感，何時已乎！君以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歲次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生於福建之閩縣，幼孤，母氏至賢，君於諸兄姊妹中年最少，姊氏醒，適方氏，少孤，攜子賢傚與次之女弟君瑛，及夫弟聲濤聲洞同留學於日本，先後加入中國同盟會，從 孫先生致力革命。庚戌之歲，嘗與君瑛暨黎仲實，俞雲紀，黃復生，陳璧君及兆銘謀刺攝政親王，事敗，復生兆銘被執；復與君瑛等，參加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雲紀聲洞戰死。元年，與君瑛璧君等得官費留學於法國，各攜其弟妹偕行，節三四人之所得，以資六七人之用。君於此時，年十五，君瑛之妹君璧，則少於君二歲，自幼時，備聞姊氏之教，知以身許國之義。既入蒙達爾智中學，銳意力學，孜孜矻矻不倦，又自以年幼，去國遠，每學校休假，則移游學之暑，以補習國學，彙程並進，學識日懋，而習於勤儉，志節堅定，他日為國服務，廉潔之操，亦於此養成焉。元年以來，國事靡定，兆銘僕僕奔走，留學之願，有志未遂；君則沉潛專一，中學畢業，更入大學，初治化學，兼治文學，先後在法國蒲鐸大學獲化學學士，在里昂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名聲斐然。復在里昂中法大學任秘書長之職，於論法教有多數盡力，且留心國內政聞，其政治主張，亦論定於此時也。君與君璧幼時同學，志趣相得，既成夫婦，伉儷尤篤，君璧致力繪事，有聲於中外。十四年，相將歸國，皆任教授於廣州中山大學，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君被任為秘書，是為君弼輔國事之始。自始之後，數年之間，中國之進步與紛擾，更迭起伏，君與兆銘，相從患難，識定而氣閑，然備嘗險阻，習知情偽，其懷

弘之度，遂與日俱進。二十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君被舉爲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廿一年一月廿八日，任行政院秘書長，旋調鐵道部次長。其時東北已喪，淞滬又被兵，舉國汲汲，以救亡圖存爲務，而共產黨則乘機猖獗於江西，謀顛覆中華民國，中央於是決策，對內務根據三民主義，以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其尤要者：充實民力，發展國力，以裕民生，以固國防，凡有障礙，悉掃除之；對外則務求和平正義，求得國際之同情與援助，且期待日本之最後覺悟。凡此決策，蓋深維本末之義，而確定救亡圖存之方針與步驟，大計既定，頒之全國，一致遵行。軍事委員長蔣中正，督師南昌，當剿匪之任，其他行政諸機關，亦皆同心協力，謀國是之實現。君在鐵道部，佐部長顧孟餘改進路政，雖庶務奇繙，債務累積，而運籌有策，不遺餘力，先後舉辦京滬輪渡，延長隴海鐵路，復完成粵漢鐵道，此爲前清末造以來，舉國所跂望而迄未能竣事者，至是始得由廣州直達武漢，與平漢鐵路相銜接，於國防民生，貢獻甚鉅，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復被舉爲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旋辭鐵道部次長職，於翌年二月偕兆銘出國，及十二月聞西安事變，遂歸。二十六年二月就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副秘書長，八月，中央政治委員會以抗戰軍興，特設國防最高會議，以君爲秘書主任。其時中央決策，悉全國之力，從事抗戰，而於和平斡旋，仍並行不悖，當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既作，中央仍宣言願採取一切國際調停和解諸手段，以息戰爭。當八月十三日以後，戰爭蔓延淞滬，而九國公約國開會於比京，提議調停。中央仍予接受。及十二月初，南京將陷，德國大使奉其國政府之命，傳達日本和平條件，中央承諾以爲和平談判之基礎。二十七年九月，國聯開會，中央復訓令代表，要求適用盟約第十七條，亦爲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凡此事變，皆中外所昭見，而隱微曲

折，君以參與機要，知之尤深且悉。夫和戰大計，爲國家生死安危所關，不得不戰而戰，可和則和，此爲謀國之常規，況中國自抗戰以來，全國被兵，失地延及九省，將士死傷百餘萬，人民肝腦塗地，其數不啻倍蓰，如和平條件無害於國家生存獨立，則結束戰爭，以圖補救，尤忠於謀國者所宜出，惟共產黨人心目中無祖國，其始欲藉淞滬戰爭，牽制國軍，俾得以盤踞江西，及頻年被剿，由東南竄西北，窮蹙乖盡，則又藉西安事變，託名抗戰，轉移視聽。抗戰既起，乘舉國存亡呼吸之際，從擴張其政治組織及軍隊，以祈達其顛覆中華民國之謀，知和議若成，必不利於所圖，悉力破壞之，輾轉勾引，所以挑撥離間，煽動中傷者無不至。兆銘既痛國是之被搖動，又怵於國家大計爲讐人所挾持，將不甘於覆亡，數數言於國防最高會議。十二月九日，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至重慶，復激切言之，卒不納；遂於十八日去重慶，十九日至河內，君偕行，二十九日以建議書公布於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丑時，天未明，凶徒數人，持械突入寓所，發彈數十，傷五人，君傷最重，是日申時卒；夫人君璧以奮身救君，亦中三彈，餘三人傷輕重不等，凶手當場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報，皆以大字標明藍衣社所爲，且叙凶手供稱，謀殺目的實在兆銘云云。君生平文學著述甚多，而於政治則重實行，少言論，且自以處機要之地，益以愼密爲務；然亦正由其處機要之地，於中央決策之經過及其蹉跎變幻之所以然，瞭然於中，憂國之心既深，及其垂亡，而思有以救之；積誠已久，一旦決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悠之毀譽，及其一身之死生禍福，固所不計也。嗚呼！是可謂仁且勇矣！君自受傷至逝世，神志清明，語親友曰：「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無不放心者！」夫人君璧，身受三傷，目睹君之臨命，茹痛言曰：「在此時代，抗戰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當以一己之死，換取國家民族之生存

。」君卒時，三子均幼。方曾兩家，自前清末參加革命，至於今日，殺身死國事，纍纍未已；兆銘往還既密，以公義兼私交，於君之死，爲國痛，爲兩家痛。倉猝紀述，未足以盡君之生平，僅舉其志事之大者，告之同志，俾知所繼述云爾。」

在謠言攻勢和威脅包圍中

曾氏既死，高朗街二十七號的住宅，自然給停閉了去。當地法國政府，雖日夜加派警察保護周圍，並迅速修理好暴徒闖入破壞的地方，用鐵板加製防禦工事，但先生本人，暴露於身邊的危險，就重復上唐泰島去了。接着在三月二十七日發表了「舉一個例」的第三次聲明。而重慶方面爲報復起見，亦即捏造了先生與平沼內閣間訂有密約的謠言。謠言的內容，就當時的情形言，確實是相當高妙的，但從後來發展的事實看，却除了是惡意的謠言之外，便再也沒有別的意義了。

重慶方面捏造的先生和平沼內閣間的密約內容是這樣的：「一、爲便利及早實現汪精衛與日本前首相近衛之和平政策起見，日本應在中央政府改編軍隊未竣時，猛烈進攻，暫定達到下列目的：（甲）在華北日軍應佔陝西省會西安，包圍四川，而截斷中蘇交通；（乙）在華南日軍，應佔廣西省會南寧，俾壓倒該省反日情緒，並應截斷廣西與越南之交通；（丙）華中日軍應佔長沙，截斷湘贛鐵路，並佔襄陽與樊城，以制湘川兩省。二、日本完成上述程序時，汪將親自領導一「反蔣反共戰爭」，汪並保證盡可能於本統制軍力二十師。三、汪將負責組織反共親日同盟，自任總裁，具有撲滅一切反日份子與共黨份子之充量行政權。四、討論恢復中日和平友好關係之協定，此項協定，應以反共與近衛

汪氏之宣言爲基礎，並應採納所有反共國體之見解。五，爲實現第一第三兩點起見，日本應月給汪氏三百萬元。」（廿八年四月五日重慶「大公報」）

重慶又復宣傳先生已派前亞洲司長高宗武攜此提議前往日本接洽。然而不管這種揑造的「協定」內容有否意義，事實上先生此時仍在河內，根本談不到和日本政府訂結任何協定。自曾仲鳴死後，先生深感河內決非宜久居之地，爲伸展其政治抱負，爲保障個人安全，他這時的唯一考慮，是如何設法離開河內而往上海。而此時先生開始與安南方面的日本人發生接觸，目的亦祇在取得日人的協助而脫離河內險境。

藍衣社方面自從發見他們謀刺的目的未曾達到，徒犧牲了一個曾仲鳴先生時，就加緊監視先生的行動。他們假借歐亞航空公司的名義，把高朗街先生寓所的一宅鄰居房子租借了下來，以圖繼續行動。同時都城旅館也早受他們所注目，所以先生再繼續居留河內，是非常危險的。幸而此時日本方面，已深知先生的和平主張，完全是正直無私的，對於先生勇敢的行動，覺得非常同情，於是就派遣了犬養健氏前來河內，和當地日本領事館及新聞記者等，會同協助先生脫離河內。

河內脫險記

關於先生冒險河內的經過，有一位日本人士C君，在他當時的日記中，會有這樣的紀載：

「四月一日（星期六） 汪氏三十一日發表了第三次聲明「舉一個例」後，到高朗街去訪問汪氏，叩詢他的意見。因爲當時還不知道誰是曾仲鳴的繼任者。汪氏一派的聯絡完全斷絕了，也就沒有達

到目的，祇留下了一封拜訪的信，便回來了。午後五時接到電話，是流利的法語：「我是汪先生的秘書，你早上的信收到了，希望明天早上會面，時間和地點，明天再打電話告訴你。」我把這事告訴了K和木村氏。

「四月三日（星期日）　上午八時來電話，約我戴黑眼鏡，不另帶別人，上午十時去都城旅館三三四號房間。他自己用 Chan Ts Ko 的名字說：「這個並不是眞姓名。這一次汪先生要我繼任曾仲鳴先生的工作，我是法國留學的。」雖則是第一次印象，已經覺得對方是一個頗堪信任的人物。我得到了汪氏聲明的原文，和昨天信上的回答。後與K氏及木村氏討論汪氏的聲明。

「四月六日（星期四）　從日本翻譯某君之手，得到了大公報揭載的『平沼——汪的和平密約』。我即和K氏商量，我們很扭憂是不是汪派中有人和重慶祕密聯絡。重慶對汪氏的『舉一個例』採取報復手段，是沒有疑問的。但這個通報者是不是高宗武呢？

「在K氏的紫叢召集木村及坂本兩氏談話。席上K氏說，最近有兩個『客人』來了，也許是爲汪氏脫出安南來的。並愼重相約，這件事情的實現，須由我們四人全力合作。

「四月七日（星期五）　午後六時應K氏召，木村氏亦在座，K氏說明，在五時左右，領事館的直兇香記曾來過，說今晨領事館收到中國人送來一信，是一手好日文，信上說：『要來的二個人，來了沒有，望賜覆。回信用的信封，一併附上，請照上開地址送下。中山，七日。』回信用的信封上寫着：

"Madame Chamber No. 334 Hotel Metropole"

「所謂最近要來的兩個人，是金田（假名）和石見（假名）。然而中山究竟是誰？以前旣發生過「平沼——汪密約」的事件，這次關於「客人」的事，無論如何不能洩漏給重慶方面的。就是這封來信，有無問題，也不得而知。在不知此信是誰寫之前，是不放心的。因此到都城旅館去訪 Chan，沒有會到，又到高朗街去，說 Chan 出去了，問管門的人，汪先生手下有沒有叫中山的人，會寫日本文的？據回說沒有中山其人，會寫日文的祇有汪先生自己。於是留了張明片給 Chan，要他卽打電話，便回家了。

「四月八日（星期六） 與 Chan 沒有連絡。上午十一時，有自稱中山者打電話給日本領事館，用極流利的日語說：『昨天的信，請予答覆。』但總領事館因爲什麼都不曉得，電話就掛斷了。這封信和 Chan 沒有連絡，實在有些不可思議。如此看來，在「客人」未來之前，應有萬全準備。商議結果，作了下面的決定。

一、住旅館危險，「客人」住在坂本家裏。

二、「客人」與汪氏會面的地方，決定深夜在唐泰島。

三、汪氏出來，經過杜美路橋是危險的，決定晚上由唐泰島直接到海防。

「因此在唐泰島與海防之間，晚上九時配置了兩輛汽車，停在適當的地方。K氏與金田和石見的汽車，停在離河內五百米突的地方；我自己坐的一輛空車，用電筒爲暗號，和已經約定好了的，從唐泰島出發的汪氏夫婦所乘的汽車相會；然後汪氏夫婦轉坐我的汽車；汪氏夫婦原坐的汽車，俾令開回高朗街，回河內去。交代了汪氏夫婦的汽車之後，我們的車子便開走，同時K氏的汽車跟在後面，相

隔五百米突距離，一直開往海防去。在海防用坂本部下一二人担任警戒，在啟程之前，設法將與駕駛汽車人加以監禁。」

「以上的方法，決定由K，木村，坂本和我預先練習一次。但因深夜與 Chan 取得了聯絡，約定明晨會面，因此演習便告延期。

「四月九日（星期日） 上午十時與 Chan 在都城旅館會面。我拿出那份國信用的信封，他說：『這是命令我送去的。』那時我通知他爲答覆汪先生的事，K氏要和 Chan 會面，此後關於脫離河內的事，一切連絡，決定由我轉知汪氏方面的 Chan。

「午後K和 Chan 會見了，會見的方法，是在河內市外，太湖的散步路上。午後九時，我和K氏在太湖散步的時候，Chan 的汽車從後面來了，他繞到我們的汽車來，在太湖邊慢慢地轉了一週。」

「是闇的一夜，在預定的時間，預定的地區，一切事情很順利的進行着。這時和 Chan 一起來的，還有一個人，照例是『中山』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話。我們在太湖的周圍駕駛着，堤上很少有人經過。我們停車下來，中山和K，Chan 和我，分成了兩組，在黑暗的堤上一邊踱着，一邊談着。K氏對中山講述他的計劃，同時聽取對方的意見。約卅分鐘，再乘車返河內，便分別了。

「四月十日（星期一） 晴。K氏，木村，坂本和我四人，駕着汽車，照預定的計劃，帶了手錶和地圖，實地踏測從廣發島到海防去的路線。

「四月十九日（星期三） 午後，接到 Chan 的電話，約去喝茶。便到都城旅館去了，詳細說明「警、二的聯絡和今後聯絡的方法。利用都城飯店是危險的，應設臨時變更會面的場所。我們決定了

下面的暗號：

看電影去（表示午后八時半乘汽車在太湖的散步路上會面。）

喝茶去（表示電話後，十五分鐘內在都城飯店三三四號房間會面。）

散步去（表示電話後，十五分鐘內在植物園散步路上會面。）

「四月十六日（星期日）金田，石見兩氏到達海防港內。

「四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半，在K氏和坂本氏的領導下，金田和石見到了由根氏私邸。午后，由根氏私邸前發見站有幾個中國人和安南人。

「在都城旅館及植物園，和Chan會面過兩次，報告『客人』已平安抵埠，並商議和汪氏會面。二次連絡都有金田氏的信。

「夜九時赴都城旅館送去金田氏的覆信，約翌晨八時，在植物園等候對方回信。

「四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八時，預定的覆信送來了，從中山和Chan兩君口頭提議，決定汪氏和金田在今天會面。

會面的方法，經再三慎重協議如下：

一、仿照前法，利用黑夜乘車赴郊外會談

二、由我們引導汪氏去指定的場所。

三、我們到汪氏處去。

結果我向中山及Chan君提出如下決定：

一、時間在午後一時至二時間。

二、在所定時間，他們的汽車停在預定的地方，我們遲到二分鐘，在他們停車處所前三百米突距離下車，步行前進。

三、我們的「客人」坐他們的汽車到汪氏處去。

四、他們的汽車將「客人」送到植物園爲止。

「相會的地點指定在跑馬廳附近，時間一點四十五分。我們先在跑馬廳附近視察一過後，即赴樸本家午餐。

「看準了時間（和 Chan 的手錶對準了的），我們分坐兩輛汽車出發。鑑車中：K氏，我，山根；隨車中：矢田，石見，矢野，坂本。

「到約定的地點下車後，我和K氏，坂本和山根，裝做散步看風景的樣漫步着。

「我的臉色變了，在約定的地方，汪氏的汽車沒有來，附近一帶也沒有汽車的影子，時間漸漸過去。我和K氏商議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要是如此，祗有回去另定計劃了。正在這時，路上一輛汽車，掀起黃沙，飛馳而來，看見車子裏有金田氏，汽車已急馳而過。我們所乘的鑑車馬上跟上，直到看見車子到高朗街汪宅，始覺放心。那次談話二小時即完畢。

「四月二十日（星期日）晚上，突接汪氏方面來信，謂身邊非常危險，希望能於今晚坐我們的船去。他們感到我們最近的行動，已爲藍衣社方面在偵查了，要逃避他們的視線是很困難的。從來信中，知道汪氏住所的鄰家三棟，今天被人用歐亞航空公司的名義借去了。據情報說，他們都是藍衣社

。萬一從那邊拋下任何爆烈的東西，那就什麼都完了。我們很担心，立卽很快的準備了。九時半，坂本爲準備汽車，馬上趕赴海防。十時後，他又去汪宅聯絡。他回來說，法國當局負有保證安全的責任，所以今晚不用上船了。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金田，石坂氏等午前九時從河內去海防，乘北光丸出發。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接到Chan會面的通知書，約定晚上八時在河內羅大空地前連絡，從中山和Chan手中收到很長的信，在公園的路燈下看了，因爲內容重要，卽刻到K家，召木村氏，作更進一步的協議。信的內容如后：『汪氏等定四月廿五日晚由河內出發，是晚深夜乘坐停在洪建附近卡特巴島北面的法國船鳳安（譯音）號，於二十六日上午六時至七時間啓程，希望你們的船較緩啓程。』

「此外並附有鳳安號停泊地點略圖，和無線電聯絡的符號，及其他應該詳細注意的事項。卽汪氏等定於二十五日由河內出發，向洪建的路上走，到海岸後轉乘小汽船，開往停在卡特巴島北面的法國船鳳安號，於二十六日出發至上海。

「最初的計劃，汪氏到上海，是乘北光丸的。改乘鳳安號是因爲汪氏沒有護照，不能出國，後來得到安南當局的諒解與援助，在總督府的好意下，將當時停在西貢港內的鳳安號（七百五十噸），租了一個月，又在保安局的好意下，得以準備二十五日啓航。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早上K將汪氏的書籍帶往海防。海防有坂本氏與北光丸担任聯絡。

「在某地停留的Y氏來電：『上海的準備尚未完事。』我立卽追上出發後的K氏。晚九時半，與

K氏一起回來。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我將K氏攜來的金田氏的親筆信，於上午十一時帶至都城旅館與中山和Chan會談，萬事O．K。要是鳳安號更改航期的話，可以直接電知北光丸，北光丸決定於牽前附爾島北十海浬海面等候鳳安號。

「若二十六日午后六時爲止，汪氏方面留守的人，對我們沒有什麼連絡，便表示萬事在順利進行中。又在汪氏出發後，爲必要偽裝起見，應散播如下謠言：汪氏在安南當局諒解下，已去交趾養病，一月後回來。並準備其他安全必要手段。

「我和中山及Chan氏握手，共祝航路安全及計劃成功，約定再會的時間便分別了。

「這一切都很快的報告給K氏。

「四月廿五日（星期二）晝，小雨。夜間（時間不明）汪氏等全部往海防，同行者有保安局長亞士力黨爲保衛指揮官。

「午後三時半，收到北光丸來電：『行李已否寄出，速復本船。』『行李』是表示汪氏一行的意思。

「與K氏商議，想和汪氏方面留下的人接洽，但落空了。發電報的時間是午後一時半。

「大家默然不語，有不吉的預感。

「約定時間，到六時爲止，汪氏方面，並沒有來連絡，我們想大概已平安脫險。我們擔心會不會把他們送到廣東的北海去。午後九時，會見汪氏方面留下的人，談起來，大家相顧失色。

「從他們那裏知道，因天氣不好，所以開船的時間遲延了五個鐘點，至正午始啓航。然而何以尚未和北光丸聯絡。想把這情形電報通知北光丸，惟因電報局拒絕，只得待明天再作計較。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不安並沒有消失。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午后九時，金田氏來電：「二十八日午后一時，在香港附近取得聯絡，請安心。」至此，汪氏安然脫離了河內。」

「述思」

以上就是紀述的先生脫險河內的經過，讀來頗有令人發生閱讀偵探冒險故事之感，然而實際上先生所經歷的危險，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先生初到河內之際，雖亦預感到重慶方面的手段，可是他仍舊以爲他來河內的目的，僅在發表他的和平政治主張，並沒有想和重慶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而且中國既爲崇奉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的國家，同時先生又復爲中國政府的最高領袖人物，他當然有發表他的國事主張的權利。然而豔電初發，曾仲鳴，沈次高諸氏即相繼遭遇藍衣社的毒手，在河內的先生，已完全處於危險的包圍中了。我們且不談政治主張，單看上面的一段脫險記，即可充分知道先生所以要脫離重慶的理由了。

當先生在北光丸的船上時，不免悲感交集，留下了這樣的一首詩：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燈塔微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刼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悽然不作零丁嘆，檢點生平未盡心。（夜舟。）

對於這首詩，先生後來復有「述思」一作，是記述的當時的情景與心緒。和前面所引脫險記對照，則尤可知脫險記所述種種，完全是正確的歷史記錄。

這首詩，（筆者按：卽指「夜舟」）是前年（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做的，最初，曾示同志林柏生君，後來，請求書示這首詩的同志很多，大多還請問這首詩中所包含的事實，因此，想將它寫下來。

我發出了那個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和平通電（艷電）之後，我很知道重慶方面大概是不會贊同的。但是，一想到是長期同共了甘苦來的人們，總不能立刻忘却。於是，在河內找定了房子，住了下來，閉戶讀書，想靜待重慶方面翻然覺悟的日子的到來。有時，想到國運已瀕危殆，人民的艱苦已臻極點，我一個人閉戶靜居，覺得是萬分痛苦的。

這裏所發生的，是三月廿一日曾仲鳴君的遇難事件。我仔細考慮過。這樣一直靜待着，不是處置國家危急之道，也不是對於繼刺殺境的盟友之道。因此我便決心到上海去，但是因爲兇表社在側窺圍害，所以不能像普通人那樣旅行。因此，與法國的的船公司交涉，借了一只輪船。是只四百噸的船，因爲停泊在海防，所以打算趁深夜，從河內坐車子到海防去上船。法國的警察，也承允保護，出發的日期，也已決定了。

這個時候，日本的犬養健氏等，到河內來，到寓所中訪問我。這是我從戰爭以來，第一次面會日本方面的人。犬養氏等，對我詳細的說明日本朝野於近衛聲明的信賴及支持的情形，又用熱烈的語調，這樣說：——

「中日兩國，在這數十年間，糾紛不絕，直到如今，終於以干戈相見，這也快兩年了。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爲兄弟般的兩個國家永遠親睦而工作。即令兩國人民不懂得，我們也總堅持我們的信念，在數十年之後也好，甚至在一百年之後也好，不實現是不休止的。現在，離開近衛聲明及豔電的發表　才只幾個月，人心的轉化竟如此的顯著，這是當初所未及預料的。」

犬養氏爭辯這些話，是在樓下的小房間中，樓上的小房間，正是同志曾仲鳴殉難的地方。我總寫犬養氏的談話，却遺不想到同志曾仲鳴也會在場的。

我們的會談結束了。我，照預先所計劃，坐小汽油船，犬養氏等坐那坐來的大船，同時出發。四月二十五日近晚，我離開了寓所，坐了車子，向海防進發。我沒有餘暇到永眠的同志曾仲鳴的柩前，甚至於，不能向受了傷躺在床上的曾仲鳴夫人方君璧女士探問病狀。

到了海防，上了小汽油船。最初的兩三天，波平浪靜，平安的航着海，但不久，風浪很大，船，不能前進。這樣過了一天，便用無線電通知犬養氏等，請用大船來援。這便是山下輪船公司的北光丸。一換了船，萬感俱集，於是，做了前面的那首詩。

詩中前面的幾句，都是歌詠當時的景象；後面的幾句，是那個時候，想到了昔代征西大將軍桓溫登高以望變方，慨然而道的文句。他說：唉，神州是陸沈了，百姓已沒有可歸之家，王夷甫那班人是逃避不了這個責任的。現在的戰爭，不是我們的責任，是誰的責任呀？文天祥的詩，有這麼的句子，「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雖則沒有說死是報國最後的一剎那，但是，他也沒有說報國是可以一死以了責任的。這一點，是很值得慎重考慮的。

去年山下輪船公司社長山下龜三郎氏到南京，到我寓所中訪問，贈以北光丸的銀製模型，我把它放在會客室裏，可以永遠紀念。

第十九章　和平運動在上海

神祕的傳說

民國廿八年春的上海，充滿了謠言，不安與攻訐的空氣。這自然是一種重大的政治鬥爭展開前期所不能免的現象。間諜戰與神經戰，可說已至最高峯。且不說像上海那樣的國際都市，即在先生脫險前後的河內，也同樣的充斥着神祕性與傳奇性的流言傳說，其中曾有一段插曲講起先生在河內最後一段時期的冒險生活說：

在河內郊外的一條小溪旁邊，每天都有一個中國人在垂釣着。這一位目光炯炯的漁夫。正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汪精衛先生的姿態。

釣魚，成了汪先生的功課；可是，事實上，連一條最小的魚也還沒有釣到過；但他卻很堅韌地耐着，等待機會一到，自然會有魚上鈎的。

連續過好幾天的釣魚生活，每天總有一個人經過汪先生的身傍，而且每次必定揩鼻子。普通中國人的習慣，揩鼻子是用手的，可是，這一個過路人卻用紙來揩。

當太陽西沉的時候，汪先生便很小心地把這些紙收拾起來，裝到口袋裏，然後回去。

汪先生能逃出河內，便是靠這些揩鼻紙的功勞。這些紙便是連絡的紀錄。利用釣魚的時候，在暗裏交換情報

，這用意是相當週到的。

不過，在這巧妙的準備下，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早晨二點鐘的時候，不知道是那一個，突然跑到高朗街三十四號三層樓汪先生隱居的家裏，射殺了作為汪先生替身的曾仲鳴夫婦。由於這件事，汪先生更不能不決定趕快離開河內了。

汪先生隱居的家，是和上海交通着無線電往來的，好幾次在他腦子裏盤旋着，如何脫出河內的方法。在外國的輪船上恐怕被發覺，在中國的輪船上恐怕被暴露，日本輪船又坐不得，怎樣才能渡過這汪洋的海水呢！

正當絕望的時候，他接到了一隻祕密船停泊在河內的情報。好機會到了，不過麻煩還是有的，那隻船停留的地方，離開海岸很遠；而河內又是抗日暗殺團的巢坑，怎樣才能離家到海邊去呢；

正在躊躇猶豫的時候，偶然有一位熱血青年，願意在夜間裝做病人，搶到醫院去，先生便依照這個計劃離開他的隱居之所。

五天以後，這一隻輪船便把汪先生安全帶到上海，經過那一些地方，這是用不着說的。（一九四○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每日新聞」）

到了上海

猜測記載縱有部份是事實，但是給傳奇化了。事實上先生確於四月廿五日離開河內搭乘北光丸，但當時行蹤極祕，已如前章所述。然而河內方面的重慶情報機關，於發見先生一行失蹤後，其如何在各方面發動間諜網與神經戰，當然不難想像。他們的活動中心，一為南方的香港，一為華中的上海。尤其以後者為甚。然而直到五月下旬，即先生離開河內一月之後，各方對於先生的行蹤，仍未能獲得

確息。五月初旬香港方面盛傳先生夫婦乘義船康脫維梭號赴滬，一說則乘機赴日往晤平沼首相。至五月十二日，上海「導報」首先發表香港專電，鑿言先生已於四月二十四日抵滬，先與日方進行談判，旋即赴日。至五月初旬，始再來上海。又傳說先生抵滬後寓於禮查飯店和百老匯大廈。其實這些都是臆測之詞。不過在此前後，和平運動的有力份子，確已進駐上海活動，像周佛海，梅思平，李聖五，高宗武諸人。

北光丸到達上海的日期，是五月六日，一行人在虬江碼頭上陸時，正值上海的初夏。此時上海已充斥了重慶特務工作的活動，但在和平運動方面，一切方處於不利的條件下，所以先生抵滬之初，不得不暫寓在靠近日本駐軍所在的江灣路重光堂，可是對於為其信心與主張不辭最大犧牲這一點，先生及其同志是早已有了決心與準備的。關於這一點，日本陸軍報導部長谷萩那華雄少將，會有過這樣一節回憶說：

大概是在一行人到達上海後的大後天，汪精衛氏因欲檢查血液，要求介紹日本方面能負責的醫生。當時我們暗中還認為汪先生自己要檢查身體，所以立即介紹了海軍陸戰隊醫院，但到醫院赴約，竟有汪先生以下四十餘人，他們並不是來檢查有否病毒，而是因為預備突入和平運動工作，對生死一念固早有覺悟，惟為預防同志不測起見，先事檢驗彼此的血型，以供緊急情形之需。其中並且有一位青年同志，在知道了自己和汪先生同血型之後，就慷慨激昂的說：「萬一汪先生發生若慘事，我第一個實行輸血！」當時醫院中的人，對此情景，無不異常感動。（見卅二年七月份日本「富士」雜誌「語汪精衛氏」一文）

重光堂在現在的江灣模範村，先生最初雖暫寓於此，但認為在日本駐軍附近所在展開和運工作，易為外界所誤解，遂不顧當時危險的環境，挺身遷往當時上海越界築路區的愚園路。這時重慶的特務

工作人員對於和平運動者已展開暗殺的活動，和平同志一時遭暗殺者不知凡幾。是年八月的某一天，在愚園路的邸第中舉行了一次殉難同志追悼會，與會諸人有周佛海、褚民誼、李士羣、梅思平、丁默邨、林柏生等。當時受追悼的和運同志有五十一人，在席間誰忽然感慨地談起說：「到今天爲止是五十一個人，不知第五十二個又得挨到誰了……」，一時彼此默然，獨先生起立道：「諸位，此間出席諸人都是第五十二個人。而且我們都存此決心，」說畢，先生領導大家預先爲第五十二個殉難同志乾杯。在這裏我們又一度見到了他當年「慷慨歌燕市」時一樣的勇毅決心。可是在他心靈的深處，他也並不是不懷着滿腔的悲哀。

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無眠。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郊原仍作靑春色，悽愴山川亦可憐。（「不寐偶成」）

首次赴東京的經過

這首詩，可說就是述說的先生當時的內心。但先生到了上海之後，即秉其信念展開和平運動的工作。爲探訊日本，對於中日和平的眞正意向，先生於六月間曾親赴日本，訪問當時日本內閣首相平沼，重慶方面遂宣傳先生已和日本訂結秘密協定，所傳內容爲（一）在衡陽，西安，桂林未打下時，日本軍事行動不能停止。（二）規定以先生爲中心，成立「聯邦中央政府」。效能以求得德意承認到英美法有一國作事實上承認時爲最高標準。（三）該「政府」組織十二個「討蔣反共軍」。以先生兼總司令。（四）該「聯邦政府」的組織，分下列各項：（甲）取消華北「臨時政府」，更名爲「華

北聯省自治政府」。（乙）取消南京「維新政府」，更名爲「華東聯省自治政府」。（丙）俟西安攻下及粵漢路打通後，再組西北，華中，華南三「聯省自治政府」於西安、武漢、廣州三處。（丁）該「聯邦中央政府」，地址設南京或北平，由東京方面決定。（五）該「政府」經費，月由日方支給三千萬，由該轄地內的稅作抵押。（材料引自廿八年五月十二日「導報」）

這種宣傳的目的，自在使人對和平運動發生惡劣的印象，可是事實眞相決不如此，這如先生後來所解釋的。

如今一述鄙人前赴東京之經過：去歲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之後，蔣介石曾命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辭去本職，另畀以重要之任務，使駐香港，與日本接洽和議。外間所傳高宗武個人自由行動，絕非事實也。高宗武接洽和議，屢有接近之機會，而蔣介石因其個人位置問題，發生反覆，以致和議久久無成。鄙人之赴東京，並非另有經綸，不過使高宗武所已接洽者不致中斷而已。而赴東京與日本當局接洽之結果，使鄙人確信近衛聲明與鄙人建議可以實現。（廿八年九月七日「在上海招待外國記者談話」。）

重慶方面鑒於前項宣傳不售，遂另放空氣謂先生將有所謂「和平息戰會」的組織。如廿八年元月初旬渝方各通訊社電傳謂：「津訊，「此間證明汪精衛確有擬任所謂世界和平息戰會會長，並聞汪力圖在南京有所組織，此項組織名義，尚未確定，「維新」梁鴻志等，尙在反對，至於在平之「臨時」將改爲地方性質政權，其一切外交財政等事，統須受將來之南京組織指揮，刻汪在滬平兩地，均派有代表接洽，王克敏亦準備最近赴滬與汪會晤。據悉，王事先曾向日方表示，如果能保全其位置，彼當可與汪合作，至慫恿吳佩孚出山，過去本係土肥原等少數人之意，更因張燕卿池宗墨，從中活動，一時雖甚囂塵上，但吳之態度堅拒如前，不稍變更，故此事已成過去。」」（廿八年元月五日上海「新聞

報」。）

當時先生確曾先後到過廣州，青島等地，其任務在於收拾時局與實現和平，並無「世界和平總機會」云云的東西，他本人說得很明白：

如今一述鄙人別離淪陷各地的經過：當鄙人前赴各該地時，外間謠傳以爲鄙人將在各該地組織政權。及鄙人離去各該地時，則又以爲鄙人失敗而去。此非重慶之惡意宣傳，卽誤會耳。其實鄙人所抱之目的及所任之工作，係與各該地之同志及黨派不同而救國志趣相同之人士，開誠布公，共謀收拾時局之辦法，以期共負收拾時局之責任。尚與駐在各該地之日軍當局爲誠意之協商，俾收拾時局之具體辦法，有實現之可能也。（引文同前）

重慶的神經攻勢

當時在重慶所發動的神經戰與宣傳攻勢下，關於先生行動的消息，確極盡離奇能事。一會宣傳先生有所「陰謀」，一會又聲稱已告「失敗」。主觀的臆測和宣傳上的考慮，便是當時關於此方面消息的唯一來源了。爲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可從無數的材料中舉示數例。

據柏林「佛朗克孚日報」駐華訪員報告，中國前任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衞，近來活動之目的，在組織與日本議和之「中國政府」。據稱，接近汪精衞人士承認，汪已與日本方面進行談判，除派代表與北平「臨時政府」磋商外，汪精衞本人並與南京「維新政府」取得接觸，但汪派最有勢力之政客葉公博，極表反對，該彷與甘爲陳之屬僚，使汪精衞計劃，大受打擊。至於汪與日本談判之內容如何，該報並無所載。（廿八年五月廿七日「申報」）

汪精衛左右方面在拉攏教育界，並用秘密小組方法，四下網羅，但無效果。又組織一「人民動員同盟」，號與國民精神總動員，魚目混珠，蠱惑民衆。假設活動費，曾由日方於滬西鹽項下撥給六千元。（廿八年五月廿四日「申報」）

據說，日方仍希圖早日結束戰事，自數月前組織所謂和平救國會失敗後，近又有新計劃，擬由汪精衛發動組織世界和平息戰運動會，其宗旨爲呼籲世界和平，力謀中日親善，藉期誘惑民衆，促進將戰事結束，聞總會將設滬，即由汪任主席，並在平津各國設分會，北平分會內定江朝宗爲會長，天津分會內定靳雲鵬爲會長。其取名爲「世界」二字，乃準備日方在必要時，亦可作國際組織，相爲呼應。並聞前任北大教授之德人洪某，亦允參加，此外將鼓動旅平各國人士參加，該會經費，全由日方供給，預定下月可以成立。（廿八年五月廿五日「申報」）

汪精衛自率領其黨羽自河內潛滬後，其妻陳璧君亦追隨來滬，匿居虹口，有所活動，此種陰謀計劃，至今俱告失敗，汪陳乃於日前偕其爪牙，在日方護衛下，垂頭喪氣，悄然離滬，惟聞將赴海外，則仍在滬活動。（廿八年五月廿五日「申報」）

像這類自相矛盾，顯係出自臆測杜撰的所謂「消息」，在當時的報章材料中，實舉不勝舉。然而在先生一方面，一秉其「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堅毅信心，領導和平建國的運動。

在上海第一次廣播

先生在上海的第一聲，是廿八年七月九日廣播的「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在還以前，先生對於和平運動與中日關係的見解，雖在「豔電」，「答問」，「舉一個例」，一般華僑

君書」，及「重要聲明」各文獻中作過闡明，但親自向國人作空中播音，還是就離重慶，離開河內之後的第一次。在這篇宣言廣播之前，國人還不能確切知道先生是否在上海，在重慶的宣傳攻勢下，一般人更不知道和平運動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因此先生在他的第一次廣播中，就綜合過去和平運動迭次宣言的重要內容，將和平運動與中日關係的前途，作了一次詳細的解釋。

先生在該篇廣播詞中，開宗明義引述國父的遺教謂：「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說明中日兩國在目前亞洲的各自地位與相互關係，解釋中日不應爲敵，只應爲友的必要理由。其間先生曾說明他個人過去爲謀中日爲友，避免兩國關係惡化起見，曾不辭一切反對，先後主張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並締結過淞滬停戰協定與塘沽停戰協定的事實。但他不得不抱憾說：「我的主張，四年之間，並未達到，我絕不諉咎於人，我只自認才力不逮，事與願違而已。」

誰都知道，先生於二十一年以來主持行政院後的對日政策，是完全受蔣介石氏的同意和贊助的，無論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略，或淞滬塘沽兩協定的簽訂，都是在汪蔣合作的形式下成立的。然則而今先生的獨自分道揚鑣，畢竟主張何在呢？在這廣播詞中，我們可看到明白的解釋。

但是我必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就是當時所謂主戰派，試問以一個剛剛復興的中國，來與已經强盛的日本爲敵，戰的結果會怎麼樣？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爲兒戲嗎？

我當初以爲蔣介石先生與我是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蔣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後一篇告誡國人的文字，認爲蔣與我同心，所以誠心誠意來與蔣合作。然而四年之間，我已漸漸的覺得不對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於大病之後，又受了三傷，身體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內，我遠適異國，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才趕了回來，則情形更加大變了。我當時祇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決不可中止，因爲共產黨是只知有第三國際

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秘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讀者可隨時加以覆按。自從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對於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一刻不想著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後最後，方纔於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發表艷電。（「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到廣州去

上面這篇廣播發表後，反對方面即散言先生所說不是由衷之言，而是在淪陷區失掉了自由的被逼說話。事實上在八月初旬，先生確從上海的「越界築路」區到淪陷區的廣東，他的第二故鄉去過。但他並沒有失去自由，他在八月九日在廣州所發的「怎樣實現和平？」的廣播詞中，甚至這樣堅決的說：「我只會死，絕不會失卻自由。不但此也，我時時刻刻準備着以我的生命，換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換取同胞的自由。」尤其是淪陷區的民衆，如喪失了父母的子女一樣，先生認爲更應加以救助。他說：「至於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呢？他們的心神，與前方後方的民衆，是不可分的，不但心神如此，身體也是如此，所謂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他們當然講和平，並且熱烈的追求着怎樣實現和平。」

當時淪陷區的人民，雖然渴望和平，可是多數人認爲這或許是日本方面懈怠抗戰軍心之計，惟先生於廣東會晤該方面日軍安藤最高指揮後，深信只要中國的負責當局與軍事負責任者有贊成和平的表

示，日本軍隊不僅決不會進攻，並且願將已經佔領地的行政，經濟，治安等陸續交還中國。這話在當時雖有人懷疑，但後來的事實，卻是證明先生的預言是正確的。

先生向廣東人民的廣播結論是：

各位同胞，聽到了我這番廣播之後，可以知道我所謂和平，可以實現，而且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不是一種空想，而是早就可以證明的事實。各位同胞，你們不是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啊！你們從前曾經盡了前方後方的責任，忍受了許多的痛苦，許多的犧牲，及至蔣介石將你們丟了之後，還要加你們以種種臟名，恨你們死不盡，燒不光，加你們以種種惡名，好將你們繼續的燒，繼續的逐往死路。蔣介石不是以日本為敵，是以中華民國為敵，是以中華民國的民衆為敵！蔣介石在今日已爲和平之唯一阻礙者，你們只有將這阻礙除去，你們必然能洗刷了種種惡名，而重新做中國復興之柱石，進而做東亞復興之柱石。

各位同胞，我知道我廣播了這一篇講話之後，蔣介石必然又逼迫各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游擊隊的人，羅出聯名通電來攻擊我，但我知道這是無效的。只要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而且可以爲復興之基礎，我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阻礙和平之實現！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沒有一個人能阻礙和平之實現！」的鐵的意志下，先生自廣州回到上海後，即着手黨的再建工作與國府還都的折衝和準備。於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間，在上海愚園路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各地代表二百四十餘人，公推先生爲主席，議決以國民黨黨綱及六全代表大會的反共宣言爲黨的基本政策。此項宣言原文甚長，主要內容的精神，悉根據二十七年四月武漢召

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大會宣言首先重申二十七年四月間武漢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對此次抗戰目的的解釋，說明中國迫不得已出於抗戰的最高要求，仍在獲得正義的和平，此項和平要求的最低內容，爲中國在政治上保持主權及行政的完整；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其言有謂：「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謂和平，乃合於正義之和平，必如是，然後對內得以自立，對外得以共存。」

講到中日關係，大會宣言認爲「在此次不幸之戰爭中，中國固已認識日本國力之强，日本亦認識中國民族意識之盛。抗戰以來，中國失地喪師，然全國人民犧牲之決心，久而彌堅，將士效命，前仆後繼，合於正義之和平一日不達，則抗戰一日不懈。日本於此，自覺其先進國之責任，毅然不以戰勝者自處。去歲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此聲明中歷舉日本所要求於中國者，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三項……除此三項要求之外，歷述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國主權，抑且不吝考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治外法權。日本之爲此聲明，其爲放棄侵略主義，欲與中國謀正義之和平，至爲顯然。日本在戰爭中有此反省，中國亦不可不反省，使正義之和平，得早日實現。」

爲使中日和平關係再建之後作進一步的永遠友好合作起見，大會宣言特重新指出總理遺敎大亞洲主義的重要性，認爲大亞洲主義之理想乃爲中日友好合作的基礎。「總理遺敎關於大亞洲主義之演講，已示其正鵠。中日兩國，無論從何方着想，均宜携手進行，共謀前途發展。中日兩國，當爲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其深切著明，久爲吾人所服膺。前此深維中國若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則無分

担此責任之資格與能力，故不得不先致力於國民革命以求之，乃革命尚未成功，中國之獨立生存已受威脅。今日本既有此聲明，不惟目前之爭可息，歷年以來之糾紛，亦可由此解決；不但對於東亞可與日本攜手，進行世界和平，亦可奠定基礎……」

大會宣言最後指出中國過去抗戰，雖目的純正，然因重慶政權，接受共產黨的策略路線，使抗戰內容頓告變質，在日本聲明立場之後重慶所以發言拒絕者，卽受共黨把持所致，並歷舉事實，認爲此後欲實現中日間合於正義之和平，必須强調反共，從而有仿照日德義防共協定精神之中日防共協定的訂結，確定反共和平建國的總口號。

關於黨的正統問題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完全繼承的國民黨的正統，迄當時爲止，中國國民黨前後共總召開過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從第一次至第六次間，有一次是臨時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係召開於廿四年十二月，當時先生雖因身受重傷未能到會，但五全大會的宣言中，關於中日問題，曾有過和平未至絕望，決不放棄和平，決不輕言犧牲的主張。第六次代表大會照章本應於廿六年召開，惟因中日戰事爆發，所以未得舉行。然在廿七年四月於武漢所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曾明白申述中國此次抗戰的最後目的，仍在爭取合乎正義的和平。所以重慶雖在共黨把持下拒絕日本和平建議，但還行動是違背了黨的重託的，因此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舉行，是完全繼承的國民黨的眞正精神與法統。

不過當時外間有一部份人認爲先生是已經給重慶國民黨開除的黨員，同時黨章規定大會應該在首都舉行，所以認爲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產生是非法的。實則先生既爲國民黨的副總裁，負有執行黨的最高方針的責任，當蔣介石氏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拒絕執行這一責任時，則全部職責，自然非由先生負担不可。關於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合法與承統問題，先生曾先後有過闡釋。其於廿八年九月七日在上海招待歐美記者談話中，曾這樣說道：

各位先生詢問中有云：鄙人係已被開除之黨員，乃以何種權力仍用黨之名義活動？此種詢問，極爲率直，鄙人願率直答覆：其一，中國國民黨最高機關，係全國代表大會，如有違犯大會者，即爲違法。鄙人之和平建議，係依據大會宣言，而當時重慶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不依據大會宣言，則違法之責在重慶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不在鄙人也。其二，中國國民黨係革命黨，平時辦事，固當沿用普通手續，如果有特別大故，則不得已而用特別手段，縱有些不合手續，亦爲革命黨精神所容許。以前如此之例甚多，十六年間，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在武漢，蔣介石在南京，以武漢爲共產黨所刼持，宣佈脫離，另行組織，從事清黨。當時武漢中央黨部予蔣介石以開除黨籍之處分，國民政府明令通緝，然其後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發覺共產黨之陰謀，遂繼續清黨，而與南京合作。十八年間，鄙人以蔣介石在南京個人獨裁，激起內亂，動搖國本，倡言反對。當時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對於鄙人，予以開除黨籍及通緝之處分，鄙人先後在北平組織擴大會議，在廣州組織非常會議，與之對抗，及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事起，蔣介石派人至廣州，謀與鄙人等合作，遂由上海會議解決糾紛，復歸統一，而鄙人遂入南京長行政院。以上兩例最爲顯著。最近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各種決議案，對於此點已加以明白之闡述矣。

重要的措置

在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對中央幹部軍官訓練團所講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之解釋」中，先生對於六全大會的產生經過，更作如下的解釋說：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呢？就是今年八月在上海開的。爲什麼可以在上海開呢？不是黨章規定要在首都所在地不可嗎？這個平時是如此，非常時期就不能以此爲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開，而首都是在重慶，因爲二十六年十二月，國民政府搬去重慶的時候，就明白，這不是遷都，還是一個換地方辦公，因爲打仗的時候，國家的首都，在什麼地方，不能夠同平常一樣，所以這一點，在法理上沒有問題。我們再來看看這宣言內容是怎樣呢？內容跟前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來的，就是剛才所說的話，如果和平條件達不到，我們還是抗戰，如果和平條件辦得到，我們就恢復和平，這是同去年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一線相沿的，各位看看，這宣言裏面，先後銜接，沒有中斷，等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各位看看，連體裁都這一樣的，最先說明白抗戰的目的，後來說到和平條件的達到，後來列舉三民主義以及內政外交教育，說話完全是一貫的。這爲什麼？這也是根據環境來的。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還沒有得到和平的條件，當然還是講抗戰，希望和平，到現在，和平條件已經得到了，我們就要實現和平。這就是說兩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不但沒有矛盾，並且沒有不聯結的。然則現在是那一個遵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定的方針呢？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跟着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而來的，各位如果把兩次的宣言，從頭到尾看一遍就可以明白了。

在六全大會以前，先生是國民黨的副總裁，正總裁是蔣介石氏，此項制度產生自二十七年四月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無非是爲的滿足蔣氏獨裁的願望。因國民黨除國父是總理之外，並不容許他人承用此項榮譽，所以蔣氏遂以總裁制來替代了。現在在六全大會中，議決廢止總裁制而設置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公推先生任之。復因爲確定黨的主權起見，議決凡在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後，因爲中

央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會失去行使職權的自由，故一切決議及命令完全無效。又凡中央黨務機關，在改組以前，暫時令其解散。各省地方黨部，及特別黨部，在改組以前，令其暫時停止活動。六屆大會除承認第五期中央執行委員，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及候補中央監察委員的選任外，復選出新中央委員三十八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名，中央監察委員十六名，同時通電還留於重慶地區的中央執委監委從速集合上海候命。

南京三巨頭會議

先生既於本黨中廢止獨裁意味的總裁制，復進而聯合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和運同志，積極謀新政府的建設，以之實現統一的和平建國運動。其時在南京的維新政府領袖梁鴻志氏，以及北方臨時政府的領袖王克敏氏，對於先生的倡議，均表示熱烈擁護贊同。因此於二十八年九月十九二十兩日，先生特赴南京與王梁二氏作重要會談，結果發表有「九月二十一日聲明」，大意說明自蘆溝橋戰事，國民政府因軍事失敗西遷以來，民衆失所依據，幸王梁兩氏挺身亂離，組府南北，與日本周旋和平，使人民於流離顛沛之際，得所喘息。惟現在和平運動已由國民黨出而領導，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人士，不分派別，冀共赴收拾時局責任。總之，南京三巨頭會議是國府還都的先聲。

然在其間，先生仍渴望重慶作最後覺悟，共同致力和平，故先後有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的篠電，二十九年一月十六日的銑電，可是重慶的答覆是兇毆與暗殺，上海方面和運同志之遭毒手者，日有所聞，在華南方面，先生的外甥沈次高氏，亦於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港殉難，此事對於先生，情感

曾仲鳴死難以來的第二次大打擊。但先生仍抱定「救國殉國，爲吾人之素志，生死毀譽，久置度外，吾人惟有以未死之身，盡可能之努力，以繼死者之志而已」的決心，繼續獻身於和平建國工作。其「沈次高先生行狀」一文，若與「曾仲鳴先生行狀」併讀，就可以看出先生這種決心。

沈次高先生行狀

「自余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呼籲和平通電後，在重慶之共匪及其工具，遂組織殺人公司，斂錢買兇，專以刺殺余及余之同志爲急務，於是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同志林柏生在香港被狙擊幾死，三月二十一日同志曾仲鳴在河內被刺死，其夫人方君璧重傷，並傷其他同志三人；八月二十二日同志沈次高在香港復被刺死。軍興以來，同胞同志爲抗戰而死者，先後相望，至於爲和平而死者，以曾沈兩同志爲嚆矢。中日兩國，義應爲友，不應爲敵，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此爲眞理，久而愈明。爲眞理而死，雖死猶不死，自曾沈兩同志死後，同志益奮發，前仆後繼不絕，曾未踰年，和平運動已大盛於中日兩國之間，蓋不徒將化戰爭爲和平而已，且將本於戰爭所獲得之教訓，於破壞中求建設，盡掃中日兩國間過去之糾紛，重奠將來之基礎，以蘄致於中日共存東亞復興。然則爲和平而死者，其所流之血，實爲沃眞理而發其光華也。嗚呼！是眞所謂死猶不死矣！曾仲鳴同志之死，余曾爲作行狀，今復爲沈次高同志作行狀，余誠不勝後死之愧，余尤以後死爲憂，誠能盡其責，則死猶不死，不能盡其責，則不死之可憂甚於死也。

「沈同志諱崧，廣東番禺人，父諱潄，清學者稱孝芬先生。近數十年，廣東學者皆出於陳蘭甫先生

之門，或親炙或私淑。陳慶笙先生者，簡甫先生之一高第弟子，治經學爲同輩冠，而孝芬先生則慶笙先生之高第弟子也，治史學，尤精四史，好學不倦，老而彌篤，娶汪氏，余第之姐也，生子女共六人，第三子早殤，餘皆長成，且皆能致力於教育，以繼父志。次高行二，幼而穎悟，從父學通經史，既而肄業於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爲高材生，畢業後爲社會服務，刻苦勤勉。余長廣東教育會時，引與共事，時爲民國十年一月也。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余方奉大總統孫先生命赴天津，回至上海有電報至廣州，命次高轉呈孫先生。電報至時，變兵且已作，孫先生脫險出城外登永豐軍艦。事起倉猝，傳聞異詞，變兵且諱言孫先生已遇害。次高置電報懷中，經詣大總統府求得眞消息。既至府已爲亂兵縱火，衛隊悉力拒之。戰方酣槍彈如雨，次高出入其間，爲亂兵以刀傷其背數處，仍不懾，卒偵得孫先生所在，負創登艦，完其使命，孫先生盛稱其勇，撫其背視其創，並口授密令，傳達於余。次高復力疾詣上海，與余偕歸謁孫先生於黃埔軍次，其受知於孫先生自此始也。

「十二年二月孫先生歸廣州，開大元帥府，命次高襄廣州警政，十四年三月孫先生逝世於北京，其年七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東江南路以次克復，命次高爲東江行政委員，整理戰後行政財政，尤有起色。既而繼甘乃光爲南路行政委員。自是以後十餘年間與余戮力艱難險阻，無役不從。

「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戰爭起，十一月杪，余將由南京赴武漢，命次高赴廣州，次高受知於孫先生飫聞大訓，又與余共事，久知余志，雖其平日議論主張，以爲中日不幸出於戰爭，欲謀和平非無其道，然共匪不去，必爲和平之梗，而共匪工具不去，則轉相勾結，必至於淪胥以亡，在廣州見當局國事無能，對於時勢心知其危而不敢有所可否，心竊痛憤，屢以書報余極論之。及二十七年廣州當局棄廣州去，且縱火焚市構殆盡，次高發憤不可制，聞余在重慶數建議，皆被格不得行，乃規余以書曰，吾舅

既知其匪之終不可感格，共匪之工具之終將斷送國家民族而無所恤，乃猶依違其間何也？豈孔子去魯遲其行乎？然則如被髮纓冠之義何？余得書深愧其言，然余之去志亦已決矣。

「及余既離重慶赴河內，開始和平運動，次高則盡其最大之努力，日夜奔走擘畫，寢饋難寧，慨然不以為意。七月九日余在上海廣播，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次高自香港來謂余，旋先赴廣州，余亦於八月九日在廣州廣播實現和平之方法，和平運動至是遂進入一新階段，而羣凶之狙擊，破壞至是亦益亟。知次高謀勇，且於廣東事尤嫻習，必欲死之而後已。八月十五日，余自廣州回上海，次高復至香港，二十二日夜為兇徒數人狙擊於道，傷重遽卒，年僅四十有五，傷哉！夫人張氏能相其夫無予。余既痛次高英年摧折，又無以塞吾老姐之悲，親茲寡弱，尤不可為懷，故久未能執筆詳敘其事。然次高死矣，而其救國精神，凜凜然未嘗死，且無數同志，方以同一精神致同一之努力，務使救國大業，卒底於成，是則余之悲雖無窮，而次高之目亦可稍瞑矣乎，噫！」（廿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先生為了實現他的信念，貫澈他的救國主張的抱負，不惜挺身危險，致其親友爭先蹈後，視死如歸，這種鮮血淋淋的事實，決非一般功利主義的政治家所克為，這不僅證實了先生精神的偉大，且亦必然保證了先生事業的成功。目的純潔，主張光明，而於一己尤勇於犧牲，像這樣一種人物，其能博得衆人的愛戴擁護，自然是沒有疑問的。

第二十章　國府還都

組府還都的意義

自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之後，國民政府的還都問題，當然跟着緊張化起來，尤其九月間先生親自到南京與維新臨時兩政權領袖間舉行折衝以後，組府傳說，一時更甚囂塵上。但在先生之意，和平運動誕生的動機，實在並不在於組府與否，而是以實現眞正的中日和平爲最高目的的。關於這一點，周佛海氏當時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

……汪先生這次所領導的運動，當然不是以組織中央政府的本身爲目的。組織中央政府，不過是和平運動的一個過程，不過是救國的一種方法，組織政府的本身，決不是目的。如果汪先生純是以組織政府爲目的，而不顧及國家的利益，老實說，我們早已上臺了，那裏能等到今天，還在受人家的揣測和懷疑……（「關於組織中央政府」廿八年十二月十日）

這雖然是在青島會議以前說的話，但和平運動的目的不在組府，是很明白的。而且先生本人，在和平運動的初步階段，曾一再表示不願與重慶站在對立的地位，而屢屢籲請過重慶共來談判和平。卽在國府還都既經實現之後，先生於其回憶脫離重慶當時的心理時，仍懷有過這樣的感慨。

當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們幾個人，乘飛機離重慶經昆明到河內的時候，從飛機上，望着重慶街山川

城郭，以次躁躪於鋒鏑鐵蹄，縱數人民愁苦隱痛的聲音顏色，擁權於殺斮，懸想於耳畔，古往今來，生離死別的傷心，大概沒有甚於此的。（「曾仲鳴同志殉國二週年紀念日獻辭」。）

在周佛海氏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慶祝一週年紀念所廣播的「和平運動的發展與途徑」一文中，也說：

組織中央政府，乃是和平運動的一種步驟與手段，他本身並不是目的……但是在我們從重慶出來的時候，並沒有預先決定採取這個步驟和手段。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並不是因爲要另外組織一個政府，纔離開重慶的。我們離開重慶的目的，是在打開僵局，發和平運動，開闢一個途徑……我們當時的目的，是打算由汪先生一面向政府建議，一面向社會提倡，以促成和平……所以當時，萬萬沒有想到要另外組織一個政府……。

這都足以證明另組中央政府，並不是和平運動的目的，和平運動開始之初，對於組府一事是絕未考慮到的。然而在重慶一再拒絕和議之後，尤其是對和平運動的本身採取高壓手段之後，和平運動在考慮實現和平的手段上，才不得不觸及成立中央政府的問題了。現在我們再來看周佛海氏的說明：

……我們的堅決主張和立場，乃是，如果中央政府的樹立，於國家沒有利益，我們情願終生亡命，決不冒失失的隨便上台。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於國有利，我們是不避艱險，不辭危難，要挺起身來，担負這個責任的……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時間，乃是條件問題；如果條件足以救國，我們就立即着手組織，否則，我們是永遠不會組織的，……這乃是汪先生的主張。……（「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和平運動的開始，一如前述，最初是建議性質的，而不是政治鬥爭性質的，但至後來，重慶對於和平運動所取的壓迫態度，終於使和平陣營中不得不考慮採取政治鬥爭的手段，由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而召集中央政治會議，與既存政權進行折衝，並聯絡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最後

爾完成國府還都，使和平運動從在野的身份，進而爲一種國實要際的政治運動。

組府的法統解釋

也許有人認爲和平運動既然不得不進而與抗戰政權的直接形成對立，則就當時的情勢言，可逕即參加既存的政權，不必另起爐灶，更不必襲用原有的政府名稱。此種見解不僅誤會了和平運動的性質，且亦不瞭解政府的法統。蓋如先生所一再解釋的，和平的主張並非少數人的標新立異，而是出於中國國民黨最高會議的決議，因此，爲求和平主張的得以實現，不在於另立新政府，而祇在將原有的政府的政策在新的要求下加以修正，以使之適合於新的政治主張即可。國民政府之所以曰還都而不曰另組新政府或參加既存和平政權者，即由於此種區別。先生於二十九年一月青島會議中與梁鴻志，王克敏兩氏商討解消維新，臨時兩政權時，對於中央政府的法統問題，曾有過非常精確的解說。

中日事變，兩國戰爭，吾人當集中全國力量，以樹立中央政府，而樹立中央政府所首應考慮者，即爲法統問題。

蓋中國如欲樹立全國統一之中央政府，其方法有二：其一爲推翻舊統而另建新法統。此法似近乎革命方式，實行雖並非不可能，但吾人認爲不必要；蓋無論如何，此次事變，由於過去國民政府政策之失當，並非由於政制之不良。故目下收拾時局之目的，在對外求和平，非對內求革命。政策有所失當，自當充分加以修改，政制即有未盡善之處，亦只須適當改正而已足，因吾人並無根本推翻原來法統，徒使惹起混亂之必要也。

其二即承襲舊法統而略事修正之。過去國民政府法制之所以被人非難者，乃由於推動全國政治之中央政治委員會之構成份子，純限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並無黨外人士之參加，致招外界謂爲一黨專政之嫌。去年國

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有鑒於斯，對於制度，曾經決加以改善，在大會宣言中，已表明此旨。由是今後中央政治委員會，已非國民黨一黨獨占，凡各合法政黨及全國賢能之士，均能依法參加，協力籌議政治。此即實施憲政之初步，同時糾正過去政制缺點者也。重慶政權，現爲共黨脅迫，已喪失自由行使職權之能力，至於中央政治會議之決議，將依法加以改組；如能照議執行政務，完成和議，則對於法統政策，已屬毫無缺憾，一方預定於最短期內，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如能實施憲政，正如軌道之既鋪路，當能順適前進，比諸改革政制，徒惹糾紛，豈非計之得乎？

青島會議與高陶事件

青島會議的召開，主要即在根據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容納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志士的精神，聯絡各既存政權並各方和平勢力，共商國府還都大計。此項會議的參加者，除先生，梁鴻志，王克敏三巨頭外，新中央方面有褚民誼，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及舊西北將領劉郁芬將軍。臨時政府方面除王克敏氏外，爲王揖唐，齊燮元。維新政府方面除梁鴻志氏外，爲溫宗堯，陳羣，任援道等。此外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方面，亦派有李守信將軍參加。先生對於青島會談的意義，曾解釋如後。

去歲九月杪，鄙人曾赴南京，與王委員長，梁院長，會議關於收拾時局之辦法，均歸重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第一次會議，已略具端倪，今進而爲第二次之會談，所得結果，頗稱圓滿，蓋中央政治會議之組織，已擬依此而設。此中央政治會議，將由中國國民黨聯合各已成政黨暨全國賢智之士，共同組織，一掃過去參差隔閡之弊，同心協力，以負責收拾時局之責任，並對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之原則予以決定，俾由此產生之中央政府得以根據進行。深信自此以後，全國人民，必能一心一意向此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對外則努力於樹立中日

親善關係，並與各友邦敦睦邦交，對內則努力於戰後建設，修明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則此次青島會談，實可稱為和平運動的一大進步與發展也。（「在青島會談各次談話」。）

青島會談的意義，很明顯的是國府還都的準備。在青島會議中，解決了實現容納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人士的中央政治會議的具體組織問題，這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因為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制，從此給修正了，國民黨在政治建設上原是以領導實現民權政治為目的的，現在就更接近了一步。

青島會議於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召開，至二十六日宣告圓滿結束。但青島會議既是為和平運動進一步成功的表示，反對方面的破壞，自亦隨之而來，高宗武與陶希聖兩人的忽而叛離和平陣營，就是為此。

關於高宗武過去在武漢時奉蔣介石命令辭去亞洲司長，担任與日本接觸的使命一事，本傳以前各章已經提到過。他的參加和平，無非是因為這一點關係，而並不是出於對於和平運動有何堅強的信心。至於陶希聖，是一個沒有主張而失意的文化政客，其為人一如後來先生所判斷的：是「優柔寡斷，搖動失志」，容易為人所煽惑。高陶兩人利用先生待人接物的寬大，自以為已竊得中日和平談判的秘密，急欲出賣之於重慶，因此趁著先生出席青島會談的機會，偷偷跑往香港去了。高陶兩人此去對於和平運動雖毫無損失，但對於先生，這種背信賣友的行為，總不免有幾分難過。高陶在走後所發的電文中，雖有「際此意志迥異之際，未得先生之許可，遽而引離；但至此時止，我等對於一黨的機密，決不向外宣洩，尚希放心，」惟先生仍不無憾然。及至高陶到了香港，發表捏造的中日條約草案，先生更覺情不可遏了。他對於高陶兩人加以評責說。

陶希聖，高宗武皆爲最早參加和平運動之人，惟自去年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鳴同志在河內被刺之後，此二人卽呈怯懦之狀。余在河內曾屢電高宗武往晤，皆不敢往，同志間已不齒其爲人。陶希聖優柔寡斷，搖動失志，與高相同。余因其爲最早參加之同志，故仍曲予優容。及至去年十一月間，余發覺其蹤跡可疑，故關於重要之折衝，已不使其參預。今此二人，竟竊取去年十一月五日，日方在華一部分人士之試擬方案，居爲奇貨，與敵方勾結，是不止怯懦怕死，且易受各種誘惑，自喪人格，實屬卑鄙，殊堪痛恨。惟任何運動中，此等敗類，本不可免，其結果不過淘汰自己而已，於大局無損。余從事和平運動，乃在中國戰敗之際，又在敵方受共匪挾持之際。余愛中國，余深信中國今日除和平則無自救之路，且和平運動，已日由發展而趨於成功。然退一步言之，在此國破家亡之時，欲圖挽救，不可不存自己犧牲之決心。抗戰而失敗，則負抗戰失敗之責任，和平運動而失敗，則負和平運動之責任。決無所容其首鼠兩端，旁徨歧路。余及余之同志，皆決心猛力前進，對於此等中途變節之徒，固極痛心，然只有希望其負責之念，且此等變節份子，懷貳已久，一旦引去，將益見和平運動之純潔而光明也。至於和平方案，最近因中日雙方皆爲兩國百年大計，及東亞前途着想，互相諒解，互相讓步。其結果可使中國得到復興基礎，並可以其能力，分擔東亞和平與秩序之責任，與高陶所發表及附加揑造之文件，大不相同，將來可以事實證明之。（「在青島會談各次談話」。）

「和平宣言」

繼青島會談而上海會議，中央政治會議於三月二十日在南京宣告成立，臨時、維新兩政府，興亞建國運動本部，大民會，中華共和黨等旣成和平團體，亦相繼宣告光榮解消，於三月三十日正式宣告國府還都。先一週前先生曾先後發表「和平宣言」，「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廣播，均爲和平運動最重大的文獻，茲特「和平宣言」全文引錄於左。

「中日兩國無論從何方面着想，均宜攜手協力邁行，共謀兩國親密的發展；」「中日兩國關係當爲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此爲手創中華民國 孫先生之言，同應同志，曾嘗共喻，不幸中日兩國關係，歷年以來，未獲調整，終至戰禍勃發，擾攘迴年。前歲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謂「日本所望於中國者，在能分擔東亞新秩序建設之任務。」並於國會中申述其意旨，謂「日本之真正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不在征服中國而在與中國協力。」並謂「日本認識中國之民族的熱情，承認中國之完成其爲獨立國家，實有必要。」復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列舉所望於中國者爲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並謂日本非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不吝進而考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須之治外法權。日本政府有此聲明以後，中國方面應從知抗戰之不必繼續，和平之必當恢復，尤應深知中日兩國不僅當求消弭目前之戰禍，且進而根本除去過去糾紛之原因，重新確立將來之親善關係，於是和平運動漸次普及於全國。去年八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鄭重宣佈自今以後，易抗戰建國之口號爲和平建國，並鄭重宣佈以反共爲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且鑒於個人獨裁之誤國，憲政實施之不容再緩。復鄭重宣佈，務於最短期間，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使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者，得見之實行。數月以來，與日本朝野，披瀝誠意，根據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原則，使之爲具體的實現，務期兩方交受其益。復與國內各已成政權，各已成政黨暨賢智之士，悉心討論收拾時局之辦法，以一致之決意，爲共同之努力，由是有中央政治會議之組織，中央政府亦將緣是產生。自今以來，舉國人民皆在此統一而有力之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對外調整邦交，對內實施憲政，掃除歷年之糾紛與戰禍，而實現和平與繁榮之新天地矣。關於對內實施憲政，吾人已訂立適合時勢之政綱與政策，務於最短期間完成此使命。關於對外調整邦交，吾人所擬訂之各種具體方案，全部公開，別有所待，惟吾人敢爲實爲國民保證此等方案決不軼出近衛聲明範圍之外，且決不與其原則有所抵觸，於中國之獨立生存無所危害，於第三國在中國之正當權益，不惟無所傷損，且可因中國之和平恢復而得所保障，益其發達。且中國恢復和

爭之後，除與日本當經濟提攜外，並當依據建國方略之實業計劃，容納各國之技術與資本，以求完成中國之建設，致東亞之繁榮，是則和平運動非惟中日之利，亦世界各國之利也。抑有爲國人言者，吾人之和平運動，當從切近方面與遠大方面同時探討。事變以來北平故都南京新都相繼失守，天津上海青島三特別市綏遠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廣東廣西十三省會以次淪陷，將士死者數百萬，人民直接間接死於亂亡者數千萬，此眞宇宙之奇變，神州之浩劫，有史以來未有之禍也。抗戰至今，兩年有半，所失據點，未聞有一處恢復，徒使孑遺之人民，日即於淪胥，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責任深重，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對國家對人民。苟危亡尙有可救，則當身任過，與日本停戰言和，接受可以忍受之條件，以保存尙未耗竭之國力，收拾敗殘，圖謀興復，實爲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應有之責任。誠不可把持權勢，蒙蔽民意，日日以抗戰到底，最後勝利自欺欺人，使國土愈蹙，國力愈耗，終至於不可救藥也。此就切近方面言之也。至於遠大方面，則此次之和平運動，不徒欲消弭目前之戰爭而已，必探求戰爭之原因，解除過去之癥結，重新建立將來之正軌，使中日兩國得向於共存共榮之大道而攜手前進，中日兩國爲東亞之柱石，兩國相安，則東亞和平得所保障，而世界和平亦於以奠定其基礎。是故就切近方面言之，爲救國家民族於將亡，吾人不可不忍辱負重，以從事和平運動，就遠大方面言之，則致中國及東亞於復興，吾人尤當積極努力以從事於和平運動。兆銘服務國民政府，爲中國國民黨之一人，過去心力交瘁，對於不幸之戰事未能防止，及戰事發生以後，又未能挽回，撫躬省疚，日夕不遑，去年以來，竭其忠誠，向黨國同人致其呼籲，乃未蒙嘉納，惟兆銘默察今日全國人民皆希望和平，了無疑義，所懷疑者，特和平之能否實現而已。用是不避艱險，集合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並聯合各已成立政權已成政黨暨賢智之士，同心協力，以負和平運動之責任，務使全國人民所希望之和平得一一實現。茲因中央政治會議組織詢謀僉同，成立有期，爰以和平運動之經過及和平方案之要旨，播告海內，自此以後，中央政府必以實心實力謀和平方案之實現以竟和平運動於成功，所望全國同胞，咸喻此旨，同心同德，以濟此艱

府，並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平方案之實現，更勿遲遲而錯過。救亡復興，實繫於此。血誠歉歉，惟共諒之。（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一件難忘的秘話

先生畢生從事政治事業的堅固信念與其認眞態度，不僅在其一貫的政治生活上與政治言論中可以看出，就在其日常處世待人的行爲中，亦可以得到很多的啓示。國民政府的還都，對於先生及其同志，完全是出於爲國族禍利打算的行動，與私人的利益不僅毫無關係，而且是抱着絕大的犧牲精神的，這誠如周佛海氏曾說過的，國府還都的動機，是因爲：

「前線既然沒有勝利的把握，又沒有議和的準備，我們不能眼看着中國就這樣淪亡下了，而不組織中央政府來負起這個和平的使命了。我們深信組織中央政府，担負和平使命，於國家是有利的。最少的限度，雖實無害。爲甚麼說有利？因爲由汪先生所領導的中央政府來議和，可以得到較好的條件。我們當然知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要憑利害，是不能以對人的好惡爲轉移的，但是人總是感情的動物，感情的作用，並非完全不能影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汪先生這次犧牲一切，挺身出來，爲中國挽救危亡，同時爲日本解決困難，這種偉大的精神，是可以使日本人感動……」（「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周氏謂汪先生這次犧牲一切的精神足以感動和平運動交涉的對手方，是絕對不錯的。至少先生從事和平工作的決心與誠意，確爲日本有識之士所認識。日本大本營陸軍報道部長谷萩那雄華少將，在其最近發表的「論汪精衞氏」一文中，曾講起過一節十分動人的故事，而是有關於先生的偉大人格的。

現在將原文譯出如下。

關於汪精衛氏的人格，我有一件難忘的插話。

這是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時的事，當日典禮平安竣事之後，我們有關各人，承邀往汪主席公館參加慶祝宴會。席間上酒時已溫好了。汪主席舉起酒杯來向衆人說：

「諸位先生，這酒是貴國外務省情報部長須磨彌吉郎先生爲慶祝國府還都特地送來的。在我擔任國府外交部長的時代，須磨先生是日本駐南京的總領事，所以曾有過種種交涉。此次國府還都，須磨先生非常高興，特地將自己故鄉秋田縣大平山地方的有名的銘酒選送了來。因此今天請大家爲酬須磨先生的好意，一起來喝一盃。酒預先開好溫了，請乾一盃。」

說畢，主席舉起了酒盃。我們也把盃子送到嘴邊，可是這酒已經變了味，不能喝了。其時不知有誰說酒壞了，更有人說是毒酒。聽到的人，都臉色變了，有吐出酒來的，有丟掉的，鬧成一片。恰巧在還都前不久，現任內閣情報局的第三部長任南京總領事之際，在維新政府梁鴻志，陳群，任援道，高冠吾諸氏的某次宴會上，發生過因僕人在酒中下毒藥，而使外務省書記生兩名喪亡，一人受傷進醫院的事故。所以當時大家的驚慌，不是全無來由的。

可是汪主席卻說：「總之，是須磨先生的好意……」，舉起盃來，一人一飲而盡。我看見之後，馬上舉起自己的酒盃來，也喝乾了，主席連忙，「呀，谷萩先生，你……」以神情十分感激的眼光望着我這樣說。我也響應說：「主席的心理，我是明白的。」

要之，汪主席是認爲祇要是出於好意，那怕就是毒酒，在禮儀上亦當飲之的。對於中日國交，只要是出諸好意，眞心與愛，則不論有多少困難，甚至犧牲己身，亦願挺身爲之，這就是汪主席的爲人。（見十九卷七號村本「富士」雜誌。）

一貫的革命精神

關於先生過去六十年間的政治事業，本傳至此暫告一結束。筆者在本傳「代序」中早已說過，傳記文學中最優秀的，當莫若自傳。但傳記文學成立的條件，却不單限於自傳。一般說來，傳記的意義，是在將偉大人物的生活樹立在其餘人類的面前，好使他們的德行垂範千秋，他們的缺點使人永久警惕。但一個人的善與惡，却不一定限於某一個人的本身才能知道，事實上一個人想完全知道自己，敢於透視自己的性格與行爲的優劣，並不易做。同時，一個人的所以成爲偉大，是因爲他有着與衆卓異的性格，曾締造過與衆不同的偉業，所以單拿自我爲對象，並不足以言偉大；偉大一定要有羣與社會的背景。自傳以外的傳記文學所以得告成立，就是根據於這一點。

先生在其早年發表的一篇「自述」短文中，曾說過：「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講和論說，當做自傳，是最眞實的，不必另外再作自傳了。」他的演講和論說，無疑就是他的思想與事業表現的一面，所以他才這樣說的。而本傳的特質，亦唯在儘量從先生自己的言論與事業中，去刻劃出一個時代巨人的造像。誠然，傳記的執筆者與被傳人間，一般都不能不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但在本傳的場合，這種關係僅及於先生的文章與事業史實而已。此點就人物傳記應有的親切味言，也許不免是一種缺點，但其眞實性則亦因此賴以相當保存。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國府還都，先生時年已五十有八，離其最初參加革命生涯，已三十餘年。當其初以身許革命時，曾以不畏死，不憚煩的精神，喩革命事業爲釜爲薪，其言有謂：「是故不畏死之

勇、德之烈者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為飯，盛之以釜，爇之以薪，薪之始然，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即成煨燼，然體質雖毀，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為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煎，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為薪乎，抑以身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蘇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啼饑而待哺者也，革命黨人以身為薪，或以身為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人共饗之。」（見「革命之決心」。）這幾句話雖時隔將四十年，但恐怕依舊是今日先生事業與精神的最基本所在。先生於民國三十二年六十生辰時曾有一首詩作，尤足為此種精神的解釋。詩：

六十年無一事成　不須悲慨不須驚　尚存一息人間世　種種還如今日生

晚年的心境

這裏所表現的心情，雖較「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時代來顯得蒼涼些，但恐怕是由於年齡的成份關係多，而由於精神的關係少。在人生道上他雖迭經風波，但他的精神，今昔依舊，抑可信然。惟年來先生憂國傷世，內心彌多感觸，則亦為事實。且隨便看他幾首晚年之作。

稍殘精力但長吁，臥看雲波日影徂。國勢急於駒下坂，世程猶似蟻穿珠。差猶未得三年艾，拚落徒懸五石瓠。榜枻正逢明月上，枝頭烏鵲莫驚呼。

齋武鐙火懼對諸，一病因循久斷書。開笑從新歲已改，氣回爛柳復何如。粉閨鍋淌學耕爛，敢望豚蹄得滿篝

掣。夜半打窗風雨急，有人臨閣墨淋漓。（病中作）

茫茫原野。正春深夏淺。芳菲滿目。蕩得新亭千斛淚。不向風前揮灑。道碧波皆。浮青萬頃。煙雨暗清巖。滿懷如許。天涯只在茅屋。

堪嘆古往今來。無窮人事。幻此滄桑局。浮似大江流日夜。淚浪重重相逐。劫後殘灰。戰餘殘骨。一例付消磨。鵑啼血盡。花開猶照空谷。（百字令——春暮郊行）

一卷殘編在短檠，思親懷友淚同傾。百年鼎鼎行將半，孤影蕭蕭只自驚。人事蹉跎成後死，夢魂勞苦若平生。風濤終夜喧庭樹，縱把心光對月明。（先太夫人秋燈課讀圖，亡友廖仲愷曾爲題詞，秋夜展讀，泫然賦此。）

把酒長亭杯已空，行人車馬各西東。楓林不共斜陽去，自向荒郊寂寞紅。（送別）

小聚秋聲裏。近黃昏籬花搖瞑。庭柯影碎。殘葉辭枝良未忍。耿耿護林心事。正鳴咽風蕭易水。三十之年真電掣。嘆當日相對渾如寐。誰與攬。澄清轡。故客了平生志。早一抔黃花埋葬。心魂相倚。爲問當時存者幾。落落一人而已。又鬢髮星星如此。賸水殘山嗟滿目。相逢勿下新亭淚。爲歡投筆。便斷指。（金縷曲）

這最後一首詞，是先生於民國三十年夏訪問日本時作的。當時日本志士宮崎滔天的夫人，以民報時代的照片見贈，先生有感而作。先生於此詞自跋云：「六月二十二日余訪問日本於東京，晤宮崎夫人，承以民報時代照片見贈，識丙午之秋革命軍在萍瀏醴陵失敗後，余時偕黃克強赴廣東謀再舉；行前一日，在民報社庭園內所攝，倚樹而坐者爲克強，余立其後，宮崎夫人之姐氏在余之左，林時塽在余之右，再右爲晉易，爲章太炎，爲何天炯，凡七人，今存者余一人而已，把覽之餘，萬感交集，爲題金縷曲一闋於下端，護林殘葉忍辭枝時爲詩句，斷指謂黃克強也。」

先生是大革命家，是偉大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個大文學者，這一點無論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爲罕見。先生的政治演講和論文，字句清醒而富有魄力。普通人都知道先生的隨口一篇演講，錄下來就是絕好的一篇文章，加以思想正確，認識清楚，對於中國現代的政治文献，貢獻極多。而先生長於國學，於古文詩詞，尤爲擅長。其早歲「廖仲愷先生傳略」，「朱執信先生傳略」，「烈女黎君墓記」諸作，曾一時傳誦。尤其詩詞方面，如本傳中所隨時引錄者，不僅清詞麗句，且多獨到豐富的思想，與一般詩作有所不同。

圓滿的家庭

先生夫婦間伉儷之情彌篤，自北京獄中時代的「金縷曲」以來，即在騷人間傳爲佳話。至今白髮偕首，情愛日將。因爲他們的結合，如本傳第三四章中所已述的，不是僅寄托於感情，且具有共同的事業基礎。年來先生夫人專心注力於撫養孤兒與教育事業，先生女公子亦參加其間，以協助先生的建國工作。在先生早年詩作中，頗多夫婦唱和之作，像「小休集」中的「西伯利亞道中寄冰如」，「冰如薄遊北京賦此寄之」，「舟次檳榔嶼寄冰如」，「嘯行山中書所見寄冰如」，「初夏即事寄冰如」，以及「掃葉集」中的「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諸作，均足啓謝先生夫婦間的和諧美滿感情。

民國三十年五月，陳母衛太夫人八秩開三榮慶，先生夫婦曾有佳作謂：

今歲吾母壽辰，諸兒女孫曾謀有以娛親者。吾母之明德懿行，化道於家庭，貢獻于民國。斯歲所與我們偕

親一文，已述其略。每年以來，吾母憂國家之多難，民生之憔悴，勤宣佛號，禱求和平至誠懇，感之而發爲，然則不此慈以作小詩，俾家人歌以侑觴，儻亦吾母所欣然而樂之者也。

横越萬重山　秀出梅菜寺　鄉我海色闊　佛光浩無漠　林巒競以明　海水清以深

日月揭其輝　照見慈母心　母心如佛心　欲度衆生厄　智慧用蓮花　光明生貝葉

良辰值清和　華滿舊母歌　弘此聖善心　萬物皆猶趣　佇看楊枝水　滴滴成天河

甲兵法務遠　佛光慈領背　經膝有梁會　恐韓同儀健　願母進一觴　長使采顏駐

中華民國三十年歲次辛巳四月廿一日女兒璧君子婿兆銘同敬祝

在此頗可以看出先生家庭中的融樂空氣，而陳璧君女士的「我的母親」一文，於先生家庭及彼等早年獻身革命的經過，均有簡述，茲一併引錄於后。

我母姓衞氏，名月朗，生於番禺之瀝滘鄉，適吾父時，年僅及笄耳，吾父方營工商業於南洋檳榔嶼，足跡所及，尤在當檳太平爲多。判植初闢，其自奉之儉，與胼手胝足之勞，有非今日南洋僑胞享守成之業所能喻者。而吾母躬親井臼，積累所入，以爲兒女教養之資。其拮据辛茶之狀，亦非今日婦女社會所能想像也。父治種植業沿濱，壯歲勞苦，中年以後，始漸寬裕，遂巨富於檳榔嶼，吾兄弟姊妹藉父母之蔭庇，亦得以從容自力於學，而吾自與精衞相見於吳世榮君之家園圖，遂往還談革命，加入中國同盟會，至新加坡謁總理孫先生，其初慮禍及家門，殊不敢以告父母，旣而察我已明瞭有志節，且事不可終秘，乃具以告，備受譴責，而吾母乃欣然讚留余從至新加坡謁總理，且毅然同盟焉。總理當時以吾精衞與吾革命計劃有所需，吾母復與衆籌其力以供，適自湖南萍鄉之役以後，革命屢起屢蹶，精衞感無以對惟犧牲之可言，乃與余及黃復生、方君瑛、黎仲實、喻雲紀，黃復生等潛入北京，謀於清廷根本之地，爲非常之舉，以震動天下之人心，雖所費遇鉅，然所出，而爲事

至矜，不能以醫資，竊之同志，吾母知余乖將發，乃典質衣飾以足其數，吾病乃得成行。天下慈母之心，目擊其所生及愛如所生之人，均將入萬死之地，不阻其行且復有以成其志，如吾母者，似非慈之一字足以形容也。卅年來吾黨數人中如喻雲紀，黎仲實，方君瑛氏先後逝世，實存者亦四十五十垂垂將老，吾母則年近古稀，雙鬢白，幸猶得清健，而皈依佛理，老而彌篤，誦佛經隊，恒飼以爲樂，吾竊於佛其究其之源，既念及吾母等，及其卅年將於國事之憂心悄悄，以其對於我黨殉難烈士之神魂安靜，誠有朝夕定省祈禱其萬一者，則亦仍惟時懷思古人發志之誦，以吾兼所以教吾曹者，教吾兒女，俾其將來有以發國民之天職，而慰萬之心，無多餘言。中國文化教育館將編吾的母親一書，徵文於余，聊寫此文以貽之。偶記吾母壽誕將近，爾爾之辭，聊之堂上，以符祝嘏備修之意云爾。民國廿四年歲次乙亥四月。陳璧君撰。

日常生活

在結束本傳之前，我們頗思將先生晚近的日常生活作一簡單的描寫，惜筆者個人於此方面鮮有所知，且本傳雖係人物傳，主要內容還是着重在以先生人物爲中心，而展開一幅民國革命奮鬥史的縮圖。惟爲備具一格起見，仍從可靠的文獻中，約略介紹先生日常生活的情形於讀者之前。引文爲日本學者太田宇之助氏不久前訪問先生時的對談一節，是專門關於日常生活的。

太田　閣下的日常生活，雖說非常守例。大體如何，請見談。

先生　朝晨六點半鐘起身，夜上十一時至十一時半間一定得睡了。這是因爲過去病時熟照醫生的囑咐。朝起後約間散一小時，其間因須用早餐，所以散步也不過限於食後的五分鐘。此後午前有會議，午後要會客，晚上整理白天的事，或寫信。完畢之後，方始得着晉齊。但實在也沒有甚麼空暇。若午前會議結束得早，午後會

客時間不長，間或也想看看書，但現狀卻往往不許照希望。

在事變前，每天總要在中山門外作一小時光景的散步，但現在因為要警戒甚麼，也就不很方便了……

太田 不過在園子裏散散步……

先生 在這園庭裏，我想，祇是似乎感到地方太狹了。

太田 每天作體操或運動嗎？

先生 以前是每月體操的，自從受傷之後，因心臟衰弱關係，受醫生之勸，就很少再做了。據醫生診察，似乎裏面有甚麼雜音，也不明是甚麼病……

太田 換換氣氛，這方法不知又如何……

先生 維持健康的方法，在中飯後有半小時的休息。要不要這半小時休息，就很感疲倦。一經休息，疲憊就消失了。

太田 夜上睡得好嗎？

先生 這像剛才說的。健康與熟睡大有關係，無論怎樣忙，總還能睡。在貴國有人問起這事，我也同樣答覆。即在非常煩悶之時，想睡也就睡了。

太田 喝酒嗎？

先生 極少……

太田 但據聞從前很能喝的……

先生 也只跟朋友相聚之時，才喝一些，現在卻不能像從前那樣喝了。從前喝十杯，現在祇能喝兩杯光景。

太田 十杯想……

先生 （微笑）每日少許喝一些酒，是幫助消化的意味，對於糖尿病似乎也有好處。

太田　閣下喜歡喝中國酒，日本酒，還是外國酒？

先生　都喜歡，祇是加砂糖的就不喜喝。

太田　平常一般人喝時……

先生　在大東亞戰爭開始之前，法國的葡萄酒還便宜，且不濃烈，所以很喜喝。

太田　據聞先生沒有甚麼娛樂，但總得……

先生　過去就是散步，現在就不成了。

太田　呼吸新鮮空氣，還是作一些詩吧？

先生　詩是很難的……還是寫文章容易。不過作詩也是解悶一法。

太田　閣下好攝影，是嗎？

先生　呀，技術拙劣得很哪。

太田　閣下青年時代潛隱北京時，不是開過照相館嗎？

先生　那時同黎仲實，黃復生，陳璧君三人開過照相館，只是當真能夠拍照的只有仲實一人。他是千葉醫學出身，還弄火藥。

太田　火藥的話，豈不是……

先生　誠然。他後來作了七十二烈士之一，為殉國的一人。

太田　那麼在娛樂方面閣下很寂寞啊。

先生　我雖然也受過新式教育，但在日本忙着用功，在歐洲時，還是在這方面忙着，沒有餘暇做音樂等藝術，跳舞也沒有學過。

太田　有看電影的機會嗎？

先生　有的，最近關東方面的同志送了一架放映機，有好片子的時候，就在家裏一星期放一二次。東亞戰爭之後，曾看過日本的二三張好片子。

太田　是些甚麼片子？

先生　大都關於戰爭的。……現在倒很想看看日本方面非關戰爭的東西，有甚麼好的呢？

太田　最近日本電影也有幾部好的，未嘗都出來，還待你講賞吧。

先生　這謝謝了。

太田　不久前衣笠貞之助從滬曾經來過，您聽說過嗎？

先生　從林柏生處聽說過，但沒有會見。

太田　我在莫斯科時曾見過他，現在相隔已十幾年了，他計劃的和平電影，規模非常大，他在日本也是最優秀的導演，一定能夠製出好東西。

太田　講到詩的話，曾仲鳴先生所集的閣下詩集，其題名何由？

先生　「雙照樓」的文字，是取諸杜甫的詩詞（先生一面講吟，一面寫在紙上，一行行講這首詩歌。）

今夜鄜州月　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　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　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　雙照淚痕乾

這是杜甫在鄜州的鄉下，想憶在長安妻子而作的詩，是述懷的[illegible]之篇。

太田　閣下是最喜歡杜甫的嗎。

先生　李，杜都喜歡。

太田　日本詩也看嗎？

先生　都讀的。

太田　主要是誰的作品？

先生　維新時代的特別喜讀吉田松陰和乃木將軍的東西。現在在南京的今關天彭先生的詩，也是很好的。日本的和歌就很難懂，若有人譯出來就很有趣。俳句也是一樣。

太田　最近閣下又出了詩集……

先生　就在舊作中加入些新作，請黃先生代為出版了。若還有，就奉贈一部。（說着老翁語・命人取書來。）

太田　在為時局憂悶，或心中鬱積之時，寄托詩詞，是很有意義的，如閣下能寫對日本方面的人物有所啓示，務希不時作適當的發揮。

先生　我的詩只是小休之作，決不滲入這樣的意味，我的詩決無這種效用。（譯文引自卅二年元旦「新中國報」）

最後一章　巨星的殞落

在拙著「汪精衛先生傳」第二十章中述及先生晚年的心境時，筆者曾經這樣說過：「在人生道上他雖歷經風波，但他的精神，今昔依舊，卻可信然。惟年來先生憂國傷世，內心獨多感觸，則亦爲事實……」當時並恭錄了幾首先生的晚年詩作，如其「病中作」，「金縷曲」，「春暮郊行」諸作，頗多表現先生旰食憂勤，不辭勞瘁，而不無感慨的心情。語云憂能傷身，先生爲救拔國族出於泥淖，從破碎中躋上復興之路，在過去數年中，確可謂已至心力交瘁之境。加以先生因青年時代即奔走革命，患有宿疾（糖尿症），尤其自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國民黨六中全會會場遇狙者暗算身受三槍創傷之後，因當時未能將子彈完全取出，所以近十年以來，外創內傷，時常併發，而影響於先生健康者至巨。先生左右，本屢建議先生早作根本治療之計，但以當時先生領導國政，操心危而慮患深，竟未遑顧及一己健康。這種以身獻國的精神，原爲先生投身革命以來，早已抱定之宗旨。然至民國卅二年八月，因連續數月間往返京滬，東渡日本參加會議演講，並視察清鄉，治軍勤政，其積年宿病，竟至併發。

在卅二年八月間，先生感其背部胸部及兩脇同時發痛，初未十分注意，以爲季節現象。迨至同年冬，因痛苦甚於平日，脇痛亦隨之加劇。至此先生幹部同志及其日本友人，咸深爲關念，一致主張根本治療，乃由日本當局推薦名醫，專心診治。檢查體格結果，均認爲與背部留彈有關。旋國民政府當局即商請日本名醫　經日本陸軍醫院繼續診查，更斷定爲背彈影響所致，遂決定施行手術。於同年

十一月十九日晨由日本軍醫後藤部隊長親自擔任手術，達卅分鐘即將八年來留於先生背部之子彈取出。當時經過良好，原則短時間即可復原。繼外科手術之後，復進以內科調治，健康日見進步。

但先生在國內療病時間，雖遵照醫生之囑，臥病在牀，惟於裁決國務，訓示賓客，擬發函電，曾未稍息。因此傷口雖平而寒熱時發。至卅三年一月間，又染感冒，繼而發生壓迫性之脊髓痛，復經延醫診治，遂認先生須輕視國政，未免過勞，亟宜易地休養，再加診斷。結果遂循醫請，於卅三年三月三日出國就醫於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由彼邦醫學界最高權威之專家數人悉心診治，復施手術，經過亦極良好，當時國內傳聞先生政躬日見康復，莫不表示慶賀。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在中國國民心目中，無論政見若何，無不承認先生人格之偉大與精神之赤誠，尤其對於先生領導下之和平區域人民，在「人存政舉」，「得人者昌」的心理下，期盼先生政躬康復，更逾萬分。

但不幸先生在日療養時期，因年齡與病狀關係，病況時見進退，至本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間，熱度頻見增加，惟大體上尚見良好。但為防止肺炎及急性心臟衰弱起見，醫家已予特別注意，迨至十一月十日上午六時，病況突變，熱度高至四十度六分，脈搏增至一百卅八次，食慾全無，呼吸困難，漸入危篤狀態。脊椎及骨盤部經前後七次X光施治，背腰疼痛，略見減輕，食慾亦漸增，但終因臥牀日久，年齡已高，全身衰弱殊甚，脈搏達九十次至一百十次。加以因背部疼痛及咳嗽關係，睡眠頗受影響。凡此均為診治上不易之原因，雖經運用現代科學之能事，終於挽天乏術，在卅三年十一月十日中時以六十二歲之高齡宣告辭世。

先生噩耗抵達中國後，國民政府宣傳部於十一月十二日發表公報如下：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時，國民政府　汪主席，病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時，在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逝世，距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巳時，享壽六十有二，謹於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遺體回國成殮，擇期舉行國葬，飾終典禮，由國民政府會同中央黨部組織哀典委員會敬謹辦理。

先生噩耗發表後，舉國哀悼，薄海同悲，除由國民政府會同中央黨部成立哀典委員會主持一切外，先生靈櫬，於十二日下午五時卅分由日恭迎抵京，遺體係由先生夫人及男女公子汪孟晉汪文惺汪文彬等，同乘先生生前專用之海鶼號飛機護送回來，在首都上空迴繞一週後，始徐徐降落機場。靈櫬在中央委員及國府各院部會文武長官及各友邦軍政長官外交使節恭迎之下，由先生生前最親信之同志陳代主席公博領導昇櫬人員恭扶靈櫬下機，護送至國民政府大禮堂。

先生逝世消息公表後，全國同聲哀悼，並下半旗一月，停止宴會娛樂，各友邦元首及各國外交使官，軍政長官，均紛紛弔唁。並由國民政府明令國葬，極盡身後哀榮。

惟關於國葬一事，先生生前曾有遺言，不願國葬。良以先生自以身許黨國，個人生死，早置度外，自與民元銀錠橋畔效博浪一擊，以逮民廿七年冬艷電登高一呼，其為國為民之一片赤忱，早為世人所共知，身後哀榮，非其所計。對於勞民傷財之一切措置，尤非先生愛民若赤之心理所願接受，且先生於辛亥革命初期，曾與革命同志數人，於廣州白雲山麓合購葬地七畝，相約以此地為革命成仁後共同埋身之所，然不幸此數同志均已先後去世，先生哀傷之餘，以此數同志有生之日既係同革命而生，縱不能為革命而同死，死後亦必與之魂歸一處，借此宿願。先生生前並遺言謂：墓傍僅植梅花數株，

墓碑僅署汪精衛之墓數字，務求簡潔而不擾民，於願已足「此實為先生愛國愛民之一貫初衷。更因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六日朱培德上將逝世，中央對於國葬問題，一時衆議紛紜，莫衷一是。會議之後，先生卽書就一紙，授其摯友，表示此種意向，當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於討論及先生國葬問題時，先生夫人陳璧君女士，卽藏先生遺旨提出報告。但當局因鑒於先生勳在黨國，全國人民，全黨同志，固深愛戴，哀榮之典，乃國家崇德最後之表示，爲上遵國法，下順民情，故仍一致決議追認國府之國葬明令。惟同時因時値非常，爲恪遵先生不勞民，不傷財之遺訓起見，決定一切力避糜費，求其簡肅，在全國統一未告成立之前，先行擇定　國父陵園之梅花山舉行葬典。

先生對於死後的哀榮，本一向不加重視。早在庚戌艱難時期前後，先生於其致胡漢民及南洋同志書中，卽有警謂：「……復念世人性質，好崇拜死人，而批評生人，此風大不可長。」復於其與胡漢民氏論辯書中，表明其生死的意旨謂：「凡爲黨事而致死者，皆可云死得其正。」總之，自先生投身革命事業以來，早置個人一已的生死於度外，更無所謂身後的世俗。先生於其早年發表的「革命的決心」一文中，卽揭示其對革命事業的獻身精神謂：

「一曰不畏死，人情莫不樂生而惡死，以生之有可戀也。若夫惻隱之心所迫，則接於目者於耳者，皆顛連無告者之憂傷憔悴之色，與其呻吟之聲，既不忍於旁觀，又不能拯之出於水火，吾何爲生於世乎？則轉覺生之可厭，而未見其可戀也。夫以生爲可厭，則其不畏死無難矣。然人情莫不戀其所親，吾人於此，豈獨無所戀乎！顧天下人之愛其親，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親，而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親乎？吾於家庭之際，吾將

言也，然而天下人，其遭際之難同於我，或什百千萬於我者，則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愛親之心，拼而合於愛同胞之心，而死志決矣。自以力之微，無以致其愛於同胞，又無以致其愛於親也。以一死絕其愛焉，而於其將死猶未忘同胞，又未忘其親也。於此知愛親之心，與愛同胞之心，實爲一物，而無間於公私，卽純然惻隱之心是也。

二曰不憚煩，志於革命者，以死爲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責，故未死者之責任，不可以不重也。常人樂生而惡死，哲人反之，則惡生而樂死。其所以惡生而樂死者，以憚煩故耳。世之昏濁甚矣，陽明有言：「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嫉惡；妒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人情之險巇若此，孤潔之士，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絕人逃世，同其身於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以自殺。其次則險譎之士，操老子之術，以柔制剛，以靜制動，顚倒一世之人，而巧於自全。又其次則爲鄉愿，同流合汙，閹然以媚於世。夫老氏之徒與鄉愿，皆習知人之情僞，以巧立於不敗之地，其爲自私自利無足論；至於絕人逃世者，迹則高矣，然推其用心，由於憚煩，是亦自私自利也。而其自私自利之見所由生，在於未充其惻隱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惻隱之心者，則必不爲一己計，而

爲衆人計。目擊天下之紛紛藉藉，禍亂相尋，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當其際，而無所卸。即令所接者無所往而非險陰之人，所處者無所往而非陰鬱之境，而其至誠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閒，憂患雖深，不改其度，事變之來，不失其守。陽明所謂言語正到快意時，截然能忍默，意氣正到發揚時，翕然能收斂，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廓然能消化，非天下大勇者不能，蓋親於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應萬變而不窮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爲飯，盛之以釜，蒸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即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遜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爲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煮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爲薪乎，抑以身爲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蘇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饑啼而待哺者也。革命黨人以身爲薪，或以身爲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人共饗之。（「汪精衛集」卷一，「革命之決心」。）

綜觀先生一生，就是此不畏死，不憚煩的兩大革命精神的實行者。論不畏死，自銀錠橋謀炸以來，畢先生一生，其個人生命所經嘗之危險，實不可以數計，即此次終於回天無術之直接遠因，豈非由於先生欲貫澈其政治主張，而於民國廿四年遭人暗算創傷所致，然僅僅不畏死，尚不足以全部說明先生之偉大精神，而其眞正偉大處，尤在不憚一切阻礙艱難而實行其救國救民之革命大精神，所謂不畏憚煩是也。

就中國國民革命歷史言，先生實爲繼　國父之後之第一偉人。縱先生一生，中國政治之波折，變幻萬端，莫能指數，唯有先生始終爲其中流砥柱，其堅强不屈，爲貫澈信念而勇往直前之精神與魄力，無論先生之友友敵敵，要均不能否認。先生自二十二歲青年時代加入同盟會以來，四十年間，爲國族奮鬥實未嘗間歇。這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單就其堅强的意志與不屈的信念言，應稱一代大偉人。而先生之從事政治，其非出於個人利己之動機，不僅在生前有無數事實證明，縱在生前尚有許多爲人誤解或曲解之處點，但從今日先生之死，其浩然對天之精神，當能獲普世良知之士所共默認。

筆者在拙著「汪精衛先生傳」代序「歷史與人物」一文中，曾這樣說過幾句話：「汪先生的偉大不在他自成那一家，而在乎先生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中一位典型的經綸人物，由先生領往並現在繼續爲中國奮鬥的事實言，其在現代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是已經確定了的。就一個尚存的時代人物言，方今先生正是各方面毀譽的集中點，但時代的毀譽不足爲一代偉人的歷史評價，一代偉人的評價是其畢生的事業。人格與歷史的綜合，就是偉人所以成爲偉人的基本條件。先生自當年銀錠橋邊效博浪一擊震驚，隨登高一呼，其爲中國奮鬥，其爲民族犧牲的事業與精神，無論毀之者或譽之者，總不能加以抹殺。

不能抹殺的歷史事實，配合不能抹殺的人格精神，就是構成一代偉人所以爲偉人的基礎。先生雖不是純粹的思想家或文學家，但却是現代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位偉大的鬥士。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等等，其所以偉大，無非因其對於人類文明史的貢獻。但一位偉大的革命鬥士，爲國家獨立與民族生存的鬥士，他的偉大，除了間接保衛文明外，更會有保衛國族生命的現實意義。說先生是中國現代的革命思想家，則先生除了是三民主義思想的繼承者外，更是其執行者；說先生是當代的一位文學家

或詩人，則先生除了道德文章燦爛之外，還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實踐者。……」

現在先生已死，但筆者自信以上的說話，猶不失爲先生一生偉大精神的客觀評價。誠然，也許有人批評，謂先生爲國家民族奮鬥的精神固屬無可疑，但其畢生信念，仍未完全貫澈。現在中國仍未脫離危險時期，先生所領導的事業，亦未達完成之境。然而此種質問，不僅未能絲毫有損先生的崇高精神，且益發襯托了其偉大。何則，蓋革命救國事業，原爲個個國民共具之天職，以中國近百年來所處環境之痛苦，所受壓迫之深刻，革命救國事業之艱苦困難，原在意料之中，而先生獨能以其不屈不撓之奮鬥精神，捨其身而獻身革命。縱先生未能目睹其手創事業之全部完成，但其已爲有志後繼之士開闢了一條滿本的大道，實屬毫無可疑。而先生爲革命救國而獻身的偉大人格，則更由其今日間接直接致死的原因而得證實。先生雖死，其精神將永壽民間，其事業將永耀青史，乃屬確定不移之事實，我們雖痛先生不能克享期頤，壽臻耄耋，而使中國失去一殷痛感切要的領袖人物，惟中國因有先生其人，而啓國家危亡以一線光芒者，已深堪慶幸。所望於國民者，唯能繼承先生之遺志，與其崇高偉大之精神，繼續爲國族奮鬥不息，以慰先生在天之靈。

汪精衛先生年譜

汪兆銘，字季新，一字桂辛，號精衛。祖居婺源，後遷山陰。父省齋公，諱琡，幕遊於粵，始著籍爲番禺人。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癸未（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一歲。

夏曆三月二十八日巳時先生生於廣東三水縣署，時省齋公方遊幕三水，先生生時年已六十有二，省齋公初娶浙省盧氏女爲室，舉一男三女，後病故，續娶汪母吳太夫人，共生三男三女，先生列最幼。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乙未（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十三歲。汪母吳太夫人在廣東省城豪賢街寓所病歿。享年四十四歲。先生幼年得母教極多，後年曾有秋庭晨課圖之作以記其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丙申（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十四歲。

夏曆九月初八日省齋公在省城豪賢街寓所逝世，享壽七十四歲。省齋公平時對先生極爲鍾愛。每親自爲之課業。先生嘗謂其一生國學根基，得庭訓之益甚多。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丁酉（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五歲。

先生隨長兄憬吾諱兆鏞客居粵北樂昌縣，重陽節登城西北之西石巖，先生作有「重九遊西石巖」

詩，爲其詩作之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十六歲。

先生家本貧，省齋公年七十高齡倚親營家業，後賴長兄維持，自省齋公逝世後，先生深感有分任家庭負担必要，遂爲私塾教習，每月所入僅十元。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三年己亥（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七歲。

先生在樂昌從番禺章禕軒（琭）讀。致力文史經世之學。章氏嘗從陳蘭甫（澧）遊。先生三兄叔和諱兆鈞之外舅也。先生爲應制文字，時樂昌縣訓導雲達曉青，文昌縣人，見先生文，謂其文氣磅礴縱橫，評爲偉器。是年叔和病歿，時年二十二歲。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一年辛丑（一九〇一年）十九歲。

先生由樂昌縣遷廣東省城，隨二兄仲器諱兆鋐居。同應番禺縣試。縣令太倉錢鐵如（溯耆）閱其文，置第一，仲器第三。及啓彌封，知爲兄弟。終試，以仲器與兄易。縣有禺山書院，月課士以文藝，錢令得先生卷，優異之，數召見。及府試，廣州知府龔仙舟（心湛）將先生拔置第一。旋受知於學使歸安朱祖謀。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聞先生名，延爲西席。是年仲器歿，時年二十四歲。兩嫂一孤煢，即恃先生所得脩火以度日。時先生感國勢日危，亟思挽救。爰與古應芬，杜之秋，朱大符，李文範，胡毅生及其姪祖澤道源，在廣州豪賢街西堂書院，組織羣益學院，講求實學，互相策勵。

中華民國紀元前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二十一歲。

是年廣東當局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費生，先生應考及格。旋即渡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肄業，時校

長爲梅謙次郎博士。先生自謂其思想之轉變，成熟於此時。蓋從憲法中得知國家觀念，及主權在民觀念，使所謂君主之義棄若芻狗，固有之民族思想勃然而興。

官費生月給爲三十元，先生暇時從事譯書工作，月入五六十元，卽以作入專門科學費，並兼贍家及濟友之需。

中華民國紀元前八年甲辰（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二十二歲。

是年　國父歐遊歸國，順道至日本，與黃興相晤，東京中國留學生於富士山樓舉行歡迎　國父大會，先生偕胡漢民亦參加。先生聆　國父演說，心爲之折，遂決心參加革命。

中華民國紀元前七年乙巳（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二十三歲。

是年七月　國父手創之同盟會在東京宣告正式成立。先生偕朱大符往謁　國父於神田錦輝館，請入同盟會爲會員。三十日同盟會開籌備會，公推公推先生起草會章。八月二十日在赤坂靈南坂區坂本金彌氏別邸舉行成立大會。　國父爲總理，先生爲評議員兼爲「民報」編輯。「民報」於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東京出版，先生撰文提倡革命，如「民族與國民」等。粵督岑春萱大驚，乃派朱叔孚（之英）馳赴東京，擬加勸阻。先生拒之。是年先生五姐逝於廣東陽江廳。

中華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二十四歲。

先生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得法學士學位（在三百餘同學中考第二名）。同年先生在「民報」上絡續發表重要文章，如「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並與「新民叢報」派作論爭等。後「民報」因遭禁止，先生奉　國父命至南洋設同盟分會，於檳榔得識陳璧君。

事先先生長兄在兩廣總督岑春萱門下時，曾代先生與其同僚劉子蕃之妹訂婚，惟未得先生本人同意。岑春萱遂令先生長兄召先生返，先生接書後，即書一最後家信，署名爲「家庭罪人」，聲明取消劉氏女婚約，並宣佈脫離家庭關係，蓋恐己身參加革命，有以累家庭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五年丁未，（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二十五歲，

是年八月二十日，代「民報」以鼓之「中興日報」在新加坡創刊出版，由先生主持其事。同時並在南洋各地設立同盟會支部百餘所，一面努力募集革命資金。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二十六歲。

先生仍在南洋，奔走各地。；璧君女士於是年先赴日本留學。是年清景皇帝崩，溥儀即位，載灃監國。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先生二十七歲。

先生此時鑒於黨內同志因革命屢遭失敗，情緒大爲低落，同時康梁派乘機攻擊，光復會派章炳麟，陳芸人等又復附和，於是清廷即思利用此機會，籌備立憲，企圖分散黨人力量。先生遂毅然決定以一己爲犧牲，北上謀刺攝政王載灃，以一醒黨人耳目。

是年先生先由新加坡赴香港，惜事爲胡漢民所知，乃即與 國父聯電勸阻。先生爲謀刺事，曾先後於是年往返日本兩次。終於同年十一月上旬偕同志喻紀雲黎仲實陳璧君輩悄然北上。事前與胡漢民等有論爭書信往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先生二十八歲。

二月二十一日午夜，先生偕喻紀雲埋彈銀錠橋下，後爲軍警發見，至三月七日，先生於守眞照相

館內被捕，於衣袋中抄出「革命的決心」，「革命的趨勢」，及「告別同志書」三文，蓋先生事先早抱犧牲決心矣。

中華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二十九歲。

先生被捕後被判處終身監禁。一年後，即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同盟會於廣州舉義，造成黃花崗之役，一時各省革命勢力蜂起，夏曆八月十九日，武漢革命發動，翌日革命軍佔領武昌，清廷乃宣佈開放黨禁，企圖掙扎。夏曆九月十六日，清廷以明詔釋先生出刑部獄。計先生於庚戌年三月七日被捕，同月二十二日正式被判入獄，迄翌年九月十六日被釋，在獄時期前後一年又半。

先生出獄後，曾一度至天津創辦「民意報」，於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發刊詞即出諸先生之手。旋先生南下追隨　國父左右，代表共和政府與袁世凱商榷條件。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年）三十歲。

一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當時發表之就職宣言，即出諸先生手筆。

初先生以爲革命既告成功，願回歸書生本色，遂辭去一切政務，與陳璧君女士成婚，偕返廣州，省視兄嫂。八月間出國赴法。是年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年）三十一歲。

袁世凱帝制陰謀抬頭，　國父被迫辭職，後命李烈鈞黃克強等組織討袁軍，發動二次革命不果。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先生仍居歐洲考察。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年）三十二歲。

先生仍居法國，與李石曾蔡元培諸人，並在法國里昂創立中法大學，從事文學工作，一時詩作譯作極多。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年）三十三歲。

國父於日本正式宣佈討袁，蔡鍔將軍在雲南起義，先生奉召返國，先至上海，六月偕瑩君夫人赴香港。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年）三十四歲。

六月六日袁氏病死於故鄉新華宮中，五年來之討袁運動告一結束，先生遂再遊法國。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年）三十五歲。

國父在廣州發動護法運動，自任大元帥。先生奉召二次歸國，取道英國，芬蘭，經西伯利亞返。時俄國正值革命時期，先生觀察所得殊多。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年）三十六歲。

國父辭去大元帥職務，被選爲軍政府七總裁之一。先生在上海追隨 國父，努力黨之籌建工作。

是年先生爲探視其好友胡漢民在日本神奈川縣江之島養病，曾往日本一遊。

中華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年）三十七歲。

是年歐戰講和，因先生熟悉法國政情，被廣州軍政府推爲南方巴黎和會代表，先生不受。旋自太平洋經美國以私人資格再度赴法。

十月十日 國父改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年）三十八歲。

先生自法蘭西歸國，旅遊於廬山，莫干山等名勝間。旋隨 國父返廣州，重開軍政府。

是年第三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正式在上海成立。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年）三十九歲。

國父就非常大總統職；先生主持廣東教育事業，任廣東教育會會長。

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年）四十歲。

六月十六日以陳炯明叛變， 國父蒙難於總統府，脫險後赴滬，先生隨往。

中華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年）四十一歲。

國父返廣州，執行大元帥職務，主張國民黨容共，蘇聯代表鮑羅廷，加倫將軍相繼來華任顧問。

十月國民黨改組，通過容共，聯蘇，勞農三大政策。先生一時有國民黨左派之目。

中華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年）四十二歲。

一月廿日國民黨開全國代表大會，先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所有宣言均出諸先生手筆。國民黨開始北伐運動。

先生奉 國父命至北方進行採段張三角聯盟，以貫通國民黨勢力於北方。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在北京政變，推段祺瑞為執政。 國父決定親自北上商議一切，先生隨行。至上海後先期入北京佈置一切。 國父道經日本，在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講。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年）四十三歲。

國父逝世，先生侍側，並奉命草擬　國父遺囑。　國父既歿，先生亦罹重疾，旋於六月間返粵，被舉爲國民政府委員會常務委員主席，成爲　國父唯一後繼者。國民黨內部左右傾軋甚烈，廖仲凱因是死之。西山會議派成立，反對先生。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年）四十四歲。

一月一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先生任主席，通過容共政策。二十七日先生向中央政治會議提議北伐。然此時反對派活動益熾，致發生三月十二日中山艦事件。先生不欲見黨內分裂，於五月間返赴法國。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年）四十五歲。

自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三月，先生在法。後受蔣介石氏再三敦促，始於四月間再歸祖國。是時甯漢分裂局面已成，先生決往武漢一觀動靜，惟方在途中，甯漢已告決裂。但先生經「夾攻中的奮鬥」，終於領導武漢反共成功，使甯漢再歸統一。然十二月廣州暴動事件發生，先生適在南方，遂受政敵攻擊，爲表明心蹟起見，聲明辭職，再度出國赴法。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年）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在法讀書靜養，夫人璧君女士與曾仲鳴氏隨侍。足跡遍歷中歐南歐。惟對於國事則並未放棄其注意。如其「駁駐法總支部函」，「一個根本觀念」，「覆林柏生書」等，均對當時國事有所主張。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年）四十七歲。

關繞三中全會問題，國民黨中之青年份子，奉先生為領袖，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內容反對蔣氏獨裁。三中全會後，國內分裂現象又起，張發奎首先發表獨立宣言，聯合反蔣各派，主張擁護先生。先生遂於九月離法歸國，但先生之目的，不在支持地方軍人反對中央，而在黨的立場調解中央與地方軍人間的衝突，然不果。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年）四十八歲。

先生靜居香港。七月間各方主張先生出主國事，遂迎先生至北京，開擴大會議，仍主張於最短期內召開國民會議。旋因主張不果，仍返香港。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年）四十九歲。

胡漢民氏在京被蔣氏軟禁，舉國騷然。先生遂赴廣州另組國民政府，並組織非常會議，對內仍在貫徹維護黨統與黨治主張。旋因九一八事變發生，舉國主張團結，先生倡之尤烈。並率領代表至上海舉行談判。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年）五十歲。

先生出長行政院，適值淞滬戰爭爆發，先生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旋淞滬停戰協定成立。後因彈劾張學良，於八月間宣佈辭職，於十月間赴德國療病休養。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年）五十一歲。

是年三月，華北戰事重告爆發，熱河不守，平津危急，先生受中央一再敦促，於三月十七日返國，以「跳火坑」精神，再出長行政院。於五月三十一日成立華北停戰協定。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年）五十二歲。

先生仍長行政院，力謀中日和平方案。八月間於廬山先生與蔣介石黃郛兩氏間曾有對日政策之重要決定。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年）五十三歲。

先生仍主行政院。對中日和平關係雖備致努力，但兩國間劍拔弩張之形勢，日益緊張。元旦先生發表「救亡圖存的方針」，然中樞內部，意見紛歧。先生曾一度辭職不果，後於十一月一日六中全會席上，任大會主席團主席時被刺，身受槍傷三。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五十四歲。

二月先生出國就醫。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先生好友胡漢民於五月九日在港逝世，享年五十八歲。

中華民國廿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年）五十五歲。

西安事變後受中樞召，兼程返國，就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

是年中日戰事爆發，十二月首都淪陷，先生事先至漢口主持政務。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年）五十六歲。

國民黨於漢口召開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先生主席，決定和戰最高原則。就任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武漢與廣州相繼不守，先生深憂抗戰前途，亟思獲得正義之和平。十二月廿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聲明，先生向中樞力陳議和時期已成熟，不果。遂於十二月十八日飛離重慶，二十九日

發表聲明。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年）五十七歲。

自河內至上海，正式開始和平運動，於上海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親赴日本探訊和平條件之意向。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一九四〇年）五十八歲。

三月二十九日國府還都。先生任行政院長，兼代國府主席。十月三十日成立中日邦交調整基本協定。中政會推舉先生為國民政府主席。

中華民國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年）五十九歲。

六月間赴日本訪問。於國內開始清鄉政治建設。大東亞戰爭爆發，先生主張中日同甘共苦。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年）六十歲。

三月先生六十大慶，以國難方殷，力避舉觴。並竭力提倡新國民運動。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年）六十一歲。

於一月九日中國對英美宣戰。八月一日收回上海租界。十月三十日簽訂中日同盟條約。十一月初旬赴日參加大東亞會議。領導中國入於歷史轉機之重大局面。